

2005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上]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

[上]

[美] 托尼·朱特 著

林骥华 唐敏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欧洲史. 上 / (美)朱特著; 林骧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661-3

I. 战... II. ①朱...②林... III. 欧洲—现代史

IV. 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383 号

Postwar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2005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战后欧洲史(上)

[美]托尼·朱特 / 著 林骧华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56.625 字 数: 93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1-3

定 价: 88.00 元(上、下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与鸣谢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除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只有 550 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 1700 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 46 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详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 60 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1〕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埃立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时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 P. 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富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完全不同,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杰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 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我这本书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

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德妮丝·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

〔1〕在各章里,脚注大多属于传统类型的:它们是对正文的评价,而不是注明出处。为避免使这本为普通读者而写的早已很厚的书再添冗赘,我不再列出完整的参考资料来源。《战后欧洲史》的资料来源和一份参考书目可以用访问网站的方法获得,网址是雷马克研究所网站[<http://www.nyu.edu/pages/Remark/>]。

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 of 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学到很多东西)。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配合,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夏勒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却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高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高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我是靠了他们才成功地出版了这本书。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的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第12章和第14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宝琳娜·勃兰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赛蒙·杰克森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给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阿莱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必不可少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有一个快乐的结尾。我的妻子杰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导 言

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谜被揭开，就坠入了深渊。 1

——海因利希·海涅

情势(某些先生居然对此无动于衷!)在现实中给每一条政治原理涂上明显的色彩,并且带来不同的结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亲爱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哈罗德·麦克米伦

世界历史不是一片生长出快乐的土壤。各个快乐的时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页。

——盖奥尔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尔

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在 1989 年 12 月,恰逢时机。当时我正从布拉格回来,瓦克拉夫·哈维尔的《自由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筒。几个星期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被拆毁了。在匈牙利同在波兰一样,每一个人都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旧政权——几个月前它还执掌着一切权力——退出后的断裂。立陶宛共产党刚刚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收音机播送着罗马尼亚反对齐奥塞斯库家族独裁的暴动的最初报道。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这非常明显。但是随着旧秩序的逝去,许多长期以来实行的制度就会发生问题了。曾经看来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却转瞬

2 即逝。冷战对峙；东欧、西欧分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繁荣的西欧同它东面的苏联卫星国集团的故事是各自分离、互不传播：所有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或政治的铁定逻辑。它们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而历史却正在将它们推开到一边。

欧洲的未来看起来会非常不同——它的过去也是这样。回顾 1945 年至 1989 年的岁月，从现在来看，它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战后的间歇，1945 年结束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对欧洲的塑造有赖于未来岁月，以往经历过的熟悉的、有条有理的故事难以再重复。我觉得很明显，在那个冰冷的中欧 12 月份，战后欧洲的历史是需要重写了。

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1989 年的维也纳是一幅覆盖画，将欧洲原先复杂层叠的昔日画面覆盖了。在 20 世纪初期，维也纳就是欧洲：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在大灾变门槛上的多事之都、边缘状态、自我欺骗的中心。在两次大战之间，维也纳从辉煌的帝国大都市沦为一个微不足道小国的贫困干瘪首都，渐渐地褪失了荣耀，最终成为纳粹帝国的边疆省份，它的大多数公民向纳粹宣誓效忠。

德国战败后，奥地利落入西方阵营，被认定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种双重不幸的好运气使维也纳得以被除旧日的耻辱。它作为纳粹同盟者的事实被轻轻遗忘了。奥地利的首都——被苏联的“东”欧包围的一座“西”方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样。对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维也纳代表着“欧洲中心”：一个在世纪的进程中似乎被抛弃的欧洲人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区。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那些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倾听自由的地方，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地方，一个为东欧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东方的桥梁而相遇和启程的地方。

于是，1989 年的维也纳成为一个“思考”欧洲的好地方。奥地利体现着战后西欧颇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个充满福利的国家所标志的资本主义繁荣；通过一切主要的社会团体和政党自由地致力于创造工作机会和薪酬待遇而实现的社会安定；由西方核保护伞明显庇护下获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奥地利自身保持着沾沾自喜的“中立”。与此同时，跨过利塔河和多瑙河仅仅几公里的东面，是“另一个”荒凉穷困和秘密警察的欧洲。将两者分隔开的距离可以用维也纳的两个火车站的对比来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或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却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

3 正如维也纳的两个主要火车站无意中承认了欧洲的地缘分裂——西站面对乐观的、

赢利的西方,南站粗疏而很不情愿地承认着维也纳属于东欧一面的素质——这座奥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见证了一种无声的分裂,将欧洲平静的现实同它不安定的历史隔离了开来。咄咄气势、充满自信的楼宇沿宽阔的环城路而立,诉说着维也纳一度有过的帝国性质——尽管对于一个欧洲中型首都来说,这环城路本身似乎有点太大、太辉煌,因为它只不过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这座城市却无可非议地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间感到自豪。的确,维也纳很能够唤起对昔日荣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历史,它却注定要缄默。

犹太人曾经占据了内城的许多楼宇,对绘画、音乐、戏剧、新闻和思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曾经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点,维也纳却缄口不言。维也纳的犹太人被暴力驱赶出他们的家,从维也纳漂泊向东,并且抹去对一切往事的记忆,因为这些往事有助于说明维也纳今日戴罪的宁静。战后的维也纳像战后的西欧一样,对于无法言说的历史闭口不谈。最糟糕的历史大多发生在陷于苏联控制之手,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却(在西欧),或很容易被掩蔽(在东欧)的原因。随着东欧回归,以往的历史将不再难以言说:但现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说了。1989年后,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将来,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可以难为情的。

虽说我正是在1989年12月决定撰写一部战后欧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动笔。这是因为客观情势复杂交织。回顾往事,有一点是很幸运的: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朦胧模糊,到今天却变得有些明朗了。档案馆的大门敞开了。革命性的转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却使自身厘清了从1989年动乱以来的某些长期后果,使之现在触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容纳成千上万名从邻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难民。

奥地利放弃精心培育的战后自治、加入欧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现为欧洲事务中的一股力量,这是东欧剧变的直接结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访维也纳时,发现西站贴满了尤尔格·海德尔的自由党的海报。虽然海德尔公开吹捧说,纳粹军队“可尊敬的人们”在东部战线“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仍然赢得那一年的27%选票,其手腕是煽动奥地利同胞们对过去10年里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产生的焦虑和不理解。在几近半个世纪的静默之后,维也纳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重返历史。

* * * * *

4

本书讲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故事,所以从1945年开始说起: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零点开始。但是,正如20世纪的一切事情一样,它的故事被从1914年开始的30年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大陆从那一年起就开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切参与者难忘的屠场——塞尔维亚18岁至55岁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战斗——但是

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德国(与当时普遍认为的相反)在战争中、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未被摧毁:很难解释它只过了 25 年就又崛起,而且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确实,由于协约国的胜利代价超过了德国战败的代价,而德国并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赔偿,因此在重新崛起时,比在 1913 年更强大。随着一个世代以前普鲁士崛起而在欧洲浮现的“日耳曼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1918 年旧式土地帝国垮台后出现的一些小国家都是贫穷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邻国。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多的是“历史修正派”的国家: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在大战中被打败,它们等待时机要收复领土。1918 年后,国际局势并未恢复稳定,大国之间也未恢复平静:只不过由于筋疲力尽而产生了一段幕间休息而已。暴力战争并未减弱。它转向了国内事务——转变为民族主义争端、种族歧视和内战。欧洲在 20 年代、尤其是在 30 年代,步入了一场战争的余烬和另一场隐约可见的战争之间的薄雾之中。

随着欧洲经济的垮台,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势更加恶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垮台引发了恶化的形势。在那些年里,欧洲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遭到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扭曲了国内就业,摧毁了贸易,蹂躏了整个地区,甚至还造成了破产国家。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欧——从此未能从这些后果中再恢复元气。那些恢复元气的国家在 30 年代的萧条中重又走低,而银根紧缩、商业失败、竭力保护关税以遏制外国竞争,等等,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失业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荒废,而且使国际贸易崩溃(1929—1936 年法德贸易下跌 83%),由此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怨恨加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受影响的国家中平民人口和国内经济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叙说。

5 这些打击所积累的冲击,毁坏了一种文明。欧洲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其范围之广,即便在战争刚发生时,也使当时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有些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将资产阶级欧洲的自杀当作一次为改善境遇而战的机会。奥登称 30 年代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担道义和树立政治信念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幻灭和丧命中达到高潮。这是只有 19 世纪的夏天在印度才会发生的激烈幻觉,此时却投入了一个更险恶时代的意识形态激烈战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多么渴望一种人类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经受悲惨的失败。”(阿瑟·科斯特勒语)

欧洲绝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欧更远的地方,然后——倘若他们能及时逃出去——逃向美洲。还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沃尔特·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欧洲大陆最终跌进地狱的前夕,它的前景显得毫无希望。在欧洲文明自我爆炸的过程中,无论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维也纳失去的东西,

其迹象早已由卡尔·克劳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凭直觉而知觉到了——都再也无法重新获得。在让·雷诺瓦于1937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成名作《大幻觉》里,当时只能诉诸战争及其伴随的关于荣誉、地位、阶级的神话。但是到了1940年,有头脑的欧洲人发现,整个欧洲最大的一种幻觉是“欧洲文明”自身,而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再找回来的东西。

根据在此以前所消逝的一切,可以用使人理解的方式、用一种自怡自乐的甚至抒情的方式,来尝试叙述1945年之后欧洲出人意料地复苏的故事。而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写成的史书——就像欧洲政治家们在回顾自己这些年里的成就时采用的主调一样。在整体战争的大灾难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复苏和重新崛起;国家之间不再起冲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扩大欧洲内部的合作;30年经济熔毁过后的持续性经济复苏,以及繁荣、乐观、和平的“正常化”——这一切都引起了夸张的反响。欧洲的复苏是一个奇迹。“后国家的”(post-national)欧洲接受了晚近历史的教训。一个和解的、和平的欧洲站起来了,“像凤凰一般”从它的谋杀——甚至是自杀——的历史灰烬中再生了。

就像许多神话一样,这种使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对20世纪下半期欧洲历史的叙述,包含着一种核心的事实。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东欧——从奥地利边界到乌拉尔山脉,从塔林到地拉那——未能填补这些空白。它的战后几十年同以前发生的一切相比,当然是和平的,但仅仅是由于苏联红军未经邀请的驻扎:这是坦克监视下监狱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说苏联集团的卫星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发展相比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莫斯科靠武力强迫它们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战后欧洲两个部分的历史不能相互孤立来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和先前战争的后果,迫使东欧和西欧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样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际事务的秩序,以避免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欧洲两个部分最初的普遍选择是寻求20世纪30年代那种激进方案的统一战线运动(这一点提醒人们,有时看来1945年绝对不是新开端)。东欧的某种激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声名狼藉的过去,已经没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共产主义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一种两难,而对此要做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实在的。

西欧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和压力)。对统一战线方案和共产主义的吁求减退了:这两者都是西欧在艰难时代开出的药方,但至少从1952年起,时世已不再那么艰难。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里,战后初期的艰难困苦已被遗忘。但是在1945年时,看来非常现实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确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正因为有可能回到旧日的噩梦(失业,法西斯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革命),所以西欧走上了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合

作,和平的欧洲,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欧洲理想主义者在深情回顾中想象的那种乐观主义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计划。它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在历史的阴影下,它的领导者们实施社会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过去的历史重演。

当我们回忆起苏联集团当局实质上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计划时,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握了。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设立防线来阻止历史倒退——尽管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不是靠社会进步,而是靠使用人力资源来保障实现目标。晚近历史的重写——而且鼓励民众去遗忘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说法,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疑消灭的不仅是以往历史的缺陷,而且还消灭了使它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一种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然而共产主义的迷思在无意中证实了,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继承历史的负担,这项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个新欧洲创造了条件。但是整个欧洲在1945年之后的许多年里,长期生活在刚刚过去的历史上由独裁者们和历次战争投下的阴影。这是战后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体验之一,他们同美国人有区别,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教给他们的是相当不同的、完全乐观主义的课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寻求对1989年欧洲历史的理解——以及欣赏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变,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要的起点。

7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阐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时,所说的两种“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间的风格区别颇有影响,他引用希腊诗人阿契洛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按照伯林的话来说,本书绝不是一只“刺猬”。我在书里提不出关于欧洲当代历史的重大理论;不阐释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题;不讲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没有主题形式。相反,它的主题还不止一个。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首先,这是一段欧洲地位下降的历史。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国际的或帝国的地位。这条规则有两个例外——苏联算一个,大不列颠部分地算一个——直到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段之末,它们在自己眼里、在任何问题上都只能说是半欧洲性质,而它们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欧洲大陆的其余大多数国家都曾经蒙受战败或被占领的耻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从法西斯主义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赖援助就控制住共产主义。战后欧洲靠外人来得到解放——或者说是得到豁免。欧洲人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控制自己的命运。从前的欧洲海上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领土,在这些年里全都沦落,回到欧洲本土,它们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欧洲自身。

其次,20 世纪下半期的欧洲历史上,“主人话语权”(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 世纪的一些重大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 20 世纪上半期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其原因各不相同——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目标和 19 世纪的拆毁“社会”计划相仿,同时对不受束缚的市场放弃公共事务,使国务最小化(the minimalist state);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 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欧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计划——只有自由的前景,这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希望,现在已经实现了。

第三,作为对欧洲历史上意识形态的过时野心的最温和替代,姗姗来迟地出现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欧洲模式”。产生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欧洲共同体”和它的后身“欧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这是规范社会交往和 8 国际关系方面特征明显的“欧洲式”道路。这种欧洲方式囊括一切,从儿童保健到国际法律规范,代表的不仅仅是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僚实务;到 21 世纪初,它已变成有抱负的欧盟成员国的一座灯塔、一种范例,是对美国、对富有竞争性魅力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全球性挑战。

欧洲这种史无前例的决定性转型——从地理表现(一种相当有麻烦的表现)转变成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范型和磁场——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积聚的过程。根据亚历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对两次大战之间波兰政治家们的错觉的讽刺说法,欧洲不是“命定走向伟大”。它出现的这种能力,从 1945 年、甚至 1975 年的情况出发都肯定是无法预见的。新欧洲不是预先构想的共同计划: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计划。但它在 1992 年后一旦变得明晰,欧洲的确占据了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一样。

交织在战后欧洲叙事中的第四个主题是:它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常常被误解。1945 年后,西欧人要美国介入欧洲事务——但他们也厌恶这种介入,因为那意味着欧洲的衰落。再者,尽管美国在欧洲存在,尤其是在 1949 年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两部分依然十分不同。西欧眼里的冷战与在美国唤起的相当警觉性的反应大不相同,而随之而来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西欧“美国化”则往往是被夸大的,这在下文行将叙述。

东欧以相当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及其特性。但其中也会在误导下过分地夸大 1989 年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东欧的影响。东欧和西欧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们——例如法国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克拉夫·哈维尔——都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成为他们国家的任何一类社会楷模。虽说年轻一代的 1989 年后东欧人——

度兴奋地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来使自己的国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务、低税收、自由市场,但是并未达到那种样式。欧洲的“美国化契机”只存在于过去。未来东欧的“小美国”可能会明明白白地存在。

最后一点是,战后欧洲的历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欧洲大陆曾经是一幅复杂交叉的多彩画面,其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社会和民族是互相叠合的。它的许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国边界结合部的一些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萨拉热窝、萨洛尼卡、切尔诺维茨、敖德萨,或维尔纳——实际上先前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处。我们不会将这种旧欧洲理想化。波兰作家塔德兹·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几近喜剧般的各民族熔炉在欧洲心脏地带冒着危险的火花,”周期性地爆发动乱、屠杀和迫害——然而这是真实的,它在鲜活的记忆中仍然存在。

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欧洲却被摧毁成灰。一个更有秩序的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熠熠发光,目标却不松散。由于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使每一个人现在几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里,东欧人和西欧人都生活在封闭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来的属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种族的少数人群体——例如法国犹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进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会。只有南斯拉夫和苏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但只是欧洲的一部分——站在这个新的、先后趋向同质的欧洲之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从苏联解体和欧盟扩展以来,欧洲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局面。其间有难民和客籍工人,而欧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国都市,期待着就业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来自那些随着欧洲扩张疆域而失败或倒退的国家,将伦敦、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兰等十几座城市变成了世界性的城市,无论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这一新的现象,即欧洲土地上居住着“别人”——例如,目前在欧盟国家里居住着的大约1500万穆斯林,还有等待进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8000万穆斯林——不仅减轻了欧洲目前对移民越来越多样化的前景的不舒服感,而且也因欧洲历史上死去的“别人”从脑海里消失而变得更自在。自从1989年以后,比过去更清楚的是,战后欧洲的稳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赖了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们之间,由于战时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的协助,独裁者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大陆基础。

对于这一令人窘迫的扭结(kink),在对欧洲历史朝向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阳光普

照的辽阔高地”平缓前进的叙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战后东欧和西欧——至少直到 60 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除了偶尔的争论外,对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牺牲者——的记录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回忆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们熟悉的道德规范方面:善对抗恶,反法西斯主义者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运动战士对抗通敌分子,等等。

1989 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认识到(有时发毒誓反对和否认)为欧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价。波兰人、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知道的话——他们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前真实地发生的是什麼。即使德国人也重温他们国家的公认历史——结论却自相矛盾。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人遭受了苦难,德国才是牺牲品,无论是在英国轰炸机、俄国士兵或捷克驱逐者手里——这些都是受到关注的问题。犹太人在某些受尊敬的场合再次被小心翼翼地提及,并非只有他们才是受害者……

这些说法无论是好是坏,都可以辩论。这种公共记忆是否全部属于一种政治健康的迹象?或者说有时像戴高乐一样,非常明白要更小心地遗忘它?本书的“跋”里再谈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只是指出,不必将这些最近中断的破碎回忆——它们有时同当时爆发的人种或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被理解(尤其是在美国)——理解为欧洲原罪的阴毒证据:它没有从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它带着记忆缺失的怀旧,它随时倾向于回到 1938 年。按照约基·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这不是“又一次似曾经历的错觉”。

欧洲不会回到战时的动乱历史——相反,它正在远离那段历史。今日的德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意识到的是自己的 20 世纪历史,而不是以往 50 年里的任何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回到过去。本书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的身上。然而,它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根据几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痛苦的公开辩论——看来比较合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人也应该至少能够公开质疑完全有意所为的官方记忆的准则。我们也许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好兆头。但这是一次闭幕。希特勒死后已经 60 年了,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目 录

前言与鸣谢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战后欧洲:1945—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3

第2章 惩罚 28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47

第4章 难以安定 79

第5章 冷战来临 104

第6章 卷入漩涡 144

第7章 文化战争 173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200

第二部分 繁荣与不满:1953—1971

第8章 政治稳定 213

第9章 幻想破灭 246

第10章 繁华年代 287

附记:两种经济的故事 323

第11章 社会民主时期 328

第12章 革命的幽灵 354

第13章 尘埃落定 383

第三部分 衰退时期:1971—1989

第14章 降低期望 411

第15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438

第16章 过渡时期 456

第17章 新现实主义 492

第18章 无权者的力量 515

第19章 旧秩序的终结 539

第四部分 失败之后:1989—2005

第20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585

第21章 清算 610

第22章 旧欧洲—新欧洲 643

第23章 欧洲的多样性 693

第24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718

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741

索引 768

第一部分

战后欧洲：1945—1953

第 1 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发生在欧洲化世界的不是缓慢衰败——其他各种文明轰轰烈烈地 13
向前发展，欧洲文明却被炸得粉碎。
——H. G. 威尔斯《战祸将临》，1908 年

战争想要摆脱的人类难题尚未被人想象到，更不用说会有谁在正视它。生活
的结构从来未被如此毁坏、如此解体过。
——安妮·奥海尔·麦克考米克

到处都在渴求奇迹发生，获得救治。战争将那不勒斯赶回到了中世纪。
——诺曼·刘易斯《1944 年的那不勒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完全呈现一片悲惨荒芜景象。当时的新闻照片和记录影片显示了大量可怜而且无助的平民在轰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凉的乡间跋涉。孤儿们愁苦地流浪，衣衫褴褛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瓦砾中拾荒。被驱逐出境的人剃光脑袋，集中营囚徒穿着带条纹的衣裤，饥病交迫，目光呆滞地张望着镜头。甚至连电车也好像被炮弹击中过，在损坏的轨道上，凭着时来时停的电流艰难地行进。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惫不堪，由于失去支撑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营养良好的盟军占领部队。

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这同一块大陆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那么就必须对这幅景象做细致描绘。然而它传递的是德国战败后欧洲状况的根本事实。欧洲人感到绝望,他们的确疲惫不堪了——不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欧洲战争开始于1939年9月希特勒侵占波兰,结束于德国在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总体战争,它将平民和士兵都裹挟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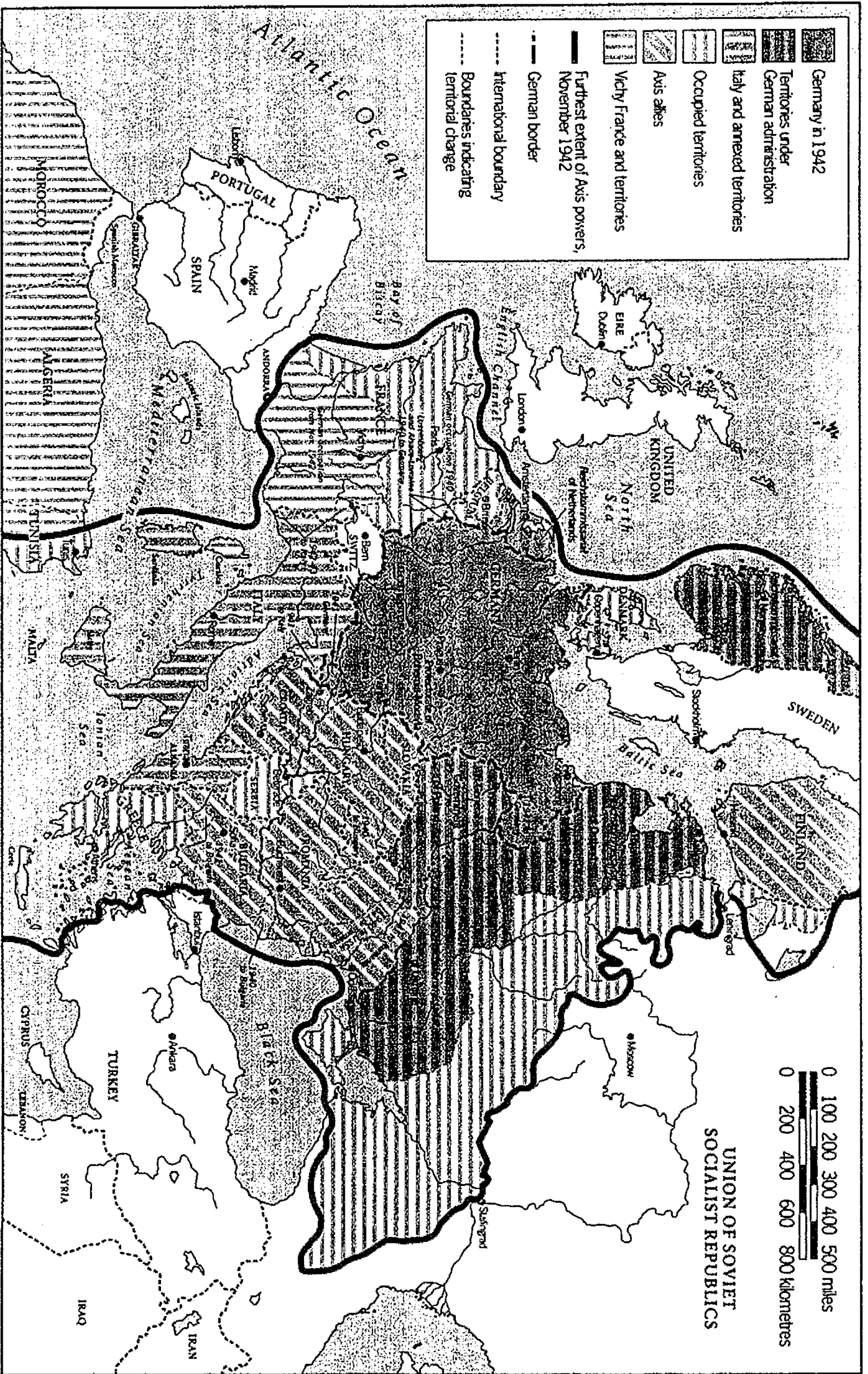
14 的确,在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从法国到乌克兰,从挪威到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平民的经历。正式的军事战斗只限于冲突的开端和末尾。在这两端之间,这场战争是占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而在其中,由士兵们、冲锋队员们和警察们控制着日常生活和千百万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国家里,占领持续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给一切地方带来了恐惧和剥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几乎是全世界的经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卷入的国家(英国,德国)经历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开始得更早,从1938年10月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希特勒战败后,战争仍未结束,因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内战在德国出局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

当然,战争的占领在欧洲并非史无前例。完全不是。民间还保留着对德国17世纪30年战争的记忆,在那场战争中,外国雇佣军占领土地,使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后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中还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们还用拿破仑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经历使他们印象殊深。这部分地是由于纳粹对待屈服的人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先前的占领军——17世纪占领德国的瑞典人,1815年后占领法国的普鲁士人——占领土地后,侮辱和屠杀当地平民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939年后,陷入德国统治之手的各国人民或者必须为第三帝国服务,或者被列入摧毁计划。这对欧洲人来说遇到了新问题。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里,习惯于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约束或奴役当地人。他们也只是使用拷打、残害或大规模屠杀来迫使受害者服从。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在欧洲人自己中间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与普鲁特河以西的地区。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欧洲国家的整体力量第一次被动员起来,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剥削其他欧洲人。为了作战取胜,英国剥夺和洗劫它自己的资源:到战争末期,大不列颠为战争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多。然而纳粹德国为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利用了大量掠夺受害国家的经济而得来的财富(这同1805年以后拿破仑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过其效率之高使拿破仑难以望其项背)。挪威、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



地图：1942年11月，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

维亚,尤其是法国,很不情愿地为德国的战争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矿山、工厂、农庄、铁路完全服从德国的需求,它们的人民被迫为德国的战时生产而工作:起初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后来在德国本土。1944年9月,在德国本土有748.7万名外国人,组成德国21%的劳动力,而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

16 纳粹分子尽可能长时间地享用受害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他们很成功,直到1944年,德国平民自己才感受到战时限制和物资短缺的压力。但到此时,军事冲突已经向他们逼近了,起先是盟军的轰炸,接着是盟军部队同时从东、西两面向德国推进。正是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年,在相对短时间里苏联军队向西进攻,才发生了最厉害的实质性毁灭。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要衡量战争造成的冲击力,不是根据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业损益,或者国民资产净值,而是根据他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处地区能目睹的破坏程度。如果我们想理解在1945年引起观察家们注意的凄凉绝望景象背后的创伤,就必须从这些情况着手。

幸存的欧洲城市和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很少有不受创伤的。根据非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凭着幸运,欧洲有几座著名城市——罗马,威尼斯,布拉格,巴黎,牛津——这些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中心,从未被当作攻击目标。但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德国轰炸机炸平了鹿特丹,进而摧毁了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先后经过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侵略途中消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城镇。整个伦敦中部地区,即著名的东区码头周边的穷人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纳粹空军闪电战的受害者。

但是最大的物质损害是西方盟军在1944年和1945年史无前例的轰炸、还有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布拉格的不屈不挠进军造成的。美国空军切除了法国沿海城镇鲁瓦扬、勒阿弗尔和卡昂。英国和美国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将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等几十座德国城市化为废墟。在东欧,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在战争结束时被毁面积达80%;乌克兰的基辅沦为灰烬;而波兰首都华沙却在1944年秋天德国军队溃退时,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系统地被放火或炸毁。当欧洲战事结束时——在1945年5月的最后14天里,柏林承受了苏联红军4万吨炮弹——德国首都大部分沦为瓦砾和扭曲金属物的冒烟丘堆。它的75%建筑物不复存在。

17 变成废墟的城市是惨遭蹂躏的最明显——有照片为证——证据,它们成为对战争之悲惨的普遍视觉速记。由于大多数破坏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结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估计有2500万名苏联人、2000万名德国人——其中仅汉堡一地就有50万人),遍地瓦砾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地提醒人们,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但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在西欧,交通和运输遭到严重破坏。法国在战前有1.2万个火车头,而到德国投降时,只有2800个还能使用。许多道路、铁轨和桥梁都被炸毁——有撤退的德国人炸的,也有盟军

进攻时或法国抵抗力量炸的。三分之二的法国商船沉没海底。仅在1944年至1945年，法国失去了50万所住宅。

但是法国人——同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由于德国人炸堤放水，损失了21.9万公顷土地，到1945年时，战前的铁路、公路、运河运输线仅存40%）、丹麦人、挪威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战前资产损失了14%）、甚至意大利人相比——相对说来还算幸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恐怖之处却在更远的东面。纳粹对西欧人还算客气，只要能够剥削他们就行，而西欧人回敬的是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冷酷无情，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游击队——尤其在希腊、南斯拉夫和乌克兰——不屈不挠同他们战斗，哪怕是毫无希望的战斗。

德国占领东欧造成的物质后果，苏联的反攻，游击队的斗争，这些都与西欧的战争经历完全不同。在苏联，7万个村庄、1700个城镇毁于战火，同时损失的还有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在希腊，全国活跃的远洋海轮损失了三分之二，它的三分之一森林被烧毁，1000个村庄被消灭。与此同时，德国的政策是根据军事需要来确定对其占领成本的赔款，而不是对付由此引起极大的通货膨胀的能力。

南斯拉夫损失了25%的葡萄园，50%的各类家畜，60%的全国道路，75%的农田和铁路桥，战前房屋的五分之一，本来就有限的工业财富的三分之一，以及战前人口的10%。在波兰，四分之三的标准铁路无法使用，六分之一的农场不能再耕种。全国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瘫痪（尽管完全毁坏的城市只有华沙）。

然而这些数字即便再重大，也只体现了一部分画面：整个大地变得阴森可怖。欧洲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尽管可怕，但是同人的损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据估计，1939年至1945年，3650万欧洲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相当于战争爆发时法国的总人口），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几年里自然死亡的人数，也不包括当时及后来由于战争而未能怀胎出生的孩子。 18

总体上的死亡人数大得惊人（这里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日本、美国或其他非欧洲国家的人）。它使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相形见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冲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属于非战斗人员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1900万，或者说占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平民死亡人数都超过军人。只有在英国和德国的死亡人数中，军人比平民多得多。

对苏联领土上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各不相同。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超过1600万人（大约是苏联军队牺牲人数的两倍，军人仅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就牺牲了7.8万名）。在战前的波兰版图上，平民死亡人数达500万；南斯拉夫是140万；希腊是43万；法

国是 35 万；匈牙利是 27 万；荷兰是 20.4 万人；罗马尼亚是 20 万。在这些死亡的平民中，尤其在波兰、荷兰和匈牙利的统计数字中，犹太人占约 570 万，还要加上 22.1 万名吉卜赛人（男子）。

平民死亡的原因包括从敖德萨到巴尔干半岛的死亡营和刑场上的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等等引起的；枪杀和烧死人质——由德国国防军、红军和各种游击队执行的；报复性屠杀平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东部战线和从 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到第二年 5 月希特勒死亡期间的西欧，在田野和城市里由于轰炸、炮火和步兵战斗造成的结果；精心策划的扫射逃亡军团；在战时工厂与俘虏营里由于奴役劳动而劳累致死。

军队的最大死亡人数在苏联，据信死亡 860 万男女武装人员；德国伤亡人员 400 万；意大利海陆空军人损失 40 万；罗马尼亚阵亡军人大约是 30 万，大多数牺牲在苏联战场上对轴心国军队的作战中。然而同各国的人口相比，军人阵亡损失最大的是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军人和平民合计死亡人数而论，波兰、南斯拉夫、苏联和希腊最惨。波兰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战前人口，这是纳粹精心完成的毁灭性目标。^{〔1〕}南斯拉夫失去战前人口的八分之一，苏联失去十一分之一，希腊失去十四分之一。从比对的角度看，德国损失率为十五分之一；法国七十七分之一；英国一百二十五分之一。

19 苏联损失的人口中尤其包括战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大约 550 万名苏联士兵，其中四分之三是 1941 年 6 月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初 7 个月里俘虏的。其中 330 万因饥饿、寒冷、虐待而死于德国集中营里——1941 年至 1945 年，苏联士兵死于德国战俘营里的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各国士兵总人数。1941 年 9 月，德国人攻占基辅，俘虏 75 万名苏联士兵，其中只有 2.2 万人活到德国战败的日子。而苏联人俘虏了 350 万人（大多数是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大多数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这些数字而言，毫不奇怪，战后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遭受极其缺少男人之苦。在苏联，女性人数比男性多 2000 万，这一人口不平衡现象要经过不止一代人才能纠正。当时苏联农村经济倚重女性来承担每一种劳动：不仅缺男人，而且几乎没有马。在南斯拉夫，由于德国人的报复行为，15 岁以上的男人均遭枪决，致使许多村庄根本没有成年男子。在德国本身，1918 年出生的男人中，三分之二未能活过希特勒的战争：我们掌握有一个社区——柏林郊区特雷普托——的详细数据：到 1946 年 2 月，在 19 岁至 21 岁的成年人中间，女性有 1105 人，男性只有 181 人。

〔1〕 或者说是斯大林的目标，他在 1940 年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 2.3 万波兰军官，事后推诿给德国人。

妇女的这种过分表现造成了许多后果,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德国男性的卑屈和失势地位——从希特勒气焰万丈的军队里的超人堕落为一队衣衫褴褛的迟归战俘,茫然不知所措地遇到了一代严峻冷酷的女人,她们被迫学会没有男人的生存,靠自己解决问题——这并非虚构(德国总理葛哈德·施罗德就是战后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千千万万德国儿童之一)。雷纳·法斯宾德在他导演的电影《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里甚为有效地使用了这类战后德国妇女的性格形象,同名女主人公将她漂亮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精力当作优势,毫不理睬她母亲恳求她不要做任何“可能对灵魂有害”的事情的劝告。但是影片中的玛丽亚挑起重担,面对下一代人充满愤恨的幻灭情绪;而实际生活中1945年的德国妇女面对的却是许多更直接的困难。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军队向西挺进到中欧和东普鲁士,几百万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先行逃走。英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个场面:“苏联红军一进来,灾难就降临这个地区了,现代欧洲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根据现存的一切证据来判断,在苏联红军最初经过之地,相当多的地方,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无一存活……苏联人……将当地人口横扫干净,自从亚细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还有的话)和任何年龄的妇女。据诊所和医生报告,在苏联军队到达维也纳后的3个星期内,这座城市里有8.7万名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被强奸的妇女人数还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德国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这一周内。这两个数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们还不包括苏联军队向奥地利进军和横跨波兰西部、进入德国的途中,乡村和城镇妇女被侵犯的未统计人数。 20

苏联红军的行径几乎已不是秘密。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军里的亲密战友、坚定的共产党人米洛万·德吉拉斯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这件事。据德吉拉斯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德吉拉斯自己作为一名作家,难道不知人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他能否理解士兵经历血与火、死亡威胁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或弄一点小事情?”

斯大林回答问题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对的。苏联军队没有休假制度。许多步兵和坦克兵一连战斗了可怕的3年,跨过苏联西部,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们的进军路上,目睹和听到德国军队暴行的无数罪证。德国国防军起先骄横地进军到伏尔加河、莫斯科城边、列宁格勒,后来在艰难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杀,他们确实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战俘,虐待平民,虐待游击队员,并且破坏一切东西,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

当苏联红军最终到达欧洲中部时,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

方的对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后悔让俄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变得更明显。当德国士兵在东欧发泄兽欲和大规模屠杀时，德国本土仍然很繁荣，在战争进行到很晚之前，德国平民很少意识到战争的物质代价。战时的德国是一个城镇遍布、到处实现电气化、衣食无虞、商店里消费品充足、妇女和儿童营养良好的社会。在苏联士兵看来，这一切同他们自己惨遭蹂躏的故乡简直是天渊之别。德国人对俄国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女人就是战利品。在指挥官们的默许下，苏联红军放松了纪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国土地上的平民实施报复。

21 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道路上，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抢夺“战利品”（这种说法曾经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国女人受害最深。1945年到1946年，在苏占区生下了15万至20万“俄国娃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统计过的流产，其结果是许多妇女同她们不想要的胎儿一起死去。幸存下来的婴儿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孤儿：这是战争造成的人类流浪者。

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万名孤儿；在荷兰有6万名；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在南斯拉夫可能有30万名。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800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1945年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800卡路里）。在荷兰1944—1945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规定的每日配给量；1.6万名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每日摄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这只是平均数。1945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

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区甚至更糟。〔2〕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买得起。

22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1945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发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1945年10月报告说,西德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1945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伤寒,2193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五分之一的人患了肺结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于1946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1944—1945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1945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民族政策,而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1939年至1941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巴尔干地区向东驱逐了一百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引了巴尔干地区的大约

〔2〕 1990年法国每人平均每日消费3618卡路里,可资对比。

12 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 13.6 万人,来自罗马尼亚的 20 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 1939 年到 1943 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在东欧和西欧之间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 3000 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同这些安全地逃回的人一样,在其他地方移民的人也逃回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 1945 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 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

从东欧来了巴尔干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队多达 2.4 万名哥萨克士兵及其家属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 10 万多名克罗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队的愤怒报复。^[3] 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 1945

[3] 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驻扎奥地利的英国军队后来将他们遣送回去,交给南斯拉夫当局(根据盟军协议,将这类囚徒交给他们与之打过仗的政府),其中至少有 4 万人被处决。

年时纳粹移置的最大群体。对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社会经历,其中包括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置到德国的28万名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如失业的荷兰人,1939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4〕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1944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200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留下性命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1946年7月到9月间,63 387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在1945年发生的事,以及此后至少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史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转移的活动。这部分地是由于“自愿的”种族分离的结果:例如,犹太人幸存者离开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兰,或意大利人离开伊斯的利亚半岛,不愿生活在南斯拉夫 25 统治下。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曾同占领军合作过(居住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匈牙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居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苏联西部的乌克兰人;等等),他们在德国国防军撤退时一起逃离,以免受到当地多数民族或正在挺进的苏联红军的报复,从此不再回

〔4〕然而他们也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在大萧条的岁月里,拒绝一份来自德国的工作合同,就会冒失去荷兰失业救济的危险。

去。他们的离境可能并不是地方当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胁迫,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经生效。德国人当然早已用迁移和屠杀犹太人开始执行这项政策了,并且大规模地驱逐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从1939年到1943年,在德国庇护下,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新边境线,来回往返。苏联当局反过来策划了一系列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强迫性人口置换;100万波兰人从现在归属乌克兰西部的家园逃走或被驱逐,而50万乌克兰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间离开波兰,回到苏联。在几个月的过程中,曾经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变成了两个明显单一民族的领土。

保加利亚将16万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2月同匈牙利的协议,将斯洛伐克境内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万人换回了同等数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种迁移还发生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南斯拉夫南部40万人迁到北方,填补60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撤走后的空缺。我们不准备讨论与此相关的人口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德国人。

在任何情况下,在东欧的德国人都可能逃往西欧:到1945年,他们不受其家族已经定居几百年的那些国家的欢迎。当地人都真心希望惩罚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以报复战争与占领对他们的劫掠与蹂躏。战后各国都利用了这种情绪,于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巴尔干地区和苏联西部的德语社群就知道自己注定有厄运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早在1942年,英国就私下里答应捷克的要求,即在战后迁走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口,次年,俄国人和美国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斯颁布命令,“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题。”〔5〕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国者”)的财产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同年8月2日,他们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资格。将近300万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数住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在此后的18个月内被驱赶回德国。在驱逐过程中,有大约26.7万人死去。1930年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日耳曼人占人口总数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他们只占1.8%了。

匈牙利驱逐了62.3万名日耳曼人,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名日耳曼人,南斯拉夫驱逐了大约50万名日耳曼人,波兰驱逐了130万名日耳曼人。但是人数最多的日耳曼难民

〔5〕 1945年5月9日,班尼斯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讲话中宣布,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再希望和匈牙利人、日耳曼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自此之后,这种情绪以及随后的行动,始终缠绕着住在捷克的日耳曼人和住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

却来自德国本土的前东部地区：西利西亚、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美国、英国、苏联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达成协议，在条约第8条里，三国政府“认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说是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都应该承担迁移责任。”这只是部分地认可了早已发生的事实，但它表明正式认可执行将波兰边境居民向西迁移。当时在波兰境内大约有700万日耳曼人，波兰当局（和苏联占领军）要他们迁移——致使部分波兰人和其他各族人失去此时已经并入苏联的波兰东部土地，向西去新的地方定居。

其结果是法律上承认的一种新现实。东欧强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证过的，他归还“东普鲁士给它所从属的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发生的任何迁移都应有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震惊于对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纽约时报》记者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记录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这一重新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的报应。”

历史并未施以报应。事实上，1300万被驱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并融入了西德社会，但是记忆犹存，在巴伐利亚（许多人移居在此），他们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在当时的人们听来或许有点刺耳的是，尽管日耳曼人被驱逐一事也会被说成是“反人类之罪行”，但是几个月后揭露出，同是这些日耳曼人犯下了一种规模更大的罪行。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着，存在着，而被他们所害的人——首先是犹太人——却大多数都死了，不存在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的美国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在几十年后写道：在战后驱逐和战时人口灭绝之间有一条关键的区别，“战时的驱逐者们伴送被驱逐者，以保证将他们关入聚居地，然后杀害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做苦工。” 27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定和调整边界，但是居住在各国边境的人口总体上还留在原地。〔6〕1945年后所发生的情形正相反：边界线大多不动，而人口却迁移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有一种感觉，即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和约》的少数条款是失败的，而试图重订条约又会是一种错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立即想到要迁移人口。倘若中欧和东欧幸存的少数民族不能有效地受到国际保护，那么最好是将他们遣送到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去。“种族清理”的说法尚未存在，但是事实肯定已经发生——而这完全不会引起总体上的反对或遇到难堪。

〔6〕 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明显例外的只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

例外的情况频繁地发生在波兰。波兰版图的调整——东部边境6.9万平方英里割给苏联,得到的补偿是从德国划给的奥得河-尼斯河以东4万平方英里相当好的土地,这件与波兰、乌克兰和德国的土地相关的重大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但是在1945年的情势下,这一点非同寻常,而且应当理解为斯大林在沿苏联西面边界强行作领土总体调整策略的一部分:从罗马尼亚收复比萨拉比亚,分别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将一些巴尔干国家并入苏联,保留了战争期间从芬兰夺来的卡累利阿半岛。

苏联边界的西面几乎没有变化。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收回了一片狭长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由于它是战败的轴心国,所以它无法拒绝)获得了布拉迪斯拉发对面多瑙河右岸的3个村庄;铁托可以掌握位于的里雅斯特周围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原意大利一部分领土,这是他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占领的。其余在1938年至1945年间用武力占据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国家,由此恢复了原来状况。

28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上述结果导致欧洲比以往更明显地成为由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种族组成的欧洲。苏联当然仍是多民族的帝国。南斯拉夫未改变其种族复合性质,尽管各种族在战争期间互相血战。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仍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及数不胜数的——也许几百万——吉卜赛人。但是波兰——尽管在1938年时波兰民族人口只占68%——在1946年时,波兰民族在其总人口中却占了压倒多数。德国境内几乎全是德国人(不计难民和移置人口);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日耳曼人占22%,匈牙利人占5%,喀尔巴阡乌克兰人占3%,犹太人占1.5%,而现在几乎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战争中幸存的5.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中,除1.6万名以外,其余全在1950年离开了。欧洲的古大流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黑海周围,意大利人进入达尔马提亚,匈牙利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波兰人进入伏尔尼西亚(乌克兰)立陶宛和布科维纳,日耳曼人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的地区,而犹太人到处散居——现在无效了,消失了,一个新的、“更有条有理的”欧洲正在诞生。

对大多数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的最初安排——将他们集合起来,为他们建立营地,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帮助——都是由占领德国的盟军、尤其是美国军队承担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凡有难民聚集的地方,唯有盟军才是管理当局。只有军队才拥有物资和具备组织能力,来管理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难民。这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先前从未负责过的事情,仅在几个星期前,他们负担的还只是同德国国防军作战。正如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最高指挥官)在1945年10月8日,针对资难军队管理难民和集中营幸存者一事,向哈里·杜鲁门总统作出回答的报告中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确实是降低了标准,但是我要指出,整支军队面临的复杂问题是要从战斗向大规模遣返作调整,因此在目前需要静下心来考虑战争遗留的很多独特问题。”

一旦收容营建立起来,实施照顾和最终遣返或重新安排几百万被迫流落异国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地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肩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9日的华盛顿会议。未来的联合国44个成员国代表出席该会,讨论战后的各种可能需要。从此以后,善后救济总署在处理战后紧急状况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个机构在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间花费了100亿美元,这笔资金几乎全由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提供。许多援助资金直接流向在东欧的前同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还有用于管理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置人口。在前轴心国的几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且所得不多。

到1945年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为被移置者和难民设立了227个收容营和救济中心,在邻国奥地利又设立了25个,在法国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设立了若干个。到1947年6月,西欧有762个这样的单位,其中大多数设在西德地区。到1945年9月,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军其他机构照顾和遣返的被解放的联合国平民(即不包括前轴心国的公民)总数达到679.5万人——在此之上还应该增加苏联当局管辖下的700万人和几百万被移置的德国人。就民族而言,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苏联:释放的俘虏和先前的强迫劳工。其次是200万法国人(战俘、劳工和被驱逐出境者),160万波兰人,70万意大利人,35万捷克人,30多万荷兰人,30万比利时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数人。 29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食物供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若没有这个机构的贡献,更多的人会死于1945年至1947年。在波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解决的食物消费量达到其战前水平的60%,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80%之多。在德国和奥地利,它同国际难民组织(IRO)共同负责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国际难民组织的身份由194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确认。

国际难民组织的资金大部分也由西方盟国提供。在它的第一年(1947)预算中,美国负担46%,1949年上升至60%;英国承担15%,法国承担4%。由于在强迫遣返问题上西方盟国同苏联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国际难民组织总是被苏联(后来则是苏联集团)看作纯粹是西方的工具,因此它的服务仅限于西方占领军控制地区的难民。再者,由于它致力于为难民的需要服务,所以德国的被移置者也被排除在它的善举之外。

被移置者(有时假定他们有一处家园可去)和难民(被划分为无家可归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在那几年里成为众多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人们受到的区别对待,取决于他们究竟是战时同盟国的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等等),还是先前的敌对国家各民族(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等)。在确定优先遣返哪些难民时,这种区别

尤其突出。首先得到处理和遣返的是联合国下属各国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人；然后是联合国各国的被作为战俘的人，再后是联合国各国被迫流落异国者（很多人是强迫劳工），再接下来是意大利的被移置者，最后才是前敌对国家的各民族的人。德国人不被考虑，而且只由当地吸纳。

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或意大利公民回国的事情相对比较直截了当，而唯一的障碍是运输问题：确定谁有权到什么地方去，并且找到足够的火车来运送他们。到1945年6月18日，120万法国人中除了4.05万人外，其余全在德国投降后一个月内回到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时间长一些，原因是作为前敌对国家的人，而且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协调计划来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们毕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东欧，遇到了两个重大的复杂问题。东欧的有些被迫流落异国者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供他们回去。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不想回去。这个问题起初使西方各国当政者颇为困惑。根据1945年5月在德国哈雷签署的协议，苏联的前战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国，并且假定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有一条例外：西方盟国并不承认斯大林在战时将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做法，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移置营里，爱沙尼亚人、拉托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选择回东欧，也可以在西方寻找新的家园。

然而不光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愿意回去。一大批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选择宁可留在德国的临时安置营里，也不愿意回国。就苏联公民而言，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害怕对任何一个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的人的报复，哪怕他这段时间是在俘虏营里。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克罗地亚人，等等，则是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哪怕在名义上还不是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不愿意回国的原因是害怕由于真实的或强加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后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整个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国当局从总体上宁可无视这种感情，责成苏联和东欧各国公民回国，有时还采用武力逼迫。苏联官员积极地从德国收容营集拢自己的人民，但是东欧难民竭力让迷惑不解的法国、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他们不想回“家”，愿意留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行。他们往往不会成功：1945年至1947年间，227.2万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

于是发生了绝望挣扎的可怕场面，尤其是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作为从未成为过苏联公民的俄国移民、乌克兰游击队员，还有其他许多人，被英国或美国军队强行——有时确实毫不夸张——送过边界，推入等候在那里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之手。〔7〕一旦到了

〔7〕1945年5月底，英国军队将1万名斯洛文尼亚士兵和曾逃往奥地利的平民交还给南斯拉夫当局。大多数人被运送到南方的科切维森林，在那里被草率地枪决。

苏联,他们就同成千上万其他各类遣返的苏联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先前被当作敌人而被红军驱逐的人归在一起。到1953年,总共有550万苏联人被遣返。五分之一的人最后或被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还有许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被送进劳改营。 31

强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随着冷战开始,西方各国将从苏联集团来的被移置者当作“政治”难民(布拉格于1948年2月发生共产党政变,当时仍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5万名捷克人立即获得了这种身份)。总计有150万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苏联人和犹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们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一起,构成了留在西德、奥地利、意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绝大多数。1951年的“欧洲人权会议”承认对这类冠以“被移置的外国人”之名的人加以保护,最终保证他们不被遣返受惩。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将变成什么人?他们本身无疑是难民或被移置者。用热奈·弗莱纳在1948年10月的《纽约客》上的话来说,“[被迫流落异国者们]除了祖国,愿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谁愿意接受他们?西欧各国缺少劳动力,并且正在经济和物质的重建过程中,起初十分愿意引进某几类不要祖国的人。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尤其需要矿工、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时安排2.2万名被迫流落异国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到瓦洛尼亚矿井工作。法国安排3.8万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英国也以这种方式接受8.6万人,包括波兰军队的许多退伍军人和参加过“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的乌克兰人。〔8〕

接受的标准很简单——西欧各国感兴趣的是强壮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符合这类条件的波罗的海各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单身妇女作为体力劳动者或家务劳动者是受欢迎的——但是加拿大劳工部在1948年拒绝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妇女申请加拿大家务工作的移民资格。谁也不要年长者、孤儿、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难民们并不受欢迎——战后美国和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们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犹太人的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各国当局起初对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一视同仁,将他们关进德国的安置营,与许多先前屠杀他们的人关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应该给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一切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 32

〔8〕“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或“加利奇安分部”由乌克兰人组成,他们曾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波兰公民,原居住地区战后被并入苏联。因此他们不能被遣返到苏联去,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同苏联打过仗,西方各国当局视之为无国籍者。

鲁门在一份报告中下令关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营地和中心“明显不现实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拒绝承认犹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对先前野蛮地屠杀他们的人熟视无睹。”到1945年9月底,美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区别照顾。

关于遣送犹太人去东欧的事情,从一开始起就行不通。苏联、波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无让他们回去的兴趣。犹太人在西方也并不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或有资格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以足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留在了德国。只有在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才解决了欧洲犹太人“安置”的难题。从1948年到1951年,33.2万名犹太人离开欧洲去以色列,他们有的是从在德国的国际难民组织的收容中心出发,有的是从罗马尼亚、波兰等地出发,因为当时他们仍留在那些国家。另外还有16.5万名犹太人最终去了法国、英国、北美和南美。

他们在那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余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会合,另外还加上1947年至194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新一代的政治难民。在这3年里,美国接受了40万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万人。加拿大接受的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总数达15.7万人,澳大利亚接受了18.2万人(其中6万多名波兰人,3.6万名波罗的海各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成就的规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几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种族的人)由于波茨坦协议未能覆盖他们的情况而被遗忘。但是经受了先前6年战争恐怖而满目疮痍、苦难贫困的欧洲大陆早已预示了冷战的分裂,在战后6年里,盟国军管政府和联合国的民事机构史无前例地、成功地遣返、汇合或重新安置了几百万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欧洲各地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到1951年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由新建立的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取代时,有17.7万人离开欧洲的被逐流落异国者收容营——其中大多数人年迈体弱,因为无人需要他们。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伦沃德的最后一个收容营于1957年关闭。

33 欧洲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地区性战争和内战。欧洲在1934年至1949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在现存各国境内的杀人内战。在许多情况下,造成外国——无论是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俄国人——占领,用新的暴力手段,首先为追求战前政治格局和对峙提供了条件,并欲使之合法化。占领者们当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典型方式是派军队在被占领国家里加入一方,对付共同的敌人。按照这种方式,曾经在和平时代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某种政治倾向或某个少数民族就能够利用局势的改变,来解决当地的宿怨。德国人尤其乐于鼓动和利用这类情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实现征服,而且能减少麻烦、在被他们

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统治成本：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者来替他们做事。

自从1945年以后，“合作者”这一名称具有明显贬义的道德内涵。但是战时的分裂和附属关系比起简单的战后定义——即所指的“合作”和“抵抗”——来，在整体上更具有当地的复杂、含糊的含义。所以，在被占领的比利时，说佛莱芒语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犯过的错误，他们受到“自治”的诱惑，认为自己有机会从说法语的贵族治国的比利时独立出去，于是就欢迎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在比利时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打出对立的种族这张牌，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佛莱芒族的比利时战俘在1940年敌对状态停止时就被释放，而说法语的瓦龙族人却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关押在战俘营里。

法国、比利时、挪威确实都抵抗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当纳粹企图逼迫年轻人去德国充当强迫劳工时，许多人逃往森林区，这种选择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积极抵抗的人数超过那些出于信仰、谋权或私利而同纳粹合作的人数——在法国，据估计，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数两边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万至17万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却是对方：德国人大多不在场。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1943年7月的宫廷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时，法西斯分子掌权已经20年了。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当地人对法西斯政权很少抵抗；大多数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后，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边的“战友”，德国人占领的北部被撕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傀儡政权；另一部分是虽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他们同盟军配合，有时得到挺进的盟军的支持。

但这里的问题也在于，表现为一个以大多数右翼思想的意大利人为一方的阵营，被锁定在同另一群边缘化的、和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结盟的危难战斗者阵营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发生在1943年至1945年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内战。投入两边的意大利人都相当多。萨洛的法西斯分子们实际上在同残暴的占领者合作的人中间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当时他们在国内能够依赖的支持力量——占领者——却不容他们忽视，占领者的力量明显地 34
不亚于他们遇到的最奋勇的对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所得到的支持。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现实中是意大利人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记忆很容易地被隔断了。

在东欧，事情更加复杂。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趁德国人到来之际，根据战前分裂主义党派酝酿已久的计划，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德国人不想在波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罗的海各国、甚至在芬兰——德国国防军起初受到欢迎，被当作除了苏联的占领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乌克兰人在1941年以后尤其卖力地利用德国的占领，以保证他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独立，而在加利西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土地上，发生了乌克兰人和波兰游击队之间的血腥战争，双方各自受到反纳粹的游击队和反苏联的游击队的

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意识形态战争、群体内部冲突、为政治独立而战等等目的之间的精确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至少对于当地居民——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成为牺牲品的人们——而言毫无意义。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或者与德国国防军、苏联红军分别并肩作战,或者反对它们,以及互相残杀,都因时、因地而异。在波兰,这种冲突(1944年以后转变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游击战)在1945年至1948年间夺走了大约3万人的生命。在苏联占领的乌克兰,最后一个游击队司令罗曼·舒克赫维奇于1950年在利维夫被杀,但是断断续续的反苏活动在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又持续了几年。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表现为内战,而且本身特别充满血腥气。在南斯拉夫,传统的称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义特别模糊。契特尼〔9〕游击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是什么人?爱国者?抵抗者?合作者?让人们投入战斗的缘由是什么?抵抗(德国、意大利)占领者?报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国内敌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战?拥护或者反对共产主义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的动机不止一种。

35 于是,克罗地亚傀儡国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领导的“乌斯塔莎”政权屠杀塞尔维亚人(20多万人)和穆斯林。但是,忠于米哈依洛维奇的游击队(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屠杀穆斯林。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时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而同德国军队合作。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目标尽管是从南斯拉夫赶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花费时间和资源来首先摧毁契特尼游击队——不仅仅是他们战斗范围内的一个目标。米洛万·德吉拉斯曾在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分子之间的战斗中亲身扮演过英雄角色,10年后,他对这种战斗感到幻灭,作为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战斗中和抵抗运动的一名真实见证人,他写道:“在一片饥饿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双方军队都长时间在6000英尺高的危岩沟壑艰难攀爬,为的是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或者去消灭一小群同胞(往往还是邻居)。我想到的是,这就是我们以往全部理论和愿景中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再往南面,希腊像南斯拉夫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入侵、占领、抵抗、报复、内战的循环,最后高峰是1944年12月共产党人同得到保王党支持的英国军队在雅典的5星期冲突,在此之后,于1945年2月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到1946年又爆发了战斗,接着又持续了3年多,结果是共产党人从北部山区的根据地败退。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和德国

〔9〕战时“契特尼游击队”的名称来自18世纪同占领塞尔维亚的土耳其统治者作战的高地游击队员之名。

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来,无疑更有成效——仅在1943年至1944年,使六千名德国士兵伤亡——但是它给希腊人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共产党游击队和以雅典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国王政府都使村庄陷入恐怖之中,摧毁了交通,在以后几十年里使国家分裂。当1949年9月战事结束时,10%的人口无家可归。希腊的内战不像南斯拉夫和乌克兰那样带有许多复杂的种族问题〔10〕,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损失更重。

战后欧洲的这些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简言之,这些内战意味着欧洲在1945年德国人撤退后,并未结束战争。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但是这些年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做出了别的事。纳粹的占领和后来苏联的占领不仅残暴,而且损害了欧洲的组织结构,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用一句套话来描述,它们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转化为社会革命。

首先,系列性的外国军队占领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法国的维希政府——就像约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国或帕凡立克在萨格勒布的乌斯塔莎政府一样——名义上是自治的,实际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在荷兰和波希米亚,市一级地方当局合作者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动性,但只是根据德国主子的愿望来避免任何冲突。在更东面的地方,纳粹和后来的苏联人用自己的人和国家机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适合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经同纳粹结盟的国家——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独立,由自己来统治,这种情形至少维持到1944年。

除了德国和苏联的心脏地区,欧洲大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少被占领两次:首先是被敌人占领,后来被解放它们的军队占领。有一些国家——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希腊、南斯拉夫——都在5年内被占领了3次。每一次占领都摧毁先前的政府,使权威丧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结果则是扫除殆尽,一切旧日的等级体制都名声败坏,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妥协了。例如在希腊,战前的独裁者迈塔克萨斯清除了旧议会阶级。德国人推翻了迈塔克萨斯。然后轮到德国人被赶走,凡是同德国人合作者都名誉扫地。

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或许当数旧日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清除。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破坏的不仅是德国本身。它给中欧许多城镇和城市带来重大的社

〔10〕 但并非全部——希腊共产党在战后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吞并希腊北部的斯拉夫居住地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他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几乎没有帮助。

会后果,犹太人曾经在那里组成了当地的专业人士阶级:医生,律师,商人,教授。后来往往还是在这些地方,当地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也被赶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其结果是使社会景观起了彻底变化——波兰人、波罗的海各国人、乌克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机会升迁到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职业(以及房屋)。

这一平衡过程,即中欧和东欧的当地居民取代了被驱逐的少数民族,是希特勒对欧洲社会历史作出的最长久的贡献。德国人的计划是毁灭犹太人和波兰、苏联西部的当地知识分子,将其余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变为新的奴隶,将土地和政府转移到重新定居在那里的德国人手中。但是随着红军到达,驱逐了德国人,新的情势又一边倒地调整到苏联人更加真实的激进化计划下。

37 此中的一个原因是,占领岁月不仅迅速地用血腥的强迫手段使社会激荡,也使合法国家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涤除。如果认为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的时代是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来监督和平与秩序的时代,那是错误的。即使在波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统治和钳制,而它的社会仍然在无视新的统治者而运行:波兰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应的地下世界,其中有报社、学校、文化活动、福利服务、经济交换,甚至有一支军队——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运作的,也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被占领的欧洲要过正常生活,就意味着违法:首先是违反了占领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规定,种族法,等等),同时也违反了传统的法律与规范。大多数普通人无法直接获得农产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换才能养家糊口。盗窃——无论是盗窃国家、盗窃市民、还是洗劫犹太人商店——现象十分广泛,以致在许多人眼里已经不是罪行。事实上,宪兵们、警察们和市长们代表占领者,为占领者服务,由于他们自己也同占领军一起有组织地犯罪,挑选一部分平民作为牺牲品,致使一些重罪变化为抵抗行动(尽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顾中才发现的)。

暴力首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最终权威总是在极端情况下,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和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来实现意志。但是在被占领的欧洲,权威是一种毫无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游击队和军队竞争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某一块土地上发号施令的能力。在希腊、蒙特内格罗和波兰东部地区的较远区域,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来就不很牢固,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义。作为占领军,纳粹和苏联人促成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不光反对那种对先前政权或国家的过时权威的忠诚,而且也反对任何一种人际礼貌或纽带的意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假如统治者用权力残酷地、无法无

天地对待你的邻居——因为他是犹太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数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显的理由——那么你为什么自己还要尊重他呢?再进一步就是给你的邻居制造麻烦来抢先谋求当局的赞许,这就必须审慎了。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甚至是未占领)的欧洲,直到战争结束,秘密告发、个人指控、流言蜚语等等满天飞。1940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挪威、荷兰和法国发生了数字惊人的向冲锋队、盖世太保、当地警察的告发事件。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得到奖金或物质报酬。在苏联统治下的情况也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兰东部的苏占区——那种雅各宾专政式的鼓励告发者,那种怀疑别人不忠诚的(法国)革命习惯,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

简言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每一个他人。人们怀疑别人的动机,就轻易地以某种假定的叛变或有害行为之罪名而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面的保护,因为掌权者往往是最无法无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大多数欧洲人根本没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国家不再坚持法律和正义;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夺者。纳粹对待生命的态度无疑是出名的恶劣;但他们对待财产的态度,可能在事实上就是他们企图在战后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实际态度。 38

在德国的占领下,财产权最多只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洲犹太人完全被剥夺金钱、物品、住房、店铺和商行。他们的财产被纳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余的也只能听凭当地人洗劫和偷窃。然而被没收财产的远远不止是犹太人。财产的拥有“权”是脆弱的,常常毫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意、兴趣或冲动念头。

在这一系列剧烈的、被迫的财产易手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店铺、公寓会被当地人侵占;他们的工具、家具、衣物会被新的主人没收或窃取。这个过程在从敖德萨到波罗的海地区“屠杀区”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处发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幸存者们在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时,往往发现自己的家被战时“占屋者”占据,而这些占屋者居然还很生气地宣布他们有权占据,拒绝离开。因此,几十万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变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同谋者,哪怕仅仅是从中得到好处。

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工厂、汽车、土地、机器和产品成品都被新的统治者出于利益而无偿剥夺,其借口是一概国有化。尤其在中欧和东欧,纳粹出于战时经济需要,接管了可观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机构。这种剧烈变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后,这些地区灾难性地转向关闭自守,紧接着是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控制,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国有企业扩展得相当厉害,目的是预防德国的经济渗透。国家指导的经济在东欧并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

39 战后从波兰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彻底完成了从德国自己驱逐犹太人开始的人口转移。苏台德地区、西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许多日耳曼种族的人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当这些土地被国家没收,用于重新分配时,影响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及其合作者手里夺回的物品和财产占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仅仅农田重新分配这一项,直接受益的农民、农业工人及其家庭人数超过 30 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只能形容为革命。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一种同过去的明显决裂,而且代表了为将来实现更大变革的一种准备。

在解放了的西欧,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国人拥有的财产很少,战争也并未作为大灾变而影响到更远的东方。但那里的问题同样在于,组织起来的当局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当地政府并未获得自身的荣名。相反,它们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 年,德国只用 806 名官员就管住了占领下的挪威。纳粹统治法国,只用了 1500 名自己人。他们信心十足地依赖由他们指定的(除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职员之外)法国警察和宪兵,而德国人只用自己的 6000 名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一个有 3500 万人口的国家来服从他们。在荷兰的情况也一样。在战后的一份证词中,派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称:“在警察部门和其他部门,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是荷兰警察。若没有它,德国的占领任务还不能完成其十分之一。”同南斯拉夫相比,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11〕

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种差别是纳粹自己如何对待被占领的国家。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 1943 年以后的意大利人,都屈从了,并且受到剥削。但是除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各种抵抗者之外,他们总体上被允许自行其是。其结果是,西欧各国被解放的人民想象着回到过去的日子。事实上,即使是战时的议会民主政治,由于德国的介入,现在看来也还像样——希特勒至少成功地推翻了对多元政治和法治的激进选择。西欧大陆疲惫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一个符合规范的国家里恢复正常生活的外表。

40 然而在西欧新近解放的国家里,情势却很糟糕。而在中欧,按照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委员会的约翰·J. 麦克罗伊的话来说,那里是“经济、社会、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无前例;除非回顾罗马帝国垮台的情形。”麦克罗伊所说的是德国,盟军政府不得不从零开始来建设一切:法律、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交通、政府管理。不过他们至少掌握许多资源来做这些事。而东欧的情况却更糟。

〔11〕 值得指出的是,波希米亚保护国在 1942 年仅由 1900 名德国官员管理。在这些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至少部分地同西欧相像。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样,使欧洲大陆分裂。中欧(指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在最西边的领土)的历史总是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一定是种类差别。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波罗的海各国人都可能心怀妒忌地看待比较幸运的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奋起为自己争取同样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尼亚人的梦想是要同巴黎一样。捷克1937年的经济超过了它的邻居奥地利,可以同比利时竞争。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易北河东面,苏联人和他们在各地的代表继承了一块次大陆,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早已同过去决裂。凡是未被彻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逃出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几个流亡政府可以从伦敦回去了,并有希望重新成为它们在1940年被迫放弃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甚至布拉格的旧日统治者没有希望了:它们的世界被纳粹改变一切的暴力所涤荡。剩下的问题只是要决定新秩序的政治样式,必须用它来取代无法恢复的往昔。

第 2 章

惩 罚

41

在战争中长大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就是去欺骗,去说慌,去开设黑市,去怀疑,去榨取:5年的经历使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保尔-昂利·斯帕克(比利时外交大臣)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某些人在我们寻求建设的世界里不会有一个位置。

——西蒙娜·德·波伏瓦

应该做出并且执行严厉、公正的判决,国家的荣誉要求这样做,最大的卖国贼也罪有应得。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要求严惩约瑟夫·蒂索神甫的决议,1946年11月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地还是不够的。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

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再者,在许多方面同仍然鲜活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很多事情不但令人有负罪感,而且令人感到窘迫。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欧洲人被动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被一帮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民族集体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是打击侵略者的武装游击队抵抗运动——这就是西欧事实上很少明显有真正抵抗的原因,而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是关于“抵抗”的神话。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或乌克兰,大批真正的游击队员公开地既对占领军作战,又互相厮杀,这就在大局问题上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42

例如在解放了的波兰,苏联当局不同意公开赞扬武装游击队员,因为后者在感情上既反对纳粹,又反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南斯拉夫,有些抵抗者同别人不一样——至少在铁托元帅和他手下的胜利了的共产主义战士眼中是如此。在希腊和在乌克兰一样,1945年的地方当局围剿、关押或扼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名武装游击队员。

简言之,“抵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含糊的范畴,在某些地方只是一个杜撰名词。但是“合作”则是另一回事。“合作者”到处可以被识别、受憎恶。这些男女或与占领者共事,或同占领者上床,占领者在他们的命运中打上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的印记,他们以战争为掩饰,趁机追逐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他们有的人在宗教或民族或语言方面是少数派,所以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早就既被人鄙视、也使人害怕了;虽说“合作”在法律定义上先前并未写为明确的罪行,但是合作者们总可以被理由充足地指控为叛国——即一种完全符合严惩条件的真实罪行。

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合作者的惩罚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事实上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执行,其形式或者是个人行为,或者是根据地下抵抗组织的命令。然而在德国军队撤退和盟军政府建立有效控制之间的空档期,普遍仇恨和个人报仇行为往往带上政治机会或经济利益的色彩,导致一个短暂但又血腥的创记录的循环。在法国,“法外司法”程序杀死了大约1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死于武装抵抗组织的独立团体之手,其名为“爱国者卫队”,他们追捕可疑的合作者,夺走后者的财产,而且往往将他们枪杀。

以这种方式被草率处死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前被杀的,其余大多数人在此后4个月里法国土地上发生战事时成为牺牲品。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考虑到4年被占领和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在法国引起互相仇恨和怀疑的程度,这个数字还算是低的;无人对报复行为感到惊奇——用年迈的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特的话来说,“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之前,法国首先需要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在意大利出现的也是同一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尤其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和伦巴第地区)导致死亡人数接近 1.5 万人,而且还断断续续地至少持续了 3 年多。在西欧的其他地方,流血报复的程度要低得多——在比利时,以这种方式用私刑处决的男女人数为大约 265 名,在荷兰不到 100 名。然而,其他各种形式的报复则到处存在。对妇女的指控(说法语的玩世不恭的人们早已将她们称为“卧式合作者”)相当普遍:荷兰陪占领者睡觉的女人被裸体涂上柏油、黏上羽毛;在法国到处可以看到的场面是在公共广场上将她们剥光衣裳、剃光头发。这类事情往往发生在当地被从占领者手中解放的日子或此后很短的时间里。

妇女常常被其他妇女指控为结交德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许多指控中包含着某些事实:提供性服务,以换取食物或衣物,或得到这样那样的个人帮助,而这对女人及其家庭是绝望困境中的一条出路,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指控之普遍,以及报复与惩罚时的快感,都提醒男人和女人们:被占领的经历首先是一种屈辱。让-保尔·萨特后来用确切的性术语来形容“合作”是一种对占领者权力的“依从”,而在不止一本 20 世纪 40 年代的小说里,描写的合作者要么是女人,要么是柔弱的(“女人气的”)男人,她(他)们被条顿族统治者的阳刚魅力勾引。对失足的女人施行毁灭性的复仇,是克服个人或集体毫无力量的不愉快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被解放了的东欧,暴力惩罚的无政府行为也很普遍,但形式不同。德国人曾在西欧积极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其占领的斯拉夫土地上,他们直接用武力统治。他们为时持久地鼓励的唯一合作对象是当地的分裂分子,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也只要他们为德国的目的服务。结果,德国人一旦撤离东欧,立即受到惩罚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少数民族。苏联军队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并不制止报复。相反,立即报复(有些完全是刻不容缓地)的措施是进一步将当地的精英和政治家赶走,因为他们会妨碍苏联在战后的目标。例如在保加利亚,新组织起来的“祖国阵线”鼓励以非官方形式报复各种种族的战时合作者,从整体上对“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提出指控,谴责被怀疑为同情西方的任何人。

在波兰,普遍复仇的主要目标往往是犹太人——在被解放的波兰,1945 年的前 4 个月杀死 150 名犹太人。到 1946 年 4 月,这个数字接近 1200 名。小规模袭击与 1946 年 5 月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 年 9 月发生在托波尔恰尼地区)和匈牙利的昆玛达拉斯,但是最严重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于 1946 年 7 月 4 日发生在凯尔采(波兰),42 名犹太人被杀,而在传闻有一名当地儿童被绑架和杀死做祭品之后,更多的犹太人遭到伤害。这些行为被当作是对合作者的惩罚,因为在许多波兰人(包括先前的反纳粹游击队员)眼里,犹太人被怀疑是同情苏联占领军的。

在苏联占领的东欧,或在南斯拉夫,最初几个月的“未经官方授权的”清洗和屠杀中,

确切的死亡人数无从知道。不过,各地不受约束地算账报复的活动持续得并不太久。脆弱的新政府对此不感兴趣,它们不仅不会普遍允许武装群体横扫乡村,任意逮捕、拷打和杀人,反而会明显地制止。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宣布控制军队和司法机关,树立正统权威。若谁被逮捕、被指控在占领期间犯有罪行,那么这是相关的权威机构的职责。若有举行审判,则应该在法治之下举行。若需流血,那么这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一旦新的当权者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情况就转变了,当权者会解除从前的游击队的武装,强化他们自己警察的权力,抑制对粗暴惩罚和集体报复的普遍要求。 44

至少在西欧和中欧,令人惊异的是无意解除抵抗者的武装。在被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狂热中发生的谋杀等罪行,当权者视而不见:比利时临时政府对在该国宣布解放的官方日子之后41天里以“抵抗运动”名义所犯的各种罪行实行大赦。然而,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重建的新政府机构应当担负起惩治犯罪的任务。

这里就产生了问题。谁是“合作者”?他们同谁合作,怀有什么目的?除了明确的谋杀或盗窃案,什么是“合作者”罪行?总有人要为国家遭受的苦难付出代价,但是对苦难作何种定义、谁又必须对此负责?各国之间对这些复杂难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是总的难题却是一个普遍问题:此前6年里欧洲经历的事情实属史无前例。

首先,针对与德国人合作者行为的法律必须是有追溯效力的——在1939年之前,“与占领者合作”的罪名闻所未闻。以前也有过多次战争,期间占领军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上寻求并取得人们的合作与支持,但是除了一些特殊例子——例如1914—1918年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佛莱芒民族——外,这种行为不被当作罪行,而被看作是战争附带的破坏。

前文已经指出,符合现存法律概念而可称作合作的罪行只有叛国罪。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的许多合作者——无论他们的具体行为是什么——都受到审判,被控触犯1939年刑法第75条“通敌罪”。但是在法国法庭受审的男男女女们往往不是替纳粹效力,而是替维希政府效力,而维希政府又是法国人领导和执政的,名义上还是战前法兰西国家的合法继承者。同样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西米亚保护国、墨索里尼的萨洛社会共和国、伊昂·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战时的匈牙利,这些地方的合作者可以、而且确实 45

在辩护时宣称,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工作或合作。

至于高级警察或政府官员,他们的明显罪行是通过受傀儡政府雇用而为纳粹的利益服务,上述辩护就显得很不老实。但是对于地位较低的人,更无须说那成千上万名被指控在这些政府里或同政府合作的商行里受雇的人,这种指控会引起真正的混乱。例如,某人1940年5月以后是某个政党成员,而这个政党在战前的国会里是合法的,但他接着在占领时期同德国人合作,那么对此人的指控是否正确?

法国、比利时、挪威的流亡政府试图以颁布战时法令警告要在战后严惩,来预先解决

这些难题。但这些法令旨在阻止人们同纳粹合作,它们并未提出更加广义的法律与公正的问题。首先,它们无法预先解决如何衡量集体责任中的个人责任问题。在包括所有成员在内的战争罪和预先确定的各类人员——某些政党的成员,军事组织,政府机构——合作罪的背后,还存在着 1944—1945 年的政治利益平衡。但是这样一种法律程序仍然通过了对普遍要求加以惩罚的个人实施惩罚;它会包括一些人,其主要罪行是出于习惯或由于懦弱;而法律首先应该采取一种集体起诉的形式,但是大多数欧洲法官却从心里厌恶这样做。

于是,接受审判的都是个人,其结果因时、因地而差异甚大。许多男女被不公正地挑选出来受惩罚。更多的人完全逃过了惩罚。有许多诉讼程序不合规则,很可笑,而政府、执政者和法官的各种动机——出于个人利益、政治算计或感情原因——也远非无可指责。这是一种不完美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评价标志着欧洲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罪行审判,以及相关的社会净化行动时,始终需要想到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在 1945 年的情势下,应当指出的是,法治是完全重新建立的——毕竟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整个欧洲大陆在寻求对如此大规模的新的罪行下定义,并且要将罪犯纳入适用的公正法律。

各国之间受惩罚的人数和惩罚的规模差距非常之大。挪威人口只有 300 万,光是拥护纳粹的合作者组织成员中就有 5.5 万人受审判,还有其他 4 万人受审;被判刑入狱的有 1.7 万名男女,判死刑的有 30 人,其中执行死刑的是 25 人。

46 其他地方的比例都没有这么高。在荷兰,20 万人受到调查,将近一半人入狱,其中有些人的罪行是行纳粹礼;1.75 万名公务员失去工作(但是在商业界、教育界和专业人员中间几乎无人丢掉饭碗);154 人被判死刑,被处决的是 40 人。在邻国比利时,被判处死刑的人更多(2940 人),但处决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 242 人)。荷兰关进监狱的合作者罪犯不久后大多数被宣布大赦;比利时将罪犯关押的时间更长些,而先前犯有严重罪行的合作者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公民权。佛莱芒居民的情况与战后长期以来的迷思相反,他们被当作惩罚目标的人数与人口比例大不相称,但是通过对战时“新秩序”政府支持者(大多数是佛莱芒族人)的有效压制,战前的比利时精英——天主教徒、社会党人、自由派人士——重建了他们对弗兰德斯和瓦洛尼亚等地方的控制。

挪威、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合法政府曾经流亡,而法国的许多人认为维希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两者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在丹麦,实质上并未有过合作罪。然而在战后审判时,每 10 万名丹麦人里就有 374 人被判入狱。在法国,战时的合作者比比皆是,就从这一点来看,惩罚相当轻。既然国家本身就是合作者,那么用同样罪名来指控地位低微的公民,就显得粗率,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分裂——更因为在法国担任对合作者审判的法官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自己就曾受“合作国家”的雇用。在这种情形下,每 10 万人中只有 94

人——占人口总数不到0.1%——因战争期间的罪刑被判入狱。入狱的3.8万人里,大部分人在1947年的部分大赦时,除了1500人仍被关押外,其余都被释放了。

1944—1951年间,法国官方法庭宣判6763人死刑(其中3910人系缺席审判),原因是叛国以及相关罪行。在这些判决中,只有791人被处决。法国合作者被判处的主要惩罚是1944年8月26日巴黎刚解放时开始使用的“国民降级”(national degradation),詹妮特·弗莱纳(Janet Flanner)讽刺地形容说:“国民降级的内容包括剥夺法国人认为是好的一切事情——例如,无权佩带战争勋章;无权当律师、公证人、公立学校教师、法官,甚至证人;无权掌管出版公司、广播或电影公司;最主要的是无权担任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董事。”

4.9723万名法国男女受到这种惩罚。1.1万多名公务员(占国家雇员1.3%,但比在维希政权下失业的3.5万人要少得多)被解职或调离,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6年后重又恢复权利。总之,人所共知的清洗涉及35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无人因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罪而受惩罚。这些责任就像其他各种战争罪行一样,只归咎德国人。 47

出于许多原因,意大利的经历很特别。虽然它先前是轴心国,但是盟军政府授权它自行审判和清洗——毕竟它于1943年9月转向了。但是,“谁”应该为“什么”原因受审判的问题相当模糊。在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合作者的罪名是“法西斯主义”,而在意大利,这一术语的含义太宽泛、太含糊。意大利从1922年到1943年一直由国内法西斯主义者统治,这个国家最初由自己的一位元帅彼特罗·巴道格利奥(Pietro Badoglio)从墨索里尼的统治下解放,而巴道格利奥建立的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府里就有很多人是前法西斯分子。

唯一明显地可以惩罚的法西斯罪,是1943年9月8日(德国入侵)后同敌方合作。结果大多数被起诉的人都在被德国占领的北部地区,他们同在加尔达湖畔城市萨洛建立的傀儡政府有关联。流传于1944年的一份颇具嘲讽意味的调查表“你是否曾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关键只在于“萨洛”法西斯分子和“非萨洛”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区别。对前者的制裁,依据的是国内立法大会1944年通过的第159号法令,定义为“虽然不属于犯罪,但被确定为违反严肃规范和政治体面而特别严重的行为”。

这份世所罕见的法案旨在摆脱困境,即如何起诉受公认的国家政府雇用而有此行为的男女。但是1944年9月组成的高级法庭要审判比较重要的囚犯,法庭的法官和律师们自己却多数是前法西斯分子,为惩罚合作政府里一般雇员而设立的特别巡回审判庭的组成人员情况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过程在全国民众中很难获得尊重。

毋庸置疑,其结果无人满意。到1946年2月,39.4万名政府雇员受到调查,而被解雇的只有1580名。大多数受调查询问的人都宣称自己下水是“为免遭殃”(gattopadismo),

争辩说他们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时故意玩弄两面派手法——说到底,是因为公务员必须加入法西斯主义党。既然许多执行询问的人很容易地坐到了询问桌的另一边,他们肯定会同情这种辩护词。在高度公开化地审判几名高级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之后,本应对政府和行政机关实行的清洗就结束了。

48 指定执行清洗任务的高级委员会于1946年3月关门,3个月后,即宣布了大赦,其中还包括撤消5年以下的判刑。实际上,1944—1945年间被清洗的每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市长、中级官员都恢复了工作或免交罚款,而将近5万名因法西斯活动而被判刑入狱的意大利人也只在狱中度过很短的时光。〔1〕最多只有50人因有罪而被法律判处死刑,但不包括1945年7月17日在斯基奥监狱里被游击队处死的55名法西斯分子。

在冷战期间,意大利可疑地、毫无痛苦地从轴心国转变为民主同盟国,这常常被归因于外国(美国)的压力,以及梵蒂冈的政治影响。实际情况还要复杂。教皇庇护十二世同法西斯分子关系热络,他对纳粹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罪行视而不见,但是,天主教会无疑很轻松地脱身了。教会的确施加了压力。而英美军事当局在试图重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正常生活时,当然不愿意驱除妥协了的统治者。从总体上看,凡在左翼抵抗运动及其政治代表掌权的地区,实行对法西斯分子的清洗是比较有效的。

然而,正是51岁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在战后担任联合政府司法部长时,起草了1946年6月的大赦令。经过20年流亡、多年在共产国际担任高级官员的陶里亚蒂不会幻想欧洲战争之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1944年3月,他从莫斯科回到意大利,在萨莱诺宣布,意大利共产党将致力于民族统一和议会民主——这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感到困惑不解。

意大利几百万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都同法西斯主义合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陶里亚蒂看到,将整个民族推到内战边缘是毫无好处的——或者毋宁说是会处于早已发生的长期持续内战中。努力重建秩序和正常生活,将法西斯时代抛弃,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谋求权力,这样要好得多。再者,从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级人物的立场出发,陶里亚蒂的战略眼光超越了意大利边界,他牢牢记住应当将希腊发生的情况作为一种警示。

在希腊的官员和商界精英中,很多人都是被占领时期的合作者,然而在战后清洗的不是右翼,而是左派。这种情况很独特,但是有启发意义。1944—1945年的希腊内战使英国人相信,只有在雅典坚定地重建一个保守政权,才能使这个虽小但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的国家稳定下来。在这个国家里,革命的左派摆出要夺取政权的架势,那么,如果清洗或威

〔1〕 晚至1960年,在法西斯政府里任职的64名意大利省级行政长官中有62人,以及全部135名警察局长,都已释放。

胁到曾经同意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合作的商人或政客,就会带上激进的意味了。

于是,对爱琴海和巴尔干南部地区稳定的威胁因素立即从德国军队变为在山区隐蔽 49
很深的希腊共产党人及其游击队同盟者。很少有人由于战时同轴心国合作而受到严惩,
反而是左翼人士被任意地颁布死刑。左翼游击队浴血奋战希特勒,共产党游击队试图推
翻战后的希腊政府(实际上左翼和共产党往往是同一批人),由于雅典政府在这两者之间
不作一以贯之的区别,所以在此后几年里,受到审判和入狱的都是战时的抵抗者,而不是
通敌合作者——而且在往后几十年里,左翼被排除在民权生活之外:甚至他们的子女和孙
辈都要付出代价,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不能在庞大的国家机关里就业。

希腊的清洗和审判就这样公然具有政治目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欧比之更
规范的起诉也是如此。作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而引起的任何司法程序都带有政
治目的。在法国审判皮埃尔·拉伐尔和菲利普·贝当,或者在意大利审判警察头子彼得
罗·卡鲁琐时,这种心态很难说能导致合乎规范的司法程序。在许多这类战后审判和清
洗中,屠杀、流血、复仇和政治算计都起了关键作用。当我们考察中欧和东欧在战后的官
方惩罚时,应当记住这个关键问题。

在苏联红军控制的土地上,无疑在斯大林和苏联当局看来,对合作者、法西斯分子、德
国人的审判或其他惩罚一向是、而且首先是一种方式,可以用来清除当地阻碍苏联统治其
政治和社会的力量。铁托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许多人被指控犯有法西斯重罪,而他们
的主要罪行或者只是属于错误的民族群体或社会群体,或者是加入了不恰当的宗教团契
或政党,或者只是当地群体看不惯的或有恶名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清洗、剥夺土地、驱
逐、判刑、处死刑,等等,目的都在于消灭无罪的政治对手,这在社会与政治的转型过程
中是阶段性的特点。但是他们也将目标对准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战犯。

因此,铁托在攻击克罗地亚天主教会时,也起诉了臭名昭著的萨格勒布红衣主教阿罗
伊·斯特皮纳克,因为斯特皮纳克替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恐怖政权最严重的罪行辩护,而他
可以自我庆幸的是于1960年在床上死去之前只被软禁了14年。巴尔干地区契特尼游击
队首领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受审判并于1946年7月被处决。由于他的缘故,几万人死
于南斯拉夫解放后的两年。他们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考虑到他
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无论是契特尼分子、乌斯塔莎恐怖分子、斯洛文尼亚白卫军,还是多 50
莫布朗齐(Domobranzi)武装分子,在任何法律制度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必然会被判重
刑。〔2〕南斯拉夫处决和驱逐了许多匈牙利族人,原因是他们曾在1942年1月间匈牙利
对伏依伏丁那实施军事屠杀中所起的坏作用,他们的土地被分给了支持新政权的非匈牙

〔2〕多莫布朗齐武装分子:即战争期间的“克罗地亚内卫军”。

利族人。这是精心算计的政治动机,但是许多受害者确实是罪有应得。

南斯拉夫是一个特别混乱的例子。在它北面,匈牙利战后的人民法庭确实在1944年一开始就审查真正的战犯,特别是道姆埃·茨托亚伊和弗朗茨·萨拉西的亲德政权中的活跃分子。在匈牙利,受谴责的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的比例不会超过战后比利时或荷兰的罪犯人数——他们无疑犯了严重罪行,包括制订和执行德国的计划,将几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围捕并送到他们的死亡之地去。直到后来,匈牙利当局才增加了“破坏罪”和“阴谋罪”等种类,它的明显目的是将范围更广的反对派和倾向与反对共产党接管的人一网打尽。

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5年5月19日总统令而建立的特别人民法庭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普通人中的“叛国者、合作分子、法西斯分子”发布了713份死刑判决,741份终身监禁判决,19888份有期徒刑判决。所使用的语言充满着苏联的法律提法,无疑预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怕的未来。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期间,确实有叛国者、合作者和法西斯分子;其中的蒂索神甫于1947年4月18日上了绞架。蒂索等人是否受到公正的判决——他们在当时的氛围下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并不比像皮埃尔·拉伐尔那样的人差。战后捷克的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先入之见,用“反国家罪”这样含糊而有问题的类型词来特别针对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实施集体惩罚。然而在那几年里,法国的司法也处于同样状况,或许能拿出的理由还更少些。

在先前被占领过的欧洲,要判断战后的审判和反法西斯的清洗是否成功,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当时判决的形式颇受非议——凡是战争尚未结束时或一个国家刚被解放时受到审判的人,所受的惩罚要比后来受审判的人更重。结果,1945年被判刑的罪行较轻的人,比起第二年或再后来才被送上法庭的合作者主要人物来,所判的刑期反而更长。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比例很高的(95%)死刑判决被执行,因为有一条规定,囚犯在审判结束两小时内就要执行;在别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逃过了立即执行,就有可能得到减刑。

当时的死刑判决相当频繁,而且很少遭到反对:战争时期对生命价值的轻视,使这些判决看起来不像在正常情况之下那么极端——而且理由更充分。在某些地方造成更大伤害、而且可能最终破坏整个司法程序价值的,是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惩罚情况不一致,更不用说作出其中许多判决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自己的战时记录就有污点,或者更坏。战时因效忠而白纸黑字留下记录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的结果更惨。高度公开地审判著名知识分子——例如1945年1月在巴黎审判罗贝尔·勃拉西拉克(Robert Brasillach)——引起了像阿尔贝·加缪这样的真正抵抗者的抗议,加缪认为,由于某人的观点而判死刑和处决是既不公正又很轻率的,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可怕。

相比之下,从被占领中获得利益的商人和高官却几乎没有遭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

在意大利,同盟国坚持认为,可以放过菲亚特汽车公司的维托里奥·伐莱塔,尽管他同法西斯当局的勾结早已臭名远扬。意大利其他企业家只要表明过去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在萨洛的社会共和国,就可以逃过一劫——他们确实也曾常常反对这个共和国,而原因恰恰是它太“社会”了。在法国,对经济合作者的起诉由于采取国有化措施而落空——例如,雷诺汽车厂的国有化就是因为路易·雷诺为德国发动战争做出很大贡献而采取的惩罚措施。而各处的小企业家、小银行家和小官员,曾经帮助过占领政权、建设“大西洋墙”(the “Atlantic Wall”)来抵制法国、向德国军队提供军需品等等,都保留不动,让他们为后继的民主政权提供同样的服务,保障社会的延续和稳定。

这种妥协或许是不可能的。1945年,由于战争的破坏,民众士气普遍低落,这就意味着无论保留下来的是什么,都是为建设未来所需要的基石。在刚解放的那几个月里,各国临时政府都几乎缺乏帮助。若要向饥饿的民众提供食物、衣物和燃料,那么经济界、金融界和实业界精英们的无条件(对此还应该感激)的合作确系至关重要。经济界的清洗会破坏生产,甚至造成经济瘫痪。

但是这样做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严重损伤人们对解放的幻想和希望。早在1944年12月27日,那不勒斯作家古利埃尔墨·齐亚尼尼在《大众》报(*L' Uomo Qualunque*,同名的新意大利政党机关报)上写的文章,表达的正是这种致命的幻灭情绪:“我就是那个人,碰到一位前领导人,问他:‘你怎么竟然会成为清除别人的人?’……我就是那个人,四处环顾,说道:‘这些都是法西斯分子的方法和制度。’我正是那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任何人。”

正如我们所知,意大利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案例。但是像齐亚尼尼那样的人们的情绪 52
在1945年末的欧洲十分普遍,而且迅速地导致情绪的变换。在前不久被德国占领过的土地上,大多数人希望将一切归咎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惩罚那些案情异乎寻常、或惩罚后能使人心理得到满足的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将令人不舒服、不愉快的事情丢掉,使破碎的日子能够过下去。当时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乐意责备同胞们的最严重罪行。由于这些原因,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德国人必须负全部责任。

这种非常普遍的观点确实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应该只归罪于德国,甚至连奥地利也被饶恕了。根据1943年的一份同盟国协议,奥地利被正式宣布为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受到了与德国不同的对待。这一情况,应当注意到温斯顿·丘吉利的观点,他认为纳粹的根源在普鲁士,他那一代人的观点纠结于普鲁士的崛起在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对欧洲稳定造成的威胁。但是这种观点也符合其他同盟国的口味——由于奥地利的中枢地理位置及其对中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将它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分开,看来还是比较明智的。

无论如何,假如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合作者不受到惩罚、它的正常生活不得到恢复,奥地利就很难被当作是另一个受德国占领的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名纳粹分子:在战争末期,奥地利仍有53.6万在册的纳粹党员;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服务。在冲锋队里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奥地利人的比例都很大。纳粹同情者渗透在奥地利公共生活和高层次文化圈里——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令人惊愕地轻易脱身了。13万奥地利人受到战争罪行调查,其中2.3万受审判,但在被判决的1.36万人中,只有43人被判死刑,而执行处决的却只有30人。大约7万名公务员被解雇。占领奥地利的4个同盟国在1946年秋季同意让奥地利人从此开始自己处理罪犯,实行“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教育界尤其迅速地“去纳粹化”:小学教师被解雇2943人,中学教师被解雇477人,而大学教授被解雇的只有27人——尽管许多资深的学术界人士都是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

1947年,奥地利当局通过了一项法律,将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作“程度高”和“程度低”的区分。后者50万人在第二年就被大赦,并且恢复了选举权。前者——总数大约4.2万人——将在1956年全部大赦。在此之后,奥地利人完全忘却了他们曾同希特勒勾结。53 轻易忘却,其原因之一是奥地利自从同纳粹主义调情才开始显山露水;而忘记历史却是符合当地所有人的利益的,可以掩饰它们的近期历史:保守的人民党(其前身是战前的基督教社会党)用尽一切理由来证明该党以及奥地利是“非日耳曼”的,以便转移对他们与1934年建立的合作政权同流合污的注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议地是属于反纳粹性质的,也曾经无论如何要抹掉1933年前号召同德国合并的记录。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政党都感兴趣于安抚和奉承前纳粹党徒,为的是争取他们的选票,因为多数选民的投票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再有一点是因为冷战已经开始,造成了新的政治格局。

在德国,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算计。但是德国民众自己的命运还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在1943年10月30日的同一份《莫斯科公告》里,奥地利投靠纳粹的罪责被赦免了,而同盟国却警告德国人说,他们应该对战争罪行负责。他们的确是负责了。在1945年至1947年的一系列审判中,驻德国的同盟国占领军起诉纳粹及其合作者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谋杀罪,以及为追求纳粹的目标而犯下的其他各种一般罪行。

在这些起诉中,最出名的是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领导人的审判,然而还有其他许多次审判:美、英、法军事法庭在它们各自占领德国的地区审判纳粹低级领导人,他们同苏联一起将纳粹分子转送到其他国家——主

* 即去掉纳粹身份。——译注。

要是波兰和法国——在纳粹分子犯下罪行的地方举行审判。“战争罪行审判”的计划在同盟国占领德国期间一直在进行：在西方占领区，5000多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但其中只有不到800人被判处死刑，而最终处决的只有486人——在德国人呼吁从宽处理的喧嚣声中，最后一名罪犯于1951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处决。

尽管纽伦堡审判认定纳粹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但是，德国人仅仅因为是纳粹分子而受到惩罚却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纳粹分子人数太多，反对将他们看作集体犯罪的声浪也甚嚣尘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清楚以这种方式认定几百万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不过，纳粹党领导人的罪责却是清楚的，而对他们相应地遇到的命运也决没有任何怀疑。纽伦堡审判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接下来一系列审判的主要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说：“太多的人认为他们受到第三帝国领导人不公允的伤害，所以想得到对这一后果的判断。”

从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一开始，就是教育与司法并重。纽伦堡审判的主要审讯情况在德国电台每天广播两次，它公布的证据在全国的学校、电影院和再教育中心用来教育人们。但是，这些审判并非总能显示出以儆效尤的意义。在最初几场审判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时，许多人完全逃脱了惩罚。他们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对立司法之便，反诘和羞辱证人与集中营幸存者。在吕纳堡审判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管理人员时（1945年9月17日至11月17日），正是一名英国的辩护律师作了成功的辩护，结果45名被告中有15名被撤诉。

因此就很难知道对纳粹的审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德国和德国人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再教育。许多人认为它们代表的当然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事情不过如此。然而它们也是对犯下明显罪行的真正罪犯的真正审判，它们为以后几十年里的国际司法提供了重大的先例。就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最想迅速地忘却罪行的时候，1945年至1948年的审判和调查（当时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已经解散）记录下了无数份文件和证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国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或国家目的而犯下的罪行，无论怎样辩护，都是个人的责任，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所谓“执行命令”并不能作为遁词。

但是同盟国在惩罚德国战争罪行时，有两个无法避免的缺点。苏联检察官和苏联法官的出场，被德国和东欧的许多评论家指责为证明了他们的虚伪。苏联红军的行为以及苏联在它“解放了的”地方的所作所为都不是秘密——这些行为在当时比在后来更多地流传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屠杀，在许多人头脑里还记忆犹新。让苏联人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来审判纳粹——有时审判的罪行是他们自己也犯过的——使纽伦堡一系列审判贬低了价值，使审判看上去完全是一种针对德国的报复行动。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种审判唯一能传递的意思是，说到底，当这类罪行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某一个政

府的领导人所犯下的时,是正当的,可以原谅的,而由另一个政府在另一些情况下所犯下时,则是不正当的,不可饶恕的,应当受到死刑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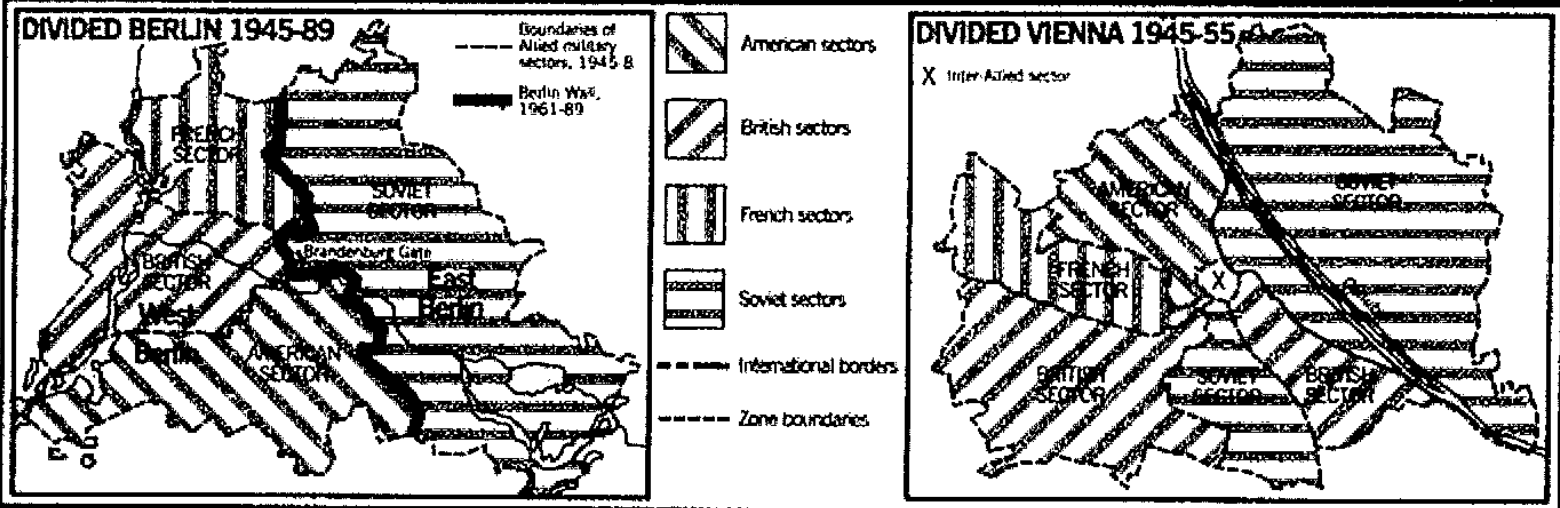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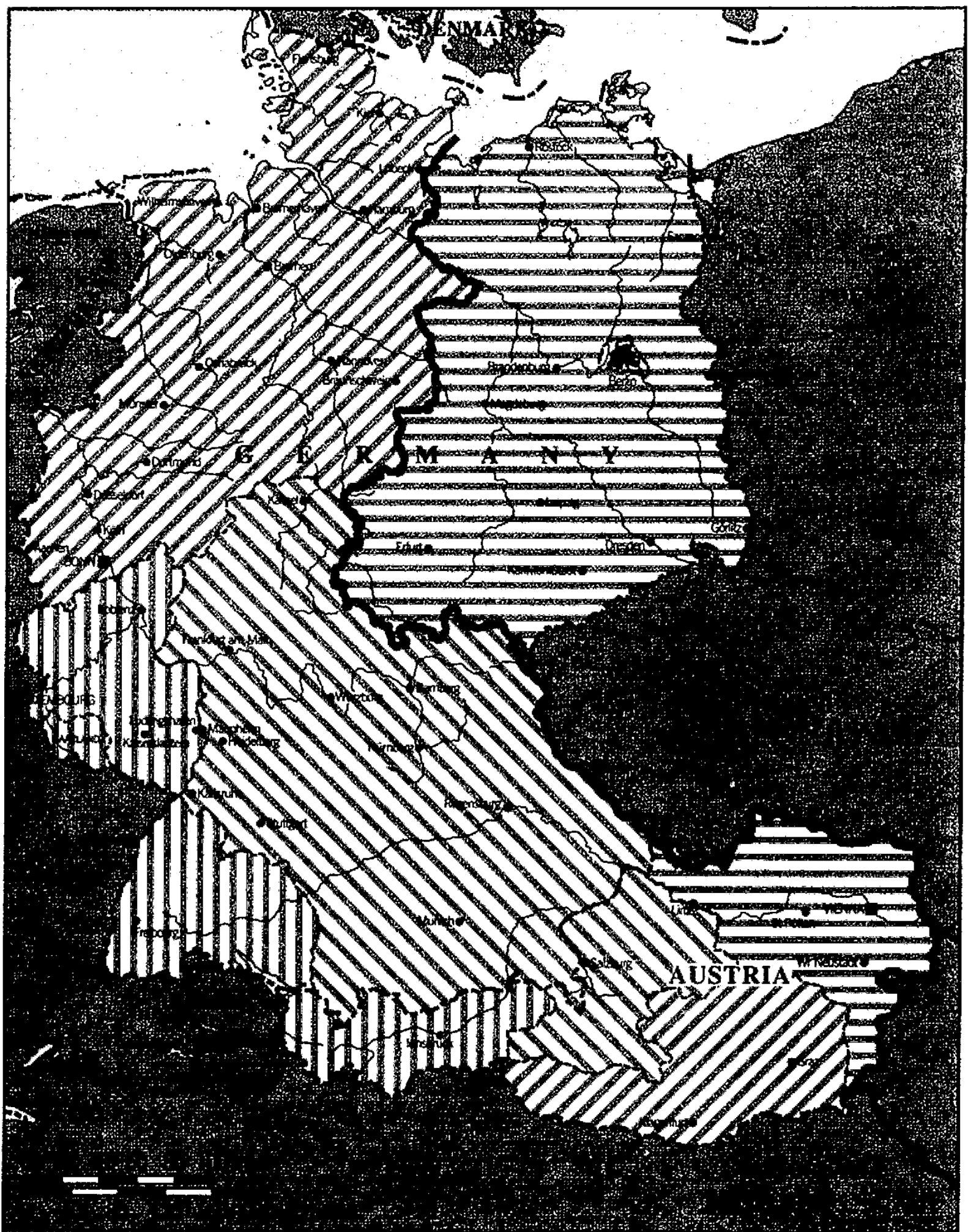
56 苏联人出现在纽伦堡,是因为在战时他们属于同盟国,也因为在打败希特勒的战斗中,苏联红军的卓越贡献。但是审判的第二个缺点却是司法程序的性质中固有的。恰恰是因为从希特勒本人开始,纳粹领导人的罪责是被小心翼翼地确定为完全个人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感到有权认为其余人全都是无罪的,作为集体的德国人,像别人一样,都是纳粹主义的被动受害者。纳粹分子的罪行可以说成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引用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半个世纪后说的话),然而几乎无人真正赞同说,这些罪行是由德国人犯下的。

美国人尤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领区启动了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其目的是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废除纳粹党,粉碎它的根基,播下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组织了一群心理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他们的任务是要研究明白,为什么德国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英国人也承担起同样的项目,但是他们心怀狐疑,拥有的研究资料也很少。法国人对这件事无甚兴趣。但是苏联人立即赞同,于是各种积极的“去纳粹化”措施成为同盟国占领当局能够达成协议的为数不多的议题之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对于任何行动一致、旨在从德国生活中根除纳粹主义的计划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1945年的情势下这种计划根本就行不通。美军司令卢修斯·克雷将军说:“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地发现合格的德国人,他们未曾以某种方式附从或协助过纳粹政权……看来往往只有一种人符合要求……即职业公务员……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用我们的定义来说)只是名义上参加了纳粹党的各种活动。”

克雷并未夸大其辞。1945年5月8日,当欧洲战争结束时,德国有800万名纳粹分子。在波恩,112名医生中有102人曾经是纳粹党员。在沦为废墟的城市科隆,城市水务管理局的21名专家——他们的技术知识在重建给水、排水和防止疾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间,有18人曾经是纳粹党员。战后德国的民政、公共卫生、城市重建和私人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由这些人来承担,尽管他们还必须在盟国的监管之下。在处理德国问题时,要将他们排除在纳粹分子之外,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是就作出了这样的努力。在德国的3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填写完成1600万份调查表,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完成的。那里的美军当局列出350万名德国人(约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作为“可以起诉的案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被带进法庭。这份名单是1946年3月在同盟国的监管下,由德国人负责确定的。德国平民都必须去参观集中营,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纪录影片。纳粹教师被清除,图书馆藏书重



德国与奥地利：盟军占领的地区

新整顿,新闻报纸的发行由盟军直接控制,重新分配给被证明是真正反纳粹的新的出版者和主编们。

对于这些措施,甚至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1946年5月5日,后来担任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乌珀塔尔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反对“去纳粹化”的措施,要求让“纳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两个月后,在对他新组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去纳粹化”的持续时间太长了,而且毫无益处。阿登纳是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他认为,让德国人来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正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根深蒂固,这位未来的总理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允许甚至鼓励沉默,是更明智之举。

他的话并非全错。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它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战后的种种困难——食物短缺,住房短缺,等等——而不知道在被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那些受害者的苦难。他们实际上倾向于将自己看成受害者,所以认为审判也好,对纳粹行为的愤怒也好,都是胜利的同盟国对一个已被废除的政权的报复。〔3〕除了少数例外尚可尊重,德国战后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而这个国家的主要部分——自由职业者,法官,公务员——是态度最折中的一部分人。

调查活动就这样受到了嘲弄。它尽可能地洗刷可疑分子的劣迹,帮他们获得良好证书(所谓“帕西尔”证书,得名于一种洗衣皂的牌子)。再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让德国人去看纪录影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让他们看过电影后引起思考了。多年以后,作家斯蒂芬·赫姆林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不幸的人们——我也在其中——既伤感又麻木。他们对被什么事情触动和‘了解你自己’都不感兴趣。”〔4〕

随着冷战的到来,西方盟国放弃了“去纳粹化”的努力。很清楚,这种努力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巴伐利亚,到1946年时,半数中学教师被解雇,但只过了两年就全部复职了。

〔3〕 1946年,西德的地区委员会向盟军当局建议:考虑到德国目前的短缺现象,应当减少被迫流落异国者的食物配给。卢修斯·克雷将军仅回答说,即使是短缺的食品,也是由欧洲各国即德国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提供的。

〔4〕 斯蒂芬·赫姆林,《命运类型》,(柏林,1985),第46页,引语出自弗兰克·斯特恩《刷白黄色奖章》(1992,第xvi页)。

1949年,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1年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西德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阿登纳总理的主要助手汉斯·格劳伯克在整个50年代负责对希特勒1935年纽伦堡法律作出官方评价。莱茵兰-法尔茨警察局长威廉·豪瑟负责监督调查战争时期在白俄罗斯的屠杀案。 58

行政部门以外的情况也一样。大学和法律界受到“去纳粹化”的影响最小,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同情早已臭名远扬。商人们也轻易逃过了关。弗里德利希·弗立克在1947年被定为战犯,波恩当局于3年之后就释放了他,让他恢复先前作为戴姆勒-本茨汽车公司主要股东的名誉和地位。工业集团企业法尔本和克虏伯的有罪的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为难。1952年,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分公司重新召集了纳粹年代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美国管辖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约翰·麦克罗伊替他们轻判或减刑了。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三分之一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作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西德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三分之一,达到37%。而且在同一年(1952年),25%西德人承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在苏联占领区,对待纳粹遗产的方式略有不同。尽管苏联的法官和律师们也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他们在东欧“去纳粹化”中主要强调对纳粹分子实行集体惩罚,并且从一切生活领域中消除纳粹主义。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抱幻想。后来担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沃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国家战败后仅过6个星期,就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人民的悲剧是出于一种事实,即他们服从了一群罪犯……德国工人阶级和从事生产的人们在历史面前失败了。” 59

这是阿登纳或大多数西德政客不愿意承认的,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但是乌布利希像

他们听命的苏联当局一样,与其说是对惩罚纳粹罪行、不如说是对保证共产党在德国掌权和消灭资本主义感兴趣。结果,虽然在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比在西方更深入,但是“去纳粹化”的基础是对纳粹主义的两种歪曲理解:其一是认为它构成共产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二是它带有殚精竭虑的机会主义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苏联的官方说法都认为,纳粹主义纯粹是法西斯主义,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在危机时刻的产物。因其如此,苏联当局对纳粹主义的明显的种族主义一面及其种族灭绝的结果几乎不加注意,相反却集中精力抓捕和剥夺商人、有才华的官员、教师,等等,认为他们推进了背后支撑希特勒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苏联以这种方式来拆毁德国的纳粹主义传统,同斯大林在中欧和东欧其他地方推行的社会转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苏联对前纳粹分子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只起到一种微弱的作用。共产党员在被管制的德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坐着红军的行李列车到达,但是并不能使自己赢得选民。除了暴力和选举骗局,他们唯一的政治前景只能依靠诉诸精心算计的自我利益。在东欧和南欧,共产党的方法是驱逐日耳曼种族的人,将日耳曼人空出来的农场、工商企业和公寓分给新来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而自己则以保护人自居。这显然不是德国本身的选择。在1945年末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错误地拒绝了少数纳粹分子和前纳粹党员起潜在关键作用的支持。因其如此,共产主义在战后奥地利的前景就黯淡了。柏林接受了这一教训。德国共产党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对几百万前纳粹党员提供了服务和保护。

60 两种观点——教条的和算计的——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们当然相信,实行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从德国清除纳粹主义的一条有效道路:他们对个人责任或道德再教育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也懂得,纳粹主义不光是一种对天真的德国无产阶级施行的诡计。德国工人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失职。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正确地施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很容易使它适应共产主义的各种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东德当局就像西德当局一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假如不是同前纳粹分子,他们还能同谁一起管理这个国家?

因此,一方面,苏联占领军当局解除了大批前纳粹分子的工作职务——到1948年4月是52万人——并且任命“反法西斯分子”进入苏占区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主动鼓励前纳粹分子妥协,加入他们的队伍,只要这些纳粹分子的记录不是太公开。毫不奇怪,他们非常成功。前纳粹分子们非常高兴地用将自己的命运扔给胜利者的办法来抛弃自己的过去。作为党员、地方行政官员、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证明自己完全一致地顺应共产党国家的各种需要。

毕竟新的制度非常像他们以前曾经知道的制度：共产党人简单地接管了纳粹的机构，例如“劳工前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它们起了新名称，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同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东德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西德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20世纪50年代初，东德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10年后，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新处理的国家安全局接管的不仅是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和实务，而且也接收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的雇员和密探。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牺牲品往往被一个统一的罪名指控为“纳粹战犯”，逮捕他们的人是前纳粹警察，审判他们的人是前纳粹法官，而看守他们的卫兵，也是新政权统统接收过来的纳粹时代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前纳粹卫兵。

东德的个人和机构轻易地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并非是无二一的，在其他地方或许只是规模问题。意大利战时抵抗运动中隐藏的各类前法西斯分子人数众多，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态度可能出于某种事实，即它的许多潜在支持者都曾向法西斯主义妥协过。在战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公开地引诱前法西斯箭十字组织成员，甚至还会向他们提供帮助，阻止归还犹太人的财产。战时在伦敦，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弗拉多·克莱孟提斯和欧仁·洛贝尔是苏联间谍从战前捷克法西斯主义政党里悄悄招募来的，而10年后在公开审讯中，他们的证词将会被用来对付苏联间谍。

人们对纳粹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视而不见，反而将其用于战后政治目的，这样做的不 61
仅仅是共产党。在奥地利，前法西斯分子往往受到西方当局的青睐，允许他们从事新闻或其他各种敏感的职业：他们同战前奥地利的极权主义政府合作过，由于纳粹入侵，也由于他们对左派的憎恶是完全可信的，而且越来越可以被利用，所以他们的罪责不再被提起。在意大利东北部边疆地区，同盟国军事政府保护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南斯拉夫通缉的，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却到处招募有经验的和消息灵通的前纳粹分子——包括绰号“米兰屠夫”的盖世太保官员克劳斯·巴比——以备将来所用：大多是用来对付为苏联服务的前纳粹分子，因为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辨认出来。

1944年9月20日，康拉德·阿登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会里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如此谈及“去纳粹化”和纳粹遗留人员：“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信许多人愿意为并不重的罪行赎罪，所以决定，凡是可这样做的，都应该将过去忘掉。”很多德国人无疑从内心深处

拥护这种说法。如果说“去纳粹化”流产了,那是因为出于政治目的,德国人已经自发地在1945年5月8日将自己“去纳粹化”了。

并非只有德国人是这样。意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日报在希特勒死去的那天就发出了相似的号召,宣布“我们有权遗忘!”“尽早忘却!”在东欧那些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情——他们遭受的事情和自作自受的事情——需要忘却的国家里,共产党最有力的呼吁是许诺造成一个革命性的新开端。在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强烈的弃旧履新的意向,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伊索克拉底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一起来治理,就当它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相信短期的记忆,寻求可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德国的反纳粹战士,法国的抵抗运动战士,波兰的受害者——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看到的最重要的现象。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使铁托元帅、夏尔·戴高乐或康拉德·阿登纳等人能向他们的同胞提供一种貌似有利的、甚至很自豪的自我评价,以致鼓舞国家恢复元气。甚至连东德也宣布自己有一种高贵的起点、一种虚构的传统:像神话故事般地、大多是编造出来的关于1945年4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共产党“起义”。这类说法使一些被动地遭受战争苦难的国家(例如荷兰)可以抛开他们曾经妥协的历史记录,使另一些其积极行动被证明是被误导的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可以掩埋一段互相争斗的英雄主义的污点历史。

62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被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在1945年的情势下,在一块布满疮痍的大陆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真的死去并埋葬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量地、有选择地集体失忆,尤其是在德国。然而在当时,首先是在德国,的确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忘却的。

第 3 章

欧洲的复兴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本身造就了一场无声的革命,铺平了通向新型的按计划建立秩序的道路。

——卡尔·曼海姆

普遍的观点认为,为了完成重建任务,应当采用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

我们回到英国,许多人对它很失望……无人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它变成我们想要的英国。

——温妮·怀特豪斯夫人(保罗·爱迪生《战争现已结束》)

要想补救,就要打破恶性循环,使欧洲人恢复对自己国家、对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

——乔治·C. 马歇尔

欧洲遭灾,其规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战争改变了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 1939 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无稽之谈。年轻人和激进派自然持这种观点,老一辈睿智的观察者们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法国解放时他已经 54 岁,看问题异常精确:“在大灾变中,承载着失败的重压,人们思想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将 1940 年的灾难看成是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失败了。”

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问题并非从1940年才开始。每一个地方的反法西斯的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战时的占领者及其当地代理人战斗,而且也在向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作战,他们对祖国经受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正是这些政界人士、银行家、商人和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自己的祖国拖入了灾难,他们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夯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英国有一本小册子痛斥保守党在1940年之前鼓吹绥靖政策的行径,责备这些人是“有罪之人”。为战后变革而设计的战时计划就将这些人和他们的制度当作批评目标。

因此,每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都明显带着革命性质。这一点天生符合逻辑。否定一个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使人自然“梦想革命会从擦干净的地方开始”(伊泰罗·卡尔维诺语)。正如我们所见,在欧洲许多地方,这块记事板的确已经擦干净了。但即便在西欧,也普遍地期待戏剧性的、迅速的社会转型: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阻碍道路?

从战时的抵抗运动战士们来看,战后政治会是他们战时斗争的延续,很自然地投射和扩展他们的秘密存在。很多在战时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其他公共生活的形式:在1924年以后的意大利,在30年代初开始的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在1940年以后欧洲大陆上被占领的每一个地方,不知有正常的政治。各种政党都遭禁止,选举制度受到严格控制或被废除。要想反对威权,鼓吹社会变革甚至政治改革,就会将自身置于法律之上。

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政治就是同抵抗有关——抵抗威权,抵抗社会或经济结构状态,抵抗过去。法国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战后成为一家著名杂志主编的作家克劳德·波尔德在他的回忆录《糊涂历险记》里准确地描绘了这种心态。他写道,“抵抗运动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战斗者’,具备这个词所含的每一种意义,同人斗,也同社会制度斗。”从抵抗法西斯主义,到抵抗战后试图倒退回30年代的错误,看来只是跨出了很自然的一步。从中产生了很奇怪的乐观主义情绪,许多观察者在刚刚解放时就做出了断言。尽管到处陷入贫困——的确也是由于贫困——肯定会出现新的、更好的事物。1945年11月,意大利《社会》周刊的编辑们写道,“我们谁也不会承认自己过去的历史。看来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受到一种麻木不仁意识的控制,凭直觉去寻求方向。事实使我们无能为力。”

希特勒失败后,激进变革的主要障碍不是反动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同独裁者一起被清除,而是合法的流亡政府,他们多数在伦敦坐观战争,谋划回归。它们认为自己同国内的抵抗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同盟者的关系,而是一个麻烦问题:需要将这些粗心的年轻人解除武装,让他们回到平民生活,将公共事务交到充分清除了合作者与叛国者的政治阶级手里。若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或者被盟军无限期地

占领。

战时的各种抵抗组织在1944年至1945年组织起各种政治派别,它们对流亡政府的回归持怀疑态度。在它们看来,政客们、官员们、大臣们逃离了被占领的祖国,他们负有双重责任:战前的错误和战时的逃跑。在法国和挪威,1930年选出的议员被他们自己在1940年的行为证明是不合格的。在比利时和荷兰,议员们在那复杂的5年里不在场,回归的政府无法理解国内的苦难和在纳粹占领下公众情绪发生的变化。在中欧和东欧,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其于国家先前的政府都由于苏联红军的到达而变得无足轻重了(而它们有时却迟钝到感觉不到这一点)。

回归的各国政府都很愿意在政策问题上妥协——尤其在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方面,这在下文再谈及。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戴高乐等人主张的“有序的转型”。由于这也是东欧和西欧的同盟国占领军的选择,所以抵抗运动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在东欧(除南斯拉夫以外),由苏联人决定战后政府的组建,一切行动都听苏联人的指挥。在西欧,过渡政府掌权后就举行了新的大选。在任何情况下,抵抗运动组织都被劝说、最后是被迫交出武器,解散组织。

回顾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制度复辟的现状几乎没有任何抵制。在波兰和苏联的一些西部地区,游击队武装组织又生存了几年,但它们都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特别组织。在挪威、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组织都和平地融入了战后的政治党派和联盟,没有出现公开的抗议。在比利时,1944年11月,命令战时抵抗组织在两个星期内交出武器。这引起了11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大规模抗议集会,警察开了枪,伤及45人。但是这类事件并不多见。〔1〕更为典型的是,20万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成功地合并进了正规军,他们的组织“法兰西国内武装力量”未表达任何抗议便解散了。

苏联人从战略角度考虑,竭力支持解散抵抗运动组织,赞成在西欧(并且名义上也在东欧)恢复议会政府。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和意大利的帕米罗·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袖在使他们的(有时是茫然失措的)追随者们走向和平合作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许多人愿意相信,抵抗运动的能量和雄心到现在应该纳入民族复兴的政治目的了。

有时候,在抵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联系还继续存在着——例如,荷兰社会在结束了几百年来天主教与新教的教派分裂后,在战时又开始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战后成立“抵抗运动党”的计划却到处都失败了。它在意大利最接近成功,1945年6月,费鲁乔·帕利当上总理,他保证过,他的“行动党”会追随抵抗运动的精神和目标。然而帕利不是政客,当他在6个月后下台时,政权就明确无疑地落到了传统党派的手中。法国的戴高乐

〔1〕 1948年秋天,意大利最后一批武装的游击队员在波伦亚一带遭到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围捕。

是一位比较出色的政治策略家,但是他也(在帕利下台后1个月)放弃了职位,不想将他在战时的雄心纳入议会的日常事务——因此无意在重建法兰西共和国的延续性中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功。

大多数欧洲人在战争刚结束时,不想受一个新的、抵抗者兄弟团体的统治,却发现自己受到左翼和以左翼为核心的政客们的联合统治,这是他们在30年代的“人民阵线”中已经熟悉了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在那几年里,战前的政党唯有在战时建立了反法西斯信誉的,或者,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唯有(至少暂时)能符合新政权对这种信誉的要求——才能继续正常运作。在实际情况中,这意味着就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一小批自由派或激进派团体。这些政党和团体同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成了战后最初几年里的参政党派,它们带来了“人民阵线”时代的许多政策和人员。

现有的各左翼政党因其在战时从事抵抗运动而斩获颇丰:尤其在法国,共产党将其战时所得(有时颇为夸张)转为政治资本,而且使冷漠的观察家们甚至也相信他们独特的道德立场——正如1944年12月詹妮特·弗莱纳所形容的,他们是“抵抗运动的杰出英雄”。所以战后欧洲各国政府的改革计划应和并且重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未竟事业,也就并无特别令人奇怪之处了。

有经验的政党政客在1945年之后毫不费力地排挤了战时的积极分子,这是因为后者虽然共同反对法西斯,也都有普遍的改革愿望,但是抵抗组织及其继承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目标相当模糊。意大利的“行动党”意图废除君主制度,使大型资本和工业国有化,改革农业。法兰西民族抵抗委员会的“行动纲领”中,虽然没有国王可供打倒,但其勃勃雄心同样没有精确地落到实处。抵抗组织一向太专注于战斗,或者只为了生存,所以对战后的立法都未做过详细的计划。

但是,抵抗者们显得软弱无能,首先是因为缺乏经验。在众多地下组织中,只有共产党具备实际政治知识,而且除了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组织都还不够成熟。但是共产党特别不愿意被具体计划的内容束缚手脚,因为那些具体内容可能造成同未来战略上的同盟者分道扬镳。于是,抵抗组织除了宏观内容的意向和泛泛的一般问题之外,对于战后制订的计划并未留下多大意见——即便如此,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944年8月指出的,是“匆匆忙忙地写出了异想天开的计划”,尽管他在其他方面还都抱着同情态度。

然而,在一件事情上,各方都达成了一致——无论抵抗者还是政客都一样:“要制订计划”。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1918年之后失去的机会;1929年股市崩溃后紧接着的大萧条;失业造成的浪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不公正、低效率,导致许多人倾向于极权主义;傲慢的统治阶级精英无耻的冷漠;一个不成熟的政治阶级的无能——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完全无法将社会组织得更好。如果要实行民主,如果想恢复它的魅力,

那么就必须制订计划。

有时候,有人会提出,这种对制订计划的信念(它像是欧洲战后的一种政治宗教)来自苏联的榜样:计划经济明显地避免了资本主义欧洲的痼疾,挺住了纳粹的进攻,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完全是靠了一系列具体的五年计划。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在战后的西欧和中欧,只有共产党人相信苏联式的计划(但他们对此所知甚微),他们甚至不懂这类计划如何才能用于他们当地的环境。苏联人沉溺于数字目标、生产配额和中央指令,除了少数在当时的西欧鼓吹计划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这一切都十分陌生。这些鼓吹者们——而且他们也是各式各样的——依靠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

计划与制订计划的时髦流行,早在1945年以前就开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大萧条时期,从匈牙利到大不列颠,支持各种计划经济的呼声就已纷纷出现。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尤其在奥地利、在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中间)来自较早的社会主义传统,但是更多的思想源自1914年前的自由派改良主义。19世纪的“照管”型国家已经过时,因为它的注意范围仅限于国家安全与维持治安,于是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使只为了深谋远虑地防止政治动乱,国家也有必要介入经济事务,调整不平衡现象,消除无效率现象,校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1914年前,这类改良主义的计划主要强调限制累进税,保护劳工,有时还包括数目有限地垄断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崩溃和战争的逼近,对制订计划的要求显得愈加迫切,而且显得雄心勃勃。法国和德国的年轻的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公务员中间广泛流传各种关于国家计划的建议方案,主张国家应该积极介入对经济领域的支持、阻止、援助,如果有必要,就监管主要的经济部门。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想要成为计划者的人及其支持者们苦恼地徘徊在政治边缘。老一辈的政客们对他们的呼吁装聋作哑:保守的右派和中间派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令人厌恶的;而社会主义左派则普遍认为,只有革命后的社会才能合理地计划它的经济事务。只有到那种时候,资本主义才会自食恶果,最终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崩溃。双方都认为,那种以为有谁可以“计划”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纯属荒唐。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们受到挫折,于是常常被极右派和极权政党所吸引,并且明显地发现与这些政党的道路更合拍。

所以并非出于偶然,奥斯瓦尔德·莫斯莱同英国工党的一些成员在苦于无法应对大萧条时,转向了法西斯主义。比利时的汉德立克·德·曼也无法说服他的社会主义同事们相信他的“计划”的可行性,就开始制订了更极权化的解决方案。在法国,社会党的一批最辉煌的年轻领袖对其政党未能富有想象力地应对经济危机而深感失望,遂分离出去组织新的派别。这类人中间有不少人最后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1940年以前,法国和英国的墨索里尼拉拉队员们钦羡地看着他通过国家领导的计划,并且对所有各个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保护伞式的机制,成功地克服了意大利的经济缺点。希特勒“新秩序”的执行人阿尔伯特·斯皮尔的经济监管与调整计划在国外受到很多人佩服。1943年9月,斯皮尔同维希政府工业生产部长让·皮歇洛纳一起,根据两次大战之间“计划主义”的思想,制订了一套降低关税的制度,为后来几年里欧洲贸易关系和法德经济合作做了准确的预案。1933年,一批敏锐地提出制订政策新方向的年轻思想家和政治家成立了“青年欧洲”会社,其中有后来的比利时国务活动家、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保尔-昂利·斯帕克,他与全欧洲思想相同的同时代人(包括后来在战时成为在巴黎的纳粹主政者奥托·阿贝茨)就加强国家作用的观点交换了意见。

简言之,“制订计划”的历史十分复杂。许多鼓吹者最初获得公务员和工商企业领导者的经验,是在战时的占领政府里——在法国、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意大利了。英国未被占领,但是战争引发并培养了当时相当抽象的政府“计划”观念。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战争,首先使英国的政府处于经济生活的中心。1940年5月的“紧急权力法案”授权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而监管任何人做任何事,控制任何财产,指令任何工厂完成它选定的任何一项国家目的。英国战后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传记作者肯尼思·哈利斯说:“国家计划和国家所有制在1945年至1951年那段时期,是工党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组织战时总动员的结果。”

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因此成了异端的、边缘化的、往往争议很大的经济计划观念同战后主流经济政策之间的桥梁。然而这种妥协的传承很少冲击对制订计划的吁求——无论它同极右派还是极左派、同占领还是战争发生联系,计划却十分明显地与两次大战之间名声不佳的政治没有联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计划真正涉及的是对国家的信任问题。在许多国家里,它反映出一种基础深厚的意识由于战争的经历而进一步强化,认为在缺乏任何一种调整与分配的机构时,只有国家处于个人需求与经济匮乏之间。但是,当时提出国家干预的那种热心主张,未能顾及绝望情绪和个人利益。1945年英国的戏剧性般混乱的大选中,工党击败了丘吉尔的保守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许诺非常符合同时代人的情绪:现在所需要的是“良好计划的、良好建设的城市、公园、运动场地、住房、学校、工厂、商店”。

人们极大地相信政府有能力(不仅仅是有责任)出于集体目的和目标,通过动员和指挥人民和资源,来解决一些大规模的问题。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明显地对社会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然而关于“一种良好计划的经济意味着一个更富裕、更公平、更有规则的社会”的思想有非常广泛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当时在西欧各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1945年11月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们说:“在欧洲没人相

信美国生活方式——亦即私有企业；或者说，相信美国生活方式的是一群失败的人，他们的前途不会比1688年以后的英国激进分子们好到哪里去。”泰勒一向夸大其辞，而从长远来看，他想错了，（然而谁又不是呢？）如果他知道当时占领德国的美国当政者中有许多人都是“新政者”（New Dealers），热心主张计划经济，他可能会觉得惊奇。但在当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什么是“计划”？这个词是误导的。主张计划的人都相信在社会事务中和经济事务中强化的国家作用。除此以外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它们通常都是国家政治传统的产儿。在英国，事实上很少发生过“计划”，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国家所有制作为其本身的目标来实行“控制”——控制工业、社会服务与经济服务。因此，国有化（主要是矿藏、铁路、商品运输和公用事业）和对医疗服务的规定是1945年之后工党纲领的核心。简言之，经济的“统制高地”被接管了。但是仅此而已。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留下的制度——它造成大部分经济领域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在战后大多未被触动。变化的只是政党的政治色彩，它们控制公司和国有机构，以权力为基础，从工业、金融业中获益。在西德，1948年后的经济大部分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是在工厂管理、劳资关系、雇用和分配条件等方面都有详尽的、共同协定的细则。在荷兰，中央政府的计划对于使用私有企业作出了各式各样预先规定的法令。

以政府开支或公共服务部门雇员人数来衡量，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公共部门发展得很迅速。只有在法国，国家计划的理论热情才真正转化为实际事物。像英国一样，战后法国政府推行国有化：航空运输、银行、32家保险公司、公用事业、矿产、军火工业、飞机制造业、巨型的雷诺汽车集团公司（其收归国有，是对其所有者曾在战时为德国发动战争出力的惩罚）。法国总体生产能力的五分之一在1946年5月属国家所有。

与此同时，在1945年12月4日，让·莫奈向戴高乐总统提交了他的《工业设施现代化计划》。一个月后，成立了以莫奈为首的“计划总署”。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莫奈为各门工业（采矿、电力、运输、建筑材料、钢铁与农业机械，后来又增加了石油、化工、化肥、船运、合成纤维）设立了“现代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递交了各种建议和部门计划。仅在其创办后的一年，到1947年1月，“计划总署”的第一份国家计划就由法国内阁毫无争议地批准了。

莫奈的计划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位非凡之人的作品。^{〔2〕}但这首先要归因于一种

〔2〕 让·莫奈1888年生于科涅克，父亲是白兰地酒商。毕业后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秘书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代表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同美国谈判武器供应。他致力于经济计划和后来他对欧洲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所做的贡献，使他在大规模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知名度很高，这对于像他那样的阶级出身的人而言，在当时可谓异乎寻常。

政治文化,即早已形成的主张用政府法令来实行极权式决策和建立共识的倾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法国成为第一个全心全意地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当作公共政策的西方国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设想是法国获得德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因此它的成功故事成为战后10年法国阐释其同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充满了许多虚假起点、限制和挫折的故事。

71 第一个“莫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针对法国战后危机的应急措施。到后来它才扩展内容,以适应“马歇尔计划”的条款。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显示了战后法国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法国的计划从未超出“指标式”:它向来只设定目标,却不制定生产配额。在这一方面,它同苏联的计划大不一样,后者的本质特点(也是主要缺陷)是坚持按部门、按商品来武断地、严格地规定产量数字。“莫奈计划”只限于向政府提供战略和平衡手段,以便积极地培养某些经批准的目标。在当时,这是一种特别具有原创性的做法。

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建立于1946年6月,贝内斯总统用它来指导和协调大规模公共部门的国有化,它的某些特征和目标同莫奈很相像。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一年里,交通运输部门的93%雇员和工业部门的78%雇员早已为国家工作。银行、矿产、保险公司、主要的公用事业、钢铁厂和化工厂、食品加工业,以及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已经被政府接管:2119家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制造业总产量的75%左右。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有化与国家经济计划开始顺利地推动了共产党接管,并且表现出这是大多数选民真正的政策选择——1949年2月,在共产党执政后仅过了一年,“计划委员会”经过调整,改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职权范围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里,大规模的国有化(例如1946年1月波兰“国有化法”批准的)是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联合政府推行的。但在这一方面,也有共产党执政前的根源:早在1936年,战前波兰共和国极权政府就在由中央指导制订计划的早期制度下,提出一项“四年投资计划”。

欧洲大陆战后制订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投资。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巨大的投资,政府计划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国家的有限资源投放到哪里?谁来花钱?在东欧,重点不可避免地放在基础设施的开销上——道路、铁路、工厂、公用事业。但这样一来,留给食品与住房方面就非常少了,而留给医药、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就更少;留给非关键性的消费品的则是零。这种经费支出的格局本身不会讨任何选民喜欢,尤其是在那些早已长期遭受物质被剥夺的国家里,所以毫不奇怪,在可怕的短缺条件下,这种计划或迟或早几乎总是伴随着极权统治和警察国家。

但是西欧各国之间的情况并无很大差异。英国连续几年接受“节制消费”作为恢复经济的代价,但对其年份是有限制的。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长时间的私人资本市场,一切主要的投资都由公共资金投入——第一个“莫奈计划”偏向于将资本投向主要的一些

工业产业,牺牲国内消费、住房和公共服务,其原因就在此。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到1947年,法国像意大利一样,受到罢工、暴力游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共产党及其工会的威胁。刻意忽略消费品生产部门,将稀缺的国民生产资源投入少数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这些都具有长远的经济意义:然而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策略。 72

计划经济理论直接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战后经济复苏的成功策略应该防止回到经济停滞、萧条、贸易保护主义,而且首要的问题是防止失业。创建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就是基于这些考虑。根据40年代的传统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的政治两极分化直接产生于经济萧条及其社会代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因社会普遍绝望、贫富差异巨大而兴旺起来。若要恢复民主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的状况”问题。用一百年前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如果某件事没有做,那么终有一天这件事情自己会做,而且行事方式让谁都不愉快。”

但是,“福利国家”——社会计划——不止是一种预防政治动乱的措施。使我们现在感到不安的诸如种族、人种改良、“退化”等等,在20世纪上半期大众思想中混淆了重要的问题——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不只是纳粹分子。到1945年,欧洲两代医生、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和政治评论家都投入了广泛的争论,他们辩论关于“人种健康”、人口增长、环境与职业福利、公共政策,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进和保障。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公民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是一个共同利益的问题,所以也是国家职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结果是,1945年以前就已广泛传播各种不成熟的福利预案,尽管它们的水平和范围都相当不同。德国典型地是最先进的国家,它早已于1883年至1889年间在俾斯麦领导下,将退休金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计划制度化了。但是其他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开始做到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英国的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就引进了初步的国民保险和退休金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英国(1919年)和法国(1920年)就立即设立了卫生部。

强制性的失业保障首先于1911年在英国实行,并且在意大利(1919年)、奥地利(1920年)、爱尔兰(1923年)、波兰(1924年)、保加利亚(1925年)、德国和南斯拉夫(1927年)、挪威(1938年)形成制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意外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计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生效了,东欧所有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建立了国民退休金 73
制度。在增长出生率——1918年后,在战争中严重损失人口的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的计划中,家庭津贴成为关键因素,这一制度最先在比利时(1930年)推行,随后是法国(1932年)、匈牙利和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但是这些办法(甚至包括纳粹的办法)都不代表全面的福利制度。它们都是逐步积累的专项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只涉及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是对先前制订的计划中显示的缺点做改进。例如,英国推行的各式各样的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福利程度极其有限,而且只适用于在工作的人(不包括妻子们和需要赡养的其他家庭成员)。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失业救济者的资格取决于一种“财力测试”(Means Test)。这种测试根据19世纪的“贫民救济法”原则中的“最低资格”条件,要求申请公共援助的人证明他真实的赤贫状况,以符合资格。没有哪个地方认可国家有责任保证向所有的公民提供一整套服务,无论他们是男是女,就业或无业,年老或年幼。

正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促成了立法与社会规定(哪怕只是在战争年代过后对待寡妇、孤儿、残疾人、失业者)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现代国家的职责和民众对它的期望。这种变化在英国最明显,梅纳德·凯恩斯正确地预见战后“渴望社会的和个人的保障”。但在每一个地方,(用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来说)“战争与福利牵手并行”。在一部分国家里,关于营养与医疗的规定在战争期间确实得到了改进:动员男男女女投入战争总动员,意味着更多地发现他们的状况,并且尽一切必要手段来保证他们提高生产力。

1945年以后的福利国家之间的情况相当不同,这取决于它们能提供多少资源,以及获得资金的途径。但是可以指出它们的某些共同点。关于社会服务的规定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娱乐地点、国家补贴的公共交通、改革对艺术与文化的资助制度,还有国家介入的各种直接利益。社会保险主要是由国家提供保险——针对疾病、失业、意外事故和老年的保险。战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提供或资助这些保险,有的国家做得比较好一些。

74 这些计划在涉及如何支付新的公共经费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别。有些国家通过收税来提供免费的或高补贴的照顾和服务——这就是英国选择的制度,它反映出当时对国家垄断方式的选择。另外一些国家根据社会共同决定的资格标准向公民发放现金福利,让受益者自己选择购买服务。在法国和一些较小的国家里,希望公民们支付某些种类的医疗经费前期款,然后向国家领回他们付出的大部分钱。

这些差别反映了国家财政与会计的不同制度,但是它们对于基本的策略选择是有意义的。从孤立的角度看,社会保险无论有多慷慨,在原则上都不是政治上的激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最保守的政府也都比较早地采纳了这种制度。然而全面福利制度本质上就是再分配制度。它们的普遍特点和运作的规模都要求将资源——通常是通过税收获得的——从特权阶级转到生活贫困的阶级。因此福利国家本身就担负了一种激进的责任,而欧洲福利国家在1945年以后的不同情形,所反映的不光是制度性的计划,而且也

是政治性的考虑。

例如在东欧,1948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从总体上一般并不赞同普遍福利制度——它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它们可以凭权力任意重新分配资源,而不用为公共服务花费稀缺的国有资金。例如,农民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频繁地排除在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安排之外。在西欧,只有6个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在1945年以后采用强制性的、普遍的失业保险。对志愿者计划的补贴在荷兰维持到1949年,在法国维持到1967年,在瑞士一直坚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建立已久的地方和团体的失业保障可能超过了普遍实行的保险制度的发展,因为对保险制度的需求已经降低了。在两次大战之间失业问题特别严重的国家——英国或比利时——里,福利开支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完全就业或接近完全就业。在就业问题并不严重的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福利开支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对优先性项目如何平衡的考虑。

虽说瑞典和挪威(而不是丹麦)在社会服务方面率先做到了比较广的福利涵盖面,西德也保留了从先前的政权继承来的福利制度(包括纳粹时代鼓励高生育率的计划),但是只有英国才付出了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建设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这一点,部分地反映了英国工党的独特立场,直接地促成了工党在1945年7月大选中获胜,而且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不一样,能使它的整个竞选纲领成为立法内容,而不受联合执政伙伴的限制。不过,它也出自相当明显的英国改良主义的传统。

战后英国制订社会法规的基础是一份相当出色的报道,其作者是威廉·贝弗利奇爵士,出版于1942年11月,并且立即成为畅销书。贝弗利奇生于1879年,父亲是英国派驻印度的帝国法官。他具有英国爱德华王朝自由党改良派的那种敏感与雄心。他的报告一度成为对英国社会在1939年以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控诉,并且成为战争一旦结束后的彻底改革政策的模板。即使是保守党也不敢反对该报告中的核心建议,因此它变成了战后工党纲领中那些最受欢迎、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内容的道德基础。 75

贝弗利奇就战后福利法规提出了4点设想,这4条为下一代人考虑的设想后来都成为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当有一种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一份足够的国家养老金,一份家庭补贴,以及尽量做到充分就业。最后一条本身是一种福利法规,但它支撑着其他一切,因为他确认在正常情况下,战后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应该有一份领薪水的正式工作。根据这条设想,可以为失业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制订慷慨的法规,因为这些附丽的支付是依靠征收所得税,而且随着总体就业人数的扩大,可以使税收不断增加。

实际内容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将没有个人医疗保险的无职业妇女也包括在内了。造

成屈辱地位和社会依赖的旧的“贫民救济法/财产测试”被废除了——福利国家的公民很少有(根据推测的)时候会需要公共援助,而现在他们根据权利就有资格享受。医疗和牙医服务是免费提供的,普遍实行养老金制度,采用了家庭津贴制度(从第二个孩子起,每星期补贴5—25英镑)。为这些制度立法的议会主要法案于1946年11月得到国王同意,“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法案”(即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于1948年7月5日写进了法律。

英国的“福利国家”既完成了早先的一轮改革(根源于19世纪中期的“工厂法案”),又是一次真正彻底改革的开始。乔治·奥威尔的《通向维根码头的路》(1937年出版)中描写的英国,同20年后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回答诘问者时说的那句出名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之间作对比,可谓是对“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和相伴随的对社会保险、维持收入、就业的规定献上了颂辞。今天回顾战后最初的一批改革者们的错误判断,要想贬低甚至否定他们的成就,那是太容易了。几年之后,“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多普适性的规定证明了其开支难以维持;在这些年里,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未能保持;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很明显,某些根本性的关于保险的计算和假设——包括对永久性充分就业的乐观预测——都是目光短浅的,甚至更糟。但是在战后的英国长大的任何人(例如笔者)完全有理由感激这个福利国家。

76 全欧洲大陆战后一代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除英国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始终将全面的社会保险覆盖到如此慷慨的规模。由于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欧洲人吃得更多而且(大多数人)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住房和衣服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比以前有了保障。当大多数欧洲人被问起他们对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的看法时,他们差不多总是首先谈到国家在战后向他们提供的保险与养老金规定的安全性,这并非偶然。即使在瑞士这个福利标准处于欧洲最低的国家,1948年12月的“联邦老年与幸存者保障法案”也被许多公民认为是他们国家的最优秀成绩之一。

福利国家的代价并不低。对于那些尚未从30年代经济萧条和战争摧毁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它们的代价更是非常可观。法国在1938年时用于社会服务的成本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1949年时要承担8.2%,即增加了64%之多。在英国,1949年仅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项(也就是说,不包括除社会保障以外的各种服务与设施的公共项目)就占到全部公共开支的将近17%,比起1938年严格控制国家金融时的水平来,增加了50%。即使在意大利这个穷得多的国家里,政府也努力避免社会保障的高成本,其方法是将服务与设施转给私人经济部门或工作单位,而政府在社会服务上的开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38年的3.3%上升到1949年的5.2%。

欧洲人为何愿意在保险和其他长期福利项目上花这么多钱,何况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物资仍然到处短缺?其首要原因恰恰是由于时世确实艰难,战后的福利制度对某

些最低限度的公正或者公平是一种保障。这不是许多人在战时抵抗运动中梦想的精神革命或社会革命,但是它为摆脱战前几年里的绝望与玩世不恭态度而跨出了第一步。

其次,西欧的福利国家不是从政治上可以划分的。它们是总体意图上的社会再分配(有些人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但完全不是革命——它们并不“淹死富人”。相反,虽然穷人感觉到最大的直接利益,但是真正长期的得益者是专业人士和商业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先前并无资格享受同工作有关的健康保险、事业救济或退休金,反而在战前还需要从私人部门为这些服务和利益付钱。现在他们完全有资格免费或用低成本获得这些利益。获得国家提供给孩子们的免费的或补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使工薪的专业人士和白领阶级生活质量更好,有更多可供使用的收入。欧洲福利国家不会使各个社会阶级相互分裂、敌对,相反地要使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维护和保卫它的共同利益。

但是,支撑国家资助的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基础,是普遍地意识到,这些福利要符合政府本身的任务。战后的欧洲各国都是“社会的”国家,对它的公民福利暗负着(而在宪法上是明显的)责任。它有责任不仅是造就一个严格规范的、安全的和繁荣的国家,而且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用范围很广的指标来衡量。至于事实上能否符合所有这些要求,那是另一回事。 77

明显可证的是,像瑞典这样富裕、单一民族、人口少的国家,比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的理想。然而贫困国家至少也像富裕国家一样,相信国家——或许还更相信一些,因为在这些地方,只有国家才能向人民群众提供希望,拯救他们。在经历过大萧条、被占领和内战之后,国家作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表,是使团体和社会得到凝聚和团结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今天的许多评论家倾向于将国家所有制和依赖国家看作是欧洲的一个问题,认为从上到下的拯救是时代的幻想。但是对于1945年那一代人来说,政治自由和国家行政机构的理性的、公平的分配功能之间某种可行的平衡,应该是走出深渊的唯一一条有意义的道路。

1945年以后的变革紧迫性远远超过了建立福利制度的迫切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是一个紧凑的改革时代,在此期间,许多长期以来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二连三地被提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业改革,当时的许多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这是欧洲最迫切的难题。昔日的重负仍然沉重地压在欧洲大陆的农业身上。只有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阿尔卑斯地区和法国的几个部分才有可能承认农民是一个兴旺的、独立的阶级。占欧洲主导地位的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和债务之中。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量最好的可耕地,尤其是牧场,仍然掌握在人数较少的富裕地

主手里,他们常常回避、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固执地反对改善他们的土地、佃户或工人的状况。另一个因素是,相对于手工业产品价格而言,农业产品价格长期下降,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不断恶化,其原因是在美国和英联邦自治领进口廉价谷物和肉类。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农民整整三代人的生活状况无止境地下滑。希腊、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国家、中欧和东欧的许多人移民去美国和阿根廷等等地方。留在家园的人们往往会相信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主张。因此在战后,人们(尤其是左派)普遍相信法西斯主义尤其对绝望的农民有吸引力,法西斯主义的任何一次死灰复燃都会从农村开始。所以,农业问题带有双重意义:如何改进农民的经济前途,由此来使他们摆脱极权政治的诱惑。

第一个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来尝试使其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到处展开——它的目的是重新分配土地拥有权,降低“无效分租”的数字,使农民有更好的机会有效地生产更多的商品。但是这些改革都未达到目的——部分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农产品价格甚至比1914年以前还下跌得快,新近“独立地”拥有土地的农民们事实上比以前更脆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尝试改革农业。在1945年3月的罗马尼亚土地改革中,从“富农”和“战争罪犯”手里没收1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那时多达60万名贫困或无土地的农民。在匈牙利,两次大战之间由霍尔西将军主政的政府阻止任何实质性的土地重新分配。战后根据联合政府于1944年12月制订的“塞格德计划”(译注:塞格德系匈牙利南部一城市),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从先前的地主手里剥夺出来。战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于同一年制订了相似的计划,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重新分配了大批土地——主要是从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手里夺来的农田。从1944年到1947年,东欧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拥有者阶级,他们的土地是新政府分给的。几年后,仍然是这批小土地拥有者,轮到他们在共产党政权的指令下加入合作化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在波兰、东普鲁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土地贵族阶级和大农场主阶级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在西欧,只有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堪比东面发生的戏剧性变化。1950年,在巴西利卡塔、阿布鲁齐、西西里的土地被夺取和占领后,横扫一切的改革法规宣布,在整个西西里和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地产。但是大大地忙乱一通之后,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重新分配的大部分旧日的大庄园土地缺水、缺路、缺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西里重新分配的7.4万公顷土地中,95%是“边缘”式贫瘠土地,不适宜耕种。分得土地的穷困农民既无钱,又无处贷款;他们对自己新的地产一筹莫展。意大利的土地改革失败了。他们的庄

严目标——解决“南方问题”——要到10年之后才解决,而在那时也只是部分解决:南方多余的农民放弃了土地,在意大利“奇迹”年代到兴旺发展的北方城市去寻找工作。

意大利南部是一个难以解决问题的案例。而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佃农的法定权利使他们有动力在自己拥有的小块土地上投资,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贷款制度和农业银行使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国家补贴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助于扭转几十年来下跌的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尽可能扩大生产,并且以固定的最低价格来保证收购他们的产量。同时,战后的城市里前所未有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比较穷的农村地区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从而使需要养活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 79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范围更广的政治改革间接地面临着农业问题的政治方面。其中有许多带有宪法性质,需要再度完成1918年的未竟事业。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1946年6月,意大利通过投票变为共和国,但是票数相差并不太大(1270万人投票赞成废除君主制,1070万人赞成保留君主制),而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分裂,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却由于这一结果而更加恶化:南部除了巴西利卡塔地区外,以压倒多数将赞成票投给了国王(在那不勒斯是4:1)。

相反希腊人却在1946年投票赞成保留他们的君主制。比利时人也保留了君主制,但是驱逐了在位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作为对他同纳粹分子合作的惩罚。这一决定是在1950年处于压力之下,违背略占多数的人口的意愿而做出的,明显地将这个国家按社群和语言分裂开来:讲法语的瓦龙人投票赞成驱逐国王,而72%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德人表示宁可让国王留下。法国没有君王,不用将战时的屈辱记忆归罪于他,而只需要于1946年投票,用一个数字上的后继者来取代名誉扫地的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像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一样,意图尽可能消除任何极权的或专制独裁的风险——但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不可能独自成功。

临时会议或立宪会议宣布了这些战后的政体,提出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全民投票复决,对公共机构的改革举行投票表决,这些都对左派有利。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后的表现都很出色。在1946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19%选票;法国共产党在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选中获得28.6%选票,这是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获得全国38%选票(在捷克地区是40%)。在其他地方的自由投票中,共产党的得票情况没这么好,但是比他们先前的情况好,在比利时是13%,在英国是0.4%。

西欧共产党的最初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们同各个社会党的联盟,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在1947年以前不愿意脱离在抵抗运动中重组的人民阵线式的同盟。在战后最初的选举中,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的得票数同共产党差不多,而在比利时却比共产党高出许多。

80 在斯坎的纳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他政党,在1945年到194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获得38%至41%的选票。

即便如此,在英国和北欧国家之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老左派”也决难独自掌权。在西欧,平衡总是由一头新的动物——基督教民主党——来掌握,它在许多情况下居控制地位。天主教政党在欧洲也是熟面孔——它们在荷兰和比利时早已兴旺。威廉敏娜女王执政时的荷兰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都有一个“天主教中心党”,而奥地利政治中的保守派早就同(天主教的)人民党紧密相连。甚至连“基督教民主”本身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根源在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改良主义和天主教政治中心运动,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年代里试图发展,但未成功。然而到1945年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变得对它们有利。

首先,这些政党——尤其是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法国的人民共和运动党——现在几乎都控制了天主教的选票。在1945年的欧洲,这一点仍然事关重大:天主教的投票仍然非常保守,尤其是在天主教活动程度很高的地区里对社会问题的投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传统的天主教选民很少投社会党的票,也几乎从来不投共产党的票。然而作为战后时代的独特现象,保守的天主教徒们在许多国家里往往不作其他选择,只投票给基督教民主党,而不计较后者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改良主义倾向,因为传统保守的各右翼政党要么是私底下活动,要么就是公开遭禁。甚至连非天主教的各个保守派也都日益转向基督教民主党,以遏制“马克思主义”左派。

其次,出于相关原因,基督教民主党主要得益于妇女们的投票——在1952年,大约三分之二虔诚的法国天主教妇女投票给人民共和运动党。毫无疑问,这是教堂布道起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政党对妇女产生的魅力大部分是由于它们的纲领。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即便最当地化的言辞中,也还留有暴动起义的意味,相比之下,基督教民主党的著名人物——法国的莫里斯·舒曼和乔治·比泽,意大利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和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总是强调和解与稳定。

81 基督教民主党避开以阶级为基础的主张,强调社会和道德改良。在具体问题上,它坚持家庭的重要性,这条基督教的教义连同它的重大政策细节能到民众的受拥护,是因为在当时,单亲家庭、无家可归者、赤贫家庭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基督教民主政党很理想地出来强调战后现状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方面:渴望稳定与安全,期待复兴,不要传统的右翼主张,对国家充满希望——因为同上一代传统的天主教政治家相比,基督教民主政党的领袖们,以及比他们激进的年轻追随者们,都想动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主张集体主义的左

派,而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以十分希望现代国家可以适应各种以仁慈来调停的非社会主义形式。

其结果是在意大利和西德,基督教民主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往后很多年里几乎都控制了政治权力。在法国——由于两次殖民战争的有害后果,随后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掌权——人民共和运动党运作得不太顺利。但即便如此,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权力的决定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例如外交部)里执掌实权。倾向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党派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连续掌权超过一个世代,在奥地利掌权一直到1970年。

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例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还要早5年出生,丘吉尔生于1874年。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传记作家的好奇。在1945年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失去了两代潜在的领导人:第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第二代或受法西斯主义诱惑,或死于纳粹分子和他们的朋友之手。人才短缺现象造成这些年里的年轻一代政治家们普遍显得资质平庸——只有帕米罗·陶里亚蒂是个例外(在此之前的20年里,他大多数时间充当莫斯科的政治代表)。莱昂·布吕姆在被维希政府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囚禁后,回到公共生活,他的特殊魅力不光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也因为他的年龄(他出生于1872年)。

初看起来也许很奇怪,战后欧洲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几十年前成熟并进入政界的人来完成的。丘吉尔进入议会是在1901年,他总是自称“维多利亚时代之子”。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人,生于1883年。但这毕竟不是十分让人惊奇的。首先,这些老人在30年动乱中生活过来,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未受创伤,这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的稀有价值增强了公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其次,他们都来自著名的欧洲社会改革那一代人,在1880至1910年间成熟——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布吕姆,艾德礼)、自由派(贝弗利奇,或后来的意大利总统、生于1874年的路易奇·埃诺第)或进步的天主教派(德·加斯佩利,阿登纳)。他们的本性和兴趣非常吻合战后的时代情绪。

但是第三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批重建西欧的老人代表了一种延续性。两次大战之间的时尚是求新、求现代化。议会和民主被许多人(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作是颓废的、滞后的、腐败的,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担当现代国家的任务。战争与占领驱散了这类倘若不是知识分子的、也必是选民们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和平之光下,立宪民主的笨拙妥协产生了一种新的魅力。1945年的大多数人渴望社会进步与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又重新认可稳定而又熟悉的政治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政治化、激进化的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却相反:内心深处渴望正常化。

国务活动家们的经验可以超越纷扰的两次大战之间几十年,回溯到1914年以前那个

更固定、更自信的时代,因此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凭着他们个人的延续经历,他们能够促成从以往过热的政治向即将到来的社会迅速转型的艰难过渡。无论他们的政党“标签”是什么,欧洲这些年长的国务活动家们在1945年时都是对可能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务实者。这种对两次大战之间过分自信的政治教条保持个人距离的态度,忠实地反映出他们的选民们的心态。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正在开始。

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稳定与社会改革的前景,首先完全取决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国家计划和政治领导都不可能避开1945年欧洲人面对的极大任务。战争对经济的最明显冲击是房屋设备。伦敦大都市地区有350万幢房屋被毁,其破坏程度超过了1666年大火造成的灾难。华沙90%的住房被毁。1945年的布达佩斯只有27%的住房建筑可以居住。德国40%、英国30%、法国20%的住房消失了。意大利损毁了120万户住房,大多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战争刚结束的时代,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最明显的战争后果——在西德和英国,住房短缺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正如在战后伦敦住房展览会上的一位妇女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渴望有一幢房子。我最大的野心是有四堵墙和一个屋顶。”〔3〕

83 遭到明显破坏的第二个方面是交通运输——商船,铁路,机车和车厢,道路,运河,电车轨道。从巴黎到入海口的塞纳河上没有桥,莱茵河上只剩下一座桥还可以通行。结果,煤矿和工厂即使生产出了必需的产品,也无法运输——欧洲的许多煤矿从1945年12月起就恢复生产了,然而维也纳仍然没有煤。

触目可见的破坏达到了最坏的程度:许多国家看上去好像都被捣毁砸烂得毫无希望修复。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里,国民经济即使同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表现不佳的情况相比,也显得停滞或萎缩了。但是战争并不全部是一种经济灾难——相反,在某些经济部门,它反而可以成为对迅速增长的一种有力刺激。由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成为无可置疑的商业和技术领头人,很像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地位。

实际上盟国的调查研究者们很快就明白,抵抗希特勒的战争造成的经济方面毁灭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完全不是最初所想的那样,即便连德国本身也一样。轰炸所付出的人的代价,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像鼓吹破坏结果的人所想的那么大。直到1944年5月,德国被毁的工厂只有20%多一点;甚至在鲁尔工业区这个盟军轰炸最集中的地方,工厂和机器仍有三分之二完好无损。其他地方,例如捷克,工业和农业在德国占领期间繁荣

〔3〕 引自沃勒·莫里恩《1945年的伦敦》(2004),第150页。

起来,实质上未受损害——斯洛伐克像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加速了工业化,事实上情况比以前好得多。

许多遭破坏情况的性质被戏剧性地歪曲了,以致变成所谓人和地方都可怕地遭了难,而工厂和产品却逃过了劫难,出人意料地为1945年以后的几个核心经济部门迅速复苏做出了贡献。机械工业在战争期间繁荣起来。英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和美国)全都比战争开始时生产出了更多的机床。意大利遭到破坏而严重受损的只有飞机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它的机械制造企业位于北部,因此远离了在意大利发生的战斗,运行得相当好(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它们的战时产量和投资超过了对它们所受的任何损害的补偿。至于造就了西德经济繁荣的机床工业,其战争损毁的设备只有6.5%。

当然,在某些国家里,战争根本没有造成损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战争毫不相干。相反,欧洲的多数中立国都密切地(虽然是间接地)卷入了希特勒的战争。德国倚重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在战时供应锰。葡萄牙殖民地出产的钨经过里斯本运往德国。德国战时所需要的生铁,有40%由瑞典供应(用瑞典船运往德国港口)。这一切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这些黄金都由德国偷自受害者而来,其支付渠道在瑞士。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1941年至1942年间,瑞士军火工业的60%、光学工业的50%、机械产量的40%是替德国生产的,获得的报酬是黄金。布尔-奥利康轻武器公司直到1945年4月还在出售冲锋枪给纳粹德国国防军。人所共知,日耳曼帝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存在瑞士的黄金相当于16.38亿瑞士法郎。也正是瑞士当局,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要求德国在护照上标明持有者是否犹太人,以便限制不欢迎的人入境。 84

瑞士当局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有充分理由同纳粹保持友好关系。虽然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推迟了1940年6月入侵瑞士的计划,但它从未放弃过;比利时与荷兰的经历可怕地提醒了它,脆弱的中立国家凡是阻碍希特勒的,等待着它们的是什么命运。出于同样的原因,瑞典人也同希特勒合作,因为他们历来靠德国供应煤。多年来,瑞典一直向德国出售生铁——即使在战前,德国进口的生铁有一半通过波罗的海运来,而瑞典出口的生铁的四分之三是给德国的。无论怎么说,瑞典的中立一向是倒向德国的,因其出于恐惧俄国的野心。同纳粹的合作——在巴巴罗莎行动开始时,允许纳粹德国国防军1.47万士兵通过,以及德国士兵休假时取道挪威回家,同时推迟对瑞典铁矿工人的征兵,以保证正常运送生铁到德国——可以说并非只出于惯例。

战争结束后,瑞士(而不是瑞典人)从一开始起就是国际上怀疑和厌恶的对象,因为

它帮助德国发动战争。根据 1946 年 5 月的“华盛顿协议”，限它提供 2.5 亿瑞士法郎，“自愿”捐献给欧洲重建工作，作为对与日耳曼帝国银行从瑞士银行转账相关的一切赔偿要求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到那时，瑞士早已恢复了它那公正理财的名声，成为繁荣之地：它的银行赢利极大，它的农场和机械工业开始向需求极大的欧洲市场供应食品和机械制品。

战前，瑞士和瑞典都不特别繁荣——它们实际上繁荣的只有乡村地区。但是它们在战争过程中所走的路是能够持久的：这两个国家现今在欧洲位居前列，稳坐了 40 年。在其他地方，复苏的道路颇多崎岖。然而，即使在东欧，经济的基础设施至少以显著的速度得到了修补。尽管在纳粹德国国防军撤退和红军推进时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桥梁、道路、铁路和城市都已重建。到 1947 年，中欧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机车车辆都已达到或超过了它们的战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凡是受战争破坏较少的地方，这一复苏的过程比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时间短。然而，即使是在波兰，经济的恢复也相当迅速——部分原因是它新近从德国夺来的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那里有许多工业城镇和工厂。

在西欧，物质上的损毁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复——从总体上看，比利时恢复得最快，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稍慢一些，最慢的是荷兰，那里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农场、堤岸、道路、运河和人口，而且都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比利时人受益于安特卫普的独特地位，到战争结束时，它是欧洲唯一未经多大触动的港口城市。再说盟国军队高度集结在比利时，经济上源源不断地稳步流进硬通货，长期专门投入煤、水泥、金属半成品，这些都是对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

对比之下，挪威的情况相当差。半个国家的重要渔船和商船船队都已在战争中失去。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撤退途中有意破坏，挪威 1945 年的工业生产只达到它在 1938 年水平的 75%，国家的资本总额失去了将近五分之一。在后来几年里，痛苦的挪威人同瑞典相比就不算多大损失了。不过，连挪威也在 1946 年底修复了它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网络；而在 1947 年，西欧其余国家和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复苏不再受到燃料短缺和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妨碍。

然而根据当时观察家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德国的复苏能力。这要归功于当地的人们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唯一目标是重建破碎的国家。希特勒死时，德国的铁路只有 10% 还可以运行，整个国家真可谓是停滞不前了。一年后，在 1946 年 6 月，全德国铁路的 93% 都已重新开通，还重建了 800 座桥梁。1945 年 5 月，德国的煤产量只到 1939 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一年之后，产量翻了 5 倍。1945 年 4 月，随美国军队进驻西德的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尔认为像亚琛这样夷为平地的城市肯定需要 20 年才能修复。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已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轮胎厂和纺织厂重新开张、经济生活重又开始的

情况。

造成德国最初复苏的原因之一是,一旦重建了工人的住房,运输网络回归正常,工业就即刻开始生产出商品来。在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躲过了战时轰炸和战后洗劫,到1948年,该厂已经有能力生产出全西德制造的一半汽车。德国的福特汽车分公司工厂大部分未受损失。由于战时的投资,到1945年时,德国三分之一的工业设备都只使用了不到5年,而1939年时,这样的设备只有9%。战时德国投资最多的一些工业——光学,化学,轻型机械,汽车,有色金属——恰恰都是为50年代的繁荣打基础的工业门类。到1947年初,阻碍德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已经主要不是战争的破坏了,而是原材料等等的缺乏——以及首要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还不确定。 86

1947年是关键的一年,欧洲大陆的命运悬此一线。到了这个时候,欧洲人已经花费时间修补与重建,或者在长期的复苏过程中努力建设制度性的基础。在盟军取得胜利后的最初18个月里,整个欧洲大陆的情绪,从开始为可以展望和平前景和新的开端而感到轻松,转变为面对仍然沉重的任务而冷漠地承受和越来越失望。在1947年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地还没有做出最艰难的决策,而它们又不能够在时间上拖得太久。

首要的问题是食物供应,这个根本的困难还未克服。除了瑞典和瑞士,到处都缺少食物。奥地利只有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天开始供应食品和物资,才在此后的12个月里免于饥饿。在德国的英占区,卡路里供应的标准从1946年中期规定的成人每人每天1500,到1947年初降为1050。意大利在1945年和1946年连续两年忍受饥饿,到1947年春天,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在整个西欧属于最低。法国1946年的民意测验中,“食物”、“面包”、“肉类”连续不断地超过其他一切,成为公众最大的意见。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西欧不再像以往传统方式那样依赖东欧谷仓。因为东欧人也吃不饱。1945年,由于错误的土地改革措施,加上气候恶劣,罗马尼亚农业歉收。从瓦拉几亚西部到摩尔达维亚,到乌克兰西部和苏联的伏尔加地区中部,农业歉收和旱灾导致1946年秋天接近饥荒的程度。救援机构描述说,一周岁的儿童体重只有3公斤,他们收回的报告称有吃人肉现象。在阿尔巴尼亚的救助人员形容那里的情况“不幸得可怕”。

接踵而来的是1947年严酷的冬天,这是188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冰封,道路接连几个星期不能通行,结冰使整个铁路系统瘫痪。刚刚出现曙光的战后复苏又因难以承受灾害而陷入停顿。煤仍然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想方设法也无法解决。工业生产下降了——钢产量刚开始恢复,旋即又比前两年下跌40%。雪融化时,欧洲许多地方被洪水淹没。几个月后,在1947年6月,欧洲大陆又经受了气象记录中最炎热、最干旱的夏天。显然在一些地方会造成连续第三年的歉收:农业收成甚至比歉收的上一年还 87

下跌三分之一。从美国进口煤(1947年进口3400万吨)部分地缓解了缺煤现象。食品也可以向美国或英联邦自治领购买。但所有这些进口都必须用硬通货(通常是美元)支付。

欧洲1947年危机背后有两种结构性的困难。其一是欧洲经济中会因为缺少了德国而造成影响。战前德国是中欧、东欧大部分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市场(例如,直到1939年,德国购买了希腊38%的出口商品,并向希腊提供三分之一左右的进口商品)。法国钢铁生产需要的煤主要来自德国。然而在政治前途未定之前,德国经济(其复苏的全部潜力)仍然冻结着,结果阻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第二个困难不是同德国、而是同美国有关,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牵连。1938年,英国进口的机器以价值而论,44%从美国进口,25%从德国进口。1947年,65%从美国进口,而从德国进口的仅3%。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形也相仿。这就造成了对美国商品需求的极大上升,而具有讽刺意味地表明欧洲在增加经济活动——而要买美国的产品或材料,则需要用美元支付。欧洲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没有硬通货,他们就既无法买进食品来解除几百万人的饥饿,又无法进口原材料和机器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

美元危机很严重。1947年,英国的国债从1939年以来增加了4倍,由于进口的将近一半购自美国,致使现金迅速流出。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进口国,每年对美国的支付赤字达到20.49亿美元。其余欧洲国家大多数甚至没有可用于贸易的美元。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在1947年8月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其邻国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创了历史纪录,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到最严重时,纸币10万彭格(译注:彭格是1925—1946年匈牙利货币单位)值1美元——这意味着当1946年8月用福林取代彭格时,匈牙利全国流通纸币的币值是1彭格相当于1美分的千分之一。

88 在德国,没有流通的货币。黑市兴起,香烟成为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营地里,教师们的工资是每星期5包香烟。在柏林,一条美国香烟的价值从60美元到165美元不等,这就给美国占领军士兵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严重地从事香烟配给倒买倒卖活动:在盟军占领的最初4个月里,驻柏林的美国士兵寄回家的钱比他们领的工资多出1100万美元。在布伦瑞克,600支香烟可以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是必需品,这在维托里奥·德·西卡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欧洲严重的危机对美国人来说不是损失。下文还将叙述,只是他们无论有无苏联的合作,都要提出一个解决德国问题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消息灵通人士如总统顾问乔治·凯南等人的看法,1947年春天的欧洲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西欧人原先指望能迅速复苏、回到正常的经济状况,这时都灰心丧气,而失望的德国人和中欧各国人面对意料

之外的生存危机,都只能诉诸共产主义,否则就有跌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共产主义确实具有吸引力。虽然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还有芬兰和冰岛的共产党)在1947年5月以前仍然参加联合政府,但是它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民众集会,能够鼓动人民的愤怒,从政府的失败中获取威信。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再加上红军战无不胜的氛围,使意大利(或法国、捷克)的“社会主义道路”显得真实有理而且很吸引人。1947年,法国共产党有90.7万人。意大利共产党有225万人,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甚至在丹麦和挪威,每8名选民中就有1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盟军当局害怕民众对纳粹主义好日子的怀旧,再加上对“去纳粹化”计划的反感、食品短缺、普遍发生犯罪现象,会使他们倒向新纳粹、甚至倒向苏联。

西欧各国或许可以庆幸,1947年春天的各国共产党仍然在追求1944年所采取的温和的、民主的道路。在法国,莫里斯·多列士仍然在敦促煤矿工人“加紧生产”。在意大利,英国大使形容陶里亚蒂用温和姿态影响他那些“头脑发热”的社会主义盟友们。斯大林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未鼓励他在中欧和西欧的许多支持者利用民众的愤怒和沮丧。但即便如此,内战和革命幽灵已经离得不太远了。在比利时,盟军观察家们将社会政治的紧张气氛描述得很严重,并且将希腊和意大利等列为“不稳定”国家。

法国1947年冬天的经济困难早已导致民众对战后新的共和国表示失望。1947年7月1日的法国民意调查中,被调查者的92%认为法国的事情“糟糕或相当糟糕”。英国劳工大臣休·达尔登针对战后最初几年的热情泄气情况,在日记里吐露说:“充满信心的早晨决不会再来临。”法国社会主义者、国民经济部部长安德烈·菲利普在1947年4月的一次发言中,更夸张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受到总体上的经济与金融大灾难的威胁。” 89

到处弥漫着这种失望感和灾难临头的感觉。1947年3月,詹妮特·弗莱纳从巴黎发出的报道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巴黎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抑郁气氛,或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仿佛法国人或者全体欧洲人都在期待发生什么事,或者更不好的是,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正如她在几个月前指出的,欧洲大陆正在慢慢地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期。乔治·凯南会同意这种观点。6个星期后,他在一份“政策制订人员”的文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或者若要这么说,那也只是间接的。欧洲抑郁情绪的真正根源是战争的后果,凯南将此诊断为“身心活力的根本枯竭”。欧洲面对的障碍看来太大,战后最初爆发出来的希望和重建的信心现在都消失了。对美国国会制订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交》杂志主编汉密尔顿·费什在1947年7月对欧洲形势有如下印象:

所有的东西都太少——用于运送人们准时上班的火车、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都太少,更不用说供休息日乘坐了;做面包用的不掺杂的面粉太少,即便如

此,提供给繁重体力劳动者的面包还不足以提供能量;给报纸提供的纸张太少,所以对世界新闻只能报道个大概;种田的种子太少,给种子提供养分的肥料也太少;能住人的房屋太少,窗框上需要镶的玻璃不够;制鞋的皮革、织衣的羊毛、厨用的煤气、做尿布用的棉布、做果酱用的糖、油煎用的脂油、婴儿喝的牛奶、洗衣用的肥皂,统统都太少了。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当时充满着抑郁和沮丧气氛,但是1945年至1947年的战后最初复苏、改革和计划毕竟为欧洲未来的福祉打下了基础。毋庸置疑,西欧的1947年至少可谓是整个大陆复苏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一点根本就不明显。情况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途未卜的战后形势,好像促使欧洲走到了衰落的终点。在康拉德·阿登纳等许多人看来,欧洲大混乱的规模甚至比1918年更厉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家们的思想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先例造成的最大错觉,确实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若作最好的打算,他们估计欧洲要经受几十年的贫困挣扎。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们预计他们的国家至少要过20年才能恢复元气。1945年10月,夏尔·戴高乐用绝对的口气对法国人说,法国若要复兴,还需要25年“发疯一样地工作”。

但是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欧洲大陆会重新陷入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局面。当美国国务卿乔治·C. 马歇尔于1947年4月28日从在莫斯科举行的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回来时,他对苏联不愿意合作解决德国问题表示失望,并且为他目睹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感到信心动摇,他自己脑子里很清楚,应该做出一些重大事情,并且要快。而且从巴黎、罗马、柏林等地方的那种屈从的、失败的心态来判断,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华盛顿来走。

马歇尔制订了“欧洲复兴计划”,接下来同他的顾问班子讨论了几个星期后,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作了著名的公开演讲。他的这项重大计划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并非毫无根据。从战争结束到宣布马歇尔计划,美国早已向欧洲借出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主要受益者是英国(得到44亿美元贷款)和法国(得到19亿美元贷款),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意大利到1947年中期,贷款已经超过5.13亿美元,还有波兰(2.5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等许多国家也都向美国借了债。

但是这些贷款都用于填补漏洞和应急。迄此时期,美国的援助还不是用于重建或长期投资,而是用于重要的物资供应、服务和修补漏洞。再者,贷款(尤其是向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贷款)都是附带一系列条件的。日本一投降,杜鲁门总统就立刻轻率地取消了战时的“租借”协议,此举引起梅纳德·凯恩斯在1945年8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醒美国内

阁,说英国正面临着—场“经济上的顿克尔刻大撤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恩斯成功地通过谈判,同美国签订了实质性的贷款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根据租借协议不再能得到的美元,以济购买商品之急。然而美国的条件苛刻得脱离实际——特别是要英国放弃对海外自治领的帝国统治,放弃对贸易的控制,并且使英镑完全可自由兑换。其结果正如凯恩斯等人预见的,造成了英镑多次挤兑中的第一次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迅速消失,甚至在下一年里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

美国与法国之间于1946年5月在华盛顿谈判的贷款条件,其苛刻程度只是略轻一些而已。法国除了勾销一笔战时22.5亿的贷款外,还得到几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作为回报,巴黎答应放弃保护性的进口份额制,允许美国和其他外国产品更自由地进入。就像英国的贷款一样,签订这一协议的部分目的是推进美国的国际自由贸易计划,实行公开的、稳定的货币兑换,使国际合作关系更紧密。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笔钱在一年之内很快用完,唯一的中期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厌恶(大多数是左派的意见)美国对法国经济实力的盘剥。 91

然后,到1947年春,华盛顿的双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方法明明白白地失败了。1947年,欧洲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47.42亿美元,是1946年数字的两倍多。若像后来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增长过程中的打嗝”的话,那么欧洲已经接近于噎住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对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做出反应时,形容它为“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当然他并没有说错。马歇尔的建议明确地否定了过去的运作方式。首先,在某些框架性的条件之外,留给欧洲人的是选择要不要得到美国援助,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是美国顾问们和专家们却要在资金管理方面做主。其次,援助资金必须覆盖多年,因此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复兴和发展计划,而不是一种救灾经费。

第三,数目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美国一共贷出大约130亿美元,比美国先前的海外援助总数还多。其中,就绝对数字而论,英国和法国得到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贷款,然而,相对地说来,意大利和一些得到贷款较少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奥地利在“欧洲复兴计划”第一年(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里的全国收入的14%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这些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以现金而论,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来算是1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比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时占1948年至195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按21世纪开始时的美元价值来算,马歇尔计划大约值2010亿美元。

紧接着马歇尔的演讲之后,根据贝文的提议,英国、法国、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会晤,考虑三国作何种反应。7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退出。两天以后,英国和法

国正式邀请 22 个欧洲国家的代表(西班牙和苏联除外)来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 月 12 日,16 个欧洲国家参与讨论。这 16 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爱尔兰、冰岛、奥地利和葡萄牙——都将最终成为受益国。但是,尽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起初显示过兴趣外,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最后加入“欧洲复兴计划”,也未曾从马歇尔计划中拿过 1 个美元。

92 在此,值得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含义。贷款仅限于给西方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作为荣誉性质的欧洲人),这一事实无疑使杜鲁门更容易保证在下一年里让国会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但到那个时候,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国会十分愿意相信,马歇尔计划能从经济上阻碍苏联的扩张。在 1947 年 6 月,通过了新的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加区别地提供援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怀疑美国的动机——马歇尔提出的条件同封闭式的苏联经济很不相容——但是他们的感受在当时还未形成集团的东欧其他地方并未被广泛认同。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外交部长杨·马沙吕克接受了法国和英国于 7 月 4 日发出的联合邀请。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被召到莫斯科,初次受指示去参加巴黎会议。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很清楚:利用他在巴黎露面的机会,表明“不能接受英、法计划,防止达成一致决议,然后离开会议,并且尽可能多地带走其他国家的会议代表”。

4 天后,斯大林作了重新考虑。戈特沃德被告知,要撤回他的国家接受的参加巴黎会议的邀请。斯大林会见了包括马沙吕克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关系到[捷克]同苏联之间友谊的根本问题。如果你去巴黎,你就表明想同一种旨在孤立苏联的行动合作。”次日,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明确宣布,它不派代表团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若去参加,就会构成一种直接针对苏联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国的行动。因此政府一致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何让步?他们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早已被共产党接管,苏联红军严密注视着,所以别无选择地遵从苏联的“指导”。但是红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长时间,共产党还未控制政权。然而斯大林一表示不悦,马沙吕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屈服了。假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坚持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他们就会得到公民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包括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支持,使斯大林更难于强加他的意志。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决定投入苏联怀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明确无疑地为 7 个月后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政变铺平了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脱离马歇尔援助计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难。

同样地,强加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选择”也是如此,而且首先对于苏联本身或许也是不利的。斯大林决定置身于“欧洲复兴计划”之外,这是他最大的战略错误。无论美国人的私心做何种计谋,既然他们许诺援助所有的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将东欧包括在“欧洲复兴计划”之内,而其将来的结果会无法估量。相反地,援助若局限于西欧,则标志着欧洲大陆的两半部分分道扬镳。 93

马歇尔援助从一开始起就带着自我局限的意图。正如马歇尔本人在哈佛演讲中定下的调子,其目标是要“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它不是单纯地提供现金援助,而是提出,根据每一个加入国在4年计划里制订的每一年需求为基础,向欧洲各国免费提供商品。这些商品在每一个国家售出后,会产生当地货币中所谓的“对等基金”,以供根据华盛顿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之用。一些国家用这基金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将其转化为自己国家的储备金,以期用于将来的外币兑换之需。

这种非同一般的提供援助的方式带有创新的含义。马歇尔计划要欧洲各国政府预先做计划,计算未来的投资需求。它要求各国政府不仅同美国、而且在相互之间也要谈判和协商,因为计划中所指的贸易与货币兑换旨在尽快地从双边走向多边。它限定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合作,制订生产计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条件。而它首先要阻止的是回到阻碍两次大战之间经济状态的各种情形:生产力不足,造成相互破坏的贸易保护主义,终使贸易衰落。

虽然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管理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让欧洲人自己去负责决定援助的程度和其分配的方式。欧洲政客们在早先的双边贷款谈判中对美国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早已习以为常,此番却为之惊奇。他们被弄糊涂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连美国人自己对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也意见分歧。“新政”方式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在战后美国政府里人数不少)发现有机会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建欧洲,强调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工业生产力、经济增长、劳资合作。

于是,由马歇尔计划资助的“生产力使命”使成千上万名经理人、技师和工会活动家到美国去,学习美国的企业方式——仅法国就在1948年至1952年间去了5000名(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一)。1951年3月至7月间,有145个“生产力学习团”抵达美国——大多数团组的成员(很少有女性)都从未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欧洲复兴计划”资金渠道而于1948年成立)里热衷于“新政”的人敦促他们的欧洲 94

应该说,美国的这些驱动政策所取得的即时成功却相当有限。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制订计划者还未准备好思考国际经济整合的大项目。在这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最大成绩或许当推1949年12月提议并于一年后成立的“欧洲支付联盟”。它的有限

目标是在欧洲各国货币之间建立一种借方与贷方之间的结算机构,来促进欧洲贸易“多边化”。它的设计思路是克服风险,即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可能试图储备亟需的美元,造成的结果是限制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最终对每一方都没有好处。

欧洲各国利用国际结算银行作为代理人,来保证信贷途径符合它们的贸易需求。于是,它们可以不必用光稀缺的美元,而能够通过欧洲内部信贷转让来履行责任。一切的问题都不在于你同谁做生意,而在于用欧洲各国货币来达到借贷的全面平衡。到“欧洲支付联盟”于1958年完成使命时,它不仅悄悄地为欧洲内部贸易的稳步扩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达到了相互有利的合作——应该指出,其资金的筹措是靠了大量注入美元来填满最初的信贷池塘。

然而从比较传统的美国观点来看,自由贸易及其参与者的利益本身就是“欧洲复兴计划”希望充分达到的目标和正当的理由。美国在30年代的贸易和出口衰落中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未曾努力让别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自由关税体制和货币自由兑换的重要性。就像英国自由党在1914年以前的时代热心于自由贸易一样,美国人呼吁不限制商品流通也并不完全是无私的。

但是,这种自私自利也是说得很明显的。毕竟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希望帮助恢复的欧洲,要能够而且愿意在世界市场上同我们竞争,正是为了这一条原因,它将有能力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少数情况下会有即刻的好处:在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他们得到的保证是,一切从美国运出的实际货物都使用美国拥有的货船,由美国“劳联-产联”的码头工人装运。但这只是直接的、即时的利益的偶然例子。杜勒斯所说的话大多是对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有利的是,恢复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不是将欧洲降格为帝国的附庸。

95 当然,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即使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白,欧洲在1947年面临一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一部分内容是复苏或衰败,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以及欧洲人是否会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欧洲内部30年血腥冲突是否仍然无法使它避免厄运,即落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外部大国之手。苏联十分乐意等待看到这种前景——正如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的,1947年的欧洲被恐惧笼罩着,准备让它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进斯大林手中。但是,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认为,欧洲的脆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机会。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西欧经济有可能崩溃,结果使政权落到共产主义分子手里。”

美国的一个专门小组——国防部与海军部的协调委员会在1947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更完整地解释了这个观点:“重要的是使一些地区仍然保留在友好的手中,这些地区拥有或保护着金属、石油等自然资源,含有战略意义或占有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工业潜力,

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或者出于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能使美国在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更大背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和安全程度都下降的地方,美国的利益同脆弱患病的欧洲次大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欧洲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深知内情者,主要是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里地位对应的乔治·比铎,他们对这一点都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欧洲复兴计划”本身所包含的欧洲内部利益,当然也包括如何实施,在各国之间歧见甚大。在比利时,美国的援助或许是最不紧迫需要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会使政府将投资放在传统的工厂和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部门(例如煤矿),而不计其长期成本。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马歇尔计划如愿执行。在此计划的第一年里,对意大利的援助大部分用于急需进口的煤和谷物,还有像纺织业这样在苦苦挣扎的部门。然而在此之后,意大利相应的资金中90%用于直接投资——工程技术、能源、农业和交通运输网。实际上,在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意大利40年代末的经济计划很像东欧国家,故意不考虑消费品,食品消费维持在战前的低水平,资源转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几乎成了好事多磨:美国观察家们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徒劳无益地想说服意大利政府建立更先进的税制,缓解它那种严酷的方式,降低贮备,以免引起衰退。在德国也同在意大利一样,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设计者想看到的是让社会与经济政策更加倾向于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而且必须摆脱那些传统的主张通货紧缩的政策。

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大多是为“设计者们”的目标服务的。正像莫奈的同僚之一皮埃尔·乌利(Pierre Uri)后来承认的:“我们用美国人来迫使法国政府做我们认定需要做的事,”不理睬美国人的自由化愿望,但是积极地响应美国关于投资与现代化的建议。“欧洲复兴计划”的美元——1948至1949年度的130万美元和此后3年追加的160万美元——在马歇尔计划时代,根据莫奈的计划,几乎支撑了法国公共投资的50%,若没有这些支撑,法国就难以维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受到最多人的批评。在50年代中期,法国成年人只有三分之一承认听说过马歇尔计划,而其中竟有64%的人宣称它对法国是“坏事”!

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相对比较可怜的形象,部分地反映出法国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或许对他们来说还是最大的成功。〔4〕在奥地利,当地的共产党人——受到仍占

〔4〕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国共产党选民中,有40%的人赞同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尽管作为政党,它是反对的。法国人对马歇尔计划的怀疑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看来使许多人受到特别伤害的是美国官僚政治带来的“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和大量的调查表”——它使人特别愤怒地想起自己屈从于一种低等文明。

据着奥地利东部地区的苏联军队的支持——并不注意美国人及其援助的声望；后者让人们口中有食，这才是最大的事情。希腊的情况更清晰。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扩展到希腊，在残酷的内战情形下，它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划出了界线。根据“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对希腊的6.49亿美元帮助难民和饥饿者摆脱了饥饿和疾病：仅靠骡队运输，就使几千户农民家庭从生死线上活了下来。1950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为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提供了帮助。

“欧洲复兴计划”到底有多大成功？西欧明明白白地复苏了，而这恰恰发生在马歇尔计划时期（1948—1951）。到194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首次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根据同样标准，荷兰于1948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于1949年、希腊和西德于1950年也都达到了复苏。而在战时被占领的国家里，只有比利时、丹麦和挪威迅速复苏（于1947年）。在1947年至1951年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0%。

97 简而言之，“欧洲复兴计划”在复苏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美元信贷。贷款消除了贸易赤字，保障了大规模进口急需的原材料，因此使西欧度过了1947年中期的危机。1949年至1951年，欧洲人消费的小麦有五分之四来自美元区国家。若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就不知道燃料短缺、食品短缺、棉花短缺、其他各种商品稀缺等等能否以政治上可接受的代价得到克服。因为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经济肯定也能继续增长，但只能通过克制内需、砍掉新建立的社会服务、进一步降低当地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

大多数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心里明白，所以不愿意冒这种风险。1947年，西欧各国的联合政府都被套牢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在事后看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马歇尔计划“仅仅”打破了由于重新产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僵局，华盛顿的新方法克服了“暂时的”美元匮乏。然而在1947年，谁也无法知道46亿美元的缺口是“暂时的”。在那时，谁又能够保证那个僵局不会像咆哮的激流一样横扫脆弱的欧洲民主制度？即使“欧洲复兴计划”只不过是买到了时间，那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贡献，因为时间恰恰是欧洲显得很缺乏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它扭转了政治危机。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长期利益，就比较难评估了。一些观察家感到很失望，因为美国未能成功地说服欧洲人按照他们最初的希望，圆满地合作，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无论按照何种合作的惯例和制度，如果说欧洲人获得了什么的话，他们最终获得的都只是间接地受益于美国的努力。但是考虑到欧洲的近期历史情况，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行动都代表着进步；而马歇尔计划的诱惑至少迫使互相猜忌的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协调他们的反应，而最终得到更多的成果。《泰晤士报》说得大致差不多，它的1949年1月3日社论指出，“将去年的合作努力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领域强烈的民族主义作比较，就完全可以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真正的利益是在心理方面。事实上也可以说,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受。它帮助他们决然抛弃了沙文主义思想、精神沮丧和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使协调的经济决策显得正常,而不是异常。它使30年代的“向邻居乞讨”式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初看起来显得很轻率,再看时感到毫无必要,最后觉得荒唐。

若不是马歇尔计划作为欧洲“美国化”蓝图而出现,就不可能有上述的好处。相反,战后欧洲人由于意识到他们卑微地依靠美国人的援助和保护,所以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强烈压力都必然在政治上引起反面结果。华盛顿允许欧洲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的折中方案和自己的经验来制订政策,在复苏计划中避免单一僵化方法,事实上至少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已经预先考虑了对西欧一体化的某些期望。 98

“欧洲复兴计划”并未落空。西欧能从美国的帮助中受益,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就确立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和(除近几年例外的)稳定政策。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欧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且会绝对坚持这样做。正如英国外交官奥利佛·弗兰克斯所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将美元放在欧洲人手里,去购买复苏的工具。”其余的一切——可兑换的货币,良好的劳工关系,平衡的预算,自由化的贸易——就要依靠欧洲人自己了。

但是,明显可对比的不是美国人的希望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而是1945年同1948年对比。两个战后时代非同寻常地相像的方面之多,超过了我们现在能回忆的。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早已鼓励欧洲人采用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在20年代,许多美国观察家看到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投资拯救了欧洲。同样也是在20年代,欧洲人眼光越过大西洋,寻求对他们自己的前途和目前实际援助的指导。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提供贷款,不提供资助;而这些都几乎总是通过私人投资市场来提供的,所以它们带着价格标签,通常还是短期贷款。当大萧条时期开始时,美国人就收回贷款,由此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对这一方面做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1945年至1947年的最初摇摆之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先前(战后初期时代)的错误。马歇尔计划的意义不光在于它所做的一切,而且也在于它要小心回避的方面。

但是欧洲还有一个问题,使“欧洲复兴计划”既无法解决、又无法回避它,而其余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它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德国问题”。若德国不能复苏,法国的计划就等于零。例如,法国要用马歇尔计划中的对应资金在洛林建造新的大型炼钢厂,但是,若没有德国供应的煤,这一计划就毫无用处。马歇尔计划中的贷款用来购买德国的煤,这很好;但是,若德国没有煤,那怎么办?1948年春天,德国的工业产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英国花费前所未有的巨款(仅在1947年就是3.17亿美元),只是为了维持它在

德国西北部的占领区里孤立无援的德国民众,那么英国的经济也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如果德国不购买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的产品,那么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经济就会垂死凋敝。

99 根据马歇尔计划的逻辑,要求解除一切对西德生产与产量的限制,以使西德可以再次对欧洲经济做出关键性的贡献。所以从一开始起,国务卿马歇尔就清楚地说,他的计划意味着终止法国对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的希望——毕竟这一要点是使德国得到发展和整合,而不是使德国人成为依赖别人的贱民。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 20 世纪 20 年代的悲剧性事件——回顾起来,徒劳无益地想从疲惫衰竭的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直接地导致了法国的不安全,导致希特勒的崛起——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就很清楚,马歇尔计划仅仅是更大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法国和德国从中都同样地可以看到实际的、永久的利益。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战后解决“德国问题”,这对欧洲的未来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莫斯科还是巴黎、伦敦或华盛顿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件从整体上更加有争议的事情了。

第4章 难以安定

若非身处当时,很难想象战后那几年的欧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于德国复兴的恐惧,而其政治方向是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再发生,这些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100

毫无疑问,除了希腊以外,巴尔干半岛各国都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而我却无法阻止它。
对波兰我也束手无策。
——温斯顿·丘吉尔,1945年1月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头们——不讲原则,任用方法,但是言词朴实——要么“是”,要么“不”,然而只有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他。
——克莱门特·艾德礼论斯大林

五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
——让-保尔·萨特

“只有当你和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俄国人交谈过了,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欧洲人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国人才是德国好人。”美国随军心理学家索尔·K. 帕多维 1945 年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战后欧

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重点是要击败德国,因此在战争进行期间,其他要考虑的事情全都被搁置一边。

战时同盟国的首要考虑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国人和英国人日益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尤其是苏联收复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后。斯大林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认为西方同盟国延迟开辟(西线)第二战场是一种战略手段,目的是在开辟战场前让苏联做出更多牺牲以从中牟利。双方都参照战前的绥靖主义和有关盟约,认为对方不可信赖;他们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捆绑在一起。

这种互相之间的担忧,很能说明战争期间三大同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签订了确定只有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欧洲战争的协议。11个月以后,在德黑兰,“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原则上达成协议:战后分割德国,恢复波兰和苏联之间所谓的“寇松线”〔1〕,承认铁托对南斯拉夫的统治,承认苏联拥有通向波罗的海的原东普鲁士港口哥尼斯堡。

显然,斯大林是这些协议的受益者。但鉴于红军在参与对希特勒的战斗中越来越重要,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出于同样原因,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百分比条约”,他只是让出了后者早晚会抓获的利益。这份条约由丘吉尔仓促起草,传给桌子对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蓝色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勾”,英国和苏联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共同享有对战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权(各50%);苏联拥有对罗马尼亚90%、对保加利亚75%的控制权,而英国则拥有对希腊90%的控制权。

关于这项秘密“交易”,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百分比分割只是纯公式化的,其真正的争议之点是巴尔干半岛。其次,正如我们所见,这项交易主要靠协议双方共同遵守。第三点,从条约中所涉及的那些国家来考虑,无论这份条约本身有多么残忍,但其实它并不是非常重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中欧政治中,“雅尔塔”成了西方背信弃义的同义词,因为当时的西方同盟国出卖了波兰和另外一些位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小国家。

但是雅尔塔会议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都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创造条件以确保自由了的人们可以行使其(民主)权利,三大同盟国将齐心协力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欧洲国家以及原附属于轴心国的欧洲卫星小国的人民……”成立议会制政府,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由选举,等等。这项承诺其实是苏联的犬儒主义,它被扔到西方国家面前,由那面带悲切和理解、代表着被禁锢国家的新闻发言人来宣读。然而,那些在德黑兰和其他会议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在雅尔塔会议上照样悬而未决。

〔1〕 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国外交大臣提议划定。

雅尔塔会议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尤其是罗斯福，成了他自己错觉的受害者。因为在当时，斯大林其实已经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不再需要经过任何西方国家的允诺。这一点，英国倒是理解得非常准确。根据纳粹和苏联在1939和1940年间签订的秘密条约，那些割让给苏联的东欧国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苏联手里：雅尔塔会议期间（1945年2月4日—11日），苏联用货车带向西行、准备接管战后波兰的波兰共产党“卢布林委员会”其实早在华沙会议〔2〕上就已经被正式任命了。 102

事实上，正因为事情实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尔塔会议推脱了一项真正重要的议题——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虽然经过了努力尝试，但西方领袖们还是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占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为答谢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会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慷慨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打败希特勒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同盟国在寻求斯大林的协助，而非后者要答谢前者。当时必须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并且设想以后还要苏联同日本作战），中欧的问题可以等到和平后再谈。若非如此，1944年8月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对岸坐观华沙那一场毫无希望的起义中德军屠杀20万波兰民众一事，将可能遭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更强烈的谴责。

斯大林说波兰地下组织“保家军”是“一帮贪权的冒险家和罪犯”，对此西方领袖们有可能不认同，但他们肯定不愿意由此引起他们的主要军事同盟者的敌意，这时距离诺曼底登陆的发起进攻日才过了六周。对当时的波兰而言，这违背了战争的目的——毕竟，由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已经对德宣战了。但对西方同盟国来说，让斯大林自由掌控东欧是不言而喻的事。战争的重点是击败德国。

直到战争结束，这项目标仍然是一种首要的推动力。1945年4月，德国其实早已全面战败，只是名义上还未投降。在战后处置德国的问题上，罗斯福还是宣称，“我们的态度有待研究，最后决定尚需推延。”采取这种姿态，理由十足——敏锐的观察者们早就注意到，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相当困难，有必要尽可能继续保持战时各方组织成立的反德联盟。这样的实际结果是，战后欧洲的态势，并没有以已经签订的战时协议和条约为首要依据，而是以德军投降时各国占领军所占有的地方来划分势力范围。当莫洛托夫质疑用心良苦的《欧洲解放宣言》时，斯大林解释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重要的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 103

1944年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欧洲东南部的战争得以宣告结束。

〔2〕 1943年，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对卡廷森林大屠杀进行国际审查，苏联为此与之决裂。该遗址由德国人发现，他们正确指出该地为苏联对俘虏的波兰军官实施大屠杀之地。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苏联政府及其在西方的支持者们一直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对此大为恼怒。

到1945年5月,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红军解放并再次占领了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军队穿过普鲁士进入了萨克逊。在西部,英美正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对德激战,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先苏联一步抵达柏林,但却被华盛顿方面阻止了。丘吉尔很希望西方国家能率先入驻柏林,但是罗斯福却更明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关注着士兵伤亡(前一个冬天在比利时阿登高地的巴齐战役中,伤亡了二战中五分之一的美军士兵),而斯大林正在对德国首都虎视眈眈。

最后,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军率先进驻了离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亚西部的比尔森地区,但随后不久又转交给了苏联红军)划定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比原来在战时预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将欧洲划分为“东欧”和“西欧”。顺便说一句:无论巴顿将军还是蒙哥马利元帅如何努力施压,最后结局并没有什么重大变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亚斯特这座中欧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国民解放军和英国第八军两军对峙,划下了真正意义上的冷战第一条分界线。

当然,“官方”的冷战开始还有待时日,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开始显露了。只要德国这个敌人还存在,那么关于苏联和她的战时同盟者之间的深刻分歧和敌意就容易淡忘些,但总归还是存在着。4年来面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生死存亡的合作,并无法消除相互间几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实上,在欧洲,冷战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

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得很明显,在1920年,她就开始了与新苏维埃政权的拼死一战;在英国,丘吉尔的战时威望部分地应该归功于英国国内对于20年代早期的“红色恐惧症”和他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张;在法国,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国入侵前这段时间里,右翼党派主要的国内议题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人们起诉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中鼓吹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就像起诉佛朗哥一样;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本国,斯大林的政治独裁和针对党内批评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苏联的共谋者阴谋反苏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国际斗争处于西方民主和苏联极权主义之间的间歇期,这场战斗虽然形式模糊,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改变,因双方都受到欧洲大陆的中心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威胁。

是德国让苏联和西方国家在1941年走到了一起,正如它在1914年以前的成功所为。然而这一联盟早已命中注定。1918—1934年苏联关于中欧和西欧的策略——分裂左翼势力,怂恿颠覆和暴动——导致形成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性排斥和敌意。虽然苏联国内当时发生了一些审讯和大屠杀事件,但四年来处于内部混乱和意见分歧的“人民阵线”联盟对于消除这种印象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1939年8月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及来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伙肢解了他们共同邻国的武装,严

重损害了“人民阵线”联盟期间舆论宣传的影响。只是因为1941—1945年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纳粹分子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才帮助消除了这些早期的不良记忆。

然而,对苏联人来说,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西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17年之前。1917—1921年,西方军队介入了俄国内战;在接下来的15年里,国际机构排斥苏联,使它无法参与国际事务;苏联怀疑,若非万不得已,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宁可倾向于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会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凭直觉认为,假如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毁灭性的冲突,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会对此漠然,袖手旁观——所有这些有根有据的怀疑,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憎恨。虽然战时同盟已经建立,击败德国这一共同目标也已明确,但各方相互间不信任的程度还是令人相当震惊:据披露,战争期间东西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涉及高度机密的情报交流。

因此这种政治态势就很明确了:战时同盟并不齐心和接下来的欧洲分裂,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某种赤裸裸的自身私利和憎恨造成的。它们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二战前,英美一方和苏联一方之间,一向关系紧张。所不同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以绝对优势来独自掌控欧洲大陆。此外,法、德的存在也使双方都未能遂愿。随着1940年法国的蒙羞和5年后德国的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接踵而来的冷战虽然不是不可避免,但却完全有可能继续发生。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各自无法调和的目标和需求,最终导致了冷战。

在欧洲,由于德国的侵略,终于使美国第一次成为欧洲的一股强势力量。即使那些被战绩显赫的苏联红军所吸引的国家,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1945年春,美国拥有了世界制造业二

105

分之一的生产能力,粮食过剩,国际金融储备充裕。为对付德国及其盟国,美国投入了1200万人的兵力,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美国舰队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舰队加起来的总和。美国将如何使用她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方面采取了不作为态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究竟想要什么呢?

就德国而言——美国85%的兵力都是用来对付德国的——美国参战的初衷是严峻的。罗斯福去世两周后,1945年4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编号为JCS1067的报告。根据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其他人的回忆,报告指明:

“应当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残忍的战争、纳粹的拼死抵抗,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混乱和苦难,于此种种,德国人咎由自取。占领德国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放德国,而是要让它意识到自己是战败国、是敌国。”或者用摩根索自己的话来讲:“最最重要

的是,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次德国是战败国。”

简而言之,关键是要避免再犯《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个错误:没有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正是他们的罪程度之严重,才使复仇女神降临。这一点可以从1945年政策制定者的回想中看出。美国介入德国问题的最初动机是解除德国武装、粉碎纳粹主义、削弱其工业化——剥夺德国的军事、经济资源,对民众实行再教育。这项政策执行得不错,至少部分如此:德国国防军正式解散了(1946年8月20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美军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内实施了“去纳粹化”计划;对德国工业产能和产出都实行了严格限制,根据1946年3月实施的“战后(德国)经济平衡计划”,钢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

但是,“摩根索计划”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批评。如果使(受美国控制的)德国沦为前工业化状态,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战前德国最富饶的土地大多数已经到了苏联手里,其余的又转让给了波兰。此外,西德到处充斥着那些既无土地又无食物的难民。对城市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可能会使德国衰竭,而德国将无法完成其自给和重建。这样一副重担将由那些胜利的占领者来肩负!他们迟早会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德国人自己,届时又不得不让德国人重新发展经济。

106 考虑到这些,原来的美国“强硬”派批评家又补充了一条:强制性地迫使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战败固然不错,但还得让他们看到一些美好未来的希望,否则的话,结果恐怕还是会重蹈覆辙:一个充满怨恨、心怀耻辱的民族将会落入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手里。1946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曾当面对杜鲁门解释说:“或者是报复,或者是和平,你只能选择一样。”如果说美国的对德政策随着利益天平越来越倒向“和平”一面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美苏关系的恶化引起的。

华盛顿内部有一小圈人从一开始就看出,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将会导致冲突,而若明确地划分势力范围,这对解决战后问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案。这是乔治·凯南的观点。1945年1月26日,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苏联]做一个明白而又得体的妥协呢?——真实地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欧洲——我们自己不去碰苏联的地盘,苏联也不要来碰我们的地盘?……不管留给我们的行动范围有多大,至少我们可以……在一种安定、有尊严的基础上,在战后开始重新生活。”

六周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佛莱尔·哈里曼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在东欧的军事行动作出了悲观的、毫不掩饰地对抗的反应:“随着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进逼,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苏联的统治策略,除非我们愿意接受20世纪的蛮族入侵欧洲……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这个问题,历史将把下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描述为苏联时代。”

关于如何对付苏联,哈里曼和凯南意见完全相左,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

描述却是一致的。其他美国领导人的态度就乐观多了,至少在1945年春是如此。另一位美国外交官夏尔·波伦,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凯南信件的收信者,认为战后安定要依靠有原则的民族自决和强国合作。波伦认识到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还应寻求苏联的合作,他和战后的国务卿詹姆斯·巴恩内斯等人对同盟军占领原轴心国及其卫星国抱有信心,根据雅尔塔会议上的规定,这些国家享有自由选举权。然而,在实际观察中,他们看到苏联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滥用职权,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目标的不可调和性,转而赞同凯南的观点:对这些分管地区应该采取强权政治。

最初的乐观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大众普遍认为斯大林没有兴趣去挑起争端和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6年6月亲自对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的:“我认为红军不会发动战争。现在的武力冲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想要的几乎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话有点道理:斯大林并不想和美国交战(认为苏联想和以前的同盟国展开充分合作,虽然这一结论后来并没有站住脚)。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美国对苏联实行开放交流,寻求解决共同问题,这对美国而言,其冒险性微乎其微。 107

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帮助筹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真诚地希望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颁布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召开了首届联合国大会。但对当时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涉及金融和经济组织与协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和世界)危机的根源是由战争期间的经济灾难造成的。除非货币之间可以互相流通兑换,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增长共同获利,否则的话,将重蹈1931年9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体制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其主要精神是梅纳德·凯恩斯领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寻求替代战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以某种相对灵活、紧缩的方式取代金本位,但它又必须比浮动汇率下的货币体制更坚挺可靠。凯恩斯强调,不管将来新的货币体制采取什么模式,它可以效仿一家国际银行,其作用相当于某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国内经济的管理:在促进和简化外汇交易的同时,保持汇率稳定。

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协议的核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便于扩展和平衡国际贸易”(协议第一条)。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形式而成立的最早的总理事会代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会上提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最后在1947年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同意相互之间减免关税,规范贸易,制定解决违约和纠纷的程序。所有这些,与原来贸易中的“重商主义”方

式截然不同,它旨在等待时机成熟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开放性贸易时代。

108 隐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目标和机构中的,还有一项是要成立“世界银行”:这也意味着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对各国的国家事务进行外部干预。此外,货币变得可以通兑,这是使以同美元的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商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重重困难:英法两国强烈抵制兑换权,英国是因为战后经济的衰弱以及想保护它的“英镑区域”〔3〕,法国则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它那“坚挺的法郎”,期望对不同地区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汇率,这是一种已逝的辉煌年代的新柯尔贝尔式的做法。十年以后,法郎和英镑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才实现了货币的完全自由通兑(1959年5月德国马克、1960年1月意大利里拉也先后加入了该体系)。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们曾预计全球化的国际通兑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能完成,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由于冷战的到来(或者说,事实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换句话说,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制度而制定的这些合作计划和组织被高度地理想化了,它假设了一个可以产生共赢的、安定的国际合作年代。一开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倡议的金融体制,苏联态度诚恳,它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筹资者。也许美国人(和一些英国人)都太天真了,认为苏联——或实际上法国——的决策者们会同意。他们没有事先征询苏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任何意见就草拟了这些计划,因此碰到了障碍。

此外,他们还真切地希望,通过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共同利益,将会克服各国之间的传统差异和政治上的不信任。因而,当1946年初苏联断然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财政部非常尴尬;为了解释斯大林的真实动机,1946年2月22日夜里,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首次郑重告知美国政府:美苏之间即将产生对抗。

109 除凯南外,其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此完全不知情。不仅仅是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威尔和沃尔特·李普曼,他们听说苏联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行动后,都觉得难以置信。至少在1946年中期以前,许多美国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还在继续下去。甚至连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后来成了他本国政治公审中的牺牲品)也在1946年夏签订《巴黎和平公约》时,大为

〔3〕 印度和其他一些英联邦自治领持有相当数量的英镑,这笔财富主要是在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信贷资金。假如战后立即实现英镑和美元自由兑换的话,那么这些财富就会大量缩水,从而削弱英国早已脆弱的外汇储备。那也正是英国为了从美国获得贷款,作为交换条件而被迫经历了最初灾难性的兑换后,又在1947年重新建立英镑管制的原因所在。

震惊地感叹：那些“美国佬疯了。他们给苏联人那么多，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期望”。〔4〕

但是，美国政策可不仅仅是无知而已。1945年以后，美国极力想尽早从欧洲抽身而出，因此它热切地实施可以无需美国亲临或监控的可行方案，这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了。今天对美国战后这项想法知道并理解的人不多，但在当时，这一点对于美国的谋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解释说，美国希望对德国（和欧洲）的占领最多不超过两年。

杜鲁门要完成这项行动，受到的压力很大。突然中止租借协议是削弱对欧洲经济、军事总体承诺的一部分。1945—1947年，美国国防预算缩减了5/6。欧洲战事结束时，美国在那里拥有陆军97个师，到1947年中期，只剩下了12个，其中大部分师都是编制未满并且只是执行行政任务。其余都早就回国或复员了。这比较迎合美国选民的意志，1945年10月仅有7%的选民认为海外事务较国内事务严峻。但这却对美国的欧洲同盟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他们十分害怕两次大战期间的孤立主义重新出现。他们只对了一半，英国知道，如果1945年苏联入侵西欧，美国的策略是立即撤回到边缘地带，如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地区。

即使已在削减对欧洲的军事责任，美国外交官们还是在采取倾斜政策。还是那位原先对战时协作和苏联的好心抱有信心的国务卿巴恩内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试图安抚他的德国听众：“只要德国需要占领军，美国军队就会加入进来。”这很难说是一项对欧洲防御的明确承诺，但它可能是由杜鲁门6月份的一封信引起的（“我受够了对俄国佬的娇宠！”），反映了美国对与苏联共事过程中产生的困难越来越恼怒。

不只是德国人需要安抚——英国人尤其想弄清楚美国为什么摆明了想急于逃离欧洲这块累赘之地。英国在华盛顿并非受到人人欢迎。1946年4月12日，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除了语言和文学传统上的共同之处外，大英帝国和共产主义苏联一样，和我们之间毫无共性。”当然，华莱士以对共产党“手软”而著称，但他对美国卷入英国和欧洲事务的厌恶却在政界广受欢迎。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勒顿镇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华尔街日报》刻薄地评论说：“公众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富勒顿演说之反应强有力地证明，美国勿需任何联盟，或和任何国家之间的任何类似联盟的东西。”

不管是华莱士的讲话还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丘吉尔对此都并不感到惊讶。早在

〔4〕 据凯南声称：“我们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根本就没有料到，可能也不会想到，在苏联秘密警察支持下的贝利亚时代，苏联的占领对那些被占领国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943年,他就仔细估量过罗斯福要清除大英帝国的梦想了——实际上有好几次罗斯福似乎考虑过战后削弱英国,容纳苏联。1944—1947年间,美国的策略如下:与斯大林达成欧洲大陆协议;给英国施压,迫使其放弃在海外的帝国控制权,拥护开放性贸易和英镑自由通兑;尽速从欧洲撤军。有关这些,只有第二条实现了,第三条由于第一条的不可行而随之失败了。

英国的观点则迥然不同。1944年,内阁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列出了与苏联谈判中需要牢记的4个首要方面:(1)中东石油问题;(2)地中海地区;(3)“重要的海上交通”;(4)维持和保护英国的工业强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没有一条是直接涉及欧洲大陆的——除了第二条,它解释了英国对希腊的保证。如果说英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的交涉中抱有戒心,那其实是预见到了未来苏联向中亚和近东的进军,而非害怕它对中欧的计划。

鉴于英国在东亚、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上述几点就显得有意义了。当涉及欧洲问题时,大英帝国的战略幻想(不光是华盛顿的一些人早已有这种说法)就比它的同盟国美国讲究实际得多了。伦敦方面认为,战争是为了击败德国,如果相应的代价是让苏联得以霸占东欧,那也是势之所趋。英国依然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欧洲问题:引用外交部威廉·斯特兰爵士的话来说,“由苏联来统治东欧比由德国来统治西欧强多了。”

斯特兰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943年。到了1945年,苏联的统治范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扩大,英国领导人和他们的美国同仁们一样无法再乐观了。1945年2月,苏联操纵了布加勒斯特政变,接着又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施以高压,很显然,这些国家为苏联的霸权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英国并不打算改善这些地区的状况,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必须准备好以欺诈对付欺诈。”

对于苏联有可能控制东欧——到1944年末,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英国并不真正害怕,它担心的是苏联可能会将衰落、怨愤的德国也纳入它的范围内,从此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1944年秋的英国参谋长会议得出结论,认为很有必要划分德国,并占领其西部。在此情况下,1945年3月英国财政部的一封机密报告总结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不再通盘解决德国问题,而应当将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完全纳入西欧经济。英国总参谋部长艾伦·布鲁克在1944年7月27日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德国已不再是欧洲的霸主了。苏联才是……她……15年后必将成为主要威胁。因此,要栽培德国,将她培养成熟并纳入西欧联盟。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所谓苏、英、美神圣同盟的面纱下进行。”

4年后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在所有的同盟国大国中,只有英国猜对了、甚至找到了对最终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英国既无权力、又确实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结果强加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明显地不再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手了。在与德国的

史诗般战斗中,英国已经筋疲力尽,连作为一个大国的起码体面都无力维护了。从1945年欧洲胜利日到1947年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兵力从巅峰时的男女总共550万人服役削减到了仅110万人。1947年秋,为了节约燃油,它甚至被迫取消了海军演习。美国大使威廉·克莱顿充满同情地说道:“英国人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他们指望通过我们的帮助或其他什么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和统治。”

在此情形下,英国只担心美国会退缩,而不担忧苏联的攻击,也就情有可原了——英国的政策基础是估计苏联可能采取战争以外的其他形式进攻欧洲——而美国则会退却。执政的英国工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的退缩感到高兴,他们寄希望于战后成立中立性质的欧洲防务联盟。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可不这么幻想,在给他的伙伴、工党成员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他解释说:

“[工党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将自己创建成为欧洲第三种力量。想法不错,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基础来看,时机尚未成熟。欧洲现在的剩余力量本身还不足以抵抗苏联。必须以一种世界力量才能对抗另一种世界力量……假如没有美国的力量去阻止,苏联将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横扫欧洲。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但你们却没理由忽视这一点。”

112

但是,美国值得信赖吗?英国外交官们并没有忘记1937年的《中立条约》。他们当然也理解美国在海外问题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跟英国早年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从18世纪中叶到1914年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期间,英国就一直倾向于委托别人参战,而自己不用维持正规军队,这样可以避免长期介入大陆纠纷,所以在欧洲地区不常年驻军。在过去的欧洲战场上,海战方面可以依靠西班牙、荷兰、瑞士、瑞典、普鲁士,当然还有俄罗斯作为盟友。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因此,1947年1月,英国决定继续其原子武器项目的研究。但是这一决策的重要性要到未来才能显现。在战后初期状况下,英国最大的希望还是鼓励美国继续参与欧洲事务(这意味着通过谈判来公开拥护美国的信念),同时在现实可行的情况下和苏联合作。只要对德国复仇主义的害怕处于首要位置,这项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然而到了1947年初,这项政策就开始瓦解了。虽然尚未明了苏联是否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事实上存在的危险(直到1947年12月,贝文仍然认为,比之将来复兴的德国,苏联的威胁要小一些),但德国的窘境的确使他明显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政治讨论悬而未决,德国经济停滞,英国在它的占领区投入了巨大财力,今后恐怕维持不久了。不管苏联同意与否,德国经济要复苏。于是,英国迫切希望对过去做一了结——自始至终,英国和德国两次长期交战,虽艰难获胜,却收获甚微——并且寻求解决大陆危机的权宜之计,以便让一切从新开始。

如若情况好转,英国也许会退回到不列颠群岛,同时他们猜测美国也想撤兵回美洲,而将西欧的安全问题留给他们原来的保护者——法国。在1938年以前,英国战略思考的基石是:作为欧洲大陆的最大军事强国,法国值得依赖,它可以抗衡在中欧野心勃勃的德国和将来有可能对东欧造成威胁的苏联。法国的这一欧洲大国形象,在慕尼黑会议上发生了动摇,但出了东欧各国大使馆的门,在一般人心目中它还没有破裂。令整个欧洲大为震惊的是,1940年5月和6月,德国装甲部队跨过墨兹河,穿过皮卡迪,大肆杀戮,法国大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接下来的6个星期令人痛苦难忘,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主要参照关系永远改变了。法国的强权地位,甚至大国地位,从此消失了。虽然在后来几十年里,戴高乐一直竭力争取,但还是一去不复返了。1940年6月的溃败,导致了接下来4年里忍辱含羞、低声下气的被占领生活,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沦为德国的傀儡。无论他们在公众场合如何表态,法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对他们的国家状况心知肚明却又束手无策。正如1944年巴黎解放一周后,法国内部的一份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假如来一个第三次攻击,下一代法国人又投降的话,那真是令人害怕……法国将会永远屈服了!”

那是私下里说的话。面对公众,战后法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坚持要求,承认其作为同盟国成员而应享有的胜利者荣誉,作为世界大国应享有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地位。这种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尚能维持,因为它比较符合其他大国之间的表面意愿。苏联需要一个西方战略盟友来和它共同抵制英美;英国希望复兴后的法国可以取代它在欧洲的责任,从而减轻大不列颠在欧洲大陆的负担;甚至美国也同意在高层领导方面给予巴黎一席之地,它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好处——虽然不多。因此,法国获得了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加入了对越南和柏林的联合军事管理,(在英国的坚持下)还得以从原美国对德国西南部的占领区里分得一杯羹,这块法军占领地毗邻法国边境,并且正好在苏联前线的西边。

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反而引起了这一已经受屈辱的民族更大的羞辱感。法国最初的回应就表现得敏感而棘手。在同盟国对德管理委员会上,对于最后通过“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决定,它不是坚决阻挠就是投反对票,理由是当时法国没有参加。在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问题时,法国各外省政府最初拒绝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同盟军政府的合作,理由是法国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和管理应当采取独立的、完全法国式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战后法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层决策圈子之外。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可信赖(请记住,1920年美国撤离欧洲,1940年7月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击毁了法国舰队);但他们联合起来则更不可信赖——戴高乐的感

伤尤其强烈,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战时他客居伦敦期间的屈辱地位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眼里对他的轻蔑。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和伦敦可以对与其切身相关的事务作出决定,而法国却毫无能力施加影响。 114

和不列颠一样,法国也是一大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在占领进程中,法国渐渐失去了对它的殖民地的控制。无论如何,除了在非洲和东南亚拥有大量资产外,法国首先是、并将仍然是一个欧洲的强国。和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现在被间接地卷入了苏联在亚洲的行动或即将到来的中东危机中。正由于法国现在在衰退,因而在它的视野中,欧洲就显得突出了。巴黎也确实有理由关注欧洲。在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外交在东欧地区曾经非常活跃,但现在法国对东欧的影响结束了:1938年10月,那位被炮火吓坏了的爱德华·贝内斯留下一句名言:他“在历史面前犯的大错……是忠于法国”,他的这种幻灭情绪在这个地区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现在法国的注意力放在了、事实上是集中在了德国身上。这也情有可原:1814至1940年间,法国国土曾五次遭受德国入侵和占领,最近的三次还记忆犹新。法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土流失,财富遭掠,人员伤亡,苦难重重。1918年以后,为未能建立起一种联盟体制来控制并遏制德国的复兴和复仇,法国外交部一直无法释怀。因此,希特勒战败后,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确保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

如此一来,法国对待德国问题的最初立场就很明朗,它直接借鉴了1918—1924年的教训:如此种种,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企图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计划,只是这次依赖的军事对象不同而已。法国决策者想要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并削弱德国经济:禁止生产一切军需产品和相关军需设备,作出战争赔偿(包括德国工人要在法国境内进行义务劳动),重新配置农产品、木材、煤炭,运走机械设备。鲁尔区、萨兰德和部分莱茵河地区的矿区从德国划分出来,其资源和产品均归法国处置。

如果实施这一计划,那么多年后德国将被毁掉:还好这项目标只被认可了一半(在法国,那是一项很有政治吸引力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有利于法国恢复元气,它占有了德国的大量重要资源——实际上,莫内计划尤其看中自由支配德国的煤炭资源,因为缺少了它,法国的钢铁业就无以为继了。到1938年,法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约40%的煤和焦炭需要从国外购买。到了1944年,法国国内的煤炭产量下滑到只有1938年的一半都不到。整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到了1946年,虽然国内煤炭产量恢复到了1938年的水平,但法国1000万吨的煤炭进口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离开了德国的煤和焦炭,战后法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将注定夭折。 115

然而,法国的计划中有许多漏洞。首先,它与25年前凯恩斯对法国政策提出的异议相抵触。如果德国的资源对法国自身的复兴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摧毁德国资源就没什么

意思了。其次,根本就没有办法强迫德国人为法国效力,因为在德国国内,生活条件低劣而又看不到得以改善的希望。20世纪40年代,战后德国反对外来压迫的全民抵制情绪,比起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要实施法国对战后德国的计划,最重要的阻力是,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它的西方同盟者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一种大意的疏忽。法国同样还得完全仰仗这些同盟者,才能保证安全,并得以恢复活力。在次要问题上——例如与德国的萨尔州之间的海关和货币联盟,1947年法国曾提出自己的方式——西方同盟国可能会接受法国的要求。但是关于德国的未来这一核心问题,法国对于英美的决策却丝毫没有影响力。

法国和苏联的关系略有不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和俄国或盟或友,在公众心里,法国人对俄国的感情比较特殊,战后的民意测验不断地揭示,法国十分同情苏联。〔5〕德国战败后,法国外交家们曾指望,出于天然的共同利益——害怕德国,怀疑英美——苏联能长久地支持法国实现外交目标。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把苏联称为“俄国”,这是有更大的历史原因的:1944年12月,他前往莫斯科,商谈一项意义不大的、防止德国侵略复发的《法苏条约》。这位法国领导人高兴地发现,他和斯大林的见面,可以媲美400年前法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的会晤,差别只是“16世纪的法国还没有穆斯林组织”。

然而,斯大林可没有法国式的幻想。他对于作为一种对抗势力来协助法国抵消英美的外交重压不感兴趣。但直到1947年4月,在同盟国外交部长们的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支持乔治·比铎分裂莱茵河地区、控制鲁尔工业区的提议,法国才最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法国政府还在梦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毫无可能的独立政策。与捷克
116 斯洛伐克和波兰关于煤炭、法国钢铁和农产品市场的谈判也流产了。1947年末,法国国防部长还秘密建议法国可以采取国际中立的立场,与美国和苏联达成防范性的谅解或协议,以防止两国中任意一方对法国挑起进攻。

最终,法国放弃了这些幻想,在1947年回到了它和西方伙伴们的现实之中。原因有三:第一,法国的对德战略失败了,它既没能肢解德国,也没有得到赔偿。法国无权实施她的德国计划,也没有其他人去采纳她的方案。第二点是,1947年中期,法国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危机。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正如我们所见)也急需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复苏。前者是间接的,但显然得依赖于法国同意对后者的战略。

但是第三点,也是决定性的一点,法国政客们和法国民众的思想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苏联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以及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详见下一章)

〔5〕194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被问及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帮助法国复兴时,25%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另有24%的人认为是美国。

的建立,使得强有力的法国共产党从一个不显眼的政府联盟者变为对法国内外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如此一来,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法国可能会走向内战。在这段时间里,巴黎多少有点恐惧战争的爆发,又新愁旧虑不断,既担忧德国的复仇主义,又害怕苏联的随时入侵。

在这样的情境下,加上遭到了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法国极不情愿地转向了西方。1947年4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问及美国是否“可以信赖法国”时,外交部长比铎回答道:“可以”——但需要时间,并且条件是如果法国可以避免内战的话。可以理解,马歇尔当时对此并没有太在意,11个月后,他描述说比铎“惊恐不安”。马歇尔认为法国对德国威胁的事先担忧“背时而而不切实际”。〔6〕

马歇尔关于法国害怕德国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缺少对法国近期历史的同情心。法国议会通过了1948年英美对西德的计划,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虽然当时的投票情况势均力敌,297票对289票险胜。法国实在别无选择,但它心里明白。如果他们要经济复苏,并且得到英美在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护,来抵抗德国复兴或苏联的扩张,那他们就必须赞同——尤其是现在的法国已经深深陷入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里,损失惨重,急切需要美国支援。

美国和英国可以担保法国不受德国军事复兴的威胁;而美国的政策可以保证实现德

117

国的经济复苏。但这些都无法解决法国长久以来的尴尬处境——如何保证法国在德国早已享有的物质和资源方面的特权。如果这些目标通过武力或合并都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德国问题“欧洲化”。这就又像比铎在1948年1月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必须将这作为一个目标……建议同盟国和德国人自己都要将德国纳入欧洲整体……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为经济上繁荣但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德国注入延续和活力。”

总之,如果无法摧毁德国的话,那就会将她融入欧洲体系,使她不再对别人造成军事伤害,却给经济带来好处。1948年以前,要是说法国领导人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只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是一个万不得已才选择的最佳方案。只有在最后放弃“法式”方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采取“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法国领导人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方案。那3年里,法国人实际上不得不和他们300年来的历史作斗争和妥协。就结局而言,这可绝不是一项小成绩。

〔6〕 比铎的话并没有给马歇尔带来多少宽慰,他认为,公众对德国的威胁产生焦虑,仅仅是出于现在法国国内消费的原因。

1945年,苏联的情况正好和法国相反。20年来,苏联一直被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现在它开始重新露面了。苏联人口的恢复,红军取得的胜利,还要补充的是,纳粹的占领使得原本最反对苏联的国家也开始转向了,这些都给斯大林带来了信誉和影响力,无论是在政界舆论中还是在街谈巷议里。

这种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魅力建立在权利诱惑的基础上。苏联确实强大:除却德国入侵的最初6个月里的巨大损失外——当时红军损失了400万兵力,8000架战斗机和1.7万辆坦克——1945年,苏联军队恢复到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到1946年,仅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苏联的常规驻军就达到了约160万人。斯大林直接或间接(如在南斯拉夫)控制了欧洲东部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若不是被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抢先一步,斯大林差点就长驱直入德国北部,进军到丹麦边境。

西方将领们都清楚,如果斯大林下令的话,根本无法阻止红军直捣大西洋。可以肯定的是,美军和英军在战略轰炸能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点早在118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之前,他就早已知道了。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想苏联拥有原子弹——那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要苏联控制德国东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拥有铀矿。几年后,20万东欧人将在这些矿区为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而劳作。〔7〕

原子弹虽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使斯大林比先前更加怀疑美国的动机,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苏联的军备计划。这些计划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政治规划和目标,后来成为苏联和俄罗斯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中,首先是领土目标:斯大林想收复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两年后和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丢失的土地。通过1939年和1940年与希特勒的秘密会谈及协约,他已经收复了一部分失地。至于其余的失地,却是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丢失的,而苏联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途中乘机重新占领了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以这种方式占领和并吞了贝萨拉比亚地区(从罗马尼亚手里)、布科维纳(从罗马尼亚手里)、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西乌克兰(从波兰手里)、芬兰东部,而3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被并吞,与其说是与法西斯敌人之间令人作呕的交易,还不如说是战争胜利一页上的污点。

在这一地区的版图扩大对苏联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它结束了被人歧视的地位。对斯大林来说比较重要,他现在已经成了欧亚大陆一个巨大集团的领导人,苏联在新的联合国

〔7〕 据1945年3月签订的捷克-苏联秘密协约,苏联拥有波希米亚西部贾奇莫弗矿区的开采权并可攫取铀。

安理会上坚持要求设立否决制,这标志着苏联获得了新的权力。此外,土地代表的不仅仅是名声,最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安全。从苏联角度考虑,在西部拥有一块地带,这一大片地区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德国对俄罗斯的人侵,安全意义非同小可。在雅尔塔会议上,后来又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明确地坚持要求,介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这些地区,如果不能全部并入苏联国土的话,也应该成为由“没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政府来统治。

对最后这句话的解释,可谓争议颇多。但在1945年,英美两国并不想就此问题和斯大林起争执。在感觉上,苏联有优先权来解释他们认为合适的安全保障,就像最初同意莫斯科有权从原轴心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获得赔偿、战利品、劳力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现在回顾起来,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和经济掠夺似乎是苏联对欧洲东部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当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但在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显觉察——西方观察者们甚至还觉得莫斯科最初采取的战后姿态比较熟悉和传统,可以让人得到鼓舞。〔8〕因为曾有先例。

119

总之,若不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认真分析它的主张和雄心,就无法理解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但在有些时候,比如说1945—1947年,即使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要参照以前沙皇们的政策,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毕竟,是彼得大帝教会了俄国人如何通过“保护”邻国来实现统治的战略。凯瑟琳女皇又将帝国疆土向南部和西南部延伸。最重要的是,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帝国的势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

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和1945年情况相仿——在打败拿破仑一世以后,那些取得胜利的、相互猜忌的联盟者汇聚一堂,商讨重新构建欧洲大陆的平衡。当时亚历山大的意图十分明显。各小国的利益完全让步于各个大国。由于英国只对海外利益感兴趣,而欧洲大陆又没有可以和俄国抗争的其他势力,沙皇成了当时划分战后欧洲大陆的仲裁者。当地人民的反抗被看作是对此项安排的威胁并遭到了相关势力的镇压。俄国的安全在沙皇统治下的各地区得到了保护——从此不让任何西方军队随意到达莫斯科——随着这一条款的奏效,那些占领军被迫向新体制妥协。

1945年的一切都是在苏联的预谋下进行的。如果亚历山大和他的大臣们假如能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伊凡·马伊斯基1944年11月写的政策备忘录,肯定会觉得它无懈可击:“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状况是战后欧洲只有一种强大的大陆势力——苏联;只有一种强大的海上势力——英国。”当然,130年过去了,情况早就不同了:1945年的斯大林比亚历山大更关注中亚和近东地区(虽然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在那些地区也很活跃);相

〔8〕当然,波兰人觉得最宽心了——原因是这一切实在太让人熟悉了。

反,苏联战略家们并没有像沙皇那样,被君士坦丁堡、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等问题所苦苦困扰。但是政策的延续性远远超过了差异性。在沙祖诺夫(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俄国外交大臣)的规划中,它们似乎又被联结到了一起,他设想未来东欧是一个众多弱势小国的组合体,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依附于伟大的俄国。

120 根据沙皇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斯大林明显补充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切实希望看到欧洲经济的崩溃——通过两次大战之间的先例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推断——面对萎缩的世界市场,英美两大帝国成了主要的竞争者,他夸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由此他不仅演绎出更加动荡的时期即将来临——因此苏联必有所获——而且“分裂”西方联盟也确实可行:尤其是中东问题,可能还借助德国问题。这也是他不急于达成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斯大林认为对他来说,时机有利。

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觉得更安全。相反,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防卫并小心翼翼地心存怀疑,正如乔治·凯南在1946年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局势神经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演说,宣称苏联将恢复到战前对工业化、战备等的重视,提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再次明确地重申,今后只有当苏联需要的时候才会和西方合作。

这些说法并无新意:斯大林又回到了1921年前、后来是从1927年到建立“人民阵线”之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强硬”路线。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不很稳固——毕竟,它生来就只是处于逆境中的少数派的政变,又处在极不受同情的大环境里——和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需要在国内外制造威胁和敌人。此外,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如果1941年德国再早一个月入侵苏联(按照希特勒的原先计划),苏联很可能就垮掉了。和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但理由可能更充分些,苏联领导人一直受困于“突然袭击”的多虑症,担心他们新赢得的地位受到挑战。俄国人(有甚于法国人)几十年来不断把德国看作是主要威胁。〔9〕

那么,斯大林想要什么呢?他预测到了与西方的关系即将冷却下来,他想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本和西方的弱势,无疑这是对的。但却无法表明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其他一些明确的战略。研究苏联占领后的战后东德史的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总结说:“苏联人只是被该地区的具体事件所驱使,他们没有预先的计划或思想意识上的考虑。”这不仅适用于解释东德事件,它也符合我们对斯大林总体思路的理解。

苏联人并不打算在近期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从1945年6月到1947年末,红军

〔9〕 1990年,据称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曾注意到:尽管同美国之间的冷战时间长达四十年,他的孙辈们在玩战争游戏时,仍然把德国人当作敌人。

在编人数从 1136.5 万减少到了 287.4 万——削减的比例和美英两国大致相当(虽然战场上还保留了相当多装备精良的摩托化部队)。当然,苏联的预谋在其西方同时代人眼里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认为斯大林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者的人们也无法完全肯定。不管怎样,莫洛托夫倒是陈述了一件事实,他在自传里说,苏联倾向于利用有利形势而非冒险去实施他们的计划:“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可能的话,我们会采取进攻手段;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等待。”

斯大林本人以反对冒险而著称,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对西方未能对其尽快并进一步实施“包容政策”感到遗憾的原因。但这些年来没有人想要再打一场战争,而斯大林也很快被说服了放弃扰乱巴黎或罗马的企图(因为他在那些地方并无驻军),人人都意识到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在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人毫不掩饰地拒不理睬英国和美国的意愿,对当地人的意愿更是不屑一顾。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有点令人不解,苏联红军早就从此地撤了军。

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他在执行莫斯科谈判的决议方面倒是很守信用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假设西方同盟理解苏联计划占领和控制“他们的”半个欧洲,作为在形式上对民主的小小交换,看来他们乐意接受西方对苏联占领地区的行为所提出的抗议。但是他们觉得在要求东欧的独立和自治问题上,西方却咬文嚼字地过于认真了,苏联领导层对此大光其火。这一点从 1945 年 2 月莫洛托夫评论西方干预波兰前途的话里可以捕捉到:“我们不知道比利时、法国和希腊等国的政府是如何组建的。没有人问过我们,然而我们要说,我们不喜欢这些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模式。我们未加干预,只因为那是在英美两国的军事占领区。”

人人都盼望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像上次那样,签订一项包罗万象的《和平条约》。事实上,1946 年在巴黎确实签署了 5 项单独的条约。这些条约解决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意大利的领土等等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挪威问题,挪威从技术角度来说仍然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直到 1951 年。^[10]最后,那些大国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冲突而达成了一致意见,完全不顾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接受苏联统治的条约),这些条约有多么重要。

至于德国问题,那就完全不同了。尤其对苏联人来说,德国问题举足轻重。战争是由

[10] 意大利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付给苏联、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3.6 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另外还把伊斯特拉半岛割让给了南斯拉夫。边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仍处在争议之中,又持续了长达 8 年之久。

德国引起的,和平问题也主要牵涉到德国。苏联人脑子里萦绕着的德国复仇主义阴影并不比法国人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波茨坦会晤时(1945年7月17到8月2日,期间在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后,艾德礼取代了丘吉尔),达成了共识,将德国从东欧分离出来,对德国的行政再分割是为了占领的需要,以及实现“民主化”、“去纳粹化”和“非卡特化”的目标。然而在这些总体上的共同意向之外,困难还是产生了。

虽然当时一致同意将德国经济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但也允许苏联有权从德国的苏占区自由支配和获取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通过从东德提供的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中,他们相当于从西方占领区又获得了10%的额外补偿。但由于对德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采取了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些协约也带来了矛盾。关于赔偿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分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一样):俄国人(和法国人)想得到赔偿,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德国兵工厂,并搬走了他们的设备,也不管是否获得其他占领国的认可。

关于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一直没有最后结论。甚至连实施民主化的共同基础这一具体问题,在执行过程中也都遭遇了许多实际困难。结果,同盟国领袖们一致认可了差异的存在,并暂时延缓决定,指派他们的外交部长们稍后就此事另约时间再行会谈。从而开始了所有同盟国外交部长们长达两年时间的会谈——分别代表苏联、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政府:第一次会谈是在波茨坦会议后的两个月,地点是伦敦;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的12月,地点也是在伦敦。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就战后德国问题做出最后决议,并为同盟国和德国、奥地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做好准备。也正是在这些会谈中——尤其明显的是在1947年3月和4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针对德国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变得更清晰了。

英、美的战略部署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谨慎的考虑。如果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里的德国人老是处于战败、贫困、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的话,他们迟早会重新投入纳粹的怀抱——或者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所以在英美两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工作重点早就转向了重新构建民事和政治机构,并赋予德国人管理其国内事务的责任。这给了新的德国政治家们比较多的优势,远比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预期的要多,因此他们立刻就开始充分利用它——宣称除非问题得到改善,并且占领者们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对德国未来在政治上是否效忠负责。

对西方联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柏林和东德地区的苏联占领区内,共产党的占领政策还没有想到要去赢得不满的德国人的感情和选票。不管在满怀仇恨的德国人眼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多么不受欢迎,后一种选择(投靠共产主义)只会更糟糕:如果斯大林真心诚意希望德国保持统一的话,就像他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共产党所要求

的那样,那么苏联的策略实在是选择得不怎么样。从一开始起,斯大林并未征得同盟国的同意,就在他的占领区内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大肆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尽其所能,无情地榨取德国资源、拆走他们所抓到的一切东西。

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共产党还从未考虑过,除了武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对德国、甚至只是对苏联占领区的统治。1946年10月20日柏林市的选举显示,共产党候选人的得票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这样一来,苏联的政策明显地强硬起来。但在这一阶段,西方占领者自己也身陷困境。到1946年7月为止,为养活英军占领区(德国西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当地人口,通过向美国借贷的方式,英国已被迫进口了11.2万吨小麦和5万吨土豆。

英国从德国最多得到了2900万美元的战后赔偿,但为了维持占领区的供给,每年却要支出8000万美元。这里的差额只能由纳税人来承担支付,英国政府甚至被迫在国内对面包实行了配给制(这种权宜之计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被采用过)。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登认为,英国是在“给予德国人赔偿”。美国人没有遭遇同样的经济困难,他们的占领区遭受的战争损失不大,但是他们的情况看来也同样荒唐——尤其是美国军队很不满意,因为供养上百万饥荒的德国人的开支要从他们的军事预算中支付。乔治·凯南注意到:“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让我们对德国的一部分独立承担起了责任,德国的这一地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经济自给,由于战争以及德国战败被占领后,这一地区要实现经济自足的可能性更是渺小。在我们同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时候,我们对如何恢复这一被占领区的经济还没有任何计划,因此期望以后可以通过国际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再加上德国对苏联拆运走工厂设备这一举措怨恨日深,美国军事长官克雷将军注意到苏联政府并未对《波茨坦公告》中的有关协议践约,于是在1946年5月单方面暂停了从美占区向苏联(或其他地区)提供赔偿。两个月后,英国也开始效仿这一做法。这只是标志着分裂的开始。法国也和苏联一样,一直想得到战后赔偿,而所有四大同盟国仍然在遵循1946年签订的“产业规划水平”协议,照此协议,德国的生活水准应该被压制在欧洲(不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的平均标准线以下。此外,1946年5月的英国内阁会议考虑到欧洲安全问题,仍然不情愿将德国正式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但明摆的情况是,四大占领国并不想达成一致意见。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主案结束后,《巴黎和约》的各条款也在11月定了下来,战时结成的同盟国除了负有对德国的共同责任外,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矛盾最终上升为军事力量的对比。1946年末,英美达成统一,将他们的占领区经济合并为一个所谓的“双占区”;但这还并不意味着是对德国的划分,更不是标志着要把“双占区”纳入西方范畴。相反,3个月后,即在

1947年2月,法国和英国大张旗鼓地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双方约定共同抵抗未来德国的任何侵略行为。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仍然态度乐观,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法解决德国经济难题,都没必要分裂德国。至少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还是一致的。

真正的分裂是从1947年春开始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3月10日到4月24日),会上重提了寻求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和平协议。这次会上双方的裂痕开始明显了。美英两国决定重建西德经济,期望德国可以实现自给并有助于欧洲总体经济的复苏。苏联代表想从德国西部地区获得赔偿,因此希望根据最初在波茨坦所设想的一样(虽然比较模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行政、经济实体。但是,现在西方同盟国不再想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脱对德国西部的人口负担——这同时本身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只要当时的军事力量是不对称的,还可以将这个国家实际上转交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驻德国的美国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K. 墨菲指出:“是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真正拉下了铁幕。”恩斯特·贝文甚至在抵达莫斯科以前就早已放弃了正式的希望,认为关于德国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对马歇尔(和比铎)来说这是一个作出定义的时刻。125 无疑,这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来说也一样。到了下一次四国外交部长们在巴黎会晤时,从6月27日到7月2日,他们讨论了马歇尔突然提出的新计划,美国 and 英国早就一致同意(5月23日)允许德国参加新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这拉开了西德政府的筹备期序幕。

从此以后,事情迅速向前发展。双方不再寻求或做出任何妥协;美国 and 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苏联和德国单方面签订和约,并为预先阻止这一切而同意延缓和妥协,但最后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决定不再把这一结果考虑在内。8月份,他们单方面提高了双占区的产能(引起苏联和法国的一片批评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份报告JCS1067(即“摩根索计划”)被JCS1779取代,它正式指出了美国的新目标:与德国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联合,鼓励德国政府自治。尤其对美国人来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了。〔11〕

在伦敦,外交部长们——莫洛托夫、贝文、马歇尔和比铎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从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这是一次奇怪的聚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破裂。西方联盟之间一直致力于西欧复兴的独立计划;而早在两个月之前,斯大林成立了

〔11〕 后来证明这种调节实施起来很简单。一位美国军人很高兴也很诧异地发现,他在德国得到的认可比起冷冰冰的法国人对解放者的态度强多了:“真见鬼,这些人干净多了,比法国佬和善多了。他们和我们是同一类人。”引自厄尔·齐姆克《德国被占领时期的美军,1944—1946》,(华盛顿特区,1985),第142页。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国内事务中采取不调和路线,并且对那些加入了苏联统治集团的、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实行严厉看管。这些部长们就像过去一样,讨论了要在西方联盟的控制下筹建一个德国人政府的前景,并讨论了可以达成最终和约的一些其他条款。但关于如何管理德国并未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对德国的未来也没有做任何规划,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预先安排下一次会议。

相反,英、法、美三国却继续就德国的未来问题展开了三方会谈,地点又一次设在伦敦,时间是1948年2月23日。正好也就在那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功发动了政变,标志着斯大林明确放弃了他的早期战略,开始认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受布拉格政变的影响,法国和英国将他们的《敦刻尔克条约》扩展成为3月27日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纳入共同防卫体系。

现在已经消除了一切障碍,西方领导人和伦敦会议迅速同意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西德,并制定规划,要为西德建立一个最终的政府(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代表的赞成,作为交换,他们暂时同意将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并建议成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监管鲁尔地区的工业)。这些计划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无疑地遭到了驻柏林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抗议(他忘记了苏联自己早就多次违背了那些同样的精神)。

3月10日,索科洛夫斯基谴责这项关于西德的计划,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强加于德国民众的,完全否定了德国人表达自己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机会。他重申了苏联的看法,认为西方列强在干预德国东部问题时,滥用了他们在柏林的权力——该地区应该属于苏联占领区。10天以后,即3月20日,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痛斥西方联盟的“单方面行为”,“欺骗了西德人民,损害了和平国家的利益,违背了热爱和平的德国人民的意志——他们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随后他愤然拂袖而去,其他苏联代表也跟着退出了会场。接下来的会议日期一直未定。同盟国之间对德国的共同占领就此宣告结束:两周不到,即4月1日,柏林的苏联军政府开始干涉西德和西方联盟在柏林占领区之间的道路交通问题。欧洲大陆真正的冷战开始了。

不用再质问,通过上述叙述就可以明了“谁发动了冷战?”就冷战是因德国而起这一点来看,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各方都可能选择让德国统一。1945年5月,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深感不满。一些德国政治家,最著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纳,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还得感激国家的分裂:假如德国继续保持四国占领局面或实现统一的话,一个来自边远西部天主教莱茵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客将不大可能在政坛上脱颖而出。

阿登纳并没有将德国的分裂当作他的政治目标,不管私底下他是多么欢迎这一结果。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政敌是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舒马赫,一位来自西普鲁士的新教徒、一位孜孜不倦地主张德国统一的鼓吹者。与阿登纳相反,舒马赫宁愿德国成为中立国,也不愿意看到现在德国分裂的局面——这看起来是斯大林所许诺的。当时的舒马赫在德国更受大众欢迎,这成了阿登纳不得不谨慎行事、并将德国分裂的责任推卸到占领军身上的原因所在。

到了1948年,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并非不乐意看到德国出现分裂,面积较大的德国西部现在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虽然有一些人曾经预测到了这一结局,如乔治·凯南(早在1945年,他就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引导美占德国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优秀的独立体,这样就不会受到东部的威胁”),但他们还只是少数派。美国人和斯大林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在临时凑合,没有计划。有时候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有些重要决定和宣言,例如著名的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加速并促成了斯大林从妥协到严厉的态度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洲的分裂责任在于华盛顿政府的麻木不仁,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它那早已预谋好的不退让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此事而言,杜鲁门主义对苏联谋略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作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上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们反抗来自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的占领企图,这是美国的政策。”这也是对伦敦政府因1947年2月的英国经济危机而无力再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一事的直接回应。美国将转而扮演英国的角色。杜鲁门因此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为其海外援助计划增加40亿美元的预算:为确保获得这笔资金,他在申请中列举了共产党的活动引发的危机。

美国国会对他的讲话很重视,但莫斯科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对土耳其和希腊——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很感兴趣。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范围不应该受到杜鲁门哗众取宠表演的影响。相反,他继续认为和西方阵营的分裂对未来是件好事,美国肯承担以前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责任就是个标志和先兆。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斯大林对东欧的策略性思考,那肯定不是由美国国内政治说法的变化而引起的。〔12〕

导致德国和欧洲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年来斯大林自己的过错。在中欧,他曾想选择让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衰弱和中立,但是在1945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不肯妥协的僵持和冲突战略中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假如斯大林的愿望是想看着德国腐朽

〔12〕 1947年12月,经常代表他的领袖发言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告诉代表们,杜鲁门主义的矛头至少是指向苏联的,但同时也是指向了英国,“因为它指明要把英国的势力范围逐出地中海和近东地区。”

下去,并让德国人怨恨而又无助地最后求助于他的话,那斯大林的算盘就完全打错了——虽然在两德占领区的同盟国政府曾经担忧他有可能计谋得逞。由此看来,欧洲冷战的不可避免是由苏联独裁者的个人性格和他领导的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德国就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一点他的敌人们都清楚:“问题是我们在玩火,却又没有工具去扑灭它,”1948年2月13日马歇尔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如此描述。苏联要做的只是接受马歇尔计划,并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莫斯科曾经本着良好的信念,寻求建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德国。在1947年,这有可能会迅速改变欧洲力量均衡中的优势。无论马歇尔、贝文和他们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如何考虑对策,他们将无力阻止这一切。这一战略计谋远比斯大林无法让西方信任这一点来得高超。就像迪恩·艾奇逊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我们比对手们来得幸运!” 128

回顾过去,多少有点讽刺性的是,为了削弱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过于强大的势力,各方展开了一场死伤无数的大战,战后的胜利者们却又对击垮战后德国这一巨人的安排意见不一,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只能在他们内部将其瓜分。很显然——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然后是法国,最后是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是不断地争论协议条款,然后公之于众。这样做虽然让人感觉不佳但却行之有效。用英国驻德国占领区的情报官员诺尔·安南的话说:“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自己却和希特勒的自觉追随者们沆瀣一气,这想起来确实令人憎恶。但是对西方而言,最好的希望还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建立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第5章

冷战来临

129 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吧,这对想要一统天下的俄国君主来说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的马其顿。他们还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想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鞭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关于建立欧洲秩序这一想法,不是说要人为地创建一个德国,而是势在必行。
——鲍尔·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安东尼·艾登,1952年1月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

米洛万·德吉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所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的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结果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演变成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观点也很清晰——早在共产党占领东欧以前，他就告诉过德吉拉斯。苏联参战的目的是击败德国，重振雄风，确保苏联在西部边防的安全。无论将来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区不应该悬而未决。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之间这块南北纵向的地区上，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国政府虽然不值一提，但对苏联是一致敌对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直对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苏联会对他们入侵。在斯大林看来，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在那些事先还未并入苏联范围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并且不会威胁苏联安全的政府。 130

但要保证这一结局的实现，就必须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苏联一样，这从一开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图。他的目标看来非常直截了当：像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这些国家里的旧贵族早已名誉扫地，若想将他们清除掉，除旧布新，这并不太难。在许多地方，苏联占领者起初是作为解放者、作为变革和改革的先锋而受到欢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外，苏联对西方邻国的内部事务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动。即使在那些共产党占有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他们对苏联的认可以及1927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执的影响，将他们自身推到了东欧政治的边缘。苏联后来的一些做法，他们对在莫斯科避难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监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们的弱势——对波兰领导人事件的处理，差点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的灭亡。

1945年2月，当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迪亚斯·拉科西从莫斯科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尚可以依赖大约4000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根据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的自述，近2000万民众中只剩下了不到1000名的共产党员。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见好：1944年9月只有大约8000名共产党。只有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区，在那里共产党作为胜利的游击队抵抗组织保存了下来，共产主义这才得以代表了基层大众。

一方面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还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合作伙

伴关系,因此斯大林从 30 年代人们熟悉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实际经验中想出了最初的战略:赞成他们成立“阵线”政府,结成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联合阵线,排除和惩罚旧政权及其支持者,谨慎地、“民主”地实行改革,而非实施革命。到战争结束或刚结束后不久,东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一个联合政府。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东德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实上,控制比政策来得更重要。在东欧的每一个联合政府——“祖国战线”、“联合统一政府”、“反法西斯团体联盟”——里,共产党都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断、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权力,由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百万农民的忠心。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机遇巧合。共产党还进入了重要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地区行政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

相反,东欧的共产党并不急于要求获得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的职务,而通常把这些职务让给同他们联合的党派,例如社会党、农业党或自由党。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性质——共产党只在其中占有少数地位——有助于安抚西方观察者。当地百姓可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预先小心防范——1945 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上升到了 80 万——但在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策略还是相当令人心安地温和的。除了土地集体化外,共产党一直在敦促给无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充公外,共产党并没有强制实行资产公有制或国有化——它要求得并不多,甚至比同它联合的党派要求的还少。也几乎没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目标。

共产党在 1945 年和 1946 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东德、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国家和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 1945 年 11 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

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或小土地拥有者党派的代表所击败。

结果,共产党转向采用施加压力的措施,伴随着公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那些竞争对手遭到了诬蔑、威胁、殴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样的对待,被监禁甚至枪杀。“人民”民兵助长了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共产党发言人将此归咎于政治批评家们。那些弱小或不受欢迎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成了公众辱骂的目标,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同伴忍受着这种辱骂。因此,在保加利亚,早在1946年夏,农业联盟党的22名常务委员中就有7人,80名委员中有35人被监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农业党记者库内夫,控诉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真正的罪犯的姿态称保加利亚政府是政治和经济的梦想狂”。

农业党、自由党和其他主流党派轻而易举地成了众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情绪之名,最后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大、最复杂的一项障碍是当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一直参与了共产党的改革。在中欧和东欧,很难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或其同谋——他们也曾经和共产党一样遭到了压迫。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东欧,只要存在着工人阶级,他们就在传统上忠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因而,当共产党无法轻易打败社会党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加入他们的方式。

或者毋宁说,这是在让社会党加入共产党。这是共产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项策略。1918—1921年间,列宁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欧洲的社会党,将激进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进新成立的共产党,并谴责社会党的残余部分为反革命,让他们遭到历史的淘汰。但当各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处于少数派地位时,莫斯科改变了策略,转向了同(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的计划——当然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管下。在当时东欧已经获得解放的氛围下,这种建议在许多社会党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敏感。

甚至在西欧,一些有左倾思想的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成员也被共产党吸引,受邀请合并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压力难以抵抗。在苏占德国区首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会议上)共产党决定联合比他们大得多的社会党“同盟者”。这次合并以两个月后“社会统一党”的诞生而初战告捷(在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党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产党”的名字,这是这些合并的特征之一)。事实证明,在东德,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对这次合并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在新党派和后来成立的东德新政府中,他们被授予了极高的权位。那些抗议或反对成立新党的社会党成员遭到了谴责、驱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里,这些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罗马尼亚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

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亚在8月份,波兰在12月份。那时,社会党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们消失之前,已经早就不是在本国政治领域内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国一样,那些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原社会党人获得了一些空头衔。原来的社会党人阿尔帕德·萨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

东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西方的社会党经常鼓励它们与共产党合并,这要么是天真地认为,只要那样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么寄希望于缓冲共产党的行动。直到1947年,东欧那些独立的社会党(即拒绝和共产党同志们合作的社会党)才被阻止加入国际社会党组织,因为它们对“进步”力量联盟来说是一种障碍。同时,它们在国内又遭受着屈辱和暴力。即使他们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境况也未见好转——1948年2月在罗马尼亚两个党派“联合”的议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谴责她的前社会党同事,说他们蓄意破坏体制,对反动政府奴颜婢膝,“恶意中伤”苏维埃。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134 这些对苏联最初接管东欧之情况的描述,展现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普遍进程。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将民族差异性考虑在内。共产党想要通过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来确保安全,这看起来是斯大林的意愿,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点却是在权力而非合法性上。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对司法和政治的顾虑却越来越少的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选举的胜利会为其开脱后,它甚至不惜牺牲外部的同情。

此外,各国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曾经是苏联的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共产党势力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和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关系明显,正好处于苏联版图的外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前第三国际的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谁要是在选举中不投共产党的票,谁就被认作是叛徒。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议会465个席位中,共产党的对手们还是赢得了101席。但反对派早已注定要失败——占领区的红军及其当地同盟者公开消灭反对势力的唯一障碍是,他们需要和西方同盟国合作签订关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来确保英美认可共产党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在保加利亚的合法权利。

一旦签署了和约,共产党就意识到等待不会有结果,各项事件该发生的还是会按时间

顺序陆续发生。1947年6月5日,美国参议院不顾驻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心,正式认可了《巴黎和约》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的条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亚反共产党的政客、农业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于不愿意跟随绝大多数识时务的农业党人,他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祖国阵线)。对他的审判从8月5日延续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正式生效,4天后,美国对索非亚政府给予外交认可。96小时后执行了对佩特科夫的处决,对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国官方表态后才公布。通过司法程序杀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再也不惧怕任何绊脚石了。苏联将军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红军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时说道:“我们没有权利不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努力消灭这个可怜虫。”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还要低微。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亲俄罗斯情结,使共产党可以利用。^[1]虽然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保证过会归还其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1940年在胁迫下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这两块地方早就并入了苏联,他也不愿意归还与保加利亚接壤的罗马尼亚东南地区的南多布罗加;结果,在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这一重要地区,完全受束缚于苏联提出的对当时还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土地要求。

135

更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表现得不像罗马尼亚人,至少不符合罗马尼亚的传统标准。安娜·鲍克是犹太人,埃米尔·鲍德纳拉斯是乌克兰人,瓦西尔·卢卡有着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由于老是被看作外来人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完全得仰仗苏联军队。他们得以在本国内生存,不是依靠大选获胜——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实际目标——而是依靠他们神速地、高效地占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并消灭“历史上的”敌对党派,对这一任务,他们执行起来得心应手:早在1948年3月,他们的政府就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罗马尼亚的情况和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装甲部队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盖格区的种族压迫的动乱)一样,颠覆和暴力并不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位于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途;在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向西面实现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兰,亲苏的当地政府通过公众选择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与巴尔干半岛各国不同的是,波兰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轴心国的牺

[1] 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多年来一直明显地在狂热地亲德和极端的斯拉夫主义两边摇摆不定,结果两面不讨好。当时有位当地评论家指出,保加利亚老是挑错牌……然后把它甩在牌桌上。

牲品；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曾和同盟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在东、西战线；波兰人对战后前途充满了希望。

正如后来所示，那些期望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波兰共产党的“卢布林委员会”经苏联授权成立于1944年7月，这样苏联就可以在抵达华沙时就拥有一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政府来掌控大权。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没什么群众基础，只得到了当地、尤其是年轻人的些许支持，他们强调和苏联“友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范德国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土（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忧虑），可以实现民族交换政策，例如波兰可以清除剩余的乌克兰少数民族，而东欧各地的波兰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边界内重新定居下来。这些想法有助于处于民族边缘化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犹太裔的）获得机会，融入波兰民族甚至它的政治传统中去。

然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它的支持者们遭到了威胁，它的领导者们遭到了攻击，它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和抨击。在1947年1月，波兰的议会选举完全被操纵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农民党只得到10%的选票。^{〔2〕}9个月后，米科拉伊奇克为保性命，逃离了波兰。以后的几年里，战时的“内卫军”（Home Army）剩余力量仍以游击队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于事无补，毫无希望。

苏联对于波兰的政治斗争如此感兴趣，导致波兰人在战时——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幻想看来更加虚幻而不切实际。而匈牙利关于“走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信念倒并不完全是幻想。战后莫斯科对匈牙利的主要兴趣在于构建一条将来红军可以通向西方、进入奥地利（或者是后来意图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当地共产党人需要广泛支持，他们的苏联顾问们就会很乐意上演“民主”策略，并且乐此不疲。

但是事实证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达佩斯，共产党也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农党”

〔2〕这并不是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亲自监管波兰的重大选举：在1972年当地议会选举中，波兰人被要求选举那些肯定会分裂国家的人，外国军队驻守在当场，以威胁来确保选举结果。

(在匈牙利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农业党)尽管被看作是反动派甚至是法西斯党,却稳稳占据了1945年11月全国大选的绝对优势。后来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其领导人安娜·凯斯里拒不相信共产党会在选举上弄虚作假),共产党成功驱逐了议会里小农党的一些议员,并在1947年2月起诉他们阴谋造反,指控他们的领导人贝拉·科瓦茨是反对红军的间谍(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56年得以回国)。在1947年8月新一轮的选举中,虽然共产党人、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厚颜无耻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产党还是只保住了22%的选票,但是小农党却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和他的东欧邻国汇聚到了一起。在接下来的1949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了95.6%的选票。 137

回顾往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要实现东欧民主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中欧和东欧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民主或自由传统。在欧洲的这些地区,两次大战间歇时期的各国政府一直充斥着腐败、威权主义,甚至嗜好谋杀。旧的统治阶层充满腐朽气息。两次大战间歇时期的当权阶级极其官僚,正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人又将被招募为共产党国家的行政干部。借着“社会主义”的调子,从落后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向共产党的“大众民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而易举。因此,历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或匈牙利转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极大地削弱了反共产党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才对苏联的恐怖势力感到害怕。毕竟,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格劳斯在共产党日报《人道报》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苏联的保护难道不是既防止了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的民族独立吗?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丘吉尔注意到:“总有一天,德国人会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现在苏联自命为是罗马尼亚和波兰新边界的捍卫者,更不用说那些驱逐了德国人之后重新分配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其他土地了。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也表明了苏联红军势力的无所不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第37军系由1944年9月占领罗马尼亚的红军派遣,一直驻守在保加利亚,直到1947年《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止。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驻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后又再次驻守),在罗马尼亚驻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整40年的统治一直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苏联军队还经常在波兰境内通行自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并不想离开这片欧洲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也因此把它们的前途和苏联这一强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明显的例外。许多捷克人欢迎苏联人来做解放者。由于慕尼黑条约,他们对西方势力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依赖伦敦的爱德华·贝内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个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确表态的政府。1943年12月,贝内斯对莫洛

托夫如此解释他的处境：“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会在言行上都配合苏联政府代表。”虽然贝内斯不一定像他的导师、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那么警惕投入俄罗斯人或者说是苏联人怀抱的危险性，但他也不是一个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 1938 年前它寻求和巴黎关系亲近一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身处中欧、易受攻击的弱小国家，它需要保护者。

因此，虽然身处“东”欧国家，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最具有西欧特点——它在历史上就具备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战后则实行西方倾向的社会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一地区在 1945 年以后苏联的最亲密同盟，虽然由于苏联的土地“调整”使它丧失了最东部的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鲁塞尼亚。那也是贝内斯在东欧和东南欧众多的战时流亡政府总理中唯一得以班师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 年 4 月，他重组班子，联合了 7 名共产党人和其他 4 个党派的 11 位部长。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捷克共产党真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战争爆发前的 1935 年那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爱戴，获得了 84.9 万张选票（占总数的 10%）。他们并没有依靠红军，1945 年 11 月红军就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以外交机构的形式在布拉格还是保留了一些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1946 年 5 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在一种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满忧虑的气氛中举行了，共产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区赢得了 40.2% 的选票，在大部分农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区获得了 31% 的选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党表现更佳，它获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三分之一的民众的欢迎。〔3〕

捷克共产党预计能继续获胜，因而他们一开始就对马歇尔援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招募新人为未来投票做准备——党员人数从 1945 年 5 月的 5 万人左右上升到 1946 年 4 月的 122 万人，到 1948 年 1 月达到 131 万人（全国人口只有 1200 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党利用恩惠和压力等手段来确保选票的可能性。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门，并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预测到 1948 年的选举结果后，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通过“捷克式的道路”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东欧其他国家相当不同。

哥特瓦尔德确信不需要苏联帮助，就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胜，这一点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 1947 年秋，斯大林都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驱逐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这引起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赖苏联），战后，贝内斯政府把重点放在了经济规划、国有化和努力工作上，这使得

〔3〕捷克的农业党及其同伴——斯洛伐克的人民党——由于密谋推行纳粹政策而在战后被取缔。

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国记者将这种精神和苏联早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联想起来。早在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政府和独揽大权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栏里就一直张贴着斯大林的画像,把他的画像和贝内斯总统的画像挂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部长扬·马沙吕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总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4〕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布拉格政变唤醒了西欧社会党人对东欧政治生活现实的认识。1948年2月29日,年迈的莱昂·布吕姆在法国社会党报纸《大众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批评西欧社会党未能站出来对东欧同志们的遭遇大胆说话。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如果说斯大林在策动布拉格政变时未曾料想到这些后果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他老是通过苏联集团来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举足轻重。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同一时期的德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苏联的政策由原来的阻碍与反对迅速地转向了同她的前盟友之间的公开对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个时代的风格,转变了策略。这一转变,总的来说是表现了斯大林因无法如其所愿地控制欧洲和德国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南斯拉夫与日俱增的恼怒。

* * * * *

1947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地位很独特。和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力量上台执政,既没有依靠当地同盟,也没有借助外来支援。当然,英国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对契特尼游击队的资助, 140

〔4〕西方公众舆论同时也受1948年3月10日马萨利克之死的影响——据报道说他是从外交部大楼窗口“失足”而亡。关于他死亡的确切情况一直未作解释。

而转向支持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于南斯拉夫的金钱支助(4.15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72%的钱来自于美国。但对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抵抗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党派。

在胜利的鼓舞下,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走东欧其他被解放国家的那种联合政府之路,他们立刻消灭了所有的敌人。1945年11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者们明确无疑地面对着一选择:或者是铁托的“人民阵线”……或者是一只公然贴着“反对派”标记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引进了一套直接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铁托推行这套制度时变本加厉,他大肆逮捕、监禁和处死他的反对者,同时强制实行土地的集体化。而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还在小心翼翼地树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来南斯拉夫正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强硬边缘。

从表面上看来,南斯拉夫的激进主义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对苏联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还很热络。苏联毫不吝言对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的溢美之词,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将南斯拉夫树立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作为回报,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一切场合表达他们对苏联的敬重,他们自认为是把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进巴尔干半岛的典范。米洛万·德吉拉斯回忆说:“我们人人都在精神上倾向于苏联。要不是由于它那种傲慢大国式的忠诚标准,每个人都会继续忠于它。”

但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投入总是太过热情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斯大林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革命的兴趣更大:应该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党的战略,由莫斯科来决定何时采取稳健路线、何时采取激进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不应当只是一种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会效仿苏联,但他们想要跳出苏联的掌心,就会遭到批评。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铁托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他树立东南欧共产党标准的雄心方面,这位前游击队将军跑到了苏联战略的前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胜利:他正变得比国王还像国王。

斯大林虽然早在1945年1月就对“缺乏经验的”铁托很恼怒,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铁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还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树立为与苏联革命相抗争的模式,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不和随着地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开始显现上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开始孕育野心,其实这早就根植于巴尔干的历史中,想要吞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部分地区,将南斯拉夫扩大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邦”。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颇有吸引力——在索非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眼里,这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很有意义,并觉得这将进一步摆脱小国

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斯大林自己一开始也并不反对谈论巴尔干联邦。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心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号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还在公开谈论这一前景。但是抛开这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东南欧纳入共同联邦的诱人计划,还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斯大林对此早就心存怀疑,当地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共同合作的基础刚有眉目,马上就显现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区霸权。斯大林很可能马上会给铁托扣上一顶帽子,说他有野心。其二,显得非常严重的是,在西方,铁托正在给斯大林制造麻烦。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第二类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因此,铁托煽动和鼓励希腊的叛乱,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的帮助,希腊错综复杂的局面早就会自己得到和平解决〔5〕——而且铁托本人也会由于受到排斥,而进一步被踢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圈子。但是铁托不光在南巴尔干半岛上使斯大林尴尬,他同时也激起了英美两国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的利半岛,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国签订《意大利和约》的障碍:1947年9月《和约》最后签署时,的里雅斯特地区一直悬而未定,同盟国军队仍然驻防在该地区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紧邻的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铁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愿分得这一地区,但斯大林宁愿维持这一地区的未定现状(这样苏联就可以享有明显有利条件,得以在奥地利东部屯兵,当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驻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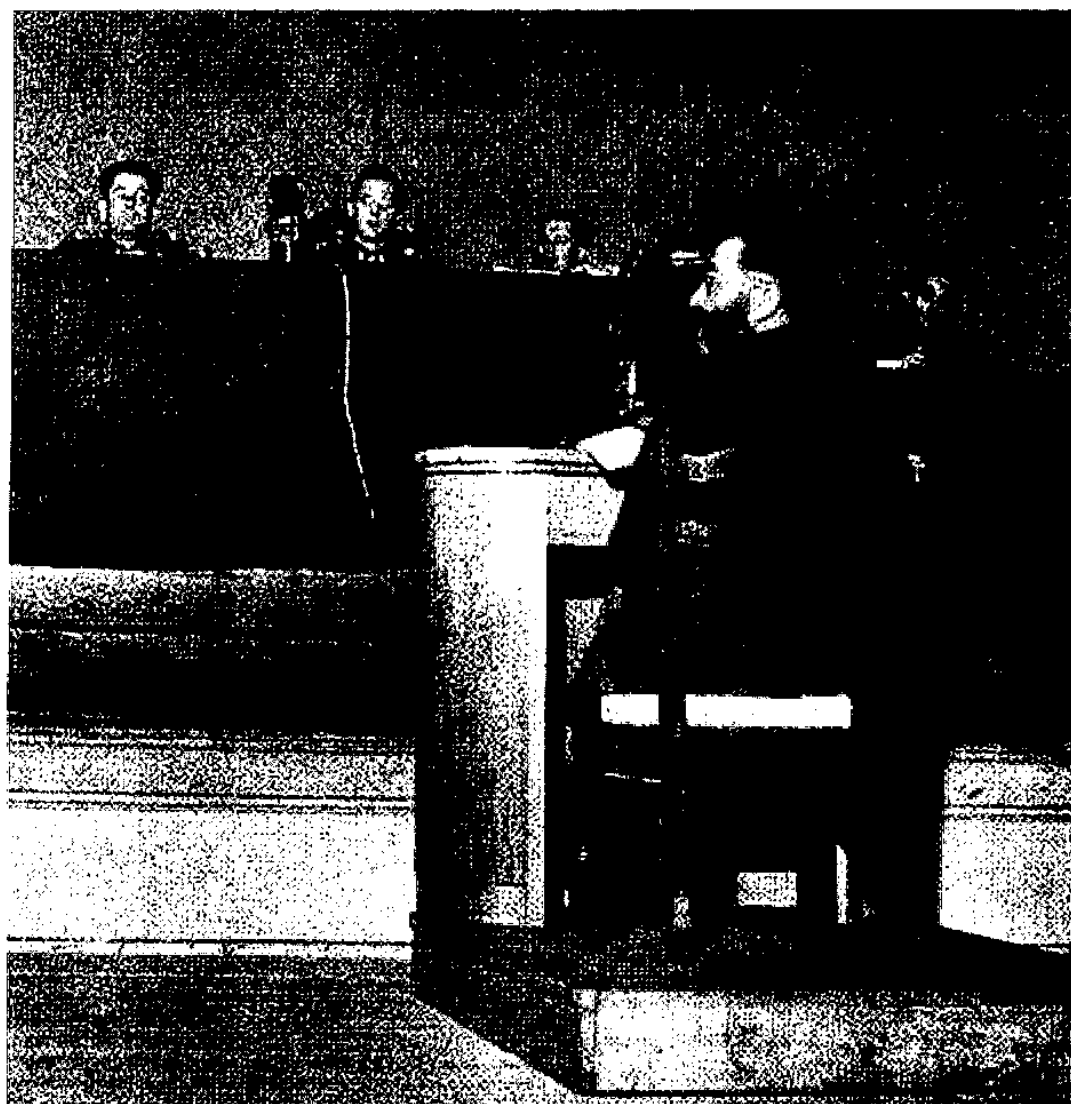
铁托将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主张和游击革命的狂热相结合,这越来越使斯大林觉得尴尬。根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史》所说,1945年5月之后,在西方军事圈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根本瞧不上意大利东北端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乐意看到意大利共产党被他们的共产党邻国不讨人喜欢的区域野心所为难。

〔5〕 铁托和斯大林决裂后,于1949年7月关闭了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陆地边界,导致希腊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几乎立即分崩离析。

1945年德国战败后不久，一个小男孩路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营外的乡间路边堆放着成百上千被关押者的尸体。和战后许多德国成年人一样，小男孩扭头不看。



1946年在基辅，德国士兵以战犯罪名被公开处以绞刑。对于战后实行的审判和处决，无论当时苏联的动机有多复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铁证如山。



1946年6月,南斯拉夫契特尼(民族主义)战时抵抗运动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军事法庭上。对共产党游击队来说,契特尼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和外国侵略者一样严重。战后,铁托对他们实行无情镇压。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8日被枪毙。



1944年8月,美军解放拉瓦尔镇的几小时后,一名法国妇女因被指控犯有与德国占领军“卧式合作”而被剪掉头发,当众游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成千上万名妇女因同样原因遭此羞辱。



1947年2月的严冬,伦敦妇女排长队等候购煤。燃料供应十分紧缺,大多数妇女不得不等候整天以获得每周的配额。那些婴儿手推车为运煤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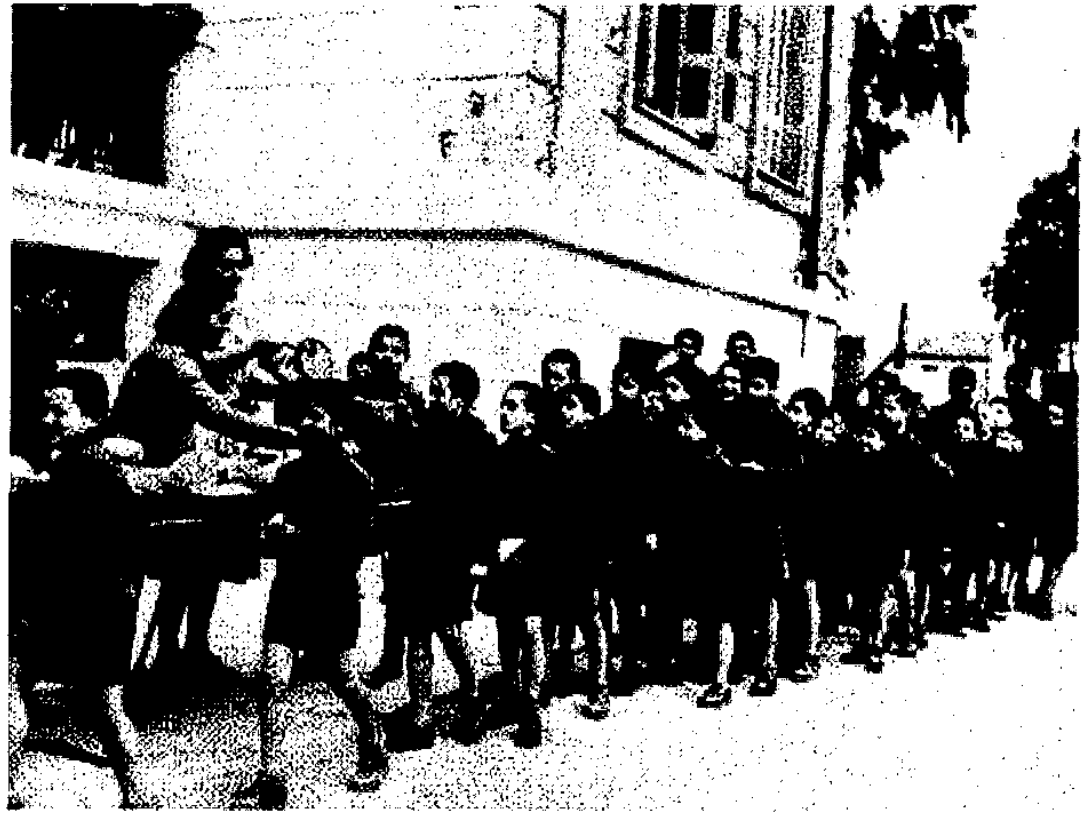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6日救济金首发日,一位母亲携带孩子们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领取家庭救济金。战后欧洲的福利机制促进了正式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马歇尔援助(1): 1949年2月3日,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首批食糖从加勒比海地区运抵伦敦码头。工党的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左)、马歇尔计划代表埃尔默·霍尔姆格林(中)到场迎接。

马歇尔援助(2): 1949年圣诞节的雅典: 希腊孤儿们领取用“马歇尔计划面粉”制作的面包。即便在贫困的希腊,马歇尔计划振奋人心的作用和物质捐助一样,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



马歇尔援助(3): “世界人民不想再受战争之苦。”——约·斯大林(和鸡蛋一起递送的步枪上裹着的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请注意:苏联在西方的支持者们正在一面法文旗帜下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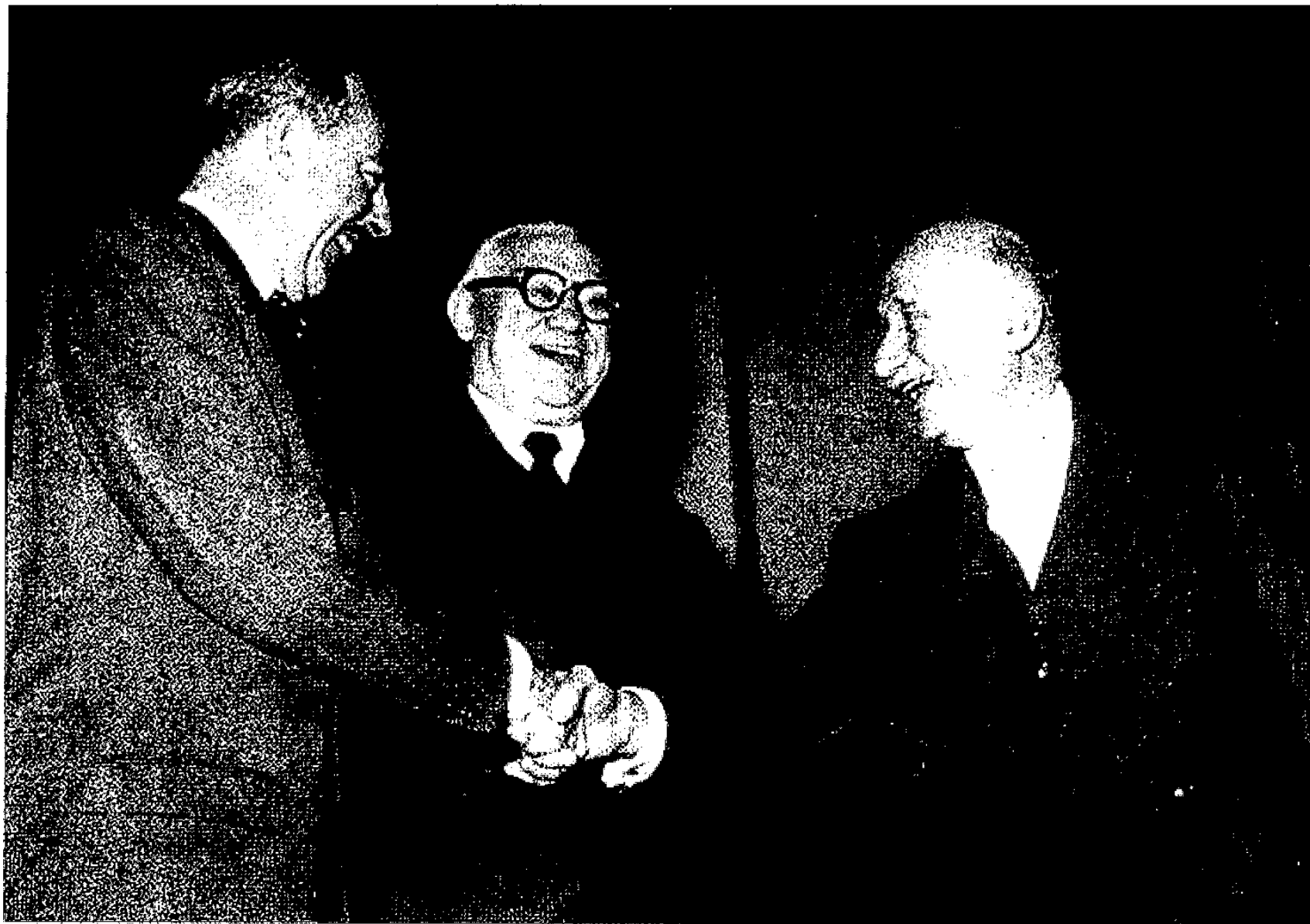
1948年2月25日，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的文切斯拉斯广场集会，倾听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成立新政府。请注意观众的不同表情流露——共产党政变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而是受到了欢迎。



1948年7月，铁托的画像装点布拉格的一座大楼外墙。1948年春，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是恼恨铁托不听话：他搞个人崇拜，并且越来越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独裁权威的挑战。

1948年6月，一架美国飞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着陆。对柏林长达11个月的封锁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失误：它驱散了德国人的中立幻想，促使西方联盟进驻柏林，加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





出席成立大会。从左至右：迪恩·艾奇逊，美国国务卿，“遏制”政策的主要幕后人；厄内斯特·贝文，战后英国外交大臣，首倡建立大西洋联盟者；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建议成立欧洲煤和钢铁共同体。



“约瑟夫大叔”在莫斯科的一个接待站，1949年。“（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头们——不讲原则，不讲方法，言词朴实——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然而只有当他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相信他。”——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1953年6月17日的东德动乱,首次标志着在苏联集团内部,人们可能会“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布莱希特荒唐地提出)“感动大众,另选一个”的建议还未一试,就已落空。



1949年9月23日,拉兹洛·拉吉克(中)在受审判的最后一天。身为内政部长,拉吉克对许多无辜者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他本人的审判和处决使他成为后几代人眼中的烈士。

大约在1952年,苏联的古拉格岛上的劳改犯。那一年是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达到第二个巅峰期的年头,170万犯人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另有80万人在移居地服劳役,275.3万人遭到“特别安置”。“一般的”苦刑期长达25年。





1954年6月23日,让-保尔·萨特在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欣赏善本图书。这些年里萨特对共产主义的沉迷主要来自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反美主义),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玷污了他的国际声誉,并有损其战后光彩。



1952年雷蒙·阿隆(左)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在没有自由的年代,阿隆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政见往往不被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在政治上没有善恶之选,只有好恶之争。”

由于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对南斯拉夫的恼怒就激化了。虽然保加利亚首都火车站上贴满了铁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诟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治国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会议上,奴颜婢膝、满腔忠诚的拉科西还向斯大林汇报了铁托对他的私人的赞扬之辞,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满意。铁托已经不仅仅是给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外交尴尬,他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惹麻烦。

在外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成形于苏联,并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挥。但在斯大林眼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从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除了在中国以外,莫斯科确实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然而在战争期间,它失去了这种控制权——以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为标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在欧洲,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苏联扶植就上台执政的党派,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虽然表示继续对莫斯科效忠,却是一天一天靠自己逐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建议和指令。这些共产党领导人143 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不知情。就像捷克共产党,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指导更少,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国或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联合执政方式,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党内目标时,并不觉得那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变了。1947年5月,担任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人被逐出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寄希望于他领导的共产党能重新加入联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施特拉斯堡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还称那些提倡反对派全部出局的人为“冒险家”。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很显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在日丹诺夫发信给多列士的几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东欧邻国及其卫星国签订了商务协议,以此作为一致对抗马歇尔计划的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打击在该地区的对苏联影响力的威胁。布拉格、巴黎、罗马

所追求的、并且此时被斯大林默认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诺夫所宣布的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所代替,转而退向对抗战略。

为了执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兰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会议。除苏联外,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建立“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接替共产国际负责“协调”国际间共产党的活动,加强莫斯科和它的各卫星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但这次会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实际上只开过3次会,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标是重新建立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吉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144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都迅速转向对抗战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各种活动——在东欧还上升到夺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开会,宣告正式开始针对他们先前的同盟者社会党的诋毁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向稍微晚了点,但在194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也采用了“新路线”,它的焦点是“为和平而战”。结果西欧共产党遭遇了重重灾难——他们被推到了国内事务的边缘。在意大利,损失更重。由于梵蒂冈和美国大使馆站在反共这一方,大肆干预,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遭到失败。^[6]但是没有关系。在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理论中,西方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只是处于次要的、搞破坏者的地位。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论在当时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绊脚石,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财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树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表现出的纡尊降贵的姿态,令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

[6] 在1948年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所得选票确实有所上升,但却是以牺牲社会党为代价,后者损失惨重。得胜的基督民主党以超过400万张的选票大胜左翼联合阵营。

耿耿于怀：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各地共产党无不拍手称快，谴责“铁托党的叛变”，无需苏联的任何鼓励，他们就大肆辱骂和嘲讽那些失宠的巴尔干同志们。

其实，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裂痕最早公开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谴责巴尔干联邦这一想法引起，苏联由此取消了贸易谈判，接着又在下一个月召回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顾问和民事顾问。虽然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沟通和指责，双方都宣称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可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有被制服。但当时他和他的国家实际上比表象看起来还要弱。若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铁托很有可能难以逃脱苏联对他的经济制裁和苏联干预所构成的颇有实效性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贸易都是和苏联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年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对它的攻击步步紧逼。在善于使用修饰词的列宁式的辱骂语汇里，铁托成了“犹太铁托及其煽动者”、“泛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新沙皇”。他的追随者们被骂为“无耻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战争与死亡营里的害人的先驱，阴险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孝子贤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贬为“一帮间谍、煽动者和刽子手”、“一群啃着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的资本而吠叫、受美国牵制的狗”。

铁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击时，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巅峰状态的那几年。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清洗和公开审判，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确实看出了铁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害怕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共产党或他们的政权产生腐蚀作用。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坚持强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正在面对危险，并且提醒人们，这些正是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须强调要对苏联和斯大林效忠，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或“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义的第二轮冰河时代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不辞辛劳地想在东欧渗入或再次渗入他的权力的话，那他将要付出相当

代价,因为他正在失去在德国获得的先机。〔7〕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国在伦敦开会,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计划。6月18日宣布发行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三天后就开始流通(这些纸币是在美国秘密印制后,再由美国军队护送运回法兰克福)。同时开始回收旧的帝国马克,允许居民按1:1的比率兑换手里40%的旧马克,其余的旧币换新币则要按10:1的比率兑换。虽然新货币一开始不受欢迎(因为导致了储蓄受损、物价上涨,这让许多居民无法购买东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商店里摆满了货物,农民和商人愿意按照一种可靠的兑换率,以固定价格售货。 146

6月23日,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也发行了新货币——东德马克,并切断了连接柏林和西德的铁路线(三周后又关闭了运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军事政府阻止了苏联向西柏林输送东德新货币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柏林城是处在四国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从此就一直没有被落入苏联控制的东德范围。随着苏联军队对进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加强,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利用空运为它们自己的占领区保障供给。6月26日,第一架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的滕珀尔霍夫空军基地。

对柏林的空运一直延续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共空运了约230万吨食物,一共起飞了27.75万架次飞机,牺牲了73名盟军飞行员。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弃该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无任何文字保证西方同盟国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计划。这正是斯大林的真实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来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西方盟国不仅继续紧紧抓住柏林不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而西柏林人在无限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接着是布拉格政变,反而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继续实施他们关于西德的计划,他们使得分别设立德国的设想越来越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认同。1949年4月,法国加入了“双占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西德经济体,拥有4900万居民(而苏占区只有1700万人口)。

和斯大林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一样,封锁柏林也只是一项临时决定,而根本没有经过如何进逼的深思熟虑(虽然当时西方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无可指摘)。斯大林并不想为了柏林而发动战争。〔8〕相应地,由于封锁失败,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开表示要解除封锁,以换取延缓建立西德的计划。西方盟国根本就无意让步,但同意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因此5月12日,苏联取消了封锁政策,但仅仅换来了一次

〔7〕 1948年3月18日苏联召回了驻南斯拉夫的顾问。绝非巧合的是,48小时后,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退出了正在德国召开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会场。

〔8〕 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不会有什么实际障碍。1948年春,苏联在柏林附近拥有300个师的兵力。美国在全欧洲只有6万名士兵,其中,驻柏林的美军还不到7000名。

定于5月23日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

147 这次会议如期召开并延续了一个月,但如前所料,却并未达成任何共同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恰恰是在西德议会刚在波恩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基本法》之后;一周后,作为回应,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东德政府的计划,正式成立时间是10月7日。^[9]6月20日,会议中断了,西德的军政府转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虽然西方盟国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并在必要时可以恢复直接行使权力,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紧随着基督民主党在8月份大选中的胜利,康拉德·阿登纳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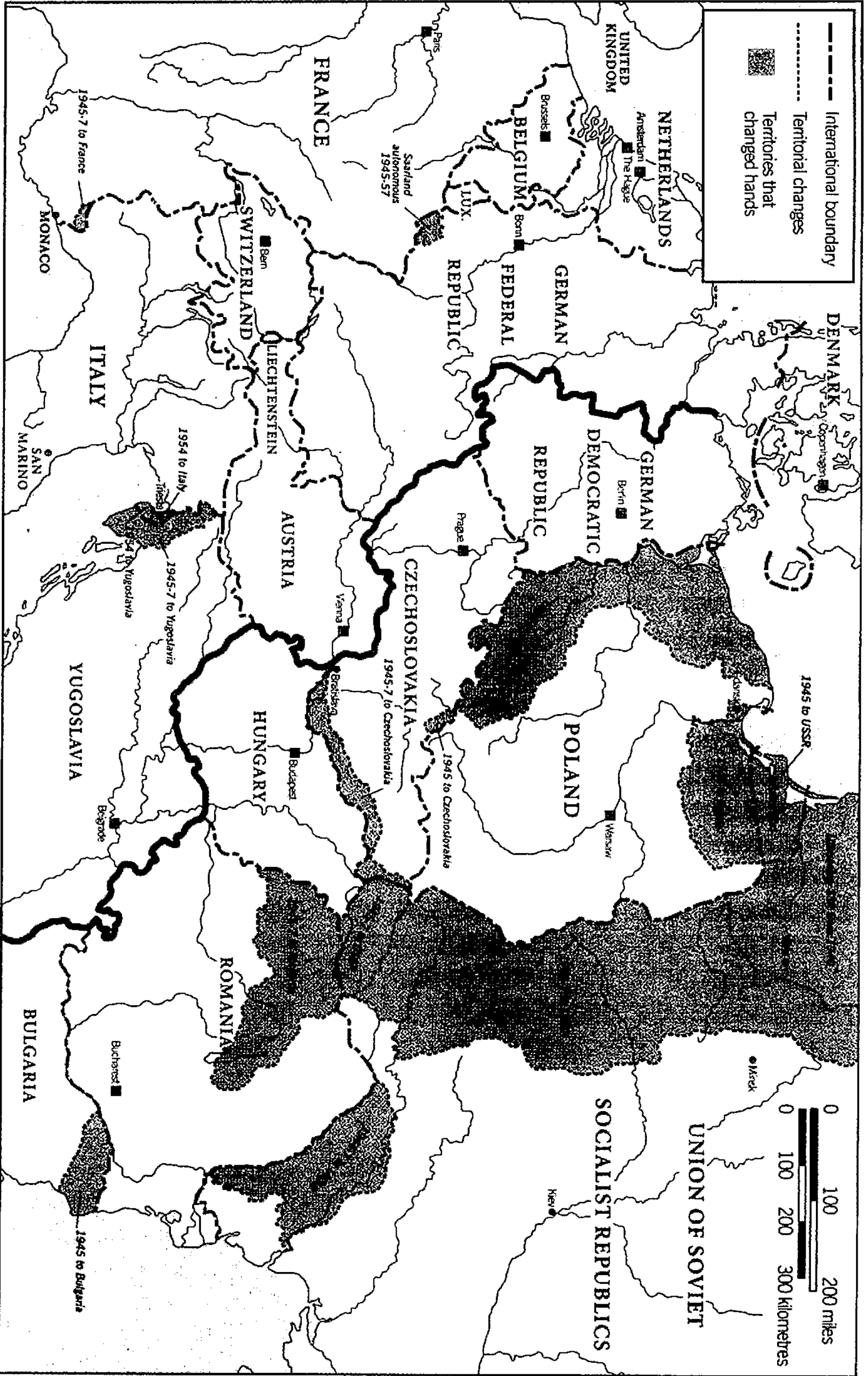
柏林危机导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结果。第一,它直接导致成立了两个德国,4年前没有一个同盟国会料到是这一结局。对西方各大国来说,这成了一项吸引人而又很现实的目标;实际上,鉴于德国统一后可能产生的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人会急吼吼地盼望它发生。正如9年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答复夏尔·戴高乐总统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有何想法时所说的:“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一贯支持重新统一。那样说,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对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认识到既无法在德国人的效忠问题上和西方同盟国竞争,又没法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东德共产党国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柏林危机使美国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欧洲展示了它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的成就——正是贝文成功地敦促美国对柏林的空投。当时杜鲁门被马歇尔和克雷将军(美军驻柏林司令官)说动了,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法国是所有卷入柏林危机的国家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因为从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间,它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民议会中各党派的统治优势均不明显。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柏林危机直接使西方的军事预算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西方想保护德国不受苏联侵犯,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有一定实力才行。柏林危机刚出现时,美国曾经在英国部署了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群,当时美国拥有56颗原子弹。但华盛顿政府对如何使用这些原子弹并没有明确政策(杜鲁门本人尤其不愿意使用它们),而且万一苏联领先的话,美国在欧洲战略上仍然考虑从欧洲大陆撤兵。

149 军事上的重新考虑是由捷克的政变引起的。捷克政变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高度危险期,关于战争的议论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克雷将军都感受到了这种到处蔓延的恐惧:“几个月来,根据逻辑分析,我原以为并且认定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9] 《基本法》故意拟定为临时性的——“在转型期内规范政治生活新秩序”,意即将实行到国家再统一时止。



但最近几周里,我感觉到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一时之间无法描述,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剧烈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立法,欧洲各盟国之间也于1948年3月17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捆绑在一起达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因为当时欧洲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了无法面对苏联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以前一样易受侵略: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德克·斯迪克在回忆时说的,“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只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而已。”

英国首先向华盛顿提出新的方法。在1948年1月22日的议会发言中,贝文提出让英国和她的大陆邻国之间组成共同防御战略,成立一个“西欧联盟”,这样一来,英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再脱离欧洲大陆国家了——这与英国原来的思路大相径庭,意义重大。这一西欧联盟根据《布鲁塞尔条约》正式宣告成立,但贝文在3月11日给马歇尔的口信中解释说:只有把安全范围扩大到将北大西洋作为整体统一考虑,这样的组织才会确有实效——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深表同意,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对挪威大力施压,要求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贝文的敦促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卫条约。1948年7月6日,也就是开始柏林空运后的第十天,正值南斯拉夫刚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这些会谈内容对其他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作了公开。其中,法国又一次对英美背着他们私下里安排世界局势非常不满。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都签名加入了该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还鲜有人预测到美国国会加入欧洲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情愿认同《公约》的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一成员国遭袭击时,其他成员国须提供援助)。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有关大西洋的公约,而非欧美之间的联盟,因此经过长达3个月的讨论后,这一公约仅得到了国会层面的通过。事实上,迪恩·艾奇逊在参议院代表政府发表意见时,小心翼翼地坚持认为,美国实质上不会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正是美国的意图。如果说美国现在已经第一次卷入欧洲联盟的话,那也是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认识和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一样:它有助于欧洲人对自己感觉好一些,并能料理自己的事务——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自我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军事平衡:在驻扎西欧的14个师里,美国只有两个师。西方盟国仍以12:2的优势遥遥领先。1949年,美国三军参谋长预测,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莱茵河地区的有效防卫体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

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但在欧洲人眼里,情况完全两样。美国人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但欧洲人却认为“比起以前只是纸上承诺的一鳞半爪,这次确实更重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同事如是说。或许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话好说。至少,英国还是一个岛国。但法国却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堪一击:既抵抗不了原来的德国人,又抵抗不了现在的苏联人。

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举双手欢迎:这将有助于把抵抗苏联的防御线比目前更进一步向东推进——正如夏尔·波伦早在《公约》签订前的好几个月里就说过的,“[法国人]的微薄信心只在于一个事实,即不管美国军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毕竟挡在了法国和红军中间”。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在防止德国的复仇方面增强了安全感。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保护,使内心深处还牢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法国也同意西德建立国家。

法国因此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出承诺,保护它不受德国复苏之害,这是它在前三年里一直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荷兰和比利时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看到了对未来德国复仇主义的阻碍。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获得对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从而抵制共产党的批评。英国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的《公约》看成是把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而杜鲁门政府则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宣称,这是为了建立起防止苏联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英国后来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 151
否则它将毫无意义。他们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公约》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和马歇尔计划(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布鲁塞尔条约》)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了战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一种分享信息并在国防、安全、贸易和货币制度及其他许多领域里合作的意愿。毕竟,要在和平时期实现一个完全联盟化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是闻所未闻而脱离实际的。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

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国人和西欧人立刻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朝鲜的事情要么能扭转局面,要么就是一个序幕,下一步可能就会是德国了——这种推论又由于乌布利希的话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不负责任地吹嘘说,接下来联邦德国就要垮台了。8个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导致美国军事专家夸大事实地认为苏联正在准备战争;但即便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通过第68号文件(提交于1950年4月7日)关于增加预算的请求,只是同意对朝鲜宣战。

关于欧洲战争要爆发的危险被极度地夸大了,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大林正在考虑有可能的话进攻南斯拉夫,而非西德——但由于面对西方的军备重整而放弃了这一打算。和西方国家误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目的——他的情报部门准确提供了美国军事装备迅速升级的信息——也错误估计了美国,以为他们对他的东欧地盘有进攻计划。但当时对这些假设和错误估计并不清楚,所以政客们和将军们只好尽可能地依赖有限的情报和先例来作出判断。

152 西欧的军事重整确实规模较大。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亿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国国防开支已经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占4.7%。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美国盟友们响应华盛顿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自从1946年稳步削减以来,到了1951—1952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长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的重整军备时期还要快。法国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防开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上升到了战后最高峰。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地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西德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西德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于军队装备、武器储备、军事安置和部队供给,西德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短短一年内就下降了65%。都灵的非亚特集团拿到了美国的第一批合同,生产支持地面部队的喷气式飞机(出于政治原因,这批合同由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出面敦促华盛顿政府而得以完成)。

但是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英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福利等公共事业的开支来弥补国防需求,这一选择使得执政的工党内部分裂,导致它在1951年大选中的失败。在西欧,由于政府部门开支过大激发了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法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消费品物价上涨了40%。刚刚开始享受到马歇尔援助而获益的西欧人,肯定不愿意长期支持战争经济。1951年美国颁布的《共同安全法》认识到了这一点,它立即废除了马歇尔计划,而开始转向军事援助计划。到1951年末,美国总计向西欧提供军事援助近50亿美元。

为了从心理上提高欧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充当了军事援助的角色,凭借看起来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国经济资源,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欧洲,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盟军司令部和行政机构。此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含糊地成了一个联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军事策划者们所说的“继续捍卫”欧洲安全:也就是说,在德国中部同苏联红军对峙。为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在此后的两年内,至少要新编96个师的兵力。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西德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西德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滋长中立情绪。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西德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欧洲联盟,这一概念并不新颖。19世纪时,曾在中欧和西欧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联盟,它们当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还偶尔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讨论,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各不同地区的统一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加强了这种想法,而不是消弭这种乐观的展望。正如法国国务活动家、欧洲条约及其蓝图的积极规划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坚持认为的:克服宿怨、想欧洲人所想、说欧洲人所说、感欧洲人所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1924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勒·纪德联合欧洲其他签约者,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3年后,英国外交次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令他“大吃一惊”。

老实说,令人奇怪的是,大战反而使得法国和德国相互间更加依赖。随着战后分裂的瓦解,巴黎放弃了强制德国赔偿的无偿努力,在1926年9月,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区(当时仍是自治区)签署了国际《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防止生产能力154 过度。虽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钢铁条约》,但它只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卡特尔。但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当然从中看到了未来跨国联动的雏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钢铁条约》也没能躲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作为其结果的大萧条。但它进一步证实了1919年法国钢铁大王们所看到的事实:法国的钢铁业,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区的回归而规模翻了一番,现在却得完全依赖从德国进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寻求长期合作的基础。这一状况在德国人眼里也很明显,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和贝当就支付和运输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很少有人料到,当时德国以战争形式迫使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的这一法德“合作”体制,会成为新的“欧洲”经济秩序的萌芽。

因此,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后被“自由法兰西”组织处死的皮埃尔·普谢构想出一个战后欧洲秩序,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整个大陆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普谢的想法得到了埃尔伯特·斯皮尔等人的认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种拿破仑式的大陆体制的升级,从而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大陆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曾经历过1930年代制定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困苦。

真正使得这些计划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以共享泛欧洲利益的形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某一国家的私利考虑。他们是“欧洲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绝望中认为可以从纳粹统治下获得好处的国家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纳粹们也显然对欧洲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综合处理——拆除边界、没收财产、整合交通网络,等等——使得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欧洲从它的过去和敌意中解放出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击败纳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乔治·凯南对迪恩·艾奇逊坦白说,他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德国在西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所产生的忧虑,“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错误的,原

因只在于那是希特勒个人的。”

凯南只是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公开场合,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对战时的“新秩序”说一句好话,凯南完全低估了它所产生的低效率和不诚信。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当然还在继续——比如,和1943年一样,战后的让·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荣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形成……一个‘欧洲实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许多热心“欧洲统一运动”的人们在丘吉尔的怂恿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 155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早期很有影响力的倡导某种形式的欧洲合并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安东尼·艾登:“我必须承认,我的主要考虑都放在欧洲方面,在恢复欧洲的荣耀上……如果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使得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都蒙暗的话,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国家会在‘欧洲委员会’的名义下,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起来。”但战后的政治环境对实现这样的理想来说并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欧洲对话的论坛,这一建议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运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由这一建议而产生的“欧洲委员会”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并于当年8月召开首次会议,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在他们北面的几个小邻国却行动积极。早在大战结束前,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就签署了《比荷卢协定》,取消关税壁垒,寻求三国之间劳力、资本和服务的最终自由流动。1948年1月1日实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接着又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法国、意大利之间进行了多次漫谈,商讨扩大合作范围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些“小欧洲”制定了一半的计划一碰到德国问题就被搁浅了。

1947年7月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谈判结束时,人人都同意“德国经济应当纳入欧洲经济整体,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总体生活水平。”问题是如何纳入呢?西德即使在1949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了马歇尔计划要求提供的机械生产和被盟军占领外——而这两点也都是临时性的——大多数西欧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荷兰一直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1939年以前,荷兰48%的“看不见的”收入都来自德国通过荷兰港口和水路的贸易——德国的经济 156

复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兰人对德国人态度“友善”,荷兰希望经济复苏后的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处于弱势,这对荷兰很重要。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时人赞同。除非德国势力受到大不列颠的介入而实行抗衡,否则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和德国合作。

1948—1949年的国际事件打开了这一死结。随着布拉格政变、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柏林遭封锁、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乔治·比铎和罗贝尔·舒曼等法国国务活动家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德路线。应当成立一个把鲁尔和莱茵地区包括在内的西德政治实体——只是把弱小的萨尔区暂时排斥在德国主体之外了,因为萨尔区出产的煤不适合炼焦炭。如何才能使得这一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资源既能纳入、又能促进法国的利益呢?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西德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西德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第三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一个联合的高管机构管理,这一机构具备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允许他们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议远远不止是一个钢和煤的卡特尔,它已差不多是欧洲一体化的蓝图,代表了一种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问题从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扰着法国。在舒曼的计划中,高管机构有权鼓励竞争、制定价格政策、引导投资、代表成员国操作买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从纯粹的德国土地上掌控鲁尔和德国的其他重要资源。它以欧洲方式解决了一个——这一个——法国问题。

罗贝尔·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这一“计划”,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逊。英国事先并不知情。法国外交部对此满心喜悦:这是首次对英美抛开巴黎制定决策的小小报复之一。这些决策中最近发生的一件是:就在8个月前,英国单方面将英镑贬值30%,事先只预告了美国,而使得欧洲国家被迫跟进。^[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重新开始的经济私利和欧洲各国之间缺少沟通带来的风险,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10] 法国财政部长昂利·居叶对美国驻法大使抱怨说,英国人“完全背信弃义”。

德国政府立即对莫奈的计划表示欢迎,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康拉德·阿登纳高兴地对舒曼说:“法国政府的这一计划考虑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于瘫痪,现在的计划对建设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动。”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对助手们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和其他独立国家平起平坐——并且,如阿登纳所愿,从现在起就和西方联盟绑在一起。

德国人最先认可舒曼计划。接着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荷兰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英国而加入。但英国拒绝了舒曼计划的邀请,而英国若不加入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加入就成了问题。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签订《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只有6个西欧国家签署。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对当时颇受关注的这一共同体的前途作一评论。1951年在条约上签字的所有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主要成员国的三位主要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纳,罗贝尔·舒曼——均来自于他们国家的边缘地区:德·加斯佩利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特兰提诺,阿登纳来自莱茵区,舒曼来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特兰提诺属于奥匈帝国,他本人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舒曼成长的洛林区曾并入日耳曼帝国。和阿登纳一样,他在年轻时加入了天主教社团——事实上10年前莱茵地区的人们仍还属于这些同样的社群。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个人都用德语交谈,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对于他们三人,同样地对于来自讲双语的卢森堡的同事、来自双语和二元文化并存的比利时的同事、还有荷兰人来说,欧洲合作计划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对克服文明危机做出了一大贡献,这种危机在他们青年时代曾将欧洲世界搞得摇摇欲坠。由于均来自本国的边缘区域,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国界也一直在变换,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们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权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直到此时才发现,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他们的主权就遭到了轻视和践踏,他们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主权好丢失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社会团结和集体责任,这使他们对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国“高管机构”来行使权力这一理念感觉贴心。 158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了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

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经济杠杆,因为高管机构从未真正行使过莫奈所设想的权力。相反,和那几年里的其他许许多多国际机构改革一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在心理空间上为欧洲的发展提供恢复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纳在10年后对麦克米伦解释时所言,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组织(因而,在他眼里,英国置身事外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尽管这是莫奈的梦想,但它在签署的时候却是体现了西欧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这是一辆在经济伪装下的政治大车,一项克服法德之间敌意的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出的那些问题开始得到了自我解决。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长。1949年西德和欧洲的贸易平衡基于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后,即1950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因为德国国内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来促进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51年又出现了贸易顺差,并在后来保持了好多年,这得感谢德国成批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951年末,德国的出口水平增长达到了1948年的6倍,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实际上,到了1950年代末,西欧已经饱受煤供应过剩之苦。

159 在这当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起了多大作用,这有点令人怀疑——使得德国工业机器高速运转的是朝鲜,而非舒曼。但是说到底,这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比它所宣称的作用小——如果说法国组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他们继续怀疑的德国,如果说欧洲经济繁荣和高管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不大,而它们对竞争、就业和价格的影响甚微——那么,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加入呢?为什么它既然很重视,却又离得远远的?

英国并不反对建立欧洲关税同盟——至少他们很赞成让其他各国的欧洲人建立这种形式。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机构这一组织要被赋予超国家的执行权,哪怕只是指导产品生产和两种商品间的价格而已。伦敦政府对此早有体会——1948年,贝文和工党内阁商讨美国提出的在将来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他主要考虑的是“各国代表团必须拥有有效控制权……以防秘书长(或‘独立的’主席)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各成员国必须服从组织下达的指示,这应该不成问题。”

英国不愿交出任何国家权力,这与莫奈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明显地格格不入。英国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大陆想楔入英国事务的苗头,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险性。贝文对艾奇逊解释英国拒绝加入的理由时说:“这样重大的事情,风险也大,我们可不能盲目赞同。我确信换了美国处在这样的境况,也会这样考虑的。”或者,他用丰富多

彩的语言跟他的助手们如此解释对欧洲委员会的担忧：“如果你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会跳出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来。”

英国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涉及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方面——看起来比它的欧洲大陆邻国健康多了。1947年英国出口总值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当时西欧各国的贸易主要在其内部进行，而英国则在全世界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到了1950年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1913年的还要少很多。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160

还有英联邦国家。1950年，英联邦范围扩大到了非洲、南亚和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大多数仍然掌控在英国手里。从马来半岛到黄金海岸（加纳）的殖民地是摇钱树，提供了大量金钱以维持伦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镑平衡”。英联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英联邦（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称其为帝国）都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或者说在当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让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体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从现存状态的其他发展方向中剥离开来，这明显太过无耻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特殊优越感，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在帝国巅峰时期被驱逐到了美国。〔11〕

〔11〕 英国战后向美国借款谈判期间，盛传的一首匿名小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心态：在华盛顿，哈里法克斯老爷/窃窃私语，对着凯恩斯老爷：“他们确实抓着钱袋/只有我们才有脑袋。”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
161 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12〕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遭灾、忍受并最终战胜苦难的无言的骄傲感,使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同时也塑造了战后英国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在其历史上首次以明显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并且,如前所述,通过大范围的国有化进程和社会改革,在宪法里明确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福利国家。政府的大多数改革受到了欢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和喜好上改进极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 B. 普里斯特利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君主国,这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战后英国的国内政策主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和必要的机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以前各届政府逐步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围绕着急需解决的公共事业开支再度展开辩论——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养老金,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人们为国家近年来所作牺牲的最好补偿,但它也表明英国大多数选民(还有许多英国议员)对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及为赢得对德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1945年的英国濒临破产边缘。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动员兵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1945年,在2150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000万名男女在编或服役,差点就耗尽了国家的有限资源。温斯顿·丘吉尔又竭尽所能,向美国借债,并拍卖英国的海外资产,以维持货币和物资流通。战时的财政大臣曾说,这些年眼看着“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倍,它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

这引起了战后英国周期性的货币危机,因为必须努力偿付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债务,而国内收入又在锐减。那也是马歇尔计划在英国未对工业投资和现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对等资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来偿还国家巨债了。换作任何一个欧
162 洲其他的中等国家,处在战后英国这种困境下,都将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由于英国

〔12〕 可以理解德国人不会这么认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对英国球迷唱的小调里和英国小报标题把他们称为“德国兵”、“德国泡菜”深感困惑。

还负有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责任,因而问题就更显严重了。

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为维持大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就在剧烈上升中。1934—1938年间,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开支是每年600万英镑。而在1947年,仅军费开支一项,政府预算就达2.09亿英镑。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各国相应地提高国防开支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就布满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舰队,同时还在“支那基地”拥有常驻军。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拥有常备的120支皇家空军中队,在香港、马来半岛、波斯湾、北非、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西德和英国国内,都拥有部队或供养着部分常驻军。此外,英国的巨资还耗费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领事和情报机构以及殖民地的公务开支上,这本身就是一付官僚、行政的重担,尽管新近印度的独立已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英国唯一的解困办法是自我节制,面对这前所未有的自愿拮据生活——这种贫穷催生了这些年来广为赞誉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胜不败的大不列颠看起来比整个欧洲以往任何战败的、被侵略或掠夺过的国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阴沉而又坚定。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编辑兼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本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半空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碜……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闲逛度日,百无聊赖。

这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为了增加出口(由此获得大量外汇收入),几乎所有的东西要么按配给供应,要么根本就买不到:肉、糖、衣服、汽车、汽油、出国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时,连面包也实行了配给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这在战争期间都未发生过。1949年11月5日,英国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庆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不得不重新实施许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紧了腰带,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英国战后的街景倒是让苏联集团

各国的人民比较熟悉——一位英国主妇回忆说,那些年里,“买什么都要排队,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卖什么……你就加入了排队队伍,因为你知道那里肯定是有东西在卖。”

事实证明,英国人虽然被剥夺了权利,但他们特别能忍耐——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至少,这对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公平——虽然对配给和管制的恼怒在加剧,一些工党的大臣们产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长制情绪(主要是财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这导致了1950年代保守党在大选中重新上台。这种“别无选择,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态度,使得英国战后那一代人变得“谨慎、谦逊,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生活时这样描述,这和他们后来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实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矿区退休的工会领导人山姆·华生在回忆1950年的工党年会时说:“消除了贫穷,解决了温饱,病有所护,老有所养。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在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英国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但也是一个福利社会,我们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会”。作为战后立法的结果,对收入和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对国有财富的占有率从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业的做法与战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来,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乐观前景。1946—1948年,15万英国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随其后。但从1951年开始,似乎这种紧缩的年代快要结束了,国家正在乐观地筹备“不列颠的节日”庆典,纪念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胜利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的前身)100周年。

这些感想在亨弗雷·詹宁斯1951年拍摄的英国纪录片《家庭写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片名本身也揭示了这一国家的显著特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记录片制片人根本不会想到起这样的名字。这部片子是对英国特性的礼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近年的战争中重拾的苦难与辉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弥漫着的一种淡淡的孤芳自赏的骄傲。该片主要侧重科技与进步、构想与工作,并不涉及英国的邻国和盟友。它所展现的1951年的英国和1940年的英国实际上如出一辙:形单影只。

164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这还不算是最后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国(以及在英国人看来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势力的加盟,西欧这个“小欧洲”最后错误地落到了法国手里。法国人确实承担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英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起“欧洲”自己的形象,并最终仿照法国惯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机构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未能加盟深表遗憾,但英国却不觉得遗憾。欧洲许多政要都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英国能够加盟。比利时的欧洲政治家保尔-昂利·斯帕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道义上的领袖地位——是你们的,只要你们开口。”莫奈后来回顾旧事时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国的权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战时,如果她选择加入的话,那么情况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10年之后,英国确实会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战后的欧洲,10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届时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

第6章

卷入漩涡

165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因此有必要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我在集中营里碰到许多人,他们总想把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对斯大林的宗教狂热式的崇拜联系起来。

——伊芙吉尼亚·金斯堡《漩涡之旅》

斯大林主义就是要消灭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实真相,无论诡辩家们怎么说,不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如何撒谎。必须消灭人的本性,才能将共产党的戒律根植于灵魂深处。

——亚历山大·瓦特

他们先把人绞死,然后再审判他。

——莫里哀《浦尔叟雅克先生》

1945年后,在西方观察家眼里,苏联咄咄逼人。红军徒步行军,将武器和供给抛在牲口拉的大车上;禁止士兵请假,稍一犹豫,就毫不留情: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7 593人因“懦弱”而被处决。稍作休整后,苏联就胜过和击败了纳粹巨人,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军事力量以重重一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见证了布尔什维克取得的成就,这对它的敌友都一样。斯大林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战前的行为大多被遗忘了。成功就是胜利的法宝,斯大林深谙此道。 166

但是,苏联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胜利者中——其实在所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无论胜负——苏联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经济灾难的国家。可估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惊人,此后几十年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捷克共产党员、1950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回忆说,当时的首都陷入了“贫穷和落后的困境……成了一座木头房子的大村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情况更糟糕。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道路、桥梁和铁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坏。1950年代初期的粮食产量还不到1929年的水平,远远低于沙皇和平统治最后时期的收获。苏联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马、牛、猪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杀。曾在1930年代遭受人为严重饥荒的乌克兰,还未来得及恢复元气,却又面临着另一场——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饥荒。

战争年代,苏联人民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以及长期以来主要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这使战时的苏联变成了一架令人惊奇的高效的战争机器,无法关注人民生活 and 福利待遇,只能为全面战争作准备。战争年代滋生了一大批党内官僚阶级——勃列日涅夫一代——随着国防工业的丰产,他们也功成名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也就按照脑子里固有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万古长青的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比喻,现在在真枪实弹中得到了验证,值得骄傲。苏维埃党国又得到了一块新的神圣丰碑:伟大的卫国战争。

纳粹的侵略和蹂躏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苏联发起的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为了共同的目标和民族利益,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战中,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民自发表达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许暂时将党的利益搁置一边。这一点也表明苏联强调自己植根于过去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这使斯大林在战后突然进入中欧。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斯大林在欧洲最最想要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过在西欧取胜来获得经济利益。中欧的各个小国,从波兰到保加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生活在德国主宰的阴影下:尤其是在1930年代,纳粹德国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及外国资本的来源。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德国通过战争竭尽其能地榨取

167 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资源。1945年以后,自然而然地轮到苏联来接管原来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肆意剥削东欧的经济资源。

作为补偿,苏联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争赔偿。这些赔偿,和德国苏占区一样,实际上根本不足以补偿苏联的损失,但它们代表了捐赠国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到1948年,罗马尼亚对苏联的赔偿占到国内总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对于那些并没有和苏联作战的国家,斯大林索取的也并不见少,只是采取了“兄弟般的”态度而非惩罚性的手段。

据估算,到1950年代末,苏联从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剥削所得远远超出了它的占领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间,保加利亚和波兰,尤其是后者,与它们对苏联的贸易和供给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这样一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由此看来,苏联和它占领的西面国家之间是一种传统的“帝国”关系(只是在苏联这个案例上,帝国中心比隶属它的边缘区更加贫穷落后)。

和其他帝国开创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坚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重建和苏联相同的政府和社会。1939和1941年间,斯大林在波兰东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罗的海各国(随着他们从纳粹手里重新夺回占领权),又重新开始着手按照苏联模式重塑东欧;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每个小国家重写苏联历史,重建苏联体制并进行苏联模式的实践。

按照一位学者比较得体的措辞来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1〕各国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政体(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亚,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兰)。每个国家都进行经济“改革”并实施“五年计划”,以保持机制和实践方面都和苏联一致。各个国家都按苏联的模版成了警察国家,并且他们都由一个共产党机构执政,这个共产党机构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实际上)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2〕

168 斯大林要在他的卫星国里复制苏联社会,这一动机非常简单。战后东欧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这就使共产党轻而易举地走上了权力之路,但却并不能保证当地人会支持苏联政策。他们不选择纳粹,而是选择了共产党,或某种形式的民主党派,至于哪个党派更受欢迎,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统治的实践经验。即使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肯尼斯·乔瓦特教授的说法。

〔2〕 这种机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尤为明显,在苏联眼里,这反映了它的过渡时期,但就其法律精神和实践操作而言却是完全正统的做法。

是苏联所说的防止德国复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吸引力也会黯淡消失。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属邻国对他忠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首先,共产党必须保证大权独揽。根据1949年8月的匈牙利宪法,应先取得并保持“领导地位”,消灭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共产党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动力,是实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来源——通过控制法庭来实现。由于和独揽大权的机构密不可分,并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指示,当地共产党和他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最直接的杠杆。

其次,共产党国家对经济决策也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一些国家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乡村和贫穷状态。波兰和匈牙利在战前就拥有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制定了保护自我、防止德国经济渗透的战略。其他一些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财产和商业绝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商业发达;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则和苏联本身差不多。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采取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来对付大萧条;但是,如前文所述,战争期间有些工业区——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区——确实得益于德国对军工生产的投资。

尽管有这种种差异,共产党执政后立即就在这整个地区内强制实现了同一种经济体制。首先,和列宁主义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概念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所有制,而不是社会关系,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和工业等行业中原本属于私人拥有的大型企业。接着,国家对所有雇佣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进行接管、课税或排挤。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雇佣员工超过20人的小公司几乎绝迹。同一时期,匈牙利83%的工业归国家所有,波兰是84%,罗马尼亚为85%,保加利亚更是高达98%。

在东欧,剥夺中产阶级手中财富的现成途径是货币改革。这种剥夺现金存款的做法对农民和商人来说都非常有效,这种强索豪夺比国家强迫课税更为先进。罗马尼亚先后进行过两次货币改革,一次在1947年8月(但是其合法目的是为了终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次是1952年1月,这次使农民们在此之前4年里(他们很少有花钱的机会)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就泡汤了。

在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农民的地位命中注定。战后农村的最初改革是把小片土地分配到大批农民手里。不管这一做法在政治上多受欢迎,这些改革只是加剧了这一地区长久以来的农业危机:对机械和肥料的投入太少,而失业的劳力却越来越多,造成了连续50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到东欧共产党稳稳地掌握了权力,它们才积极鼓励毫无效率的土地再分配。但从1949年起,它们又开始越来越迫切地、咄咄逼人地摧毁“私营小企

业主”和“单干个体农民”。

在农村集体化的早期阶段,小农业主——这时已鲜有大地主存在了——被罚以重税(常常超过他们的收入),农产品价格和配额的差异都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倾斜,他们必须依靠配额本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小学后的教育。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存活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个体农民,虽然大多数人是处于经济的底层,仅拥有“微不足道”的两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

在罗马尼亚,1950年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在集体农庄登记注册,政府任意诉诸强迫手段,直到1962年。后来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地宣布“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了农村集体化。在保加利亚,在1949年开始的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进程中,剥夺了私人手里的所有可耕地。在捷克,土地集体化开始得比较晚(到1956年,大多数可耕地还在私人手里),接下来的10年里政府接管了95%的农业用地,在斯洛伐克落后和偏僻的地区则没有这么多(85%)。但是,在匈牙利全国,自由农民的存在则是有名无实。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再加上摧毁了市场分配的网络,使他们只能身处赤贫和毁灭的窘境。

苏联这种非理性的、有时甚至超现实的经济实践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都被忠实地一一仿效。1948年9月3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宣布“我们要在农村以资本主义因素为代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积累”——这个国家的农村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斯洛伐克,1951年,甚至曾试过把城市职员和政府公务员都赶到农村去,所谓的“7万人大生产运动”最终被证实为是个灾难而很快被废弃了。在离维也纳东面仅50英里处,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先锋”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心态。同时,在新苏联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导致了长期的体制化匮乏,这些国家到现在还是粮食过剩、价格低廉。〔3〕

这一政策的明显失误在于,这些政府引进了苏联的法律模式,将“寄生虫”、“投机倒把”和“颠覆活动”看成罪行。捷克斯洛伐克法官、国民大会委员兹丹卡·帕茨科娃博士在1952年3月27日对她的立法者同行们讲话时说道:“刑法程序的首要任务是要揭露农村富人的真实面目……不完成和实现[农业]生产计划必须按照破坏罪受严惩。”这些对苏联1930年代说法的忠实模仿,对农民的反感,以及成功地执行农业集体化,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实践。

在短期内,实现按照苏联制定的工业计划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灾难:一些控制经济的因

〔3〕在波罗的海各国,由于完全并入了苏联,结局比东欧其他任何国家都惨。1949年爱沙尼亚北部的集体农庄被要求在收获开始之前就要上交谷物,目的是要和南面400公里以外的拉脱维亚保持一致。到了1953年,农业一向发达的爱沙尼亚农村经济大大受损,被大风刮倒的牛羸弱到没人扶助就无法自己站立起来。

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土地集体化和解散小企业释放了大批男女劳动力进入工矿企业；共产党单一地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生产上，忽视了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量增长。各个地方都采用“五年计划”来制定宏伟目标。就总产量数字显示，这些第一代工业化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尤其是在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工业化起点几乎是零的国家。

从1948年到195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城市化的国家，也下降了18%。在德国的苏占区，纯钢的产量从1946年的12万吨增长到了1953年的200万吨。东欧一部分地区（波兰西南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的工业带）几乎一夜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了许多全新城市，如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市，给成千上万生产铁、钢和机床的工人提供住房。苏联在两次大战之间建立的那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半军事化、单一的、第一代工业化城市出现在苏联集团各国。和俄罗斯的共产党一样，东欧共产党正在短期内加速重走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之路。

就这点而言，1945年以后的东欧经济历史和同时期的西欧复兴模式非常相似。在西欧，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优先性也为生产性投资和增长做了让步，虽然马歇尔计划稍稍缓冲了一点由此种策略带来的伤痛。西欧的某些工业部门和地区也是起点较低，1950年代工业化进程在把农村转变为城镇中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相似性消失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经济史的最显著特征是：除了煤、钢、工厂和大批公寓区外，苏联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产生了奇怪的扭曲和矛盾，甚至比在苏联本国还要严重。

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4〕的成立，制定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法规。每个国家都要和苏联展开双边贸易（这是对纳粹时代的需求的又一仿效，莫斯科再次取代了柏林），被指定在国际共产主义经济中担任不容商议的角色。因此，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苏联提供工业成品（价格由莫斯科决定），而波兰和罗马尼亚专门从事食品和工业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作为回报，苏联将提供原材料和燃料。

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奇特的颠倒——帝国提供原材料，而殖民地却出口成品——外，这种结构使我们回想起了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而在非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地，如在东欧：本土经济遭遇了损伤，缺少发展。一些国家被禁止生产成品，还有些国家被责令过量生产某些产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鞋子，匈牙利生产卡车）并卖给苏联。没有人关注

〔4〕最早的经互会成员国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稍后加入的是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过了几年，南斯拉夫、蒙古、中国、朝鲜和越南也成为会员国。1963年经互会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为12%，到1979年只有9%，并开始下跌。

经济上的相对优势。

临时模仿的 1930 年代的苏联模式,原本显示出的是苏联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丰饶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无穷无尽的廉价低技术含量的劳力。这对那些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缺少原材料、但又拥有熟练技术工人、长期拥有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的小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捷克例子尤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和摩拉维亚地区(在 1914 年以前早就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工业区),人均产量远远高于法国,擅长生产皮革产品、摩托车、高科技武器和大量种类的奢侈品。从工业技能水平、生产力、生活水准、国外市场份额来衡量,1938 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堪与比利时媲美,并远远超过奥地利和意大利。

到了 1956 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落后于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西欧国家,与 20 年前相比更是效率低下、经济贫困。193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奥地利持平,到 1960 年他们之间的比率却是 1:3。即便该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最著名的是小型武器生产——也不再能够给捷克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他们被限制只能对他们的主人苏联出口。至于在奥斯塔拉伐建立的大型企业哥特瓦尔德钢厂,它的模式和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的钢厂一样,这些对捷克而言,不是代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是加速了它的落后(由于没有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铁矿资源非常有限,导致这些以钢铁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项目破产很快)。在那些基础工业领域,一开始确实出现了短期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效益增长,这在每一个卫星国里,情况也都一样。但到了 1950 年代中期,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早已在逐步走向衰落,在“按计划”地被淘汰。

苏联集团里有两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存在着部分例外。波兰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也非常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对土地实施集体化。斯大林看来是明白的,想迫使波兰农民并入集体农庄这一点不切合实际,但是这种想法并不会使他犹豫半分。苏联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论述这一问题)只是手段。与其他东欧附属国民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波兰人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和叛乱,对一代又一代俄国官僚来说并不陌生。在波兰,苏联的统治明显地遭到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严重反对。

在苏联人看来,波兰的反抗令人恼怒——战时成立的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共产党的统治展开了游击战,至少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代末——但似乎也并不值得一提。战后波兰不是以东部 6.9 万平方英里从苏联手里换得了 4 万平方英里的良田吗?而且莫斯科不是波兰抵制人人害怕发生的德国复兴的(唯一的)保障吗?还有,波兰已经摆脱了战前的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被德国人屠杀了,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又被苏联人驱逐出境了。此时的波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波兰都更“波兰”,这可得多多感谢莫斯科。

但是,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内部,并不取决于感恩与否。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作为反抗德国或西方侵略的缓冲带。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波兰保持稳定和可靠才是首要的。无论这样看来是多么低效,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合拍,但为了保持波兰国内的平静,斯大林愿意容忍自由农民阶级的存在,也允许天主教在公开场合活跃,这些活动要是放在南面和东面,却是不可想象的。波兰的大学也都毫发未损地保持原样,这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高等学校教师被驱逐和受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73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分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5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在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时期,除了它的邻国阿尔巴尼亚之外,南斯拉夫的人均收入是欧洲最低的;经过4年的被侵略和内战,这片穷壤早已沦为赤贫。南斯拉夫的战后经历所带来的痛苦灾难远比它的种族差异来得复杂,它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根据1946年的人口调查统计,南斯拉夫1570万人口中,有650万塞尔维亚人,380万克罗地亚人,140万斯洛文尼亚人,80万穆斯林(主要在波斯尼亚),80万马其顿人,75万阿尔巴尼亚人,49.6万匈牙利人,40万黑山人,10万瓦拉几人,还有一些数目不清的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根据1946年的宪法,这些人中只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分别得到了认可,他们可以将自己同另外几个民族一样看作是“南斯拉夫人”。〔5〕作为南斯拉夫人,他们的前途确实十分黯淡。19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在和斯大林决裂的最初几个月里,铁托确实变得更加激进,更加“布尔什维克”,似乎要证明他自己的言论是正统的,而苏联人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但这一姿态并没有能够

〔5〕 根据1956年的《宪法》,组成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和黑山——可以自由脱离联邦,但7年后它们被剥夺了这项权力。

维持多久。由于缺少外来的援助,又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他转向西方寻求资助。1949年9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贝尔格莱德2000万美元的贷款。10月,南斯拉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300万美元,同年12月,又和大不列颠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800万美元的预支款。

苏联的威胁迫使铁托增加了国防开支(作为南斯拉夫可怜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50年的16.7%;为安全起见,该国的军工业全部搬到波斯尼亚的山区(这导致了1990年代的战争)。1950年,美国国会认识到了南斯拉夫在全球冷战中的可能意义,通过了《南斯拉夫紧急救援法案》,又为它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援助。接着在1951年11月又根据《共同安全法案》,同意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南斯拉夫的国内财政赤字全部由美国的援助所填平;从1949年到1955年,铁托从西方得到的资金共计12亿美元,后来只还了5500万美元。1945年5月,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僵持,曾经导致它和意大利及西方的交恶,最后由于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英国、美国在1954年10月5日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而得到了解决。

西方的援助使得南斯拉夫政权得以继续偏重重工业和国防,维持1948年分裂前的状态。但是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执政,他们放弃了战后那些年来的极端布尔什维主义。到了1951年春只剩下邮政业和铁路、民航和水运还归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控制。其他的服务业和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被掌控在各个独立的共和国手中。到了1954年,80%的农田又回到了私人手里,根据1953年3月30日颁布的法令,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7000个集体农庄到最后只剩下了1000个。

由于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国内外都沐浴在“他的”红军的伟大光环下。对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早在大战之前就形成了,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公开文件表明,斯大林单枪匹马赢得了战争,他在军事谋划和战争指挥中没有启用任何将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辩证法到植物学,斯大林被宣布为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威。苏联生物学家们被命令采纳徒有虚名的李森科的理论,他对斯大林许诺,如果正式采用他的关于习得性特征遗传方面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苏联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梦想中的农业大丰收——结果可想而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结局。〔6〕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整个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

〔6〕 这一点非常重要,斯大林放任其核物理学家,而对他们的计算结果从不怀疑。斯大林可能是疯了,但他可绝对不傻。

1951年拉脱维亚诗人V. 卢克斯的两句诗最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编织的美丽红纱线，
我们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对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他所拥有的几乎魔法般的权力，揭示了一个专制、恐怖、黑暗的社会背景；在战争的最后那几年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斗篷下，继1941年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被驱逐出境之后，斯大林驱逐了一些西部和西南边境的小民族，将他们向东赶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尤其是高加索地区：车臣人、英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纳尔卡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这一驱逐少数民族的野蛮手法并不新颖——早在1939到1941年间，就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各国人被驱逐到东部，1930年代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也遭此厄运，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

战后这些地区对纳粹合作者和叛徒的最初审判也同样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45年到1947年间，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农民党领导人都遭到了逮捕、审讯和枪毙，罪名或真或假，从战时的法西斯同谋到西方间谍不等；但在每个案子中，起诉者都特别小心地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人民”的身份诋毁那些人的爱国心和名誉。那些拒绝投入共产党怀抱的社会党人，如保加利亚的克拉斯廷·帕尔塔柯夫（1946年受审并被判入狱，3年后死于狱中），被单独列为人民公敌受到处罚。

在早期的公审中，审判情况令人震惊——除了那些确实和德国有染的人和那些罪行早就为人所知的以外——他们公开否认有罪或否认他们的“叛国”罪行。1947年8月，在那场明显受操纵的对农民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及其“共犯”的索非亚公审中，受指控的每5人中有4个人虽遭到折磨和伪证，还是坚持宣称自己无罪。〔7〕

随着1948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7〕 不管怎样，他们都被处决了。在皮特科夫死后3周，政府发表了他的“供词”。但这一供词伪造之处过于明显，因而很快引起尴尬，甚至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都让人难堪。当局不再提及它，负责安排其发表的保加利亚秘密警察头子因此事而被枪决。

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在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召开的谴责南斯拉夫“叛变”的会议上，共产党的辞藻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用作贬义词。

但是，随着国内那些非共产党员敌人的死亡、监禁或流放，苏联的专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真正危险呢？知识分子或被收买，或被恐吓。军队都被牢牢掌控在苏联占领军的手里。大众的示威抗议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因为它会严重腐蚀“工农”国家的信誉。但在早些年里，人民民主在他们宣称代表的无产阶级中间虽然一向闻所未闻。但是，消灭中产阶级和驱逐弱小民族，倒是给那些乡村农民、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动力和希望。

到处充满了机会，尤其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政府雇员来说，可以参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补贴的公寓，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就读，而“资产阶级”的子女则被驱逐出校。政治上的可靠远比能力来得重要，就业得到了保障，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雇用了大批信得过的男女雇员，从事从街区组织者到警察局审讯员的各项职业。〔8〕苏联统治下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至少在这些年里一直如此。

在这种统一化的模式存在着两个显著的例外，都发生在这个集团的最城市化、最发达的角落：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和柏林的苏占区街头。1953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明摆着是“对前资本家们的致命一击”，导致工业界的工资下降了12%（由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引起）。原来基于报酬丰厚的熟练工人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恶化，激起了大众的游行示威，在波希米亚西部主要工业中心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有2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接着在1953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捧贝内斯和战前总统托马斯·马沙里克的画像，向市政厅挺进。

仅限于一个外省城市的比尔森游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几天以后，却在北面几十英里外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抗议，反对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工作标准（但不给付报酬）。这些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强加的，这个政权早已（并非最后一次）变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苏联主人还要严酷无情，苏联曾建议东德共产党领导同意改革，并就向西德输送熟练技术工人一事作出妥协，但东德政府对此不予理睬。6月16日，东德全

〔8〕直到1966年，波兰政府雇员中还有五分之四的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整个国家都由这样一个低学历的行政管理层来统治，令人惊讶。

国大约4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和比尔森的示威群众一样,德国工人也轻而易举地被警察镇压了,但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苏联红军的坦克被召了进来,将近300人被杀;数千人遭逮捕,其中,1400人被判长期监禁。200名“乱党头目”被枪毙。柏林动乱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唯一一次公开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虽然他的表态多少还有些含糊:

随着七月十七动乱的开始,
作家协会的书记
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
从传单上可以读到
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已经大增。
只有付出加倍努力才能实现。
难道此情此景,就不能简单一点,
让政府解散人民
而重新选择一群?

处在苏联帝国统治的西部边缘工业区的工人产生了愤怒和不满,这对宣扬共产主义非常不利,但他们并没有对苏联的权力造成什么威胁——并且,比尔森和柏林的动乱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并非巧合。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带有威胁性的挑战看起来存在于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内部。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动的真正含意所在,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对“铁托主义”的回应,他因时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政策上。从1948年到1954年,共产党世界经历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性“公开审判”系列事件。

这些年里,所有清洗和审判的主要先例,当然就是1930年代苏联的恐怖清洗。而共产党人自己成了主要受害者,目的是要清洗党内“叛徒”,清除可能对政策和总书记造成挑战的人。在1930年代,这一假设的暴乱领袖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一样,他是一位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真正的共产党英雄,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实践有着自己的见解。1930年代的恐怖活动保护并阐释了斯大林无边的权力和权威,而战后些年里的清洗活动又成为东欧国家效仿的目标。

但是,当19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尤其是1938年对尼古拉依·布哈林的审判变成一种独特的、戏剧性的创新时,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价就是,革命不仅仅牺牲了他们的儿女们,更是牺牲了它们的设计者。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审判和清洗运动只是一些厚颜无耻

的翻版,完全模仿过去的苏联实践模式,看起来那些卫星国根本就不愿意费心,只是生搬硬套而已。毕竟,经过一段长期的系列审判式的清洗后,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除了战后审判叛国者和对反共政治家进行政治审判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府还利用法庭处罚教会,并关闭了除波兰之外的所有教堂。波兰教会的幸免是因为,要是在波兰和天主教公开抗争的话,那就会注定涉险太深。1949年,保加利亚新教联合会的领袖因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审判。在上一年,罗马尼亚东仪天主教会就在新的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并入了更显圆滑顺从的罗马尼亚东正教。这一迫害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沙皇统治时的18世纪。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天主教神甫在布拉格分两次受到审判,被指控充当梵蒂冈(和美国)的间谍,并被判处从有期徒刑10年到终身监禁;到1950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狱中被关押的僧侣和修女已达8000人。1949年1月,接替被监禁的红衣主教曼恩德逊迪担任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的格罗斯主教被指控有罪,因为他参与了哈布斯堡王朝复辟运动,并同铁托分子勾结,企图武装匈牙利法西斯分子。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审判也明显划分为两组。第一次是始于1948年并贯穿整个1950年代,源于对铁托—斯大林分裂的直接反应。在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到6月间,共产党内务部长科奇·霍谢受到审判,于7月份被判有罪,并被处绞刑。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的霍谢,确实很明显地支持铁托的巴尔干计划,但当时这一切也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看来,他的案件就显得稍稍有些与众不同了,因为事实上他是被秘密审判的。

紧随阿尔巴尼亚审判之后,是保加利亚对它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的逮捕、审判和处死。科斯托夫在两次大战之间曾深受保加利亚统治者迫害而双腿致残〔9〕,他以公开反对铁托而出名,他批评铁托想把保加利亚纳入巴尔干联邦的计划(铁托讨厌科斯托夫,双方都对对方没有好感)。但斯大林还是不信任他——科斯托夫曾莽撞地指责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的经济协约对保加利亚不利——他是被用来有目的地描述为民族主义罪行的理想人选。

179 他和他的“小团体”(“叛国间谍阴谋危害国家的特莱科·科斯托夫集团”)于1949年12月被判处下列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合作,从事间谍活动,为英国提供情报,参与铁托的阴谋。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科斯托夫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在“坦白书”上签字,但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读事先同意的文本,面对审讯者,他公开翻供,坚称自己无罪,因而被拖出法庭。两天后,即1949年12月16日,根据斯大林及其警察头子拉夫伦基·贝利亚在审判前的决定,科斯托夫被处以绞刑,而他的“同谋者们”则被判

〔9〕 1924年,年仅27岁的科斯托夫遭到逮捕,受尽保加利亚警察的百般折磨。因担心自己可能会背叛(地下)共产党,而从索非亚警察司令部的四楼跳楼,导致双腿致残。

无期徒刑。科斯托夫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东欧共产党中唯一一个在公审中翻供并声明自己无罪的人。这使保加利亚政府在国际上造成了小小的尴尬(广播播放了科斯托夫的审判,西方国家广为报道),马上就被勒令以后要坚决制止,下不为例。但已经没用了。

在处死科斯托夫前不久,匈牙利共产党曾举行过一场公审,针对他们党内的可能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共产党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这个案子和保加利亚的版本也差不多,只是受害者名字不同而已。指控、细节和招供都一模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两次审判都是由莫斯科一手策划的。拉吉克本人并非无罪,作为共产党内务部长,他曾经令其他很多人身陷囹圄,甚至更糟。但在对他的起诉书中,更强调的是他犯有“叛国活动”,受到“外国收买”。在匈牙利,苏联的占领尤其不受欢迎,因此莫斯科不想冒险把拉吉克变成“民族共产主义”的英雄。

但在这个案件中,不用担心这种危险的存在。拉吉克适时地开口说话,承认自己为了在匈牙利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充当英美间谍。他告知法庭,说他的真名是赖希(因此他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并且在1946年被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招募,因为他们威胁“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全部意愿行事的话”,就会把他在战争期间和匈牙利纳粹合作的事公之于众。法庭对拉吉克及其“同谋者”的审判过程,包括拉吉克自己在1949年9月16日的招供,都由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现场直播。9月24日宣布了事先拟好的判决书,拉吉克和另外两个人被宣判死刑。10月15日执行了绞刑。

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公开审判,相对东欧各国搜捕铁托主义者并对他们实施秘密审判和裁决的事件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受害最深的是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南邻”共产党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仅在匈牙利——鉴于与南斯拉夫的近邻关系,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区匈牙利少数民族众多,以及在1947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紧密同盟,斯大林对铁托主义抬头的害怕不无道理——大约有2000名共产党干部被立即处决,更有15万人被判有期徒刑,35万人被开除党籍(这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住房、特权和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在波兰和东德,虽然也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捕入狱,但没有举行大型公审。波兰倒是有这么一位铁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选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哥穆尔卡公开批判波兰的土地集体化计划,公开谈论要走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实际上,他遭到了波兰党内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们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总书记一职被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所取代。5个月后,他辞去了部长会议的职务,并于1949年11月被驱逐出党。同年12月,比埃鲁特公开批判哥穆尔卡及其“小集团”的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

哥穆尔卡被降职担任华沙社会保障局局长,最终于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华沙方面并没有对铁托主义进行公审。波兰也有过审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尔卡被捕的当天开始的,起诉一帮官员企图叛国。在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的秘密计划中,想把哥穆尔卡和拉吉克、铁托等人联系到一起,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或真或假的联络网,说他主要和美国人、专门负责战后欧洲善后救济工作的“唯一神教”领导人诺尔·菲尔德接触。以布达佩斯为据点、想象中的菲尔德的主要间谍们和铁托主义者的谍报网络,早在起诉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过了,现在又成了批判哥穆尔卡的主要证据。

苏联要求波兰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但是,波兰人能够有效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流亡后落入他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大肆消灭的做法,使得比埃鲁特预感到一旦波兰也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漩涡的话,他自己将来也会遭此厄运。波兰人在时间上还是幸运的:他们推延了准备哥穆尔卡的卷宗——在审讯中他拒绝开口,不愿在伪供上署名——这使得波兰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后、他的心腹贝利亚被处死,都没有实行公开审判。最后,一些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些年里在公众面前分裂波兰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是草率鲁莽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举行了所有审判中最大的一场公审。紧随着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开始策划大的公审。但等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公审的重点却发生了转变。铁托仍然是敌对的目标,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谍报。但在对“阴谋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犹太人。在起诉书的第一页上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绝非巧合。更重要的是,这些
181 “托洛茨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首先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斯大林是反犹太人的,而且历来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对犹太人的厌恶还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对其他不同派别人士的摧毁中——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左倾和右倾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的犹太出身几乎就造成了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和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无关;一旦苏联革命事业和“反法西斯”这面大旗相关联,从1935年到1939年8月间,之后又始于1941年6月,欧洲的犹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约瑟夫·斯大林更伟大的朋友了。

上面这种说法略带嘲讽意味。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组织里,他们的党员人数大多靠犹太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是受压迫和被厌恶的少数民族。年轻的世俗犹太人几乎没多少政治选择:

犹太复国主义、邦得主义〔10〕、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合法的)或共产主义。在这些派别中,毫不妥协地反民族主义的、最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显然吸引力最大。不管过去有多少缺点,苏联为当时面对选择“威权主义的过去”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未来”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机会。

经历战争以后,苏联的吸引力更大了。1939年德国入侵苏占波兰,那里的犹太人被迫不断东迁,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苦难。但他们并没有遭到系统的大屠杀。红军通过乌克兰、白俄罗斯挺进到波罗的海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拯救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正是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战;但一旦希特勒获胜的话——如果德国人及其合作者继续掌控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话——将会有更多的犹太人罹难。

当共产党接管东欧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有犹太血统。在二级领导人中,这一比例更是明显: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警察局长都是犹太人,还有经济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首长、著名记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在匈牙利,党的领袖(马迪亚斯·拉科西)是犹太人;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党的领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核心领导层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苏联集团的犹太裔共产党人完全得感谢斯大林。通常在长期流放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国家,但是并不受欢迎;不管是作为共产党人还是作为犹太人。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使得当地人比以前更加讨厌犹太人(战争刚一结束,海达·马格里斯从奥斯维辛死亡之旅逃脱性命回家后,一个邻居问她“你为什么要回来呢?”〔11〕);在听命于斯大林这方面,东欧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也许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值得信赖。 182

战后最初几年,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犹太下属有任何敌意。在联合国里,苏联是犹太复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赞成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阻止大英帝国的野心。在国内,斯大林很欣赏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一些工作,他们成立于战争期间,在苏联国内调动犹太人的积极性,(尤其)在国外,他们支持苏联抗击纳粹。苏联的犹太人和莫斯科领导下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欣喜地认为战争年代的这种大联合精神(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寻求和接受一切可能的援助力量),必将把战后的胜利转变成一个更加容易相处的时代。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

〔10〕 邦得(Bund)是一场犹太劳工运动,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皇俄国,两次大战之间,此项运动仅限于波兰国内。

〔11〕 参见海达·马格里斯·科娃丽所著《无情的星空下》(198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8个月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比起战前十年间,更多的犹太人遭到了杀害。

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斯维辛的回忆仅限于大体上谈及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在身后又被同化到了他们生前深受嫌恶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这种假设的犹太人的世界性特征——这是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发动进攻后的黑暗岁月里得益的国际关系——再一次被用来反对犹太人,在斯大林眼里,它确定了冷战的战线,可能造成对战时国际接触和沟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最初的一批受害者是战时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那批犹太领导人。所罗门·米柯埃尔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俄罗斯意第绪剧院的重要人物,于1948年1月12日遭到了谋杀。1948年9月11日,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掀起了犹太运动的热潮,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街道上挤满了游行,他们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歌“明年相聚耶路撒冷”。对斯大林来说,这一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挑衅性,并且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却很快失去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的热忱:不管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多么模糊不清,很明显它根本不愿意成为该地区的苏联盟国;更糟糕的是,在敏感时期,犹太国小心警觉地显示自己的亲美情感。当时对柏林的封锁刚刚开始,苏联和铁托的分裂正处于关键状态。

1948年9月21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明确指出了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发生的变化。从1949年1月起,《真理报》刊登了许多文章,攻击“没有祖国的世界主义者们”、“没有爱国心的剧评家团体”、“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们”、“失去身份的人”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犹太学校、剧院遭到封闭,犹太报纸也被取缔,犹太图书馆也被关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也早在1948年11月20日遭到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些残留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和政府官员们遭到逮捕,入狱达3年之久。在重重折磨下,他们被迫承认阴谋“反苏”的罪行,因此很有可能被安排公审。

负责执行审讯的安全部上校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想扩大起诉范围,将事情说成是揭露犹太人反苏阴谋,指责他们是受到了美国和特拉维夫的指使。他曾对其中一位被捕者所罗门·罗佐夫斯基说道:“犹太人是低等、肮脏的民族,犹太人个个都是卑劣的杂种,所有的反党活动都有犹太人的份,苏联的所有犹太人都在进行一场推翻苏联的秘密活动。”

犹太人想灭绝苏联人。”〔12〕然而,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即使在斯大林看来也多少有些感到难堪;最后,这15名被告(都是犹太人)于1952年夏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只有一人除外,其他都被处死;唯一的幸存者是丽娜·施特恩,她被判处10年监禁。

同一时期,反犹的浪潮正在那些卫星国里集聚力量。在罗马尼亚,那里生活着相当多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1948年秋掀起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并在接下来的6年里以不同程度的能力继续着这场运动。但罗马尼亚犹太人社群的规模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约束了对它的直接攻击;实际上罗马尼亚人有段时间曾考虑过让他们的犹太人离开该国,只是并未当真而已——从1950年春开始,他们同意发放签证申请,直到1952年4月才停止发放,届时仅成功申请前往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就已达到了9万人。 184

罗马尼亚计划中的公审目标是(非犹太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帕特拉斯卡努曾公开对农村集体化表示怀疑,这使他自然地成了罗马尼亚由于亲铁托主义而遭起诉的“拉吉克审判”式的最佳候选人,1948年4月他遭到了逮捕。但当他的审讯官打算对他审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帕特拉斯卡努的案子又和安娜·鲍克的案子搅和在一起。鲍克是犹太人;她来自摩尔达维亚,是犹太教割礼师的女儿,也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的政府部长(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她以推行强硬路线的理论和政策而著名,这使她成了竭力想讨好当地人的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惩戒靶子。

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公开审判鲍克等人的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953年到1954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针对一些小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审判,指控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们出卖自己,充当“帝国间谍”。受害者中有些是真正的(右翼)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被诬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他们被指控与以色列非法往来,并在战争期间和纳粹通敌合作。他们被判刑,刑期从10年到无期徒刑不等。最后,在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后,1954年4月,帕特拉斯卡努本人也遭到了审判;他被指控替英国人当间谍,被判有罪处死。

鲍克幸运得多了:由于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保护(最初是斯大林,后来是莫洛托夫),她从来未被直接攻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52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她就默默无闻地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直活到1960年去世。相比东欧其他国家,罗马尼亚共产党势力更小、也更孤立,老是发生内讧。对“右翼”帕特拉斯卡努和“左派”鲍克的胜利,对心存邪恶的

〔12〕《斯大林秘密大屠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战后调查录》(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乔什瓦·鲁本斯坦、弗拉季米尔·纳乌莫夫主编,第52页。按照惯例,后来科马洛夫本人也遭监禁并被处决——他最后是以反犹太罪被起诉的。

独裁者乔治乌-德治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派系胜利,他的统治风格(和他的后继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样)是对过去巴尔干半岛各国专制统治的病态恋旧。

在这些年里,犹太人被清洗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和政府部门,而东德和波兰的情况也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党内一派可以不顾该党的“世界性”,煽动大众的反犹情绪。东德的政治土壤更是肥沃。1953年1月,莫斯科一公布“医生阴谋案”,一批著名的东德犹太人和犹太裔共产党人就马上逃向西方。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汉斯·扬德雷斯基要求把犹太人——“国家公敌”——从公众生活中驱逐出去。但是,出于幸运、时机或谨慎起见,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计划举行全面的反犹主义公审,只有布拉格照做了。

斯兰斯基审判后来成了共产党公审的经典。它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首先被“审讯”的是一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多·克莱孟蒂斯,他于1950年被捕,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人是捷克共产党的中层干部,被控勾结斯洛伐克人参与铁托-托洛茨基的阴谋,程序和拉吉克案件相仿。但是1950到1951年间,那些受牵连的或被捕入狱的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高的资格充当斯大林所要求的公审傀儡或乱党头目。

1951年春,苏联警察总头目贝利亚命令捷克人把审讯的重点从铁托阴谋转向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从此刻起,整个事情都掌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手中——科马洛夫上校等军官被派到布拉格接管审讯工作,而捷克的安全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需要听命于他们。最后根据需要,苏联把受害者目标定在了捷克高层中仅次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统的第二把手身上: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哥特瓦尔德是一位可供使唤的傀儡,一心忠于共产党,而斯兰斯基则不同,虽然他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之前的拉吉克一样),但他是个犹太人。

起初,哥特瓦尔德不太情愿逮捕斯兰斯基——过去的3年里他们两位亲密合作,清洗党内的同事们,并且如果总书记被牵涉进去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哥特瓦尔德自己了。但是苏联人坚持这么做,提供了关于斯兰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的伪证,哥特瓦尔德只好屈服。1951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尚身处自由的著名犹太裔共产党人跟着他走进了监狱。现在安全部的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要从那么多的被关押者那里获得口供和“证据”,用来制造大案,起诉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们。多亏了有相当一批受害者们(尤以总书记本人最为突出)即使面对酷刑也坚决否认,使这项任务消耗了安全部大半年时间。

最后,到了1952年9月,起诉书才得以完成。供词的内容、诉状、预判的徒刑和审判的卷宗都送到了莫斯科,让斯大林本人阅批。而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公审全过程的“彩

排”——并且还录了音。这是为了提供两手准备,以免届时在公审法庭上某个被告翻供,出现“现场播送”事件,就像科斯托夫一样。但是实际上没这个必要。

公审从1952年11月20日一直延续到11月27日。一切都在按预先的计划顺利进行:被告们被起诉做了、说了一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些都出自被强迫的证人们以及一些被告的供词);他们因自身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但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其中有3个被告被指控在贸易中优惠照顾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在当时,这其实是苏联的政策);公诉人又起诉克莱门蒂斯私下会晤铁托(“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走狗铁托”)——其实当时克莱门蒂斯正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而铁托还正在受苏联器重。 186

与先前的案例相比,这次的公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公诉人和证人反复强调绝大多数被告都是犹太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鲁道夫·马格勒斯”、“斯兰斯基……共产党内所有犹太人最大的希望”、“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们”,等等。“犹太血统”(有时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源”)被当作了罪恶、反共和背叛捷克的有力推断。公诉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语言,其粗鲁谩骂的程度,比起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的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憎的叛国贼”,“走狗”、“恶狼”、“狡猾的希特勒的追随者”等,一样的语调风格。捷克的报纸上又把它们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到了公审的第四天,布拉格共产党日报《真理报》发表社讯说:“一见到这批冷酷无情的人,就会厌恶、憎恨得浑身发抖。犹大斯兰斯基。”文章接着写道:“这些外来力量,这批乌合之众劣迹斑斑”。作者解释说,没有一位捷克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只有那些犬儒主义的犹太复国者们,没有祖国……自作聪明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会在美元面前出卖自己。他们的犯罪动机是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

14名被告中有11名被判处死刑并被处死,还有3位被判无期徒刑。在一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国大会上,哥特瓦尔德发言对他过去的同志们作了如下描述:“一般来说,我们党不接受银行家、工业家、前富农加入。但如果他们有着犹太人血统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我们会不大在意他们的阶级成分。这些事件的起因源于我们憎恨反犹太主义,尊重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

斯兰斯基公审是一场面对公众蒙上了犯罪假面具的司法谋杀案。^[13]和先前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审判一样,布拉格事件只是逮捕苏联犹太医生前预先设计好了的一场序幕,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公布了他们的“计谋”。这些犹太医生——“一帮犹太

[13] 那些幸存者后来都被释放了,但直到1968年这些和他们受害的同伴们才准予安居并被免除罪名。

复国主义恐怖分子”被控谋杀了安德列依·日丹诺夫,阴谋联合“英美资产阶级”,在美国犹太人联合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者”所罗门·米柯埃尔斯)的默许下促进“犹太民族主义”——将在斯兰斯基最后判决后的3个月里接受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后来苏联犹太人聚众闹事的导言,并以此为借口接着把他们驱逐到比罗比兹罕(划派给犹太人的东部“家乡”)和苏联统治的中亚地区,1939年到1941年间曾有许多波兰籍犹太人被赶到那里:MVD出版社刊印并准备发行100万份宣传册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必须撤离该国工业区重新安家”。但斯大林本人却在犹豫不决(伊利亚·爱伦堡警告他,对犹太医生的公审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无论如何,在他做出决定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的偏见无需借口:俄国和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的更大兴趣在于清洗、起诉、认供和审判这整个的行动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联独裁者还需要公审呢?莫斯科完全有权通过“行政管理的程序”来消灭苏联统治下的集团中任何一个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审判的结果看来有些适得其反;那些明显出于伪造的证据和供词、那些毫不知耻的对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目标选择,根本无法让外国观察家们对苏联司法程序的诚意产生信服。

但是,共产党集团所做的公审并非是出于公正的考虑。他们只是对公众上演的一堂实例教学课;虚弱的共产党政权(在苏联,这种形式的审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苏联模式的体制中树立起权力机构的典范。他们告诉公众是非之所在;他们甚至还编写了一套在讨论公众事务中适用并得到认可的词汇语言。在鲁道夫·斯兰斯基被捕后,他只是被指称为“间谍斯兰斯基”,这种形式的称谓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魔咒。〔14〕

公审——或曰公断,按1936年维辛斯基在《苏联刑事犯罪调查录》中所引用的词汇——是为了明确地“调动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而进行的。195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庭组织法”糟糕地总结说,法庭的功能是“为了教育公民热爱并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等。”1948年布达佩斯公审中的被告之一罗伯特·弗格勒当时注意到:“从我们所写的卷宗来判断,认定我们的寓意身份比确定我们的‘罪行’更为关键。在我们每个人的证词中,我们都被迫为了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报纸、电台的利益而‘揭露’自我真相。”

被起诉者从假设的政治批评家和政敌降格到了一群无耻的阴谋者,他们贪慕金钱而

〔14〕这一卷宗记录非常精确。1952年12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安德烈·马蒂进行非官方“审讯”,他的“起诉人”列昂·莫威指控他是“国际托洛茨基分子”而非“托洛茨基渣滓”或“托洛茨基间谍分子成员”,后面这些都是共产党谈及托洛茨基分子时“常用的习惯性”称呼。这一语言学上的用词滑移将马蒂置于了十分可疑之境。

背叛国家。庞大而笨拙的苏联帝国体制有时候掩盖了这一目标——通过重提那些反对“批斗富农”者的错误,需要设计什么样的冠冕之词才能调动大都会布达佩斯公众的思想呢?但这些“公众”并没有要求去信其所闻;他们只是被训练得去重复一遍而已。

公审的一大用处是可以分辨出替罪羔羊。假如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的胜利,假如苏联的外交政策受阻或是被迫妥协了,那么肯定要有谁来接受指责。万无一失的领袖将如何解释他所犯下的过失呢?有很多候选人:斯兰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外都不受人欢迎。拉伊克担任内政部长时曾是位无情的斯大林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过去不受欢迎现在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一些或者全体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部长们在排队等候成为潜在的牺牲品。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败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一样,共产党的部长们在他们推行的政策失败后也招供自己暗中蓄意破坏——通常实际上是——为了运送物品。

除了可作为在裁定罪行时的借口外,供词的另一优势是可以巩固共产党的纪律。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异端邪说;没有批评家,只有敌人;没有错误,只有罪行。这些公审是用来展现斯大林的美德和标明他的敌人的罪行;他们也同时揭示了斯大林偏执狂的一面和笼罩在他身边的多疑的文化氛围。其中部分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对俄罗斯的焦虑,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东方”低下的心态,一种害怕受西方影响同时又对西方富裕难抵诱惑的感觉。1950年在索非亚举行的对“保加利亚的美国间谍”公审中,被告被指控散布观点,认为“优等种族只存在于西方,而忽视了从地理上来说他们都来自于东方这一事实”。起诉书接着描述被告说他们因为展示了“严重的低估自贬情绪”而被西方间谍成功利用了。

当时的西方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威胁,需要不断地被驱除洗脑。当然,确实有过西方间谍:真有其人。1950年代早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华盛顿方面确实考虑过破坏东欧稳定的可能性,美国情报局做了一系列尝试渗透进入苏联统治集团,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根据那些据称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或为英国秘密部门充当间谍的共产党人的供词,认为表面看来有这种可能性。而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确实一直在期盼着一场战争;在1951年1月《真理报》的一篇“采访”中,他解释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日益剧烈。从1947年到1952年,苏联统治集团一直处在战备状态准备打一场永远的战争:1948年到195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生产翻了7倍,而苏联向民主德国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制定了准备战略轰炸的计划。

因此,逮捕、清洗和审判是为了提醒公众矛盾正在到来;是对苏联战争恐惧的一种辩护;是削弱列宁主义党派并为战斗作准备的一种战略考虑(与几十年前很是相似)。1949年指控拉吉克里通英美阴谋颠翻共产党的起诉,让许多共产党人和西方同情者们信以为

真。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斯兰斯基等人的公开起诉都引起了广泛认同,使人误认为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西方联系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偏偏是拉吉克?是斯兰斯基呢?这些替罪羔羊是如何被选中的呢?

在斯大林眼里,任何在西方逗留过的共产党人,只要是发生在脱离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就值得怀疑——不管他或她在那里做了些什么。那些在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与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来自东欧和德国——首先值得怀疑。而拉斯洛·拉伊克曾在西班牙服役(担任“拉科斯营部”的政委);奥托·斯林格也一样,他是斯兰斯基案中的共同被告之一。佛朗哥得胜后,许多西班牙老兵都逃到了法国,结果却被关在法国人的战犯拘留营里。在那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和来自德国及流亡法国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起组成队伍。法国共产党把这些男男女女们组织起来成为地下共产党的分支,名为“移民工作队”(MOI)。战后杰出的共产党人如亚特·伦敦(另一位斯兰斯基案的被告)在MOI组织的战时工作中和西方有过很多接触和联系,因此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并在后来受到指控。

苏联战时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授令和西方联络并记录纳粹的暴行——正是这些活动后来成了指控他们罪行的依据。德国共产党人有的像鲍尔·莫克是在墨西哥度过了战争年代;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如后来的外交部长克莱孟特斯在伦敦工作过;任何一位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呆过的人:都会轻易受到指控,因为他们可能和西方特务接触过或者是和非共产党人在工作中交往过密。约瑟夫·弗兰克,一位在布痕瓦尔德狱中躲过大劫的捷克共产党人,在斯兰斯基案中被指控利用呆在集中营的时间结交了可疑人——“阶级敌人”。

190 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呆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呆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呆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迎。他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设一条当地或全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鉴于上述原因,“民族”共产党总是难免成为战后公审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产党,而拉科西和格罗——主导其公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却是“莫斯科人”(虽然格罗也曾活跃于西班牙)。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差异。在捷克斯

洛伐克,那些组织斯拉夫国人抵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人(包括斯兰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苏联怀疑的对象而成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愿与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劳。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义的、注重实际的“莫斯科人”:就像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式的人物。

特莱科·科斯托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各派直到被捕;战后他任第二把手,仅次于新从莫斯科回来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兰,哥穆尔卡曾和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反抗纳粹统治;战后斯大林欣赏的是贝鲁特和其他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波兰人。斯贝查尔斯基和哥穆尔卡后来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见,差点在对他们自己的公审中又成为明星。

还有一些例外。罗马尼亚的一位“民族”共产党人乔治乌-德治,他一手导演把另一位“民族”共产党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场,就像对付清白无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义者安娜·鲍克一样。虽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过早期的三十几年岁月,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巴尔干谈判。他也曾是经过合格检验的铁托的批判者(虽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铁托想牺牲保加利亚来承管塞尔维亚地区的野心)。然而这些不但没有能够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对协议不感任何兴趣甚至不赞同,他只想要绝对的服从。

最后,在选择公审受害者并对他们起诉时,对个人的打分评判和世俗的工具主义也成为了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

191

同样世俗的是——作为诋毁个人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对安娜·鲍克的起诉,她同时受到“右翼”和“左翼”分离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评过农村集体化,接着她不顾农民意愿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化。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实际上他这么做(1947年大选前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是为解散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警察组织作掩盖。后来他又秘密重建了共产党网络而禁止其他党派建立该网络。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无可非议是正统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对苏联大有好处。

主要公审的被告们都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被清洗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举行公审,有

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里,那些斯大林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全都是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狱或被押工作劳教的人中,共产党只占了十分之一,在死刑犯中只占二十分之一。在民主德国,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组织,监管和控制共产党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仅怀疑那些和西方有过接触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还怀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苏联统治集团以外的人。

因此,毋庸讳言,那些年里,东欧国家的所有人口实际上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怀疑之下。战后苏联国内的压迫到处都是,日趋严密: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最低限度是禁止红军在东德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

192 这项对苏联和东欧公民的惩罚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10年里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那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审判只是群岛式压迫显露出的一小端而已:还有监禁、流放、强制劳动营。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二轮高峰期,苏联劳改营关押了170万犯人,还有80万人在劳动区、275.3万人关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后(如果还能侥幸存活的话)判处。在保加利亚,在略微不到50万的工业劳动力中,九分之二是农奴。

在捷克斯洛伐克,据估算,在1950年代早期,1300万人口中有10万是政治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在号称国家工矿里工作的劳动力。根据“行政清理”,未经过任何公示或审判,那些消失在监狱里的男女就被无声无息地枪决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后才会得悉当事人的“失踪”。3个月后,法律上开始假设这人已经死亡,但还是不会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时,每天的报纸上会刊登大概30到40份这样的声明。好几万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更有好几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权利、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工作。

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总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经历过被捕、起诉、监禁或流放。三分之一的匈牙利家庭受到过直接影响。亲戚们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弗丽齐·罗埃布尔,一位斯兰斯基同谋犯的妻子,被监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鲁津监狱整整一年,还被俄罗斯裔的审讯官谩骂为“犹太臭婊子”。释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家工厂。那些被关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个人财产。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被人们遗忘,就像约瑟芬·兰格,她丈夫奥斯卡·兰格

是斯兰斯基公审中的证人,后来在秘密审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起诉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也是历时最久的。100多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充当多瑙河-黑海海峡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几万人,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的人在内。罗马尼亚监狱和各种形式的“试验”狱的条件之艰苦严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犹以皮特什蒂监狱最为著名,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三年里,被关押的犯人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身心来接受“再教育”。被关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数都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共产党政治家。

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也懂得敌人的必要性,并且这成了走斯大林路线国家的一种逻辑:要不断发动针对敌人的斗争——永远地进行下去,但主要限于国内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会议上指出:

[法官们]必须……以苏联的法学为基础,依靠世界上最深思熟虑的、唯一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科学,并完全按照苏联法律的实践经验来行事……不断上升的阶级矛盾是我们当今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需求。

193

共产党词汇中所厚爱的军事用语反映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军事用语泛滥:阶级斗争需要联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联络、转折性的运动、正面进攻。斯大林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要强调阶级斗争,这点可以根据以下这一奇怪的事实得到引证:虽然各处选举表明99%的人都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敌人队伍还是在扩大,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必须不遗余力地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模仿、复制苏联国内历史的模式。

很显然,主要的敌人是指农民和资产阶级。但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易被攻击的靶子,正和在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安德列依·日丹诺夫恶毒攻击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15〕——反映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知识分子的主题所在:宗教、娼妓、脱离人民大众。假如阿赫玛托娃是个犹太人的话,就像中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幅讽刺画可能就会完成得更出色了。

政治压迫、审查,甚至独裁专制,这些手段在奉行斯大林主义之前对欧洲东半部来说并不陌生,虽然相比较而言,大家普遍更倾向于两战间歇时期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

〔15〕 凯瑟琳·梅里黛尔,《石头之夜:20世纪俄罗斯的死亡与回忆》(2000),第249页。

审讯和监禁做法,而非其他国家的“大众民主”。1947年后共产党国家所建立的统治和恐怖机构在斯大林手下人员的努力下变得更趋完善,但其实大部分根本没有必要从东方照搬,它们早就存在了。尤根·图尔卡努一手创建的皮特什蒂监狱为共产党安全局服务,这并非出自偶然巧合,他早期曾是雅西大学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参与了罗马尼亚内战时期的法西斯组织“铁军”。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和先前的独裁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压迫机构办事的效率之高,而是在于现在它调动了权力和资源,并滥用它们为外来势力获取几乎归其独享的利益。继纳粹后,苏联的占领在形式上破坏性很小,它把欧洲东半部稳稳地深深194 纳入了苏联的轨道(对在纳粹专制统治下生活了12年的东德公民来说,这种转型是平静而顺当的)。这一进程及其带来的结果——东欧的一切,从生产过程到学术头衔都被“苏联化”或“俄国化”了——迟早就将导致那些非老派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弃。

这一转型的副作用是模糊了许多人的记忆,这些人曾在面对共产党转型最初时期产生过矛盾情绪。后来几年里,要忘记斯大林主义者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反犹太的、多是陌生恐怖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正和在苏联本国一样,东欧很多地区都能找到富有同感的听众。经济民族主义在当地根深蒂固,因此,没收财产、国有化、控制并制定工作方面的国家法规,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实行的“两年计划”,可以把违抗命令不听话的工人流放到劳改营(但实际上1946到1948年间很多捷克法官都拒不采纳此种处罚)。

虽然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一小帮华沙和布拉格的年轻人才会对共产党统治的未来抱有极高希望而已,但事实上在早期阶段,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并非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到的一场单方面的、残酷的变革。但是,正如1941—1942年从苏联手中“解放了”这些地区后,纳粹的暴行使得当地人民对其毫无好感一样,斯大林也很快就使这些卫星国失去了对他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苏联想让它邻近的这些西部发达地区加速推行自己并不景气的历史经济模式,这样的结局显而易见。共产党管理者们唯一能够不断依赖的资源,就是已被压迫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1948—1953年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和20年前的苏联相似的原因所在:双方都受到了强制工业化的束缚。中央计划经济在强迫矿工和工人获取剩余价值方面确实效果卓著;但也仅此而已。苏联统治集团的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落后了,到处是荒诞不经的浮夸风,毫无实效。以苏联为例,伏龙芝(现属吉尔吉斯斯坦比兹凯克)的官僚机构在1960年竟然鼓励当地农民通过买空当地商店的库存来完成他们(专制而又无法实现的)黄油供应配额的指标……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

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受操纵并服务于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内部之间又互相猜忌着、害怕着。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并且,这又是一种为了某一外来势力的单独利益而采取的暴政形式,这使得苏联的统治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遭到怨恨。 195

东欧苏联化的结果是使他们离他们的另一半西欧大陆渐行渐远。西欧国家即将经历剧变转型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东欧各国却陷入了停滞不前:进入了迟钝和放弃不前的冬天,抗议示威运动和压制后屈从的状态不断轮回上演,大大削弱了国势,这种状态延续了将近40年。据大致正确的表面估算,正是在这些年里,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复兴注入了约140亿美元,而斯大林——通过战争赔偿、强制派送和畸形贸易的方式——则从东欧国家攫取了大致相当的金钱。

一直以来,东欧和西欧之间就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欧洲大陆对自身的理解,也并没有被看做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就和欧洲西北部之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在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宗教远比政治显得突出和重要。二战以前的欧洲,南北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东西部之间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苏联对维也纳以东地区的统治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在俄国本国还要显著。毕竟,俄罗斯帝国以前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彼得大帝统治后的俄国所具备的欧洲性在列宁领导的世纪变革中受到了质疑。为把苏联和欧洲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持久的暴力措施。但是,他们对西方的怀疑和害怕受西方影响的心情却并非史无前例;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1917年前,就存在于有自我意识的亲斯拉夫派的文章和实践中。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则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它只是没有安全感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特人和其他小国家和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自认为是远离欧洲文明边缘的先驱;但却是受到低估了的欧洲重要遗产的捍卫者——就像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对自己的理解一样,非常合理,他们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心。罗马尼亚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巴黎时尚,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后期那些讲德语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下喀尔巴阡山区的莱茵区到特里亚斯特,一直都以维也纳为楷模。

那个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只是存在于少数人之间——而且在1918年就消亡了。那些根据《凡尔赛条约》筹建的新兴国家则从一开始就显得根底虚弱、短暂易逝。因而,两战间歇期间的几十年反倒成了一个过渡间歇期,既不太平也无大战,这时,帝国统治结束后的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多少有些前途未卜。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复苏后的德国可能成为该地区旧帝国统治下的从斯德丁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地带的实际继承者—— 196

由于希特勒自身的错误而擦肩而过,未能实现。

强加于身的苏联方案而非德国模式,使得不堪一击的欧洲东半部脱离了欧洲大陆的主体。但当时的西欧人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德国人除外,他们的国家直接受到欧洲分裂的影响但却无权对此大声抗议。大部分西欧人都对东欧的消失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并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国内的巨大变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容渗透的武装防线。但对那些位于防线东部的人来说,似乎被向后推向了一个灰暗的、被自己大陆所遗忘的角落,任由一个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来强国宰割,这个强国靠着剥夺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衰退的历史而过着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滞。

第7章

文化战争

我们都厌弃过去的时代。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悉， 197
过去的时代看起来愚昧又野蛮。
——米兰·西迈斯卡

在20世纪中叶，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和顾及苏联对于此事的态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错了，也是对的；而你们即使对了，也是错的。
——皮埃尔·库塔德（与艾迪加·莫林语）

无论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要想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
投入运动中去，并且承认它的目标。
——让-保尔·萨特

如果理由错了，你就没法帮助别人行事正确……这种对站错队的害怕心理，
不是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科斯特勒

还在欧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对未来几代人来说，其速度之快，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费解。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

进行监视,看他们是否支持苏联,这并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而开始的,但是在战后的这几年来里,在1947年到1953年间,这条划分东方和西方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界线深深地刻入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当时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在两次大战之间,对极右派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后来的回忆。从布鲁塞尔到布加勒斯特,1930年代的报刊和文献都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派展开了大量的激烈辩论。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事法西斯活动或持彻底反动观点的知识分子们、记者们和教师们,在1945年后找到了恰当的理由,大声叫嚣着支持他们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甚或还有一些临时或永久脱离公众视线的人)。由于此刻大多数法西斯党
198 派和报刊、彻底保守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仅限于中间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观念在欧洲失势了。

但是,虽然公众写作和表演的内容都是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垮台的夸张变形式的描述,主调却大致都一样。法西斯分子那种预示世界末日的恐慌,他们采用的暴力、“最后解决”手段,似乎是最终导致根本性失败的真正必然的原因;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两次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作家们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堕落、牺牲和死亡这些概念有着先入之见。1945年后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形于战争经历,但是这一次他们关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选择的冲突,排斥一切妥协的可能性:善与恶、自由和奴役、抵抗与合作。从纳粹或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以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变战争的破坏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一个崭新开端的机会。而当这一机会看来受到挫折,又回归到“常规”生活时,失望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或对极左派来说,是再一次从原来的两极分化陷入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对妥协全无耐心。他们太年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消失了一大群名声败坏的年长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帮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战争,但他们却急于弥补上一代所失去的岁月。他们的政治教育来自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年代,当他们主要通过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赢得公众认可、获得公众影响时,根据欧洲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确实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国,大战结束时,让-保尔·萨特40岁;西蒙娜·德·波伏瓦37岁;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贝·加缪年仅32岁。在比他们年长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

里亚克(生于1885年)的影响力和他们相当,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过去维希政府历史的玷污。在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生于1866年)保留了意大利上一代公众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后,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出生于1900年)是较为年长的、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小说家、政治评论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当时38岁,共产党编辑、作家厄里奥·维托里尼更年轻一岁。在德国,对纳粹的同情和战争影响了最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尔——最有才华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们在希特勒战败后的两年里组建了“47社”。——在战争结束时年仅28岁。

在东欧,战前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极端保守主义、神秘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是显著。切斯拉夫·米沃什不可不谓是个典型人物,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杂文《被禁锢的心灵》发表于1951年,当时他年仅40,正处于政治流亡中。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他出现在米洛兹的书中,但并不是为了恭维)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关于战后波兰的小说《灰烬与钻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兹·波洛斯基才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走这边》。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岁稍长的人,他们或是经历了两次大战期间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苏联,也有些人两者都经历过。但是在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男女,都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这对他们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罗松齐差点在1956年匈牙利动乱后成为苏联镇压的牺牲品,二十几岁的他和几百位同他一样的人把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舞台。海达·科娃丽的丈夫鲁道夫·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兰斯基公审案的被告之一,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部长职务时才35岁;公审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图尔·伦敦更年轻,共产党执政时他才33岁。伦敦曾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如何行使政治、军事职责。

东欧和西欧的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普遍地热切向往共产主义的未来。但是这种热情里也掺杂着一种明显看不起无产阶级、蓝领工人阶级的复杂情感。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熟练的技术工人非常稀缺——这和大萧条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集体的回忆里记忆犹新。煤矿等着开采;公路、铁路、楼房、电线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产出工具来制造其他产品。所有这些工作都急缺熟练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妇女或那些各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营里那些身体健全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难所。

这样一来,工业企业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这明显是一种对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的政治资产。那些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的左倾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男女可以通过投奔共产主义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并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拜倒在无产阶级面前”(阿瑟·科斯特勒),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歌功颂德(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典型地想象成坚定强壮的男性形象),使之几近偶像地位。

虽然这一现象是欧洲范围的,并且超越了共产党的政治(在欧洲最为著名的这种拥护“工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让-保尔·萨特,他一生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东欧,这些感情才产生了实际效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区的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帮助重建铁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尔维诺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业的相似状况。对新事业的投入、对或真或幻的工人集体的向往以及对苏联(和它那无往不胜的红军)的倾慕,使战后的青年一代从他们的社会根基和民族历史中脱离了出去。

年纪轻时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就是共产党员)。因此,捷克人卢德克·帕奇曼说:“我1943年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我当时只有19岁,一想到我突然通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还想到能够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军全世界,先是反对希特勒,接着要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我就着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拉夫·米沃什一样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教条的魅力冲昏头脑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欢迎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我很高兴看到波兰半封建社会最终被摧毁,大学向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农业改革正在实行,整个国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正如铁托身边的米洛万·德吉拉斯回忆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时,曾观察到:“极权主义开始时是一种热情和信念;只是后来才成了组织机构、政府权力和职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小国狭隘性和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比,一开始,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奉承知识分子,这一点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如亚历山大·瓦特(另一位波兰前共产党员)所见,那些世俗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这种“精装的教理”非常渴望。虽然东欧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教授们成了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赋、才华最出众的人。

帕维尔·科胡特,几十年后作为不同政见者蜚声国际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剧作家,最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视线时,对自己祖国的新政权绝对热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变,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拥挤的旧镇广场看到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时的情景时,描述说他当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那些想要寻求公正的人民大众和在领导他们加入决定性斗争的这个人[哥特瓦尔德]身上”,20岁的科胡特看到了“夸美纽斯徒劳地寻找的核心保障”。4年后,科胡特一腔忠诚地写下了“致我们自

己的共产党的颂歌”：〔1〕

让我们对党高歌赞颂！
她代表着年轻的工人突击队
她有上百万人的理由，
千万双手把力量凝聚，
强大的队伍紧跟着，
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

鲜花盛开的五月，
远处古堡的上方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真理战胜一切！”
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
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
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光荣啊，哥特瓦尔德的党！
光荣啊！光荣！

这种忠诚在科胡特那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观察到，共产主义实行的原则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没有“赞同”来得重要，这正是东欧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孩子”，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946年他才15岁时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道，“这代人并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战过，只是带着战时的思想就步入了战后这几年，这时为了某些事情而斗争的机会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姆莱纳尔这代人只知道战争岁月和纳粹的占领，思想上“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没有中间道路。因此我们独特的经历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正确观念的胜利意味着——很简单——对另一方的清洗和消灭。”〔2〕

带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东欧的一些年轻人投向共产主义（“我一心想参加革

〔1〕 见印第安纳大学马西·舒勒教授的英译文，由本书作者托尼·朱特略作修改。此外，笔者还得多谢舒勒教授，有关卢德克·帕奇曼的语句也引自舒勒文。

〔2〕 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布拉格寒夜》（伦敦，1980），第2页。

命……”，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产党时对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称)，但是
202 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终统治这些国家，因此导致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幻想都消
退了。那些稍稍年长些的共产党人，如德吉拉斯（生于 1911 年）可能一直都比较明白，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操纵人们的狂热情绪，正是为了束缚他们”。但是那些年轻的皈依
者们，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现共产党的严峻纪律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现实后都大
为震惊。

因此到了 1948 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
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
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
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
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 19 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
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
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
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界主义者、“寄生虫”或犹
太人——成为暴君所犯过失的替罪羔羊。

因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在表现得最强烈的捷克斯
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后就烟消云散了，虽然还有一些以“修正”或“共产主义改革”的形
式滞留了一些年月。共产党国家里的分裂不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和它的对手之间。重要
的分歧重又出现在那些执掌大权者——党管国家、警察、官僚、议会知识分子——同其他
所有人之间。

这样看来，冷战的错误路线并不仅限于东西方之间，它也同样存在于东欧和西欧之
间。在东欧，共产党及其机构和社会其他各部分之间处于未宣战状态，那些接近共产党的
熟人已经划定了新的战线：在那些共产党给予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实际利益的人和
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视、失望和被压迫的人中间。在西欧，这条错误路线令很多知识分子两
边受罪；但是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实践中的直接经验产生了鲜明对比。

对当代东欧命运的普遍漠视，以及西欧对它越来越冷淡，成了令许多东欧人困惑、恼
恨的根源。东欧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边缘化情状——这是他们
早就必须屈从的命运。1948 年后，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挤：一方面由于苏
联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
冷落，那些人从未把他们的经历和例子放在眼里。在 50 年代初的东欧作品中，对西方的
203 描述重复出现的主调感到受了伤害，同时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
灵》中所描述的“失望的爱”。流亡的罗马尼亚作家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 1952 年 4 月

写道,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的躯体被肢解了一块吗?“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欧洲人。”

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欧洲了,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军事防卫圈渗透到中欧,这就打破了东欧国家的均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层次剧烈下降,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总体上被排挤了。虽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一直是西欧辩论和争论的核心,但对处在几十英里之外的东欧“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际经验却很少引起注意:对那些最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仰慕者来说,更是未引起丝毫注意。

战后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即使对刚过去的时代中的外人来说,也是很难看清的。讲德语的中欧国家——20世纪的前30年里一直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不复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维也纳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样被盟国四强瓜分了。它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足够的衣食,更不用说对整个大陆做出什么精神奉献了。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和他们匈牙利及原先奥匈帝国时期的同代人一样,要么流亡外国(到了法国、英国、英联邦自治领或美国),要么和当局妥协,否则就性命难保。

德国自己已是满目疮痍。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马丁·海德格尔同纳粹政府调情的臭名昭著态度并非典型,只不过是在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中的蕴涵意义引起了争议罢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们、报纸和文化机构里,成千上万名小海德格尔们也一样,出于热情而采取妥协态度,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

战后德国的场景因存在着两个德国而更显复杂,其中一个德国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过去“好”德国的传统:反法西斯的、积极进步的、开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诱惑,决心站在苏联占领区和它的后继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边。和波恩的联邦共和国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以坚持诚心地反对纳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还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并不愿意直面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共产党政府鼓励历史学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向观众揭露“另一个德国”的罪行——只要他们不触犯某些“禁忌”。一些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杰出天才们纷纷移居东德。

他们迁移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占领下的东德是东欧集团中唯一一个还保留着西方“幽灵”的国家,它的知识分子可以面向西方听众,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作家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审查太严或压力太大而无法忍受的话,还可以有机会逃回西部,只要通过柏林关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贝托尔德·布莱希

特选择住在民主德国；年轻的作家们像克里斯塔·沃尔夫也留在了那里；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像后来持不同政见的沃尔夫·比尔曼，实际上还移居到东部去读书和写作（比尔曼在1953年17岁时就移居东德。）〔3〕

对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他们离开“物质主义的”西德的原因，是民主德国自我表现出来的进步、平等和反纳粹精神，其政治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联邦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既表现出对历史不愿谈论的沉重心情，同时又奇怪地感到轻松。他们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赖西方盟国，尤其是促成建立西德的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早期知识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倾向于两种政治极端的激进观点被公开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像伯尔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政治（这跟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文化宣传的途径当然并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来因缺少纸张而引起的报纸印刷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发行网络得以重建，在西德，约有200多份文学和政治期刊得以发行（但是后来其中很多刊物由于币制改革而停刊了），并且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报纸，其中尤以在汉堡出版的新周报《时代》最为著名。然而，西德对欧洲知识生活的主流来说还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西德新闻记者兼编辑梅尔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时写道“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在灵感甚至智力上显现出如此地枯竭和凄凉失落感。”

与德国早先在文化上的杰出表现相比，这也是导致国内外观察者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深思后产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忆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国的世纪”。为了达到纳粹的目的，德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许多腐蚀，丧失了它的品格，很难讲清德国人现在将会对欧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可以理解，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尤其受到了德国窘境的困扰。卡尔·雅斯贝斯——纳粹统治前的知识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1945年以后的争论，也是最为著名的对德国内部争论作出唯一贡献的人：1946年他写了文章，论述《德国的罪行问题》。但是西德知识分子刻意回避谈及政治意识形态，这曾在战后最初10年里对把他们边缘化产生过最大的作用，当时西欧的公共话题都强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响。

在这些年里，英国人也完全处于欧洲知识生活的边缘，当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国对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争论也很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的矛盾冲突胜过了和平主义，经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工党和知识分子左派的分裂，这些分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没

〔3〕 颇具典型性的是，布莱希特为避免风险而保留着奥地利护照。

有被遗忘。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法西斯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社会不满变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伦敦的贫民区,193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鼓动大众反对犹太人;大不列颠共产党除了早期在苏格兰造船业和一些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区工厂里拥有强势外,此外就一直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昙花一现的选票达巅峰时期的1945年,也只获得了10.2万张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0.4%),因此只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而这两个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选中,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约4900万人口中只获得了2.1万张选票。

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空想。但在伦敦知识界和大学里,它并不约束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心。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对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如H. G. 威尔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他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并且怀有同感:可以通过上层那些对此最为了解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的左派内务官员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样,没时间来关注这些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小国家的痛苦,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琐事而已。

但是,当这些事情越过英吉利海峡引起激烈争论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样子来鼓动或划分英国的知识分子了。1947年,乔治·奥威尔注意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还远没有达到对他们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争论(而在英国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焦虑产生的最初征兆是对国家“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战后英国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这个国家刚刚经过6年奋战打败了它的死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实验——而文化评论家们却被失败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因此,T. S. 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义札记》(1948)中声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标准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衰退的证据。”出于比较,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三档节目:特设了一档旨在鼓励和传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优质”节目,由那些在欧洲大陆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士编导;但是他们把古典音乐、主题演讲和严肃话题的讨论混在一起,俨然是英国人故意避免会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做法。

英国人并非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学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发表,只要愿意,英国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创痛。1945年9月,西利尔·康诺利在他自己主办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了关于当时欧洲状况的文章,他写道,“从道义和经济上来说,欧洲输了这场战争。正是在欧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们得以成长起来,读书写字、恋爱、旅行,但是这顶文明的大帐篷垮了下来:边绳受到了磨损,中间的支柱断裂了,桌椅分崩离析,帐内空空荡荡,玫瑰正在花瓶

里枯萎凋零……”

除了对欧洲大陆状况的这种关心之外,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评论家们持一种旁观态度,似乎欧洲问题和英国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在关键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4〕英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影响作用,他们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大致说来,那些在欧洲属于政治上紧迫的问题只引起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兴趣;而那些知识分子关于欧洲问题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话,通常也只局限于学术圈内。

意大利的情况则几乎完全相反。在西欧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直接经受这场时代灾难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受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长达20年的统治;曾经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西方盟军解放,在历时近两年的拖拖拉拉的战争中遭到消耗和破坏,范围覆盖了全国的四分之三,使得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几乎沦为赤贫。此外,从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个意大利北部几乎都卷入了全方位的内战之中。

207 作为以前的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它在东西方之间都遭到了怀疑。直到铁托和斯大林分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定的边界线还一直是引起冷战的不定因素和发生边界战争的潜在危险。意大利和它的共产党邻国之间一直关系不和,其复杂原因还在于它又是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国家:1946年是435万人(占总数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宣扬拥有交纳党费的党员214.5万名。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区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亚市附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它可以依靠彼德罗·内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5〕而且它那思想精确而又深刻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也广受大众欢迎。

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意大利的知识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并且和共产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占压倒多数的意大利年轻知识分子们,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到过法西斯主义诱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影响的团体。克罗齐明显地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他为知识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准则,但在战后的环境里,仅靠这些还是明显不够的。意大利人实际上面临的确切选择似乎明摆着:要么是政治化的教权主义——形成保守的梵蒂冈(在庇护十二世统治下)和美国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联盟——要么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

〔4〕最著名的当然是阿瑟·科斯特勒,但当时他很容易被看做是匈牙利人、奥地利人、法国人甚至犹太人。

〔5〕在西欧社会中,这些年来的意大利社会党在西欧各国社会党中间与众不同,它倾向并听命于共产党——这种模式只在东欧比较常见。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领导人采纳:像乔奇奥·阿曼多拉、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彼德罗·英格拉奥、卡罗·卡索拉、埃米利奥·塞伦尼等等,这些加入共产党的人,他们都来自哲学和文学界。1946年后,对行动党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因为这个党未能实施战时抵抗运动的想法,表明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进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等种种希望的破灭。当时有位作家称呼他们是“羞怯的克罗齐派”。

作为这片停滞的土地上一种代表进步和现代的声音,以及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实践的最好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学者、作家,他们为党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会主义的光环。但随着欧洲的分裂,陶里亚蒂的策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揭示了斯大林想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一样)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决心;他们的政治策略必须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形式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也必须改为日丹诺夫的毫不妥协的“两种文化”论。此外,美国厚颜无耻的干涉但却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党获得了1948年大选的胜利,战后陶里亚蒂对自由民主党的合作政策就开始显得有些天真了。 208

因此,不管有多怀疑,陶里亚蒂别无选择,只好抓住控制权,并实施斯大林的模式。这在一些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公开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本着自由权利去区分党的政治权力范围——对此他们毫无疑问——和他们享有自主权的“文化”领域范围。共产党文化刊物的主编维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陶里亚蒂:“文化”不可能从属于政治,除非它以牺牲自己和真理为代价。

陶里亚蒂曾在莫斯科度过了1930年代,并在1937—1938年第三国际的西班牙行动中担当过领导角色,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属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可以不受苏联的传诏。维托里尼和他的同伴们必须接受党关于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路线,否则就得离

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共产党更接近于服从苏联权威的道路,使得维托里尼等一批知识分子同它正式疏远了。但除了陶里亚蒂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外,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失去一种非教条式的“光环”,因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大党还在包容着、甚至赞同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思想自主;这种好名声将在以后几十年里对它大有好处。

事实上,非共产党的左派对陶里亚蒂的批评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错误论断,国内外(尤其在海外)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见解,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一样。后来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承认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至少一直维持到1948年,后来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展开的不断批评也并非自愿,但却在意大利政治的紧急关头抑制了左倾者明显转向共产主义。

但是,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西欧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那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原因。1943年彻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抹掉他20年来的统治对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的复杂影响。墨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导向反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影响;法西斯主义公开支持“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推行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鼓励用本国同样的作品来取代那些质量平平的舶来品。

最终,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屈服于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贴;而那些反对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奥·维托里尼本人就曾获得过法西斯政府颁发的文学竞赛奖。维托里奥·德·西卡在法西斯当政时代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战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现实主义伙伴、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其战后导演的影片中明显表现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还拍摄了许多有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像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几百万没有经历过和平统治年代的意大利成年人来说,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统治就是一种正常的秩序。〔6〕

因此,战后绝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问题的立场上的模糊性,由于受到过去威权政治的不当影响过深,而无法参与战后欧洲事务的核心。无论如何,意大利由于长期以来就处于欧洲现代文化的边缘,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6〕 在德·西卡的影片《擦鞋童》(摄于1946年,并以当年为背景)中,一名男子监狱的监狱长不仅行法西斯敬礼——他无法打破这一习惯——还影射出他那毫不遮掩地对墨索里尼时代低犯罪率的怀旧之情。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来,只有一个地方成了适合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的纠结和分化反映并界定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状况。它的竞争者们遭到了监禁,早已自我毁灭或者人云亦云了。自从192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沦入独裁者之手,政治难民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逃向法国。有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并加入了抵抗运动,许多人成了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牺牲品。有些人逃到了伦敦、纽约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归了。还有一些人,像切斯拉夫·米沃什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政治新闻记者弗朗索瓦·费吉托,他们并没有移居海外,直到苏联在东欧搞政变,迫使他们逃离祖国——就这点来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结果,自1840年代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亚当·密茨凯维奇、居塞佩·马志尼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度过流亡生涯以来,法国再次成为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自然家园,成了一处容纳欧洲现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场所。因此,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具有双重的世界性: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个欧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种观点和争论得以扩大,并传向更广的国际听众范围。 210

由于1940年法国惨败后被德国占领,忍辱含羞过了四年,贝当元帅领导的维希政府又道德观念模糊(甚至更糟),战后好些年里,整个国家在国际外交上落入听命于美英的尴尬境地,因而,法国的文化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时代代言人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意义,而且法国政治理论的要旨又体现了世界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欧洲之都。

这一结局在当时具有讽刺意义。是历史机遇在那些年里将法国知识分子推到聚光灯下,而他们本身关注的事情和其他人并无大异。战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忙于清算旧账、物资短缺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困扰来重新阐释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国人对巴黎重要性的自恋情结生动地、不做自我批评地投射向整个世界。阿瑟·科斯特勒回忆说,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这些草原上神圣日耳曼人的小马屁精们”)是一帮“透过墙上的小洞来窥探历史污垢的偷窥者们,”但历史显然提供了他们一次有利时机。

后来标志法国知识分子团体特色的派别在当时尚未立时显现出来。让-保尔·萨特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时,编委会成员不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广泛共识。后者的标签也贴给了阿尔贝·加缪(这令他非常不悦),当时他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并且从他写的日报《战斗》社论版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战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全都抱着一定的“抵抗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只有加缪曾积极投身抵抗运动——阿隆参加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国”组织,而其他人则在被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多少只想着

明哲保身)。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战争年代的斗争克服了“存在还是行动”的两难。因此,他们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必须尽可能地介入历史。他们的处境再也不容这些知识分子享有拒绝政治选择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萨特说:“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尽其所能。”

萨特那一代人宣称从战争中还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也符合了某种程度上的意愿。这远远超出了法国对当时的经历所做的解释:到1945年,许多欧洲人生命中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政治暴力。整个大陆的年轻人在言行上已对公开的残暴行为习以为常,而这只会使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感到震惊。而且现代政治词汇还提供了一种“方言”以帮助唤起国内的暴力和冲突:《精神》杂志的主编、基督教左翼有影响的人物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9年无疑地代表大众发言时声称:在每天都上演对资本主义受害者实施“白色暴力”的时候,谁若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虚伪的。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因而,当激进党的年迈政治家爱德华·埃利奥特(他一直担任“法国民族阵线”主席,直到1957年在85岁时去世)在解放时宣布,除非“法国首先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否则就不会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话语对法国人来说并不显得奇怪,反倒因出于一位来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议员之口而显得更有希望了。法国读者和作家们一向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变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随。萨特及其同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在这方面,他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传统。

在法国人的想象里,这种对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随着对过去法俄结盟发黑了的记忆。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国知识分子满怀同情之心,倾听着共产党对苏联的暴行作出的辩护。当然,辩证法也起了作用。马塞尔·佩居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里著文评论斯兰斯基公审案时,提醒读者说:“一个人处死政敌并不算犯错。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仪式[即公审]看起来却有点像一幅讽刺画。毕竟,这些指控并非显得不合情理。”

眼看着建设中的共产主义,那些访问过苏联集团的法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充满田园诗般的热情。因此,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于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对那批(无疑很茫然的)听众说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已经没了笑声,也失去了歌声。法国处在阴影中。但是,你们发现了幸福的阳光。”第二年,也正是这个艾吕雅在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说道:“一个民族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这样几年之后,幸福才会成为最高法律,欢乐才会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艾吕雅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情绪感染了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1948年捷克政变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确信共产党将变得无往不胜:正如与她同时代的保尔·尼赞在许多年前所写的那样,革命的哲学家只有在他所选择的阶级肩负革命重任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共产党认为自己正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在进步的历史这一边,无论有时候在道德方面发生什么变化。〔7〕

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无处不在而产生的结果。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最多时达到80万人,)但是法国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大选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赢得了28%的选票。和意大利共产党不同的是,法国共产党无需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中-右势力的天主教党。相反,法国社会党出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共产党的策略交往中积累的长期经验,它在冷战初期并未毫无异议地和共产党联合(虽然有少数成员希望如此)。因此,法国共产党比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显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更加孤立。

然而,它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没有同情心。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共产党一直由脾气倔强而头脑迟钝的党的官僚在领导,比如说矿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从1932年起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斯大林认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质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一样——他值得信赖,总是听命行事而从不发问。

〔7〕 保罗·艾吕雅尽管对苏联的文化政策有所疑虑,他仍然拒绝在当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里当着他的工人阶级同志们之面批评日丹诺夫的政策。他对克劳德·罗伊解释说:“可怜的家伙们,那样只会令他们失望。总不能让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感到不安吧;他们不懂。”

并非巧合的是,自从在1939—1940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中逃离法国军队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时光。因此法国共产党是可靠的,虽然严格说来是卫星党,却是宣扬和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有效工具。

战后一代的学生在寻找领导人、行动方向和纪律,以及和“工人们”配合行动的前景,所以法国共产党的异常严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至少持续了好几年;这点和它的捷克、波兰同行们最初在东面几个国家激起了同代人热情的情况大致一样。但是对那些更成熟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共产党内的文化委员们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长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种狂热的正统性,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对他们的进步信念形成了挑战。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共产党绑在一起的作家或学者们像意大利的维托里尼和伦敦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一样,根本无法预料到会失去周转的余地。〔8〕

由于这个原因,巴黎知识分子的天性倾向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可以用来透视冷战时期欧洲信仰与观点的错误路线。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种知识分子派系都追随国内外的政治线路。东欧国家的公审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其中许多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拉兹罗·拉吉克在西班牙内战后就一直被软禁在法国;阿图尔·伦敦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并和一位杰出的法国共产党员结了婚,后来又成了另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丈人;“安德烈·西蒙”(即奥托·卡茨,斯兰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记者圈内赫赫有名,工作表现出色;特莱科·科斯托夫从担任保加利亚驻巴黎外交官时就早已为人熟知——事实上,他在索非亚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缪《战斗》杂志的封面。

巴黎本身还举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年1月24日延续到4月4日。在审判中,克拉夫钦科带来了许多

〔8〕 生活在巴黎的弗朗索瓦·费吉托在若干年后发现,法国共产党谴责他所写的东欧历史著作,把它看作是一种叛逆。而意大利共产党虽有保留,但表示了热情欢迎。

无名的证人来为自己作证；但被告们却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国非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证词：抵抗运动小说家韦尔科，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艺术评论家让·卡索，抵抗运动英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还有其他许多人。这些都证明了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清白，苏联革命信心的无可非议，以及克拉夫钦科供词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实。审判判给克拉夫钦科一个法郎作为象征性的名誉伤害赔偿费。

这种进步的左派在“道义上的”胜利和东欧第一轮的主要公审很相似，而且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取决于是否站在苏联一边——正如萨特在前几个月指出的，“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作出选择。”但对许多批评苏联的人来说，克拉夫钦科远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选择流亡美国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对欧洲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既和华盛顿保持距离，同时也拒绝莫斯科对进步运动的独断控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1950年1月写道，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对他没有友好的感觉：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本国”堕落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德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幸存者；是萨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场短命的政治运动“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发起者。由这样一个人去起诉苏联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一下子就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政治组合力量。达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并被驱逐到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对两位左翼前抵抗运动成员、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这样的冲突说明，过去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现在只取决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单独问题的态度。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

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达官贵人》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说里的时间,使得萨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识到这类事情)。

为了反击罗塞特那批人——并且留住“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各国共产党动用了“反法西斯主义”这根道德杠杆。这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许多欧洲人参与的第一次政治动员经历可能就是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即1930年代的人民阵线组织。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也一直这样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单纯年代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安慰。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语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忠诚二元观:我们是和他们不同的人。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义者)是右翼,我们是左翼。他们是反革命的,我们是进步的。他们代表战争,我们代表和平。他们是恶势力,我们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劳斯·曼1935年在巴黎时的话来说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不是,并且我们反对它。由于大多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在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时,首先都标榜自己反对共产党(这也是战时纳粹主义对那些远在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精英产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对称有序的口号对共产党的辩论大为有利。亲共产主义,或者说反对反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本质。〔9〕

当然,苏联对在战后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它的敌人之后。反法西斯的言语现在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首先是谴责它在保护试图复仇的法西斯主义,然后扩展到将其描述为本身就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力量。当然,使得共产党的这种策略特别有效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复兴的真正恐惧,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种对在废墟上产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情。

“反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运动和结盟的潜在内容,也和战时久受欢迎的苏联形象有关,许多西欧人对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英勇胜利同样感到欢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以明显一边倒的赞许态度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友谊是毫无保留的: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证实了它的领导人体现了他们的愿望。”据埃德加·莫林所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扫清了一切怀疑和批评。它也有助于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然而盟军的罪行却凸现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但对亲俄的知识分子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有必要回顾一下向东几英里之外发生的

〔9〕 因此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6年2月的《精神》杂志上说:“反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一股必然的、相当集中的势力。”

一些事情。西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热情趋于高峰,时间并不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或“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是在它统治最严酷的时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艺术家、教师和新闻记者们经常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而是因他的缺点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规模镇压、苏联共产主义对公审采用的手段达到极致的阶段,那些处在斯大林统治范围之外的男男女女们却受到了这个人以及对他的崇拜的极大诱惑。言语与现实之间的荒诞距离却对那些善意追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有着不可抵抗的魔力。〔10〕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论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尔·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超级伟大的目标。它所犯下的错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观察者眼里,只是为了所谓创造历史而付出的代价。

但即便如此,在冷战初期,要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帮了政敌的忙的话,西欧还是有许多人可能会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以及当地共产党人。这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之一,坚持认为“左翼无敌人”(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对这一条规律都没怎么注意)。当试图阻止弗朗索瓦·费吉托写作有关拉吉克受审的题材时,进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释道:如果关注共产党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国主义者的游戏”〔11〕。

这种害怕为反苏联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担心并不新奇。但从1950年代初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争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犹以法国为最。即使东欧公审最后使伊曼纽尔·莫尼埃和《精神》杂志的许多成员都疏远法国共产党之后,他们还是特别注意不说出自己已经变成“反共产党分子”——或者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反对“反共产主义”本身正在走向一种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10〕 同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西方的毛泽东崇拜也达到了巅峰。

〔11〕 正如雷蒙·阿隆尖锐地观察到的,这些年里的“进步主义”包括“代表了共产党的观点,似乎他们都自发地独立思考过了。”

当时的欧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产党及其友人和辩护者——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的人数比前者多（在苏联集团之外），但也更显得五花八门，他们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质从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批评苏联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恶的人在观点和意见方面相同。这种非神圣的同盟成了为苏联辩护者的主攻目标，有时候很难说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公开发表观点，因为后者唯恐自己被涂上“反动派”的色彩。1948年在纽约的卡内基演讲厅，阿瑟·科斯特勒对大批听众解释说：“如果理由不正当，你没法帮助别人弄正确……这种惟恐站错队的心理，并非政治清白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战后最初10年里，那些真正的反动知识分子根基很浅。即使像法国的雅克·劳伦特和罗杰·尼米尔这种毫不羞耻地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业无望，只能抱着快乐心态，形成了一种新波希米亚式的对不光彩的过去的怀旧情结，炫耀自己与政治无关，并以此为荣。如果时机对左翼有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新一代右翼知识分子将以失败的挑战者自居，把两次大战之间那些真正堕落的、寻求死亡的唯一论作家（如德里厄·拉·罗歇叶和厄内斯特·荣格），转而养成了一种好交际的、好讲究的风格——因而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一帮“年轻的老顽固”。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国和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几乎30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意大利一样，那些活跃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反共产党的激烈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维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聪明才智和218 悲观的天主教传统，继希莱尔·贝洛克和G. K. 契斯特顿之后在英国文化生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当英国保守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空虚乏味感到愤怒或想完全逃避现实生活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开激烈辩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莫里亚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他定期为《费加罗报》撰稿直至80多岁——1970年他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论据几乎充满了伦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尔贝·加缪辩论战后清洗的正当与否，接着又和他的保守派同伙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反对这场战争——他反对共产党，总是同共产党人争论。1949年10月24日，他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解释说，法国共产党认可布达佩斯公审——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种“下流思想”。但在这些年里，莫里亚克对共产党的行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在道德方面对从美国社会来的“外国价值观”的同样不满：和欧洲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他对冷战要求他们和美国结盟这一点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而这对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雷蒙·阿隆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和欧洲政治中心的许多

“冷战勇士们”一样,阿隆对美国抱着极其有限的同情心——他写道,“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适合西欧国家。”但阿隆对战后欧洲政治的核心事实非常清楚:来自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都搅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个地缘选择的问题。要么生活在自由国家里,要么处在苏联的强硬统治下。从现在起,每个法国人都应当表态做个选择。”或者用他在另一场合的话来说:“这远非善恶之争,而是好恶之选。”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派的阿隆和路易奇·爱因诺第,还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比起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和美国有关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明显怡然自得多了。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这部分是因为对F. D. 罗斯福总统还记忆犹新,最近几年里和欧洲人打交道的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的。

但这也是美国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劳联—产联、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把温和的、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看作是阻碍共产党发展的最佳障碍,尤其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们把希望和大量资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党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这场赌博还未见胜负。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随着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变以后,西欧社会党人就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之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者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召来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时又从东欧传来了社会党人被捕和监禁的消息,这就使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对苏联集团的顽敌,转而准备接受美国的金钱援助。

对于像法国的莱昂·布吕姆、德国的库尔特·舒马赫那样的社会党人来说,冷战提供的政治机会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并不陌生:他们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结盟之前那些党内兄弟间互相残杀、斗争不断的阴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记。年纪稍轻的一代人可没有这样舒心了。阿尔贝·加缪——他于19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

种怀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战斗》报的领导权,比起三年前来,他不再那么具有政治自信和乐观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说《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他的政治伙伴所走的强硬路线这一政治现实感到不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尔鲁之口,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已决定舍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来评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然而,加缪还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站出来,和他以前的朋友们决裂。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试图将“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批评”同“对美国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评”之间作出“客观的”平衡。但是,对罗塞特的审判及东欧发生的系列公审破灭了他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笔记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遗憾是我太相信客观性了。客观性有时候是一种宽容。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称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我将不再彬彬有礼。”

220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种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讲话的无意识的回应,两年前,即1947年6月,在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就“智慧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无耻”发表了讲话——对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们的沉默表示公开忏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样,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以及一切自由主义原则都摆在了书架上。”就像西洛内还将继续在理查德·克罗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败了》里发表一篇好文章一样,加缪由此成了一位攻击“进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评家,尤以1951年他的论文、谴责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为巅峰之作,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最后决裂。萨特认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阶级。对加缪和西洛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战的界线就此划定。

时隔几十年后,再去回顾和捕捉早年发生的这些强烈反差和冷战言论,确实比较困难。斯大林还不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释说:“人们以为可以通过骂我们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们共产党人了。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誉。”而许多天才的非共产党人也同样不大愿意谴责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开脱他们的罪行,或为他们找借口。对苏联统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随着许多误解——更糟糕的是——还牵涉到了美国。〔12〕

〔12〕 有一件事在无意中讽刺地描摹了这份报告中的情感,在1948年4月,布拉格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共产党教师如此说道:“孩子们,你们知道,在美国,人民生活在地上挖的洞穴里,成了少数资本家的奴隶,所有的利润归资本家拥有。但是在苏联,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我们布拉格的人民也很幸福,这得感谢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政府。现在,孩子们,请跟我一起大声说:‘我们满心欢喜,拥护哥特瓦尔德政府。’”

美国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也遭到了共产党言语的激烈攻击。这是一种机敏的战略。美国在西欧并不广受欢迎,虽然它在欧洲经济复兴上曾给予某些国家慷慨资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国成年人认为马歇尔援助计划不会给法国的独立带来严重威胁,1948年的战争创伤和两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共产党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生殖器;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生殖器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221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西德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译注:但泽是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的旧称。)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西德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东德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

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222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度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科斯特勒、雷蒙·阿隆,A. J. 艾雅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

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同年《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 223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科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福布莱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晚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西德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佣了1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 224

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科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特·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佩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对手。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225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13〕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19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并且——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

〔13〕 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写道:“在如此熟悉的领域里,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愚蠢的低能。却又不得不原谅那些罪行,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罗伊在战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右翼行动党人物。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226

战后的生活居然没什么变化。

——戴维·洛奇

“我早年住在工厂区的镇上，生活在砖墙和煤烟灰之中，铺满了鹅卵石的街道两旁烟囱高耸。路程短的话我们就乘坐街车，长了则坐火车。每一餐都购买新鲜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对食物考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冰箱（那些不易变质的东西都藏在地下室里）。我母亲每天大清早冒着寒冷就起床，生火点燃客厅里的炉子。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永远都是冰冷的。我们通过信件交流沟通，主要从报纸上得悉新闻（然而我们还是很时髦，因为我们拥有一台像文件柜那样大小的收音机）。早年的教室里都装备了肚子鼓鼓的炉子，双人课桌上刻有放墨水瓶的凹槽，可以用来蘸笔尖。在举行 12 岁成人仪式前，男孩子们一律穿着短裤。等等。但这一切并不是出现在尚未经开发的喀尔巴阡山区，而是在战后的西欧，这里的‘战后’时间一直延续了将近 20 年。”〔1〕

比利时作家吕克·桑特对 1950 年代工业区瓦龙尼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时的大多数西欧国家。笔者成长于战后伦敦市内的帕特尼区，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经常光顾一家布满尘埃的糖果店，店主是位干瘪的小老太，不无责备地对我说：她“从女王登基 50 周年纪

〔1〕 吕克·桑特，《工厂真相》（1998），第 27 页。

念日起,就一直卖大块硬糖给你这样的小男孩了。”——也就是说,从1887年就开始了:当然她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2〕在同一条街上还有家杂货店——名叫桑斯伯雷——地上铺满了木屑,店里挤满了身穿条纹衬衫的壮汉们,那些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则系着浆过的围裙、戴着帽子。看起来就像1870年代小店刚开张时所拍摄的那些挂在墙上发黑了的老照片里的场景。

就许多本质特征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10年里的日子和50年前的男男女女们所过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在那几年里,煤炭产量还是只能满足英国燃料总需求量的90%,满足比利时等国新建的欧洲煤钢联合体82%的需求。部分地由于伦敦煤电产业带来的全局影响——伦敦市满是电车和船坞——导致经常出现烟雾笼罩,和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景象十分相似。那些年里的英国电影也染上了明显的爱德华王朝的情绪——无论是在社会背景(例如1948年的影片《温斯洛男孩》)还是在时代主调上。在影片《白衣绅士》(1951年)里,当时的曼彻斯特被描述为一个具有19世纪特色(手推车、房子和社会关系)的城市;老板和工会领导人携手,把企业的外行做法看作是美德,而不管付出了多少牺牲生产效率的代价。每周有300万英国男女去光顾持执照营业的舞厅,在1950年代早期,仅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镇就有70家工人俱乐部(虽然当时的年轻人正在对这两种社交活动失去兴致)。

同一种仿佛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弥漫在欧洲大陆的上空。米勒如此描写比利时的乡村生活:木耙拢着干草,连枷打着秸秆,马车运载着手摘的蔬果。和在法国外省的乡镇一样,头戴贝雷帽的男人们在回家的路上,从街角的“安宁咖啡店”(1919年时取此名者较盛)买些法式长棍面包;而西班牙则封闭在佛朗哥专制统治的阴影里,比利时和英国则笼罩着一种爱德华王朝沿袭下来的拘束感。19世纪经济革命的灰烬仍然在战后的欧洲散发着余热,顺其自然地往前走,留下了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的积淀,与拥有飞机、原子武器的新时代显得日益格格不入。说起来,那就是战争逆转了一切。1920年代延续到1930年代的现代化热潮已消失殆尽,只留下了老掉牙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多数乡村一样,儿童在完成小学学业的同时(甚至根本未完成学业)就加入劳务市场;1951年,年满13岁的10个意大利少年中只有1个还在上学。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复权威之后,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动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并重新发起了反对革新的运动: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协定中,佛朗哥不仅免去了教会的税收,允许教会全面干政,还赋予它审查它所反对的一切作品和言

〔2〕她并不是唯一一位抱有维多利亚式幻想的人物。当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曾经提醒公众:1898年9月他曾在英军骑兵部队任职——在苏丹的奥姆德曼。

论的权力。作为回报,教会统治集团负责维持并加强宗教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保守势力。实际上,教会已经完全投身于阐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责任,而小学的主要历史课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于1943年)把西班牙历史说成了一个独特的、天衣无缝的故事:始于伊甸园,终于最高统帅。〔3〕

228 为此他们还为那些死者编造了一个新的受崇拜的名称——在最近的内战中属于胜利者一方的“烈士”。在几千个纪念地,西班牙教会组织了无数次纪念仪式和纪念会,祭祀同反教权的共和主义作战而死的人。这种宗教的与世俗的权势之间的审慎混合及其对胜利的纪念活动,加强了教会统治集团在精神领域和人们记忆上的专制统治。由于弗朗哥对天主教教会的需要远甚于教会对他的需要——西班牙战后和国际社会及“西方”之间的薄弱链接还剩下多少呢——他实际上给予了教会无限权力,以期现代西班牙重建古老政权下的“十字军东征”精神。

在西欧其他地方,天主教会不得不估算着和那些反对大众对教会忠诚的呼声进行较量;但是即使在荷兰,天主教统治集团还是有足够信心,把那些在战后第一轮选举中投票选举它的劳动党对手的选民逐出教会。直到1956年,即教皇庇护十二世去世、标志着旧秩序终结的前两年,十分之七的意大利人还是定期参加礼拜天的弥撒。在弗兰德斯,意大利的教会赢得了尤其是保皇党人、妇女和老人们的拥护——他们明显地占据了整个人口的大多数。1947年3月通过的意大利宪法第七条从法律上承认墨索里尼1929年和教会签订的宗教协约有效:天主教统治集团保留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并享有一切有关婚姻与道德方面的监督权。在陶里亚蒂的坚持下,连共产党也只好不情愿地投票通过了这项法律,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梵蒂冈在第二年将那些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的选民开除教籍。

在法国,天主教统治集团和它的政治拥护者们感觉非常自信,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在“学校之争”中获得特别的教育优先权,直接地再现了1880年代的政一教之争。争执的主要事件是国家投资资助天主教办学的老话题;这一要求很传统,但是经过精心挑选。推动过19世纪反教权主义的那股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大部分已经消融了,仅剩下的也都转向了时下的意识形态之争,至于他们子女的教育成本和质量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鼓动那些甚至是频繁去教堂的人的议题之一。

〔3〕 高中历史教科书上关于弗朗哥上台执政一事的叙述是明明白白的:“经历了三百年之后,西班牙的未来同往昔的命运紧密相连!……古代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逝者和生者行进在充满基督教义的大道上,在这个早已变化的世界和灾难动荡的中心,深深扎根……这是上帝赋予当今西班牙的一项伟大的重任……一种罕见的天命……通过帝国,走向上帝!”(费里齐亚诺·塞雷西达,《西班牙帝国与民族史》,马德里,1943,第273-274页)引自卡罗琳·波义德《祖国历史:1875—1975年西班牙政治、历史和民族同一性》(普林斯顿,1997,第252页)。

在欧洲的各种传统宗教里,只有天主教的人数在四五十年代还在很活跃地不断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只有天主教会才直接拥有政党(而有些政党则是依附于它以求得支持)——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情况就是如此;还有部分原因是

229

在这些年里,天主教早就在传统上根植于欧洲那些变化不大的地区。但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可以为它的教徒们提供一些当时特别稀缺的东西:一种延续感、一份安全感和一种安抚,这个世界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此后的岁月里更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天主教会与旧秩序相伴,实际上它坚决反对现代化和变革,这使它在这过渡的年代里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欧洲西北部的各个新教教会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在德国,非天主教人口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都处在共产党统治下;德国福音派教会由于和希特勒妥协而多少招致一些破坏,1945年新教领导人在斯图加特的罪行忏悔会上遮遮掩掩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主要问题在于,在西德和其他地方都一样,新教教会没有与时俱进、为现代社会提供选择变更的机会,而是只想着如何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处。

按照传统,新教徒牧师或者圣公会牧师的精神权威并非用来同国家竞争,而是作为服从国家的协作者——这也是当时中欧新教教会未能抵挡得住共产党国家压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西欧国家开始加强并担当起其公民精神和物质上的保护人角色时,教会与国家之间在由谁来充当公共行为和道德的仲裁者这点上,其区别开始变得模糊。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就因此表现为过渡时代,社会对地位、权势的追求和尊重的传统仍然摇摆不定,但是现代国家却开始取代作为集体行为仲裁者的教会,甚至取消等级。

这个时代的特征在BBC(英国广播公司)1948年内部员工指导手册(《BBC各类节目——作者及制作人政策导引》,1948)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面向公众的广播公司将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BBC]可能对听众产生巨大影响,因而相应地对高标准的品位也负有高度负责。”禁止开宗教玩笑,就像不可以把老派的音乐鉴赏趣味说成是“B. C.”——“Before Crosby”。* 不可以谈及“厕所”,不可以取笑“男人的娘娘腔”。禁止作家使用战争期间流行的用来轻松气氛的笑话,也不可以使用暗示性的双关语,例如提及女性的内衣时说是“冬天来了”(“冬天穿上”)。严禁使用任何性暗示——不准说“兔子”(“姑娘”),也不可以说“动物习惯”(“肉欲习惯”)。〔4〕

* Crosby:指Bing Crosby(平·克劳斯比),30年代百老汇著名歌手。此处利用英文缩写做双关语。——译注

〔4〕战时英国的幽默主要集中在物资短缺、轻度的性影射,以及对美军士兵享有过分特权的私下怨恨。有时候这种幽默会三者合一:“你听说过有种新型的实用(Utility)内裤吗?拉(Yank,另一含义是‘美国佬’)一下它们就全掉了!”

230 还有：国会议员们不可以出现在广播节目中，以免有损公众形象，而给人以“不体面”或“不妥当”的印象，也不允许开玩笑，或谈及可能引起“罢工或行业争端，黑市、骗子和懒汉”的话语。这些词语——“骗子”和“懒汉”是泛指那些品行不端的犯罪轻微者，“黑市”是泛指那些规避配额制和其他限制的商人和顾客——至少表明了英国在战后还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直到1950年代，BBC还在斥责流行广播喜剧《恋剧》的制作人彼得·艾登，因为他让“丹尼斯·布鲁德诺克少校（彼得·赛勒斯饰演）”得到一枚大英帝国勋章，获得勋章的原因仅仅是他“在战斗白热化时清空了垃圾桶”（此外，他还允许一位男演员模仿“女王说话的声音”，试图驱赶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一群鸽子）。

这种严格的要求以及他们那种爱德华王朝时代的贵族改良主义腔调在英国颇具特色。但他们的做法对整个欧洲大陆来说并不陌生。在学校、教堂和国家广播电台里，还有在私底下，在大幅印刷品甚至是小报上，以及在公众人物的言谈衣着方面，处处表现出纡尊降贵态度，欧洲人还是遵循着过去年代的习惯和规矩。我们早已指出过，当时有许多政治领袖都是老派人物——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在参观工厂棚户区时表现出了维多利亚式的作派，因此足以说明他后来担任首相时，忽视了英国正在向现代福利社会转型，而这本来可以使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伦敦东部大有作为的。

针对这种旧欧洲形象——正在按照先前的步伐走路，却在突然间，既由于战争爆发而改变了一切，同时又由于受到战前旧俗和习惯的限制——我们必须准确地把现代化形式的首要起源定位为娱乐。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英国，看电影的人数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达到了巅峰，1946年，英国5000家影院共计售票17亿张。同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周都光顾当地电影院。即使到了1950年，尽管观众人数已经开始滑坡，英国成年人每人平均每年看电影的次数还有28次，这一数字几乎比战争爆发前一年高出近40%。

当英国电影观众人数在50年代里开始逐步下滑时，欧洲大陆的观众人数却还在继续上升。1950年代上半期，法国新开张了1000家电影院，西德的数字也差不多；在意大利出现了3000家新的电影院，到了1956年，全国拥有总计约1万家影院。1955年意大利电影观众最多，约有8亿人次（总人口和英国差不多，但只有英国一半的票房）。法国观众在1940年代末人数最多，但其人数和英国、甚至意大利都无法比拟。^{〔5〕}西德也无法与之相比，直到1959年，联邦共和国的电影观众人数才达到了高峰，但以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观众人数确实还是很多；即使在西班牙也一样，1947年，那里的成人观众平均每人看电影的次数也在欧洲最高之列。

战后的这股电影热，部分是因战时禁锢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电影的热情被激发了起

〔5〕 但请注意，法国关于电影方面的出版物却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来——因绝大多数美国片受到了纳粹分子、墨索里尼(1938年后)和法国贝当政府的禁映,当然总体上也是因为战时影片的短缺。1946年,87%的意大利电影院放映的是外国片(大多数是美国片);从1939年到1950年代末期,在马德里上映的约5000部电影中,有4200部是外国片(又是美国片占多数)。1947年法国电影业生产了40部电影,相比之下,却从美国引进了340部片子。而且美国片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还广受大众欢迎:战后柏林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淘金记》,另一部是《马耳他之鹰》(拍于1941年,但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在欧洲上映)。

美国主宰了战后欧洲的电影院,并非因为它的奇思怪想迎合了大众趣味,而是因为政治内容:“积极的”美国电影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关键时刻大批涌进了意大利;美国国务院鼓励派拉蒙电影公司重新发行《妮诺基卡》(1939)以在大选中帮助赢得反共选票。相反,华盛顿要求约翰·福特的《愤怒的葡萄》(摄于1940年)暂缓在法国的放映:法国共产党有可能会利用影片中描绘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不利一面。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电影成为美国魅力的一部分,也成了文化冷战中的宝贵资产。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被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中所描述的敖德萨所深深感动,从而将审美鉴赏转化为政治上的亲近感;但是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会欣赏亨弗莱·鲍嘉。

然而,美国电影进军欧洲市场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美国影片一向出口到欧洲并赚了大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片人受国内票房萎缩和制片成本上涨的挤压,在进入欧洲市场的竞争上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欧洲政府与以前相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美国产品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当地的电影业,尤其在英国和意大利更明显地需要政府保护,不受美国片“倾销”之害;而且美元实在紧缺,不能多花费在进口美国片上。

早在1927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关于配额制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要求1936年英国放映的电影中必须有20%的片子是国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在1948年把这项比例提高到30%,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追求着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目标(当然德国电影业不会要求得到这样的保护措施)。但是好莱坞不断游说、施压,使得美国国务院对欧洲谈判者施压,从而达成有条件的协议,把允许美国片进入欧洲作为战后最初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达成主要的双边贸易和借款协议的一部分。 232

因而,根据1946年5月签订的布吕姆—巴恩内斯条约,法国政府很不情愿地降低了对法国电影行业的保护性配额,把国产片每年55%的配额比例减到30%,结果一年后,法国国产片产量减了一半。英国工党政府同样也未能抵挡住美国进口片。只有佛朗哥在西班牙成功限制了美国电影的进口(尽管1955—1958年美国制片商试图在西班牙市场进行“联合抵制”运动),主要是因为他并不需要看大众的反应行事,而且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

的决定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和。但是我们看到,即使这样,美国片在西班牙还是远远超出了它的国产片。

美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当1949年以后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向影院票房收入征税来补贴国产制片商时,美国制片商就开始直接投资海外制片市场,他们对欧洲市场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当地的“国内”政府补贴的多少来决定拍片数量。接着,欧洲各国政府马上就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通过当地的中间商间接地补贴着好莱坞。到了1952年,美国电影业40%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其中又以欧洲居多。6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0%。

美国影片主宰欧洲市场后,要想通过这一时期的欧洲电影来了解欧洲观众的经历或感受就不足为据了。尤其是英国观众更倾向于通过好莱坞电影所反映出的英国特性、而非英国人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表现当代英国。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的影片中有一部《米尼弗夫人》(1942)就是纯粹好莱坞片子——它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故事,表现出了英国人的坚忍与耐力、英国中产阶级的缄默与毅力,背景选择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期,从而将这些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对那些首次观看这部影片的英国人来说,就会在脑海中长久地认为这是对英国历史和自我形象的真实表现。

美国影片除了它的美艳光彩给身处灰色环境中的观众带来感官魅力外,其魅力还在于它的“质量”。它们制作精美,通常都是用帆布来放映,这是资源匮乏的欧洲制片商无法企及的。但是它们也并不像1930年代传统风格的“荒诞”喜剧或浪漫片一样来表现“逃亡者”。实际上,40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些美国片是(正如后来的欧洲大陆影迷所称的)“黑色影片”。它们的背景可能是一个侦探故事或一场社会剧,但是格调——和拍摄的质感——却比前几十年的美国片更阴暗、更沉闷。

233 这一时期,倒是欧洲人老是喜欢拍些关于逃亡的片子——就像50年代初德国那些空洞无味的浪漫片,场景选在如童话故事中风景的黑森林或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或者像英国拍摄的轻喜剧,如《皮卡迪利大街轶事》(1946)、《花园街之春》(1948)和《伦敦五月集市》(1949),这些片子都由赫伯特·威尔考克斯制作,场景选在时尚的伦敦西区(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少),由安娜·尼格尔、迈克尔·瓦尔丁、雷克斯·哈里森分别扮演初涉社交界的聪慧少女和古怪任性的贵族老爷。而那些令人难忘的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则都是些化妆时髦的故事,剧中的农民和贵族则经常被机械师或商人所替代。

战后10年里最受欢迎的欧洲电影——那些观众们后来最欣赏的片子——不可避免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讲述战争。欧洲解放后短期内拍了许多有关“抵抗运动”题材的片子——《刽子手》(1945)、《末日审判》(1945)和《铁道战》,所有影片中都把英勇的抵抗者和懦弱的通敌者、残暴的德国人之间划上了一条道德鸿沟。紧接着的一部分电影的故事背景(如实也罢,想象也好)都选在了柏林的瓦砾堆上:罗贝特·罗西里尼的《德意志

零年》(1947);由美国籍奥地利移民比利·瓦尔德导演的《外交事件》(1948);沃夫冈·施道特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这是唯一一部开始在道德观念上涉及并暗示纳粹暴行的德国片(但是整部影片都没有说出过“犹太人”这个词语。)

在这些影片中,罗贝特·罗西里尼执导了三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烽烟》、《德意志零年》。和维托里奥·德·西卡一起,后者导演了《擦鞋童》(1946)、《偷自行车的人》(1948)和《D. 恩贝托》(1952);罗西里尼是1945—1952年拍摄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潮流的代表,新现实主义推动了意大利电影制片人走向世界电影前沿。就像同时代在伊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两部英国喜剧片一样,著名的有《通向皮姆利科的护照》(1949),这些新现实主义影片尤其以城市中战后的毁灭和破坏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成为战后电影的主题。但即便是英国最好的电影,也比不上意大利杰出影片中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探索。

这些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并没有反映出欧洲当时所处的时代,而是反映了战后被滤过的对战争的记忆和神话式的世界。工人、未遭毁坏的乡村、首先是年少的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代表了某些善的、未经玷污的、真实的东西——即使是处在城市废墟和贫困中间——用来反衬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阶级、财富、贪欲、通敌、骄奢淫逸。影片的大部分都不会出现美国人(除了《擦鞋童》中出现擦皮鞋的美国大兵的镜头、《偷自行车的人》中出现的那张好莱坞明星丽塔·海沃斯的电影海报,但这只是为了同那个一贫如洗的海报张贴工人互相对比和映衬);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他们生活在一个毁建参半的城市中,影片几乎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因此也得归功于战时军队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就像战后欧洲本身一样,1952年后这些影片也销声匿迹了——虽然新现实主义还是

234

以某种奇特的后继方式存在于西班牙的生活中,刘易斯·加西亚·贝尔兰加1953年导演了《欢迎你,马歇尔先生》,又过3年,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拍摄了《车手之死》。

和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娱乐一样,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集体愉悦。在意大利的小镇,每周观看上映的电影并对它进行品评,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喜好,是一种可以公开讨论的大众娱乐。在英国,星期六上午放映的儿童专场上,歌词显映在银幕上,一个白色的小圆球会随着乐曲节奏逐词跳动,用来鼓励孩子们跟着一起唱。1946年前后,有这么一首歌一直在战后伦敦南区的孩子们中间传唱: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人人微笑相互致意。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心中珍惜这种聚会。

坐在剧场,我们都是
未来社会优秀公民,
捍卫自由,争当勇士!〔6〕

这种说教的意味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至少不会以如此直白的形式——因而用不了几年就会销声匿迹。但歌词中天真率直的老派腔调在当时仍然很有吸引力。工人大众中流行的娱乐如饲养鸽子、摩托车赛或猎狗赛跑等活动在这些年里达到了顶峰,随后开始慢慢下降,直到1950年代末开始加速滑坡。从观众们所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贝雷帽(法国)和工人鸭舌帽(英国)都是在1890年代开始流行的,直到1950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式。男孩子们的穿着还是和他们的爷爷辈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换上了短裤。

跳舞也很流行,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大兵,他们介绍的旋转舞和博普爵士舞在舞厅、夜总会盛行,电台也广为播放(1950年代中期之前,很少有人买得起录放机,自动唱机也还没有完全取代现场伴舞乐队)。接下来的10年间几乎还未显露出代沟。1947年2月克里斯蒂安·迪奥推出的“新颜”系列——它的挑战性服饰与战时的衣衫紧缺形成了鲜明反差:拖地长裙,“羊腿式”垫肩,缀满了装饰结和褶裥,只要买得起,到处受不同年龄女士的追捧。外在形象更是一种身份(和收入)的象征,而不是年龄的表征。

235 当然,代际张力依然存在。在战争年间,受美国影响的伦敦懒汉、骗子们和巴黎的“小混混们”都穿“佐特服”,引起长辈们的极大不满;40年代后期在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又开始流行粗呢上衣,这种衣服的式样改自比利时渔夫们一直穿的传统外套,这暗示着年轻一代的穿衣风格将是倾向下层,而不是崇尚上流。在巴黎,最顶尖的时尚夜总会“塔布”(意为“禁忌”)于1947年4月开张,它非常慎重地对待服装式样的宽容性。而1949年拍摄的一部法国片《相约七月》,揭示了被宠坏的年轻一代表现出来的缺乏庄重:午餐时,一位传统资产阶级家庭的老派父亲对最小的儿子的行为甚为震惊,特别是因为儿子居然坚持不打领带就坐下来吃饭。

但这一切都只是成长期逆反心理引起的一些小小变化,没什么新奇之处。战后欧洲各年龄段的人都在关心着如何将就度日。1950年代初,意大利的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贫困之中,其余大多数人的日子也好不到那里去。拥有室内厕所的家庭不到一半,只有八分之一的家庭享有浴室。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最贫困区域,生活极端困苦:在位于克罗托内的马尔切萨托乡村,库托镇上唯一的一处公共喷泉要为9000名居民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

〔6〕 特莱弗尔·格仑迪,《法西斯童年回忆录》(1998),第19页。

意大利南部的贫困是一个极端例子。而1950年在西德,全国4700万人口中仍有1700万人仍然被归为“急需帮助”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处栖身。即使在伦敦,那些榜上有名、等待住房安排的家庭,也需平均等上7年才有可能找到住所;在这段时期里,他们只能栖身在战后搭建的“预制件棚户”里——在城市周围的空地上用金属架搭建了许多简易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暂时栖居,等待新的住所完工后再解决需求。在战后的民意测验中,“住房”成了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在德·西卡的《米兰奇迹》(1951)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群高唱着“我们想要有个家,孩子们才会相信明天。”

战后欧洲的消费方式反映了欧洲大陆持续的拮据生活,以及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持久影响。英国实行配给制的时间最长,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对面包实行配额供给,对布券的配给制一直实行到1949年,对军需衣物和家具的管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对肉类和其他许多食品的配给制也到了1954年夏才予以取消——其间由于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礼而有过中断,当时每人额外分配到了1磅糖和4盎司人造奶油。即使在法国很快就取消了配给制(因而黑市亦随之消失),但是在战时实行的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方式一直没有放弃过,直到1949年才开始取消。

几乎所有的东西,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供应量很少(英国工党政府盖建的、最受欢迎 236 的推荐家庭住房,标准是3间卧室一套的居室,面积大约只有900平方英尺)。欧洲人中间很少有人拥有汽车或冰箱——在生活水准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英国,女工们每天要买两次食物,或者步行,或者乘坐公交车,跟他们的母亲或祖母一辈没什么差别。来自远方的商品都很珍贵,价格也很昂贵。在国际旅行方面的控制(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进一步普遍引起受限制的感觉,法律严禁外来务工者和移民进入本国(战后法兰西共和国一直沿袭执行1930年代和被占领时期的法律,严禁输入外国劳工和不想放进来的外国人,只对有实际需要的熟练技工网开一面)。

在许多方面,与1913年相比,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早期的欧洲不够开放和活跃,当然也更显破落。到了1950年,柏林的战争瓦砾堆也只被清除了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不止是在柏林一地。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森描写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是“饱经风霜的英国人用老掉牙的机器在生产”。而在美国,到1940年代末,大多数工业设备使用了还不到5年,战后法国机器的平均使用年龄却已到了20年。通常一位法国农民的粮食年产量可以养活5个法国人,而一名美国农民的年产量却达3倍之多。欧洲人为40年来的战争和经济萧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后”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把战后所经历的困苦时期和即将来临的繁荣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延续得远比历史学家们设想的长久。在当时,欧洲很少有人(无论得到多少消息)会被告知或预料到,即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之规模会有多么巨大。过去半

个世纪的实际经历使他们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和怀疑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是块乐观主义的大陆,政治家和评论家们都对未来满怀信心。30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们的眼睛还是紧张地盯着可怕的未来。许多观察者对未来的预期都是:又一次的战后大萧条、政治极端主义的再现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但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这种集体性的悲苦情绪产生了一种深层意义上的反政治化效果:远非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方式求助于极端手段解决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暗淡岁月里,欧洲公众远离了政治。这种变化在当时只能隐约感觉得到——法西斯和共产党都难以应付日常的生存;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把政治作为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语言;国内娱乐和国内消费的出现,取代了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参与。

237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事情。《纽约客》杂志的詹妮特·弗莱纳注意到,在1946年5月,战后法国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内衣)最受欢迎的“实用”品是婴儿车。多年以来第一次,欧洲人又开始生儿育女了。1949年英国的出生率比1937年高11%;法国更是前所未有地上升了33%。这次生育高峰的来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大陆自1913年以来,主要的人口指标一直未能上升。在更多的方面,大多数同时代人可能并没有预见到: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

第二部分

繁荣与不满：1953—1971

第 8 章

政治稳定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 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 J. H. 普拉姆在其研究 18 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 19 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这一切离事实不会太远（……）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1〕

242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 1950 年代的上半叶。

从 1945 年到 1953 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 1919 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 1950 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 年 7 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 1950 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 1920 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 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被一时压制着，但总有一天会提出来，并且由强国

〔1〕 J. H. 普拉姆，《18 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政治稳定发展过程：1675—1725》（伦敦，1967），第十七章。

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19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还是认为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因为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退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中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东德和他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西德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五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道借口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

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应当坚持原有的联邦共和国,而并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西德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2〕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法朗士做出了正
245 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法朗士采取克制态度,转而将这件事处理成了信任问题,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

〔2〕1951年3月,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克服了国内相当大的中立情绪,极不情愿地同意把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并且在1954年准备好5个师供调动。

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缠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3〕——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明显目的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4〕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西德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 246 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法国人对此态度犹豫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是明摆着很不满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后10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撤消盟国高级委员会那天,苏联宣布成立“华沙条约”国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

〔3〕 据艾登所说,这些想法是他在早上洗澡的时候冒出来的。

〔4〕 唯一一条明显限制德国重整军备的条件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将来,绝对禁止德国实施核武器计划。

巴尼亚和苏联结成联盟,为了“友谊、合作和互助”,接受统一指挥。莫斯科废止了和英、法缔结的战时结盟条约,别无选择地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其纳入华沙条约。虽然“德国问题”并未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双方都整个地融入了各自的国际联盟,使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决的难题,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来替代。

此刻,德国近期的问题解决了,双方都迫切地去面对那些次要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欧洲严格奉行他们自己的“和平共处”方针,和美国一起将可能引起未来冲突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在宣布“华沙条约”的第二天,四大国签署了《奥地利立国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将成为独立国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约组织,也不加入华沙条约,可以自由选择道路。〔5〕四国的占领军准备撤军——虽然苏联早就从其奥地利东部占领区内攫取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却还要求得到最后的一磅肉:要求奥地利再付给苏联1.5亿美元,“买下”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南面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了协议,结束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僵局。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从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协议:的里雅斯特市留归意大利,但其周边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外围地区应该返归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协议和那些年里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阿尔伯托·塔奇亚尼的话说,的里雅斯特协议“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它是最终条款。”

247 在处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缓和”情绪,它使那些关于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协议的制定成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内瓦(自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召开的峰会为标志,它接受了16个新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打破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东西方敌对的死结。除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艾登之间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外,日内瓦会议上解决的最重要议题是还留在苏联手里的1万名德国战俘的命运。作为对1955年9月阿登纳出访莫斯科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回馈,苏联领导人同意遣送这些人回德国:当年遣返了9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国。此时,德国西邻的一些小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波恩达成了最后的协议。1955年,丹麦就少数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一年后比利时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卢森堡大公国直到1959年才和德国达成协议,而荷兰则等到了1960年才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言而喻,本

〔5〕 在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没有关于奥地利中立的内容;但在辩论立国条约时,奥地利议会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内容。

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欧洲战争的罪行、遭受的惩罚及带来的后果。

这些安慰性的进展是在重大的国际军备竞赛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吊诡式的现象——虽然当时两大强国正在全副武装为最终的热核战争做准备,但是欧洲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在成形——它实际上并不像其表面显现的那么怪异。美国和苏联越来越重视对核武器的战略思考,以及洲际导弹及其运载问题,这就把欧洲各国从它们在资源舞台上无法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解脱了出来,尽管中欧最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战区。因此,这些年里西欧经历的冷战和美国甚至苏联所感受的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美国的核武器在19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19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

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西德;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组织即将“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欧洲战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成为西方联盟的防卫策略之一。为了让苏联相信西方联盟可能真的对其开火,他们想废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约组织委员会上解释说:“面对目前存在的威胁,美国认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对于捍卫北约地区的安全是关键性的。总之,这些武器现在都应当被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

北约组织的核武器化和欧洲大陆的稳定并非事出巧合。同样在苏联看来,中欧和西欧的常规战争已经逐步丧失了他们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也正在储备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当时只有5枚,但到了1950年代末就已经制造了约1700枚核武器。但苏联强调的重点是要提高核武器的发射能力,不是射向欧洲战场,而是要跨过大洋,与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本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德国设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的“导弹差距”说,成了苏联

的宣传中一项令人觉得神秘而又成功的比武演习；当时大家还公认苏联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20年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注意到，赫鲁晓夫及其高层官员们早就凭直觉了解到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但是苏联在增强导弹能力上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苏联第一次成功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57年8月，比美国早5个月。接下来，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再次证实了苏联的实力（令美国非常恐惧〔6〕）。

249 弹道式武器——可以从苏联内地发射核武器弹头瞄准美国的洲际导弹——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独具魅力。它们比常规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鲁晓夫在保持重工业和军事方面发展的同时，转移其他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结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减少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一点双方都将体会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在形式上看来更加趋于好战——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并想要使用它们，这一假象看起来很重要——但事实上却使战争进一步遭到了制约。

对美国人来说，核武器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从欧洲事务的纠纷中抽身而出，他们的卷入早已背离了建国领袖们最初的美好愿望。欧洲的核武器化是解决此事的一种途径。今后将没有必要让大批美军士兵长期驻守在欧洲的腹地了——政治家们和军事战略家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欧洲能够实现自我防卫，一旦苏联发动袭击的话，美军会坚决保证支持欧洲实行大规模的核武器还击。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反复重申，美国在欧洲驻军一向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给我们的海外友人们带来信心 and 安全感。”

美国一直未能实现从欧洲撤军的原因很多。在全欧洲的集体要求下，临近1950年代末时，美国一直在想法促成欧洲集体指挥下的核震慑能力。但英国和法国都不太喜欢这一想法。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原则上都反对核武器。1952年8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颗钚弹；14个月后，英国皇家空军装备了第一颗原子弹。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把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转换到核震慑上来：实际上，英国的敦促在说服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拥有核装备发射能力的美国轰炸机在英国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7〕

〔6〕并非只有美国人对苏联展示的武器和军备实力深感恐慌。1960年英国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私下得出结论说：“他们〔苏联〕将不再害怕任何侵略。他们至少拥有和西方一样强大的核武器。他们有了内部〔通讯〕线路。他们结成了经济合作联盟，并将很快在物质财富竞赛中超过资本主义社会。”

〔7〕关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英国人（如果确有其人）到底是怎么说的。当时（1952年），丘吉尔—杜鲁门联合声明曾含糊其辞地宣布“在危急时刻，这些基地可根据共同的决定付诸使用……以当时的情形而定”。

法国人也有一项原子武器计划,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士的认可,但是法国独立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欧洲防务组织;法国人尤其怀疑美国人可能会让德国获得发射核武器权。美国人不太情愿承认他们驻守在欧洲是责无旁贷的,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欧洲盟友们所乐意听到的话。〔8〕

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桩事件是柏林问题。由于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遭到了失败,使德国前首都有点像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东、西柏林之间通过电话线和其他穿越各个占领区的交通网络继续保持着联系。同时,柏林也是东欧得以进入西欧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国人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意角落涌向东柏林,沿着和西柏林相连接的公路或铁路线,从苏联占领区进入西方盟军占领区,直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区。只要能够顺利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就自动成为西德公民。 250

然而这样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危险。那些逃亡者只能携带一些力所能及带走的东西。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那些东德的年轻人铤而走险。从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约有280万到300万的东德人通过柏林来到了西德,约占东德总人口的16%。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这些男男女女曾经是东德的未来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为了躲避1952年农村集体化的农民和经历了1953年6月那场残酷的压迫后逃离东德的工人。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东德共产党政府十分尴尬,给它处理公共关系带来了灾难。1959年12月,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斟字酌句地对莫斯科说:“目前柏林开放的现状,确切地说,这座城市中两部分之间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受管制的边界线,让人们两边做出草率的比较。很不幸,这种比较并不是对民主德国有利。”柏林的这种状况既然可以为莫斯科所利用,当然也能为他人所利用——这座城市成了冷战中重要的情报通讯站和间谍中心;到1961年为止,那里大约有70家不同的情报机构,也正是在柏林这里,苏联的间谍机构取得了一些最辉煌的战绩。

不管怎样,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把德国东部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无法继续对大批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漠然视之。并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国际上对柏林的直接关注,在该城市的地位问题上造成了长达3年之久的国际

〔8〕 1956年11月,美国施压要求英、法两国撤离苏伊士运河(见第九章),这使得北约国家害怕一旦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又可能会退回美洲,弃毫无保护的欧洲于不顾。因此华盛顿方面有必要事先做到“立场坚定”,先是在柏林,后来是在古巴,安抚那些需要美国保护的易受侵略的盟国。

危机,从而伤害了东德领导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苏联开始重新担忧美国人这次有可能计划采用核武器来武装西德同伴。看来这点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多虑——毕竟很多西欧人也都有过这种想法。因此,赫鲁晓夫开始利用柏林——这座俄罗斯人原本毫无兴趣的城市——作为一种压力来阻碍波恩的核武器化,因为他们对波恩还是非常在乎的。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公众演说,对西方列强宣称:

251 帝国主义分子们使德国问题变成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长久根源。西德统治者在尽其所能地煽动军事激情以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讲话、联邦德国防御力量的原子弹装备和各种军事操练,都明确表明了西德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是时候了,波茨坦公约的各签约国应该放弃对柏林剩余地区的占领权,从而提供可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一切正常化。苏联本身将把控制在苏联各机构手中的权力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这次挑衅的公开目标是要美国人放弃柏林,并允许它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两周后,这一愿望显得更为迫切,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方各国下定决心在六个月内撤离柏林。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集体承诺捍卫西欧的可信度就将遭受严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对核武器的呼声将在西德和其他地方越来越盛。然而,即使西方列强坚持暂时逗留在柏林,苏联也会有可能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西方同意不给波恩任何核武器。

西方领导人拒绝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他们宣称苏联自己违背了波茨坦公约:在达成最后协约前就把东柏林纳入了东德政府体系。赫鲁晓夫又作了一次尝试。在1959年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长会谈失败之后,他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主张,先是在1960年,接着又在1961年6月:即必须结束西方军事力量对柏林的占领。否则,苏联将单方面撤离柏林,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让西方和独立的东德去谈判其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机逐步激化,外交形势紧张,大批东德人像潮水般移居国外。

1961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下达了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上届高峰会议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举行的,但当时因苏联击落了美国空军飞行员盖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而被取消了,美国很不情愿地承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高空间谍活动(最初曾全盘否认说对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到本年底还未见结果的话,他将“清

洗”西方在柏林的权力。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一样,采取的是强硬路线,坚称西方国家永不背信弃义。华盛顿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约行使权力,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用来支持驻守在德国的美军。但在非正式场合,美国却显得比较圆通。美国人——和他们的西德同伴不一样——接受了东德国家存在的这一事实,理解苏联对阿登纳、尤其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最近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调子。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德国局势向前发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所说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在今后五十年里囿于这一小块地方”。出于同样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向赫鲁晓夫保证说美国并不“想因此而剥夺苏联与东欧之间的联系”:这暗示着承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以及原德国所属、现归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领土。〔9〕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东德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一劳永逸。1961年8月19日,东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筑横穿整座城市的分离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草草砌完了整座墙,使它足以阻止柏林东西两端的日常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这道墙又进行了加固和抬高。接着又安装了探照灯和带刺的铁丝网,并配备了岗哨;那些紧挨着墙壁的建筑物上的门窗先是被封闭,后来又用砖堵死。街道和广场被一分为二,两边的跨城交通联络要么得服从封锁政策、要么被完全中断。柏林建了“柏林墙”。

西方盟国当真害怕了。1961年10月,连着三天,苏联和美国的坦克车互相对峙在划分各自地界的关检口——这是他们之间仅剩的最后联系之一——东德政府以此来考验西方列强的意愿,来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拥有进入东部地区的人境权,是否遵守四大强国之间的协约。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东德有权妨碍盟军的行

〔9〕 肯尼迪的讲话不仅属于机密,甚至在当时的峰会文件中都未做记录,直到时隔30年后首次出版时才得以披露。

253 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私底下,许多西方领导人对柏林墙的出现都大大松了口气。3年来,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国际对抗的爆发点,其局势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建立一道横跨柏林的墙壁这一结局远比引发一场战争好多了——不管在公众场合是怎么宣传的,那些西方政治家当中几乎没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们的士兵“献身为柏林而战”。迪恩·腊斯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悄悄地观察到,柏林墙很管用:“用实实在在的话来说,它能使柏林问题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东德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西德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他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

我们注意到,莫斯科其实从未打算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建立庇护国,但却殚精竭虑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个弱小而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以此作为次佳解决方案。反过来,东德共产党人却一直在心里有一半担心着苏联宗主国将来有一天会出卖他们。^[10]因而这道柏林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慰藉,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在建起障碍墙后拒绝继续施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感到了失望。对波恩而言,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担心美国人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华盛顿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们说,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这堵高墙树立起来之后,美国人就明显地默认了这一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虑。因此,柏林墙建立后,华盛顿方面反复承诺,说美国决不放弃他们的占领区,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国共有25万名士兵驻守在欧洲,显然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整个过渡期间都驻守在那里。

254 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欧洲事务的危机区了。虽然时隔10年才达成了正式协议,决定了通道问题,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争端了,西柏林也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甚至连苏联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奇怪的是,西方对此并没有一眼看透。当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及其顾问们都确信,赫鲁晓夫正在精心策划复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达到他在德国的长期目标。这一点他们早就从1948—

[10] 根据1990年发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杜鲁门和艾奇逊曾把入侵朝鲜看作是苏联寻求越过德国分界线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们也把这次古巴安装导弹事件看作是苏联胁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着棋子。古巴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10天里,美国领导人每一小时都在重新考虑西柏林问题,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赫鲁晓夫在这座分裂的城市中预先谋划好的对抗行动采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对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解释说:“不用我指明,您也应该明白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肯尼迪对苏联最近的胆大妄为和宣传之词过于当真,他对美苏关系的理解都围绕着柏林问题来展开了。这就进一步戏剧性地推动了古巴危机,并使之在表面上显露出重要性,导致10月19日肯尼迪对他的顾问们私底下说道:“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古巴,也包括柏林。我们认识到了柏林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些天来导致这件事令人进退维谷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答案会更容易些。”3天前,当古巴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曾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概括说:“我也认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在里面。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想知道赫鲁晓夫先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完全出于理性。”

然而赫鲁晓夫事后得知,对柏林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在欧洲,苏联确实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超强的优势实力,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在任一时间占领西柏林(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发誓说,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西柏林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鲁晓夫可不想为了德国而冒核战争之风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鲁晓夫及其盟国对柏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砌一堵柏林墙。”〔11〕

撇开柏林和古巴,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惊人的速度着手解决第一次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会谈,最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10月10日开始生效,对欧洲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大部分原因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公开目标,而是在于它隐含的“潜在内容”。

两大强国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国和西德之手,这是《条约》的真正目的所在。许诺

〔11〕 安那托利·多勃雷宁,《机密》(时代书局,1995),第46页。赫鲁晓夫确实对战争产生了厌恶。10月26日,在古巴危机达到高峰时,他给肯尼迪的信中写道:“如果确实爆发战争的话,那么凭借我方的力量将无法让它停止,因为这是战争的逻辑。我参加过两次战争,也知道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它将席卷城乡,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满目疮痍。”

建立一个无核化的德国,只是莫斯科为折中地解决柏林问题所寻求的权宜之计;这也是美国为了达成此目的而宁愿在波恩招人嫌恶的原因所在。西德人对德国核武器装备遭否决一事多少有些心怀怨恨,就像他们接受柏林被分裂这一现实一样,这是他们想要继续使美国在当地驻军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该《条约》明显标志着苏联战略重点的转变: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各大陆。

欧洲冷战开始进入稳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热”,而且所有情势远远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掌控范围,反而使得西欧人确信常规战争的爆发似乎早已过时。在1953—1963年之间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在其他地方,战争永远都是解决争端的途径)。假如战争来临的话,那些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超级大国们也就必须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得把它归结为某一方的判断失误。在那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缓和这些结局。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同样的事实有利于激起一场运动,紧急呼吁核裁军。1958年2月17日,英国伦敦有人发起了要求核裁军的运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传统的英国激进派表示不满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倾向的非暴力派,他们首先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是针对苏联人或美国人(英国两大政党都一致确信英国有必要独立拥有核威慑力,然而直到19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导弹和潜艇,英国的炸弹永远不会击中目标)。

1962年,在核裁军运动高峰时期,居然有15万名该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年度游行,抗议在奥尔德马斯顿举办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成立大会。然而,和在西德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那些相同性质的核裁军运动一样,英国的这场运动到了60年代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关联;要想获得证据申明欧洲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新的议题取代了核裁军,被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苏联原来的反原子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也开始不再关注即将来临的核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体民众”。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欧人如果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是赞成核裁军的:1963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意大利人尤其欢迎废止一切核武器。法国人还不是完全的废除派,而德国人和英国人则分为两派,然而他们当中还是以反核者明显居多数。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关于裁军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欧洲的核武器问题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名义上)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机构需要寻求核武器装备。

意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1950年代欧洲政治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它所看到的变动,而是它没有看到的变化。战后欧洲那些自治民主国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惊奇——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发动战争,那些年长的领导者们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条都是“不做试验”。尽管背离了大众的期待,西欧的政治气温还是从过去40年来的高热期降温了。虽然公众仍对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的灾难记忆犹新,大多数欧洲人却轻松地远离了全民运动型的政治。选民(有许多地方的选民中首次出现了妇女)主要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种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意大利的变化尤其惊人。和欧洲的其他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不同的是,意大利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尚待完善,但却将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一状态。这一成果可不小。意大利曾是一个从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存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引起争议。195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里,这批人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257

意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后——战时曾在那不勒斯驻守过的英国军官诺尔曼·路易斯对那不勒斯随处可见的送水人大为诧异,“几乎和庞贝古城湿壁画中所表现的没什么两样。”墨索里尼时期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罚流放到此的一名来自皮埃蒙特的医生卡罗·列维在《基督驻足埃勃利》(初版于1945年)一书中也作了类似的描述,经典地再现了意大利南部贫瘠高原上的边远乡村生活。南部非但没有什么变化,还很穷困。1954年的一份议会调研揭示85%的意大利贫困家庭都居住在罗马以南。在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们在伦巴第的同行所挣的一半。假设当年意大利人均收入为100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则为174;而在最南

端的卡拉布里亚仅为 52。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分裂状态：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从 1943 年 9 月起，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德国人的统治和政治反抗，接着又遭遇了盟军对一些激进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在西方盟军到来后就很快结束了战争。意大利南部地区沿袭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和行政体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将军未经流血事件就成功发动了政变，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间早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差异外，现在的南北部意大利人之间又多了一层对战争的不同记忆。

战后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意大利政府只好对该国令人伤透脑筋的“南部问题”采取新的措施。1950 年 8 月，意大利国会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开辟了用国家财富救助贫困的南部地区的渠道。设立基金这种做法本身并无新颖之处，罗马试图改变南部贫困和无助状况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就具有改革意识的乔万尼·乔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意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移民，而这一做法早在意大利进入现代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无论如何，比起以前的计划来说，基金意味着对南部更多的资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为这更适用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政治机制。

258 共和国的国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倒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官僚人员〔12〕——罗马的任务是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这对多数意大利公民来说是唯一救助途径。通过各种中介公司和控股机构——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业重建局、国家社保局和 1950 年代成立的国家碳氢局——意大利的大型经济部门或由国家拥有，或由国家控股：能源、交通、机械工程、化学以及尤其是食品工业。

无论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战略有多么失策（部分根源在于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运动），它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却十分清晰。1950 年代初期，工业重建局雇用了 21.6 万工人，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些分支部门，更是雇用了几十万人员。基金会支持的合同工劳务——道路建设、城镇住房建设和乡村灌溉系统工程——以及国家补贴建设的新工厂和商业服务业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来源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本身雇佣大量人员：到 50 年代中期，每 5 名公务员中就有近 3 名来自南部地区，虽然该地区总人数还不到整个国家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这些就业安排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犯罪行为的机会；共和国沿袭了原先的统一国家的做法，对此坐视不理。谁掌控意大利国家大权，谁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权。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无论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有多狂热，首要的目标都只是

〔12〕 直到 1971 年，95% 的意大利高级公务员都是法西斯倒台以前的在职者。

为了争夺国家大权,借此途径获得拥有某种特权和恩惠之权柄。一旦这些权柄已稳操在手并得以运作,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徒及其后继者们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技巧就变得无人匹敌。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党先后两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选票(直到1970年代后期,其选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过联合中间派的其他小党派,他们一直顺利执政,直到1963年,他们才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各小党派共享执政大权。除了按传统来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区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来自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亚,以及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些小镇居民投基督教民主党一票,并非出于忠心,而是一种效劳,这一传统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些一次次当选的南部小镇市政厅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们和国会议员们,靠的是向人们许诺说,他们会拥有电力和室内管道,会提供农业按揭、修缮道路、开办学校和工厂,并提供就业——由于该党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地重复这些许诺。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和西德、荷兰及比利时的各基督教民主党很相似。它缺少意识形态根基。当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后任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梵蒂冈教权定期会晤,在立法的提议或支持方面从不违逆梵蒂冈之意;教会对自1861年以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反教会的世俗主义心存报复,战后的意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这种报复的契机。但天主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远远低于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认定的程度。控制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战后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内务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

基督教民主党及时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会救济体系,使之成为意大利国家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其他政党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和地区,比较著名的是“红色”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周边地区,共产党供养着他们的支持者并施惠于他们的救济对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拥有者。要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强调市政管理的正当性和诚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一派腐败,而且和黑手党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瓜葛。1950年代,大规模的腐败几乎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利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南部大城市执政的社会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的副产品。

意大利式的政府并不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但是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地区的公众和市民活动事实上都被划分给各个政治家族。所有的工业都成了基督教民主党“殖民地”。对报业、广播业及后来的电视业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分管;他们偶尔也会给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旧派反教会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贴。所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优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给当地、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从

工会到体育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被分别划归给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等各派去掌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体制总体来说是种浪费,不利于个体创新和提高财政效率。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下文详述)并非得益于该体制,而是在摒弃它之后才产生的。

然而,战后意大利的稳定才是促成国家经济发展和后来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不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多么似非而是,这种稳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组织分布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长久地赞同某一政党或政纲,而按比例来选举议员的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所产生出的议会,也分裂为立法时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战后的共和国宪法直到1956年才由宪法法院裁定,而争论已久的地方自治则在时隔14年后才在议会中付诸投票表决。

260 同样由于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意大利实际上是由那些非经选举而产生的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中央政府和许多半官方的机构。这些明显属于非民主的产物,导致历史学家们多少有点鄙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巧取豪夺的行为到处泛滥,一心只为基督教民主党一党垄断制牟利。^[13]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庇护伞下,面对传统沿袭下来的困难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大利整个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超常的灵活适应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麦的标准来衡量,195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公众道德和体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但是,和过去意大利举国贫困的状态相比,或者和原来经常比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奥地利作比较。两国都曾和德国并肩作战,战后都相应地承受了许多损失(意大利向苏联、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赔付了总计3.6亿美元)。和意大利一样,奥地利也曾是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很难从她的最近历史中重获战后复兴。奥地利两大政治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对于1918年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出现的、被斩头去尾的奥地利国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作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稽之作。在他们看来,旧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德语区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加入德国,成立一个联合体,而且假如《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自决权这一条款能一直生效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奥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各城市中心区的工人阶级的强劲支持。在

[13] 从意大利的早期历史来看,如果将它的体制腐败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并不完全公正。参见艾里克·J. 霍布斯鲍姆的《1941—1949年的世界史》中的“极端年代”一章。(纽约,1994,第238—239页)

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执政期内,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阿尔卑斯山区和天主教辖区——都投基督教社会党的票,这个来自外省的保守党反对一切变革,并且怀疑一切外来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基督教社会党并不带有泛日耳曼的情结,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运动也没有什么同情心;1934年,右翼发起的政变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堡垒和奥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纳粹入侵,奥地利一直处在教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受天主教政党的独断统治。

战后共和国留给奥地利的是并不愉快的首次民主经历。基督教社会党(后更名为奥地利人民党)不无骄傲地鼓吹他们曾在1938年反对德国接管;但对于4年前独力摧毁奥地利民主一事,他们却缄口不谈。社会党人(现在称作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宣称自己两次成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内战之害,第二次是受纳粹之害。但是同他们先前热切盼望同德国合并之事相比,所谓受害,简直不值得一提。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博士是奥地利凭1955年“立国条约”建立起来的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还在主张奥地利同德国合并。

所以这两个政党都有意将过去遗忘——从战后奥地利对“去纳粹化”的最初尝试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党在奥地利是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而人民党靠阿尔卑斯山区乡村和小镇的选民们支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几乎被一分为二:在1949年的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比社会党多12.3万张;1953年社会党得票比人民党多3.7万张;1956年有时人民党以多12.6万张选票获胜;1959年社会党比人民党多2.5万张选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盘,在425万余张选票中,人民党比社会党多6.4万票。

这些独特的险胜结果使人回忆起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共和国大选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奥地利和社会党的奥地利因此面临着重蹈覆辙,议会政治蜕变为了一场文化内战。即使借助于第三党——即人民党,它令人难堪地依靠了前纳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数在每一次大选中都逐步下跌——奥地利的两大政党都无法期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项有争议的立法都会引起痛苦的会议。对奥地利民主前途的预测,看来前途渺茫。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红军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红军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但战后奥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尽力避免了战前导致其国家分
262 裂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奥地利不得不这样做——而在1945年以后同邻居有关联已经
不会有问题,它就必须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共存之路。奥地利领导阶层最终找到了解决方
案,通过长久协作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消除可能的对抗。在政治上,两大政党同意联合执
政,从1947到1966年,奥地利一直实行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大联合”执政。政府各部也经
过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党担任总理,则社会党担任外交部长,等等。

在公共行政方面,奥地利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责任分工制。战后奥地利的公共行政管
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大部分媒体和从银行到采伐在内的主要经济领域。几乎所有
层次的工作都由两大政党之一提出候选人,由双方认同后就任。一段时期以内,这种“各
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奥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条庇护和受惠链,他们通过协商、互惠或
互换来最终解决争端。通过仲裁而非冲突来解决劳动纠纷,双头政府通过两党合作、共享
福利待遇这种体制来消除矛盾。那些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大联合政府得以掩
盖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并在实际上求得一致,以构建这个国家的公正平等。

不可避免的是,奥地利社会中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职业的工
匠、孤立的农民等等,一切诸如此类的由于其行业或思想不合时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
配和社会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也会因要顾及该党成员
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对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冲突的压力往往战胜了地方
的私利。这种新求得的中立,被热心地采用作奥地利的国家标志,取代了过去那段好争斗
的历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会党”、“基督教”——从而使后意识形态(实
际上是后政治)的联合政府和协同执政的理念开始界定了奥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来,奥地利这种解决政治不稳定的途径与意大利的社会变动大相径庭;毕竟意
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将共产党和天主教分离了开来,但这种相提并论很难意指“后意识形
态”。〔14〕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亚蒂及其政党的独特性是他们在
战后几十年来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并加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
263 有损共产党革命先锋的形象。而且,意大利也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来
分配福利、安排就业,虽然这种制度严重地偏袒了单方面的利益。

如果说意大利的这种政治稳定是付出了惨重的公共腐败的代价的话,那么相比而言,
奥地利求得稳定的代价虽不明显,但却同样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戏称战后的奥地利
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剧”,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失去了作

〔14〕 在1945年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只得到17.4万张选票,仅占5%,获得议会的4个席位。因此,他们在奥地利政治中不起作用。

为帝国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纳粹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犹太居民，而这些人正是知识精英层和国际公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5]1955年苏联撤军时，维也纳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声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实际上，对许多游客来说，奥地利走出其多事的历史阴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单调乏味却又令人宽慰的特性。

然而，在这个逐渐繁荣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平静的外表背后，奥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败。和意大利一样，它以全民族的忘却为代价赢来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至少可以吹嘘曾经举国抵抗德国的占领，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过类似的抵抗经历。并且和西德人不同的是，至少在公开场合，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被强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过怎样的罪行。有趣的是，奥地利和东德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机构的官僚独断性质上相同。从地理意义来说，两国都是在地缘上多变的国家，它们在战后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只不过奥地利在实践过程中更为成功罢了。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左翼和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不愿意陷入政治不稳定，不愿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西欧问题的明显轨迹。在各种社会结构中，随处可见意大利或奥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公众的政治运动热情也从1930年代中期的高点开始不断降温：在瑞典，从1939年到1962年（战争结束时短期成为一大亮点的），五一节徽章的年销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后来在新一代人的热情追捧下销量才有所回升。

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不同的结构性的社群（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来统管大部分活动。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荷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仅祷词不同，而且还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他们甚至投票给不同的政党，阅读不同的报纸，听自己的广播（后来又收看不同的电视频道）。1959年，在荷兰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学；95%的荷兰天主教农夫参加天主教农民联盟。天主教徒自己组织旅行、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团的保障，死后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在比利时，讲荷兰语的北部居民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龙人的日常生活也终生有别，虽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在比利时，社会群体不仅按照语言、而且还按照政

[15] 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前夕，维也纳共有18.9万名犹太人。而在1945年该城被解放时，只剩下了不到1000名犹太人。

治观点来严格划分：有天主教团体和社会党团体，天主教报纸和社会党报纸，天主教广播电台和社会党广播电台——分别服务于各自的荷兰语和法语民众。确切地说，两大社团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倾向去鼓吹公有化。

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对早期好争吵的内部派别的记忆，促使人们跨越社群的分立，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极端运动，特别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就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和纳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声遭到了玷污；总的来说，战争淡化了人们既定的政治党派的身份，但并没有减弱与之相关的社群服务。在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政党的一支——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和荷兰天主教人民党——从1940年代后期起就在政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1960年后期。〔16〕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天主教各党派在名义上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实际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党，其作用是保护天主教群体的利益，掌控着从国家到各城市、各阶层的统治权，并通过制定国家规划来实现广泛的社会选民的需求。除了依靠宗教外，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敌对党派——荷兰的工党和比利时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更接近于北欧模式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运动，而不像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后者更具有激进的传统，经常有反教会的言论，在和天主教的权力斗争中（和在分赃方面）很少显露出不安。

265 正是这种战后自我维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义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明显的混合，构建了低地国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时，19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兰芒分裂主义者同列昂·德格莱伊的法西斯主义派相互争斗，危及议会政府，自196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又经历过一次新的、更加扩大分裂的族群之间的斗争。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们（以及当地天主教统治集团）——他们的统治曾在1945年短期内受到过威胁——通过大幅度提高福利并且实施其他各种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权。从而使种族社群得以生存到1960年代——这种落伍过时的前政治时代的做法，正好延续到为激烈的经济转型时期提供了文化和体制上的稳定因素。

战后欧洲政治稳定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现在看起来最不足为奇。到1955年加入北约组织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已充分准备步入经济复兴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国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东西两大阵营的许多观察者都大跌眼镜。康拉德·阿登纳引导西德安全地渡过了新纳粹主义和亲苏的中立主义

〔16〕 在比利时，为了增加其超越教派的吸引力并强调其更具现代性、改革性的抱负，成立较早的天主教党更名为基督教党。在荷兰，基督教内部各教派的差别很大，因此天主教党就沿袭了旧名。

相夹持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和谴责,却在西方联盟中间安全着陆。

战后德国在体制建设上力避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政府权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权和服务经费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相当于在19世纪时期并入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独立公国。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州,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对一些旧的区划作归并或分割。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266

由于关注将冲突转移或者包容冲突,形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会市场”的立法目的是要减少劳动纠纷和经济争论政治化的危险。根据1951年的《共同决议法》,煤炭和钢铁这些重工业行业的大公司必须在监事会中含有雇员代表,这一做法后来又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小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活跃于各经济部门;虽然原则上反对国有化的垄断做法,但19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治理下的国家拥有或掌控了40%的煤铁生产,三分之二的发电厂,四分之三的铝制造业,并且关键的是,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银行。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西德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1950年代后期,西德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不利于自由市场。如果是经济学家路德维格·艾哈德——阿登纳执政时期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长——掌权的话,西德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完全变个样。然而,按照基督民主党的计划方案,出于社会总体原则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受制约的市场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了有效调解。

工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在大部分问题上能相互合作——这些年来经济蛋糕飞速增大,大多数需求都得到了有效处理,避免了许多矛盾冲突。

自 1949 年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直到 1966 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顺利执政;1963 年康拉德·阿登纳以 87 岁高龄离职后,还在掌管着波恩政府的事务。以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所以能够多年称雄政坛,原因诸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战后的西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原来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逊地区现在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天主教徒就占据了西德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基础,并以此来确保自己作为少数派联盟在阿登纳政府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牢记当年教会成了俾斯麦文化斗争的靶子时期的威廉敏娜帝国的状况;他告诫自己谨防从新的势力平衡中过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险重新挑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教会曾有过明显的不光彩的记录之后。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寻求途径,力图使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全民性的而非单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选举工具,强调基督民主党在普遍范围内的社会吸引力。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 1949 年首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是到了 1957 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结果以高出对手 50% 的选票获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大政党之间通常会确保在全国大选中赢得 44% 左右的选票)联手获胜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它吸引了大量的选民。和低地国家的同僚一样,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赢得了当地一个保守的忠实教徒社团的选票。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然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比如说,在许多小镇和乡村社区中,当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家会联合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控制并审查电影节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具有广泛性。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基础。他们获得了来自乡村和城镇、来自劳资双方的选票。当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专权掌控国家之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已经掌控了一切。在经济政策、社会服务和福利以及尤为敏感的东、西两德分裂、众多德国流亡者的前途问题上,阿登纳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始终以大众保护伞的姿态坚守阵地,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德国政治文化的新起点。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表面看来,社会民主党原来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失去了向来属于他们的德国东部和北部社会党人的选票。然而,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也是有污点的:直到 1932 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 1933 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

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 268

另一方面,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国国会说了一句名言,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惟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着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里,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日子,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影响了寿命。然而,身形瘦弱、身体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新的欧洲大国的大权。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共产党,对他们丝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坚信非军事化的德国将会获得安宁,从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这种环境才对社会党人有利。他彻底反对阿登纳倒向西方盟国一边,明显地反对让德国永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会党看来,恢复一个主权的、统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要比任何国际纠纷都重要。

阿登纳热切地谋划西欧一体化,这一计划引起了舒马赫的特别注意。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势力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问题在于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联邦德国的首次大选中,社会党将它关于民族化和社会保障的传统党纲同德国统一与中立的主张结合起来,受到人们尊重,获得了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少了42.4万张选票)。但到了1950年代中期,西德紧跟西方联盟,形成了早期的欧洲联盟计划,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预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败,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久,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西德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早已过时的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269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1961年和1965年大选中改进了做法，为自己赢得了1966年“大”联合组阁的胜利，这是当时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自魏玛时代以来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阿登纳的大部分政策，他们反而在漫不经心之间促进了西德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历来表现欠佳（1947年大选中只有5.7%的选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西德宪法法院取缔）。社会民主党从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独掌大权，并且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切年轻、激进的反对派入党。一旦它同基督民主党一起执政，并且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极左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在议会之外给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激进分子留下了空间。

西德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必担心会出现新的纳粹分子，因为国家基本法明确规定严厉取缔这一类政党。然而，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百万先前拥护纳粹分子的选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化进入不同的主流政党之中。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种选民：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方被驱赶过来的日耳曼种族的人。在总数约1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居住在德国西部。到1960年代中期，通过柏林向西涌入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从德国东部又涌入了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西德。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农场主、小店主、商人和回归者的人数太多，不容忽视，作为日耳曼种族人，他们的公民权和难民权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确保护。在西德早期，比起其他德国人来，他们更加缺少适当的栖身之所，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投票选举中表现更加强烈，在一切问题中，他们最突出的政治意愿是：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集团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或者实在拿不回来的话，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作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最后，由于那些恶意“歪曲了的”战后宣传普遍让人深信不疑，它故意夸大了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她的损失。

在联邦共和国早期，有某些迹象表明，这些伤感情绪会成为影响德国政治发展的重要

阻力。在1949年的大选中,就有48个议会议席——三倍于共产党得到的议席,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席大致相当——落入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右翼各党派之手。那些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的难民立刻成立了“回归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团体”:在1950年石勒苏因格-荷尔斯泰因的地方选举中(这里曾是纳粹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这一“团体”赢得了23%的选票。第二年,在邻近的下萨克逊州,一个性质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获得了11%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绝不可小觑,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而是在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谴责苏联和西方联盟,尤其是针对由于波茨坦公告而引发的那些问题。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东德,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西德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西德社会外,19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西德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17]。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²⁷¹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西德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东德人)根据海因里希·曼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德国的独裁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一切似乎证实了战后德国正在患着一场集体失忆症,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德国人并非如此健忘,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记忆。在整个50年代,西德官方主张采取这样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是在这样一种系列性的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就被逐步释放,回归平民生活。与此同时,罪行最严重的战犯,包括那些在东欧地区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

[17] 对此,雷奈回复道:“本来我很自然地认为在戛纳不会有人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现在我明白了。”

部的总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压下才开始对被起诉者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18〕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作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雷特达成协议,对幸存的犹太人多年来的损失作出赔偿,总金额达1000多亿德国马克。为达成这项协议,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西德人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德国可以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赔偿。其他人抱有兩種观点,一种(约占被调查者的2/5)认为只有那些“犯下过什么事的人”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进行赔偿,一种(21%)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人本身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部分责任”。1953年3月18日在272 德国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辩论,德国共产党反对,自由民主党弃权,基督教社会联盟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为了通过这项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曾不止一次利用国际上害怕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推动西德的盟友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希望德国在欧洲防务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该谴责德国的行为或者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他们想阻止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的话,那么他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关于东德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他们也看清了德国的民意所向。因此,他们允许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偏离,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即坚持认为只有他才能斡旋于他们之间,这也是一种尽可能稳妥的选择,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国内困境的话,他需要外国的让步。1951年1月,连艾森豪威尔都宣布阿登纳把魏玛和纳粹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因为阿登纳说,“德国士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地、光荣地作战。”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18〕 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担此罪过。

阿登纳的言行并没有拉近他和他的对话者们的距离,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在达成协议前,波恩坚持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肯加入文明国家的群体,好像西德反而是在给获胜的西方盟国面子。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一旦公开表示愤怒,或者他们有可能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就会立刻扭转政治局势,以利于自己——他会提醒德国选民说德国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1950年代,德国国内支持重整军备的呼声并没有多么强大,在战败后仅11年即1956年重新组建的西德军队“联邦国防军”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热情关注。甚至阿登纳本人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坚称——就他而言并无多少真诚在内——他正在回应国际方面的压力。1950年代早期由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取得的成绩之一是,它说服了许多西德人,使他们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们的国家就可以重新统一,可以获得安定。50年代初,超过三分之一的成人投票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将近50%的人希望联邦共和国在任何战争中宣布中立。 273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西德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西德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1950年代后期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受核保护”的国家。到了1960年代初期,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他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19]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要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西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乐老于计谋地竭力利用时机、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西德想获得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把这种“同情”转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然而,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密谋将他赶下台,以表达他们对北约组织的忠心。而在所有人当中,戴高乐本人对德国人并不抱有任

[19] 在不经意间,他不无夸张地把《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比作“摩根索计划的平方”。

何幻想。6个月前,在汉堡,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评论说:“要是他们真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西德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胆敢为了法国人提供的这一机会设想而和华盛顿翻脸。此外,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的联邦德国狂热地接受美国的一切;在这些年里,美国大兵驻守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国民众对美军的军事装备、军事基地、护航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现金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这些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大部分美军(和英军)士兵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随着被西方(而非红军)“解救”后那种释怀的感觉逐步消退,其他各种情绪就浮现了出来。战后盟军占领后那段时期内百姓生活的艰苦,和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在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冒险。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现代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及“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而处在西方联盟东部边缘的德国的逐渐崛起,在潜意识里会令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曾经自封的角色,认为它可以担当起欧洲的文化堡垒,对抗亚洲的苏联集团各国。

此外,西德的美国化进程——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和德国民众现行的经过净化的思想与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愿望出自1950年代早期的国产怀旧片。这些所谓的“国产”影片,通常以德国南部的某个山区景色为背景,以爱情、忠贞和群体为情节特征,服装体现了时代和地区特色。这些高度流行的娱乐片毫不掩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往往是纳粹时期电影的忠实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这些影片的导演如汉斯·德珀早在纳粹时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轻些的如鲁道尔夫·勋德勒等又是前者们一手培养的。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绿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乐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开了》(1953)、《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1954)、《忠实的轻骑兵》(1954)、《欢乐的村庄》(1955)、《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1955)、《来自黑森林的罗琦》(1956),等等,好几十部诸如此类的影片,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命运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

德国国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邦共和国早期那种乡村的、保守主义的气息,那种一

心想置身世外的愿望。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可能也是促成德军解甲复员的因素之一。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西德家庭中三分之一的户主是离异了的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从苏联释放后回归的战俘计算在内,还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1960年,联邦共和国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126:100。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事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许多女性单身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20〕——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的私人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275

通过精心思考,采用一些新的公共目标来取代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西德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那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来说,这种转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荣的机会。根据英国工党政治家休·达尔登的说法,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却无能力的”国家。于是事实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二十年里,西德人民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整个国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西德人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艾森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西德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

〔20〕 这一时代的孩子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德国现代社会的高层公众人物(包括本书写作期即2005年时的联邦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们都生活在单亲家庭,由参加工作的母亲独自抚养成人。

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19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276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19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生活,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西德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西德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的饥寒交迫。”

哈贝马斯后来致力于对“宪政爱国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民族情感才会合适地、谨慎地激励他的国民奋发向上。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源于1953年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最初提出了纳粹主义“内在的伟大性质”。当时这次事件是孤立的,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但是树立了一个标志,成为后来10年间引起对海德格尔激烈质疑的起源。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丽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玛丽亚的一切社会关系、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舒适生活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她为迎接丈夫归来而准备的那所焕然一新、装备齐全的房子。然而,正当他们即将重温幸福婚姻旧梦之时,他们的世俗财富却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瞬间灰飞烟灭:在他们全套现代化装备的厨房间,一只煤气开关爆裂了。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欢呼着西德赢得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对于法西斯德和下一代对西德极为不满的愤怒青年来说,在新的欧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德国,虽然具有了新的品质:繁荣、妥协、政治安定、默许不再唤醒本国早已沉睡的过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掩盖掉以往的过失。它们是披着伪装新衣的旧疾。

第9章

幻想破灭

278

东印度群岛丢了,大家都输了。
——荷兰谚语,广泛引用于1940年代

整个大陆风向已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非洲人的]意识正在觉醒,
这是一个政治事实。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演说,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发起强攻,想占领我国首都,明显地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抵抗。政府仍在执政。我谨对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作此公告。
——伊姆雷·纳吉在匈牙利电台的广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0分

依靠外来军队教训本国人民,那是大错特错。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56年11月11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欧各族人民本身已难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却还在统治着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在欧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看来,这些悖论并没有不合时

宜,但却结出了恶果。对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而言,他们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地区和美洲拥有的殖民地和帝国资产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以弥补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灾难性战争损失和屈辱;他们宣称那场战争中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国家资产。一旦丧失了这些遥远的领地,缺少了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供给和人力资源,英法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会比实际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对英国来说,状况尤为明显。任何一名战后长大的英国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把“英国”、“不列颠”和“英帝国”看成是近义词。小学生的世界地图上显示的英国占了红红的一大片领域;历史教科书尤其着重描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非洲的历史;新闻影片、广播报道、报纸、画报、儿童故事书、喜剧、体育赛事、饼干桶、水果罐头的标签、肉店橱窗上的告示,无处不在提醒人们,在这个由海洋诞生的帝国的中心,英国拥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城市、河流和政客们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国本土上的名字一样耳熟。 279

英国“第一次”失去帝国领地是在北美洲。它的后人,除了也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之外,根本就不是它的同类人。它在警力、服务业和管理上耗费了巨资;和法国在北非的统治区一样,例如在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地区,它受到了一小群农场主和牧场主阶层的拥护和捍卫。这些“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南非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于女王,在感情上依附于英国,并且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军备力量除了在名义上,都计入英国的国有资产。这些地区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物质财富上,而是在于其战略意义。英国在非洲东部占有的资产,首先被认为是帝国主要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英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和中东的港口、阿拉伯半岛一带和印度洋地区;当时还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内的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

所有的欧洲帝国在领地上都呈现出一种星罗棋布的随意性,但却好景不长(除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陆通道),忽视对物流和经济收益应有的持续性关注。西班牙早就丧失了部分帝国领地,先是输给英国,再后来是由于当地居住者要求独立,最近则是因为美国势力的崛起——这时断时续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绪。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间佛朗哥(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想要放弃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的一些飞地。

但是欧洲仍然控制着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要么直接受帝国首都的统治,招聘那些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人执掌当地人组阁的政府,要么就是由那些完全听命于欧洲宗主国派遣在当地的统治者执政。战后欧洲政治家们只认识这些人,因而大多对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知之甚微(也许印度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低估了印度当地民族运动的规模和决心)。

因而,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帝国都没有预见到他们即将丧失自己在海外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考证,1939年在一次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青年学生组织的讨论会上,他们都觉得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六年后,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势的和弱势的、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之间的鸿沟在最近的将来似乎根本没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之时,全球70%的总产量和80%的工业生产经济附加值还是来自西欧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欧洲帝国中是最小、最穷的一个——以极低的代价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掠夺原材料,这些也为葡萄牙的出口创造了垄断市场,使它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商品市场种植棉花,而不顾本国人口的粮食之需,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却不断导致了当地人长年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而且葡萄牙本国军事政变不断,但是尽可能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步伐。〔1〕

即使欧洲各国没有了他们的殖民帝国也还能继续维持,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离开了外来统治势力的支持,自己能够立足。甚至那些拥护自治和欧洲海外殖民地独立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也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时至1951年,英国外交大臣、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还把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比作是“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把碰簧锁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滑膛枪。”

然而,世界大战给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理解。战争期间,英国丧失了它在东亚的领地,被日本人所抢占;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了这些地区,但却严重破坏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实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国人向日军投降,这是英帝国在亚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令英国人一直无法释怀。虽然英军成功地保住了缅甸,从而保护印度未沦入日军之手,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从此永远破灭了。1945年以后,在亚洲的殖民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弃传统的领土主张的压力。

〔1〕自1961年2月安哥拉革命运动爆发7年后,在1968年,有人问及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博士,对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想争取独立这一事件作何种预测,他回答道:“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有500年之久。但与此同时,他们首先得继续参与发展。”(见汤姆·加拉格所著《解读20世纪》,第200页,1983,葡萄牙。)但在当时,萨拉查坚决抵制现代世界的方式可是很有传奇色彩: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成功抵制了可口可乐入侵葡萄牙,那可是连法国人都做不到的事。

对荷兰而言,作为该地区最老的殖民势力,其最终结局更是使它痛苦难忘。荷兰属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以及为发展殖民地而组建的贸易公司,是荷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它的黄金时代,也是荷兰商业、航海业繁荣的象征。尤其是到了战后那些暗淡、贫困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猜测,东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胶,将成为荷兰经济复兴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战败后的两年里,荷兰再次被卷入了战争:荷兰控制的东南亚一带(今印度尼西亚)牵制住了荷兰14万人的军队(包括职业军人、应征入伍者和志愿者),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又激起了荷兰帝国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竞相效仿。 281

接踵而来的4年游击战给荷兰带来了3000多名军民伤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单方面宣布的,最终于1949年12月在海牙会议上得到了荷兰当局(和泪流满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认。一大群欧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东印度,根本就没有到过荷兰)。到1957年末,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禁止荷兰商人入境,这时被遣返回国的荷兰人已经达到了好几万。

非殖民化的进程对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荷兰公众产生了痛苦的影响。许多前殖民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向政府施压,将荷兰未能在日本战败后的间歇期内重夺殖民政权一事归咎于左翼,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之为“良政神话”。另一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占有绝对人数)在经历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殖民战争后,只想着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场军事胜利只是联合国坚持用谈判来移交权力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一切很快就会湮没在国人的记忆空洞中。

从长远来看,荷兰被迫从殖民地撤离,反而使荷兰人越来越滋长“欧洲”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荷兰不可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尤其是它周边的大国。失去印度尼西亚及时提醒了荷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欧洲小国。出于自身需要,荷兰改变了策略,成了促进欧洲经济和后来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热切拥护者。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并不顺畅,荷兰全体民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情感的大转移。截至1951年春,战后荷兰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开支主要还不是针对欧洲防务(尽管荷兰已经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约),而是为了保有原来的殖民地。渐渐的,带着一丝强忍的遗憾,荷兰政治家们放弃了他们一向优先考虑的要务,开始全神贯注于欧洲的事务。

西欧所有的殖民强国和前殖民强国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美国学者在对西方其他国家展示华盛顿方面的经验和先见时,有时会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在美国,冷战是它的大事,其表现主要反映在它的内政外交优先事务和言论上。但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疲于应付那些遥远的、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 282

的游击战,消耗巨大。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令人头痛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

和英国一样,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的再分割中,法兰西帝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了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获利丰厚。而1945年后,解放后的法兰西再次获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统治,还拥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带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所有权。但是,法兰西皇冠上的“宝石”是印度支那,还有那些早期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殖民地的标示比英国教科书含糊:也许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帝国的统治在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显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讲英语的统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还有数百万法国男女记得发生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埃及、苏丹和上尼罗河领域的控制权时遭到了惨败。谈起法兰西帝国,对法国人来讲事关失败和胜利的事。

另一方面,法国的学龄儿童一直被灌输说,“法兰西”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体,法国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公开性。从西贡到达喀尔的小学都教“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并且宣称——哪怕只是从原则上——自身与法国文化浑然融于一体的品质,这在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统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2〕也只有法国,帝国当局会把大量拥有的殖民地看成是法国行政区划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归由法国的三大部门掌管(然而,在当地却只有欧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荷兰一样,它们视为珍宝的东南亚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国的殖民地丢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属印度支那还在维希政府的托管之中,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本土1940年的惨败所遭受的苦难要好得多。法国在欧洲遭遇的耻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国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自己看来,要说法国还没有被彻底退化成
283 “一堆无依无靠、毫无希望的细胞质”的话(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评语),那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大国的持续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通过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戴高乐再次确立了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的首都,在比利时所属刚果界河对面,自由法兰西的领袖对法国殖民地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在法属非洲,以及所有生活在插有我国国旗的土地上的人们,只有依赖本土获得道

〔2〕 对此说法,偶有事实为证:1945年担任法属非洲赤道地区总督职务的费利克斯·埃布伊是个黑人,但他是法国殖民地的高级官员。

义和物质的利益,通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参与自我管理,这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法国有义务实现这一切。”

实际上和往常一样,戴高乐说话含糊不清,也许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确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自治。恰逢时势。法国公众舆论对殖民地的改革并不反感——安德烈·纪德在《刚果之行》(1927)中严厉痛斥过强制劳动这一奴役行为,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欧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觉醒——而美国人也一直在不断发出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曾赞同对欠发达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实行全球化统治,并且尽早让其他国家实行自治。〔3〕

关于贫困而孤立的、讲法语的非洲地区,改革派的言论毫无价值,尤其是在法国自己也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时候。而东南亚的情况则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因为年轻时参加了1920年12月在图尔的会议,因此他也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独立。英军在两周内赶到了南部城市西贡,法军也在一个月后赶赴当地。由于越南北部先前还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基于这样的因素,巴黎当局公开召开了民族主义代表会议,商讨越南自治或独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国上将、当地全权代表梯也利·德·阿冈利厄单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该国南部)从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北部分离出来,破坏了法国政府试图妥协的精心努力,宣告了与胡志明之间政府商谈的破裂。同年秋,法国轰炸海防港,民族主义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法国人盘踞的河内,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直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权威,结果却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胡志明赢得了法国国内左翼的双倍支持,他被看作是一名争取国家独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并且这两种特质相互交织,不仅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还塑就了他的国际形象。〔4〕对大部分法国选民而言,把年轻人送到印度支那去为一场“肮脏的战争”而送死毫无意义,而让河内来接管并不比支持法国在1949年3月选定的无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劲。 284

另一方面,法国军官团还想继续在越南挣扎;在那里,就像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国的军事遗产(或者保留下来的一切)似乎正面临危机,法国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话,法国经济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这种长期战争的消耗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起初,华盛顿的援助

〔3〕 据说,戴高乐不愿就殖民地自治问题举行公开会谈,他担心那些欧洲移民,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会仿效南非模式,乘机脱离法国单独成立国家。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4〕 对敌友双方来说,在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化身得到了确认,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首先承认了他新宣布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是间接的：提供贷款和帮助，使法国能调动大量资源来打击越南人，从事这场耗资越来越大、得胜希望却越来越小的战争。实际上，美国曾保证战后法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法国却将其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了战争。

从1950年开始，美国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离朝鲜战争爆发仅1个月），美国大量增加了对驻东南亚法军的军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运的欧洲防务计划和同意西德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之前，法国曾讨价还价：他们得到的回报（在华盛顿知情人士看来，就是允许美国保护他们）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方面，法国是最依赖美国支持的一个国家。

到了1954年，华盛顿开始叫停，无论法国如何越来越拼命地乞求，美国拒绝从空中救援法国必败无疑的奠边府之战。经过长达8年毫无结果的浴血苦战，华盛顿方面清楚地意识到，法国不仅没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权，而且他们也不是胡志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手。在美国人看来，法国白白耗费了他们的钱财，这项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冒险。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宣布投降，法国要求停火，这时已经没有人对此觉得惊讶了。

法属印度支那的溃败，预告了法国想要竭力保持的几个联合政府的倒台。皮埃尔·孟德斯-法朗士继任当上了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在谈判后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两个独立的实体——越南“北部”和“南部”，它们的政治关系和体制将由以后的选举来决定。然而，这些选举从未实行过，维持法国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负担就由美国来独自承担了。

法国人对失去印度支那并不难过。与荷兰不同的是，法国人拥有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久，尽管美国为第一次越南战争支付了款项（当时法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毕竟是法国士兵在作战伤亡。尤其是法国右翼政治家对孟德斯-法朗士及其前任们大加指责，怨他们没有对战争做出更有效的规划，但却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因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窃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国空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职业军官团才一直心怀悲戚。一些年轻的军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抵抗运动或在“自由法兰西”服役的军官们，因为在那里养成了独立判断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渐渐产生了一种很不成熟、但却充满危险的怨恨情绪。他们再次嘀咕说，战场上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们的虐待。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发动了起义，这离日内瓦条约的签订仅仅过了14周。但长久以来，北非就是法国人关注的中心。自从1830年法国人首次踏上当今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这块土地，这里就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远还可以追溯到控制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之

间的撒哈拉非洲。由于在东部受到英国的阻挠,法国转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并且穿越撒哈拉,进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区。

除了早已占领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外,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是欧洲人早已永久占有的大量殖民地中法国人拥有的唯一殖民地。但欧洲人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法国人的后裔,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即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阿尔贝·加缪,也拥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国人的血统,而他的法国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当地的。法国人口过剩的现象早就成了历史,和俄罗斯、波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甚至还有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已经好几代都没有移民进入了。法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此外,要是说在法国之外还有法国存在的话,那就是指阿尔及利亚了。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阿尔及利亚在技术层面上属于法国的一个行政区,受法国的管制。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块海外殖民地北爱尔兰,它在体制上也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对于久已在那里定居的社群来说,依附于帝国心脏地区的心理远比帝国都市的大多数人更甚。在少数欧洲人看来,阿尔及利亚终有一天会独立(并由阿拉伯人来统治,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占绝对多数)这一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相应地,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家也尽量避免考虑此事。除了莱昂·布吕姆 1936 年领导的短命的“人民阵线”外,历届法国政府都未曾对法属北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视。温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费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广为人知。但却没有人能够料到巴黎当局会这么快就同意他们采取温和至极的自我统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领导层最初很乐观,认为希特勒的垮台会导致他们盼望已久的改革进程。因此,1943 年 2 月 10 日,紧随着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们忠诚于 1789 年的理想、对他们“所接受和培养的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解放的法国政府根本就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感情。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 1945 年 5 月阿尔及利亚东部卡比地区的起义,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接下来的 10 年里,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日积月累,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被压抑的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积聚到了爆发的顶点,终于在 1954 年 11 月 1 日爆发成一场有组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动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温和的、亲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获得独立,这一目标是历届法国政府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又造成了长达 8 年的内战,伤亡惨重。

法国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在 1956 年 3 月,盖伊·莫雷领导新的社

会党政府,认可了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这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上首次让步。但是当莫雷到达阿尔及尔时,一群当地的欧洲居民就朝他扔烂水果。巴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暗中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决不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当地的欧洲人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防卫委员会的领导下,拒绝同阿拉伯邻居们妥协。法国的策略是在施压并使当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并共享权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决掉民族解放阵线。

在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中,法国军队也遭遇了消耗战的痛苦。双方都不断采用威胁恫吓、严刑拷打、蓄意谋杀以及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杀事件和1956年12月欧洲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莫雷的政治代表罗伯特·拉科斯特授权法国伞兵上校雅克·马苏,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到1957年9月,马苏取得了成功,镇压了一次大罢工,并在阿尔及尔的战役中消灭了起义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法国的声誉也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长久以来的心目中,欧洲人都是怀疑对象。〔5〕

1958年2月,法国空军轰炸位于突尼斯边境的萨奇特市,他们怀疑那个小镇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地,这令费利克斯·盖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国际舆论大哗,英美两国“善意的部门”提出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纠纷。这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心里越来越引起恐慌,担心巴黎会弃他们于不顾。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军警们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同情这些居民。盖拉德政府于4月15日宣布解散,这已经是11个月里法国的第三届政府了。10天后,阿尔及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要求永久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这些集会组织者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挑衅性地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同一机构名称。

5月15日,皮埃尔·弗姆兰领导的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职仅48小时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罗洛·萨兰将军就在阿尔及尔的讲坛上,面对欢呼的人群,大喊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本人自从离开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声地居住在老家——法国东部的科伦贝乡村。在重回公众视线后,5月19日,他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科西嘉岛,巴黎谣言四起,据说即将被伞兵占领。5月28日,弗姆兰辞职,勒内·科蒂总统召请戴高乐重组政府。戴高乐当仁不让,毫不迟疑地于6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第二天就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他第一步就直飞阿尔及利亚,6月4日,面对热烈欢呼的士兵和满怀感激的欧洲人,他含意不明地宣称:“Je vous ai compris”(我早就了解你们)。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理确实早就了解他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

〔5〕 这些事件在吉耶·庞特科尔沃1965年的影片《阿尔及尔之战》里都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们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复决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获得80%的选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得票率却高达96%。〔6〕戴高乐众多优点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他坚持秩序和立法。这位自由法兰西的英雄人物、维希政府的严厉抨击者,这位自1944年8月以来使法国恢复名誉的人,绝对不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朋友(这些起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贝当的追随者),更不会站在加入起义的思想自由的年轻军官这边。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政府的权威。他的下一个相关目标才是解决已经极大地危害到法国政府权威的阿尔及利亚冲突。

288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就很明显了,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着摩擦。国际舆论日渐倾向于同情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它的独立要求。英国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甚至连比利时都最终于1960年6月放弃了刚果(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7〕。正如戴高乐所了解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早就成立了“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将那些前法属殖民地组成“共同体”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们所执掌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独立的允诺,因为他们实在都很弱小,根本无法自立,因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必定会完全依赖于法国。1959年9月,在执政一年后,法国总统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和居民们都觉得这是即将被“出卖”的证据,被激怒的人们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阴谋、有政变、也有谈论革命。1960年1月,阿尔及尔筑起了街道堡垒,“彻底的爱国者们”见到法国宪兵就开枪射击。然而,在戴高乐的坚决镇压下,那些动摇了的高层官员出于谨慎,纷纷从阿尔及利亚辞职离去(包括马苏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将军),这次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局势还是不稳定,在1961年4月又演变成了一场由新成立的“秘密军队组织”发起的军事起义,但还是失败了。这些谋反者们并没有扳倒戴高乐。戴高乐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将军们发布的一份军事宣言”。这次政变,令法国军队的士气和(仅存的)国际形象大受损伤。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有儿子远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父母们,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越快越好!〔8〕

戴高乐向来是个务实的人,他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地点定在日内瓦湖区的温泉疗养胜地依云镇。最初几轮谈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间,但是没有找到

〔6〕 公民复决投票成立了新的第五共和国。3个月后,戴高乐当选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7〕 1960年比利时撤离刚果时,只留下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掌管4000多个高级行政管理职位。

〔8〕 从1954年到1962年,有200万法国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其中120万为应征入伍者。

共同基础。1962年3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只经过10天的讨论,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在经历了将近8年的连续战火后,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据依云协议的条款规定,戴高乐于7月1日星期日举行了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法国人以压倒多数投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从此摆脱了自己脖子上的阿尔及利亚这道枷锁。两天后,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89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并未到此终结。“秘密军队组织”这一地下组织已经羽翼渐丰,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招失败后,就严惩那些“背叛”他们事业的人。仅在1962年2月,“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工和炸弹袭击就杀死了553人。虽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马特镇暗中伏击总统座车险些得逞,但针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的公开暗杀行动也都未成功。在1960年代初的好几年里,法国受到了顽固的恐怖分子不断的疯狂威胁。法国情报机构最终剿灭了“秘密军队组织”,但是人们总是对此记忆犹存。

同时,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却被迫流亡到法国避难。这些在欧洲的“黑脚杆”主要定居在法国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对法国当局心怀怨恨,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了原来的财产和工作。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还有许多人之前的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构成了西欧最大的犹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社群。许多阿拉伯人也离开了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怕会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压专制,还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经同法国人一起工作过、或者是为法国军警当局服务过的雇佣者——即被称为“鹰犬”的人——为躲避得胜的民族主义者而逃到了法国,以免沦为民族主义者早就宣誓过的报复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难逃被捕和惨遭报复的命运,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国的人,也并没有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感激或认可之辞,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法国急于忘却它的阿尔及利亚之痛。1962年《依云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法国生活中近50年来的战争和对战争的担忧。人们精疲力竭,厌倦了各种危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谣言和阴谋。第四共和国仅存在了12个年头。无爱无怨,从一开始起就缺少一种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维希政府的遗疾,令战后的法国立法者们一直不愿意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削弱。议会和选举制度倾向于维护多党利益,从而导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稳定,对社会的变化缺少预见,却造成了政见分歧。来自法国西南部内地的圣泽黑的一名书商皮埃尔·鲍贾德发起成立了欧洲史上第一个单一目标的反对党,要保护那些“被剥夺的、受欺骗的、受侮辱的和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选中,反对现行制度的52名“鲍贾德主义者”赢得了议会的席位。

但是,重要的是,战后法兰西第一届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战争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一样,第四共和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间,尽管经济稳步增长,法国还是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货币储备,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后来几十年苏联集团的运作相比而言)、外债、财政赤字和连年通货膨胀,都得归咎于毫无胜算的、军费开支无度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从1947年打到1954年,又从1955年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历届政府面对这样的难关,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经历了长达4年被占领的屈辱后,接下来的十年里,即使不是士兵们心怀不满,第四共和国也备感压力,难于应对这样的挑战。然而,它还是坚持得够久,真是令人惊讶。 290

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在体制设计上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大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势力,总统行政权得到了大幅度强化:宪法赋予总统相当的控制权,并且让他拥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总统对总理拥有绝对支配权,并可以任意任命和罢免总理。在成功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戴高乐建议今后的共和国总统应当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迄今那种间接地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方式),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提案于1962年10月28日经公民复决投票得以通过。受惠于他的体制、个人经历和个性,以及法国人的善于取舍,如今的法国总统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过自由选举而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多的权力。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戴高乐乐于将大部分日常事务交由他的总理去做。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法国于1958年12月27日发行了新法郎,这一举措对稳定备受困扰的法国金融做出了直接贡献,从此拉开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序幕。作为政界名流,戴高乐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者,从不惧怕变化:正如他年轻时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论文《未来之军队》中所写的,“只有不断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镇规划、国家指导下的工业投资等许多重大项目的改造,都是在他执政期间构思和开始的,这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和戴高乐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一样,马尔罗雄心勃勃地计划恢复和厘清所有的法国历史公共建筑物,所有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再现法国的辉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样(除此之外他俩一无似处),戴高乐明白,经济稳定和现代化是重现民族辉煌的强大武器。至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

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品位和国家原 291

因的政治需要。戴高乐早就对法国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认为后来从英美盟军手里受到的屈辱更要远甚于1940年从德国敌人那里受到的屈辱。他绝对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他作为贫困法国的发言人所受到的极大冷落和令人难堪的孤立处境。鉴于对当时军事现实的了解,对1940年7月在克尔比海英国击沉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地中海舰队一事,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和法国同胞们一样感受到的痛苦,但这次行动的象征意味使他一样地怨恨悲痛。

在对待华盛顿的态度方面,戴高乐更有理由持暧昧态度,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美国一直和战时的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完全超出了应有的情理和谨慎。法国未能参加战时的盟军谈判,这使得戴高乐后来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认法国应承担雅尔塔协议的责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应过此事。毕竟还是过去的记忆伤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却发生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讨论决定德国的重大问题时,法国被彻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间的共享情报从来都不会透露给法国(因为它被确认为是最危险的泄漏者)。该“俱乐部”中也没有法国,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国被排斥在国际军事讨论之外。

更糟糕的是,在亚洲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一直完全依赖于美国。1956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袭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却施压令英国撤退,这令法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发作。一年后,即1957年11月,法国外交官满腔怒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和美国的军火运进突尼斯,而完全不顾法国的担忧:这些武器可能最终会落到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者手中。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不久,北约组织的美国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就粗暴地告诉戴高乐本人,说他无权得知美国在法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体情况。

这就是戴高乐就任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所处的背景。他对美国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从核武器到作为货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赖于华盛顿,不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后来在苏伊士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法国必须尽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乐对英国的态度则更复杂。

和许多观察家一样,这位法国总统合理地、正确地估计大不列颠会努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一种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选择的话,伦敦会舍弃它的欧洲邻居而倾向于它的大西洋盟友。这一点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铁的证明,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总统在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会晤,达成了一份协议,接受美国提供为英国装备的用潜艇发射的北极星核导弹(这一多边军事力量合作将英国的核武器有效地纳入了美国掌控中)。

戴高乐怒火冲天。在出发去拿骚之前,麦克米伦曾经在兰布莱和戴高乐有过会谈,却没有对法国总统透露过任何消息。于是,拿骚协议在当时成了又一个背着法国炮制的“英美”计划。更令人进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法国也被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配备同样的北极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英国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的话,那就让它去好了。但它不能同时拥有“欧洲的”身份。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戴高乐转向了波恩,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份象征性的、但是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条约。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箝制。”〔9〕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法国才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殖民地正在逐渐消亡,英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过去几十年里的失败和损失令法国别无选择,如果它还想恢复一些过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正如当时英美联手迫使法国放弃苏伊士时,阿登纳安慰法国总理盖伊·莫雷时所说的:“欧洲将成为你的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国的衰弱和法国的衰弱大相径庭。英国的殖民地势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英帝国和苏联一样,虽然参战,但损伤不大,英国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国种植生产(和法国不一样,法国食物主要靠自给自足,它那大部分热带殖民地生产的是不同的产品),而且在某些战场上——尤其是北非——共同体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军人数。而且我们看到,比起他们的法国同伴而言,英国本土居民更加关心帝国的安危——伦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繁荣是来源于它是帝国赖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制造业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国广播电台员工手册提醒播音员要注意他们那些重要的非基督教海外听众时写道:“任何对佛教徒、印度教、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说是贬抑性的言词……都可能引起极度冒犯,都应一概避免。”

但1945年以后,英国并没有实际指望能保有帝国的遗产。国家的资源供应紧张,毫

〔9〕 引自费尔南德·勒·于耶尔,《法德对话录:1925—1933》,斯特拉斯堡,1971。第35—36页。

无办法,帝国甚至连维持印度这一在经济和战略上占有优势的地区都觉得不划算:1913年英国向印度次大陆的出口占英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二战后只占8.3%甚至还在逐年减少。无论如何,几乎人人都明显感到了压力:印度的独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创立的英联邦,其构建者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殖民地的加速独立,因而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提供一个框架,使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效忠并听命于英王陛下,同时又免受英帝国的不当统治。但如今,它却成了原来那些殖民地的束缚者,那些仍属于英联邦而今已独立的国家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压制着自己。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取得了独立。第二年,锡兰也独立了。整个独立的过程都充满了流血事件——在消灭种族的斗争中,上百万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惨遭屠杀,接着,又是人口转卖——但撤退中的殖民势力本身并未遭殃。然而,邻国马来西亚爆发的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令英国政府于1948年6月宣布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这一禁令直到12年后起义彻底失败后才宣告解禁。但总体来说,除了从印度及其邻国撤退了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员外,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不仅比预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没有遭遇多少痛苦。

294 在中东,情况更为复杂。在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在虽然不光彩但却(在英国看来)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大不列颠放弃了它的权利——英国一撤离,该地区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争夺战。在英美都对当地石油感兴趣的伊拉克,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埃及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原来并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国却遭遇了戏剧性地、尖锐地反殖民运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国首次感受到了国际性的耻辱,这意味着并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那是法国早就习以为常的事了。

出于后来那些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英国对埃及的兴趣直接源于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军首次占领开罗,时隔由巴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开通13年。一战前埃及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国居民在统治(大部分时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罗默勋爵在统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23年后取得了独立。两国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状态,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一份条约。但1952年10月在开罗成立的军人领导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统治,正式废除了该条约。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战略优势的这条水路,英国重新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域。

两年后,起义的军官之一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台执政,他施加压力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国越来越依靠廉价的石油,它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进口并支付英镑。一旦这种供应中断,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镑,英国将不得不动用她珍贵的储备货币来购买外汇从别处进口石油。此外,当时的外交官安

东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议英国内阁：“可以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但在埃及问题上，如果没有当地劳力来支撑的话，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价值。”

因而，1954年10月伦敦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军将于1956年撤出苏伊士英军基地——但双方达成谅解，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该地区受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军将重新在埃及“活动”。条约很快付诸实施，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名英军按时撤离了苏伊士。然而，当时的纳赛尔上校本人却卷入了权力斗争的麻烦中，他早已于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担任埃及总统。在从亚洲到非洲之间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激进分子眼里，他更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指路人。他正在设法吸引苏联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批武器交易。

到了1956年，英国越来越感觉到纳赛尔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行事激进如暴君，处于激流中却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现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参们不断地把他和希特勒作比较，把他看成一种难以抚平的威胁人物。法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恨纳赛尔并不是因为他对苏伊士运河及他和苏联集团的交好对法国构成了威胁，而是他影响了法国在北非问题上的分裂。美国也不太喜欢这位埃及总统。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次会谈中，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起签发了一项“不结盟”联合声明，明确表态埃及将保持独立而不会与任何西方国家结盟。美国马上予以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19日取缔了先前于1955年11月关于美国资助在尼罗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协议。一周后，即7月26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化。^[10] 295

西方国家的最初反应是结成联合阵线：由英、美、法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如期举行，并于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计划”派遣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齐斯去约见纳赛尔。但纳赛尔拒不接见。那些伦敦会议的参与者只好再次开会，从9月19日一直开到9月21日，最后商定要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同时，英法宣称他们将把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争议提交联合国商讨。

在对纳赛尔的行动作出反应这点上，英国特别注意美国的反响并与其保持一致。英国对美国仍欠有巨额债务，需支付大笔贷款利息，1955年英镑支付带来的压力甚至使英国想寻求暂时的豁免偿付。英国一直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暗藏野心：它认为华盛顿正在构思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拉，那也是美国发言人不断热衷于发出反殖民主义论调以博得当

[10] 苏伊士运河本身位于埃及境内，是埃及领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但运河的绝大部分收入却归外资公司所有。

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总体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作为冷战动力的朝鲜战争掩盖了1940年代两国之间的互相怨恨,英国觉得可以在英国的国际利益和承诺方面依赖美国。因此,虽然艾森豪威尔亲口说他们都非常担忧纳赛尔及其带来的威胁,但英国领导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美国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去年刚接替年老的丘吉尔)出发了,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埃及问题。不管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英法都对联合国及其累赘的程序失去了耐心,他们并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虽然因纳赛尔的行动而引起的各种会议和国际计划正在召开和讨论中,但英国政府却开始和法国进行私下协谈,计划联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这项计划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参加了英法在塞弗尔举行的高层机密协商会。以色列的目标很明确: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边界宣布停火,但双方都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因而双方为边界之争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埃及于1951年7月封锁了阿卡巴海湾,限制了以色列的贸易及行动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决定要撤销这一封锁。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纳赛尔而确保其在西奈和周边地区的土地及安全。

在塞弗尔,这些阴谋家达成了共识。以色列负责袭击西奈的埃及军队并向前推进,进而占领整个半岛,包括其西侧的苏伊士运河。英法将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军,然后借着不相干的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名义,偷袭埃及:先空袭,再从海上打击。他们将占领运河,以证明埃及没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重要资源,从而恢复过去的状况,最后再摧毁纳赛尔。这一计划实行了严格保密——在英国,只有艾登和4位内阁高级部长知道这一协约。这份协约经过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酝酿,最后在塞弗尔签订。

一开始,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10月29日,(由于苏联的反对)在安理会未能就苏伊士问题达成有效决议两周后,也就是塞弗尔会议一周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几乎同时,英国船舰从马耳他基地向东行驶。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对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议,并对以色列和埃及下达了最后通牒,狡猾地号召双方停止战争并接受英美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区。第二天,英法空军开始空袭埃及空军基地。48小时后,以色列完成了对西奈和加沙的占领,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埃及出于自救,击沉了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效封锁了航线。两天后,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队开始登陆埃及。

这时,阴谋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政府对英法的欺骗行为大为恼火,对其联合行动谎言背后的真实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违背了1950《华盛顿三国共同宣言》的内容和精神,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冲突中,英、

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国开始在明里暗里对英国施加大量的压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胁说要对英镑实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惊于美国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无法经受住大量的英镑流失,艾登稍有迟疑后,不得不采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国伞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陆两天后,英法两国军队宣布停火。同一天,联合国向埃及派驻维和部队。纳赛尔于11月12日接受了这一决定,证实了埃及主权不容侵犯。三天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埃及并于12月4日进入西奈。 297

同时,英法军队宣布撤离苏伊士,并于12月22日完成了撤军。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英镑和美元储备共损失了279亿美元,但后来得到了美国允诺的财政资助(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相当于0.5亿美元的贷款限额);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批准了一项对英国约计5614.7万美元的贷款,附加另外的一笔738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公开保证它可以在阿卡巴海湾和蒂朗海峡右侧安全通行后,以色列军队也于1957年3月的第一周内撤离了加沙。英美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还是留在了埃及手里。

在苏伊士大灾难中,每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虽然在武器上还得依靠法国,但却清楚地看到,以后还得尽可能地站在华盛顿这边以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在美国总统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尔令”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条总统令声称美国将出兵镇压“国际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在不结盟国家中,纳赛尔的地位通过击败旧殖民势力而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法国人所担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所具备的道德影响力及其榜样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国在埃及的失败预示着它在阿尔及利亚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国它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对莫雷及艾登自以为美国总会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怀不满。他们都对英法很恼火: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这次秘密计划在构思上有误、在出征中又执行不当;而且还因为他们选择的时机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苏联占领匈牙利几乎发生在同时。由于英法如此公然为了某块地区的帝国统治权而狡施计谋去对付一个阿拉伯国家,从而将世界注意力从苏联入侵自由国家并摧毁其政府上转移了开来。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落伍过时的做法,他们完全是在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糟糕的是,他们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料。苏联并没有参与这场苏伊士危机。11月5日,苏联却威胁英、法和以色列,假如他们不停火的话,它将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这种威胁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发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鲁晓夫及其同伴们也并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但一旦允许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扮演保护弱者的角色,英法 298

就会使得苏联首次获得参加权,这正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苏联所乐意并兴致勃勃地扮演着角色。由于苏伊士危机的爆发,冷战的分裂主义和论调也被根植到了中东和非洲大陆。

对苏伊士危机的失算,使英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针对纳赛尔所策划的整个阴谋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会被揭露出来,但许多人还是心存怀疑。几周后,安东尼·艾登被迫辞职,满怀羞辱,因为他所通过的军事战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不予支持。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哈罗德·麦克米伦曾不愿参与出征苏伊士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轻松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却被迫急速改进外交政策以重获好感。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白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期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分别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独立国家。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

和阿尔及利亚独立带来的苦难,或1960年比利时放弃刚果后导致的灾难性结局相比,英帝国的瓦解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东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国的解散表现得更有争议。1960年在开普顿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南非人民说道:“风向已经变了,正在吹遍这块大陆,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非洲的]正在觉醒是一个政治事实。”他并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欢迎。为了维护自1948年来就强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白人们于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脱离英联邦。四年后,在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和自治。以后许多年里,这两个国家中占人口少数的统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种族政策的人。

但非洲南部可是比较特别。在其他地方,如东非,占相对优势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兴趣来加强殖民统治镇压大多数人的反抗,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相安无事。那些反抗运动在1950年代早期还尚不明显,当时英军曾在肯尼亚发动了一场残忍、阴暗又不光彩地挑动当地白人抗击茅茅人运动的战争。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从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后得出一个必

然结论,宣布英军将从各种基地、港口、贸易中心、输油港和其他帝国时代为了保有“苏伊士东部而建的机构中永远撤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亚丁港。英国再也无力假装可以影响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渐渐地,英国本身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正如亚当·史密斯早就预见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国的初期阶段,放弃“帝国那华而不实的马车”是控制债务并使国家根据那平庸的现状来设计、规划她的未来“最好的办法。”

苏伊士事件的第二个教训是:对英国绝大多数机构而言,那就是英国也不能犯站在美国对立面与其争论之错。这并不是说今后这两个国家总得意见一致——比如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英国更倾向于对苏联作出让步,而这导致了1957年到1961年间英美关系的冷淡。但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可信任、不会支持它的友人这一说法,又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站到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国同时代人戴高乐的对立面。不管内心有多少顾虑、不管他们对美国的行动有多么不解,英国政府今后是铁定矢志于美国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指望影响到美国的决定并在必要时保证美国会扶持英国一把。这种战略上的再次结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具有重大含义。

英国社会感受到了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延续性影响。大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在1950年代早期还十分乐观。1951年保守党当选上台以及第一次显示出的经济繁荣的征兆,驱散了战后早期的平等主义阴霾。在女王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后难得小阳春般的阳光下。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1953)——在殖民地导游的正确导引下——并且首次以低于4分钟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个国家都时刻记得,正是英国人分裂了原子,发明了雷达,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设计出了涡轮式直升机引擎,等等更多,不胜枚举。

那些年代的辉煌——多少有些过誉地号称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年代”——在有关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最受欢迎的关于英国19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剧片《古纳维芙》(1953)和《家庭医生》(1954)描述了生机勃勃、年轻富有而又充满自信的英格兰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没有受过压迫的迹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袭了传统:剧中人物个个都青春亮丽、受过教育、薄有资产、言辞得体、受人敬重。那时的英国宫廷还仍然接受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子(这一明显落伍过时且荒唐可笑的礼仪最终被女王于1958年正式取缔);保守党议员中五分之一来自艾登公学;1955年的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除了善意的社会喜剧外,英国电影院也纷纷推出了大量的战争片:《木马》(1952)、《无情的大海》(1953)、《轰炸鲁尔水坝记》(或译《敌后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战役》(1956)。这些影片都根据二战中的英国英雄事迹改编或创

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战为重),令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们自豪的人和事,有点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辉煌的战役,那他们就会杜撰英国的战争神话,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跨越阶级的或占领时期的同志之爱。当涉及暗示有社会压力或阶级差异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老于都市世故的妙语或令人怀疑的论调,而不会出现冲突或发怒。只有在夏尔·克里奇顿的《薰衣草山的乌合之众》这部伊灵喜剧中最尖锐的一部喜剧里,才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的评论,这是一种布热德主义在英国的变体:反映了那些身处当中的温驯小人物们的怨恨与梦想。

然而,从1956年起,调子开始明显阴暗了起来。战争片如《克瓦依河大桥》(1957)或《敦克尔刻》(1958)就带着一种质疑的低调,似乎1940年代以来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过去模式拍摄战争片《击沉俾斯麦号军舰》更是显得出奇地过时,与现时口味格格不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开创了新风,这部剧本于1956年在伦敦首创,两年后又被忠实地搬上了银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充满了愤怒与幻想破灭的戏剧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处的社会和婚姻中苦苦挣扎,既无法放弃,又无力改变。他谩骂他妻子埃里森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她,反过来,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阶级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亲之间,而她的父亲则对现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无法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像艾里森警告他所说的:“你受伤害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杰米受伤害是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你们又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301 这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国人心态的分析虽然谈不上惊人地细致入微,但却很真实。《愤怒的回顾》登陆电影院的同时还上映了大量表现同样情绪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195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或剧本:《顶楼的房间》(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独的长跑者》(1962)、《如此之爱》(1962)、《运动生涯》(1963)。1950年代早期的电影不是由那些仪容端庄、操一口标准伦敦音调的中产阶级演员来担纲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尔克·鲍贾德、约翰·格雷逊、瑞克斯·哈里逊、格奥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爱的伦敦“派”的犹太演员来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尔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赛勒斯)。后来的电影,所谓的“厨房-水槽剧”则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汤姆·康特纳、阿尔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兰·白德斯。他们是一批典型地在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环境中成长的人,操一口与环境相称的口音和语言。他们所代表的英格兰充斥着分裂、痛苦、世俗、敌意和坚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早期和60年代早期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妇女都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如果说帝国之梦想在苏伊士危机中遭遇了破灭的话,那么英国中产阶级那种岛民固有的自信心却早就遭到了围攻。1956年的灾难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950年,就在伦敦

“这块圣土上”，在板球运动的老家，英国国家板球队首次败于西印度，标志着英国的衰退；3年后，即1953年，在国家体育馆，英格兰足球队又输得一塌糊涂，颜面尽失，以出人意料的3:6负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队。在这两项由英国人传遍世界的运动中，英国再也不是老大了。

这些非政治性运动的失败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和打击更为深远，因为这些年来英国社会一直在避开政治。苏伊士危机中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工党，根本无法利用艾登的失败来扭转局势，因为它无法利用选举来通过党政相连的网络关。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人对消费和享乐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也开始衰退，从而对与之相关的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兴味索然。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位带有自由倾向的保守党政治家，一位以爱德华式的乡村绅士面目出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对外宣扬取消殖民主义，对内则激励和平与繁荣政策。年长些的选民们都对此结局满心欢喜，只是年轻人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

帝国从各殖民地的撤离加强了英国人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之心。失去了帝国往日的荣耀，现在的英联邦国家成了为英国提供食物的巨大来源。多亏了英联邦的优惠策略（即英联邦各国家之间享有关税优惠），英联邦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在1960年代初构成了英国所有进口产值的三分之一。但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比例在其总出口量中却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65年，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首次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持平）。苏伊士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是英国衰败的标记，它们重新调整了对外贸易的对象和政策，转向了美国、亚洲以及后来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302

而对英国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却不大可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未来前景，更不可能帮助它赶上时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恰恰表明了英国的衰落和无助。因此，他们的文化和教育都针对着欧洲大陆，倒并不是说他们是出于本能。对许多英国政治家及其他人来说——而不仅对麦克米伦本人——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多多少少，他们国家的未来在海峡对岸。除了欧洲之外，大不列颠现在还能指望谁来帮助它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欧洲计划”在1950年代中期遭遇了滞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否决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提议，从而阻碍了一切有关加强欧洲之间合作的会谈。地区之间制定了一些以比荷卢协约为模本的地方性条约，如1954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之间订立的“流动人口共同劳力市场”条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议程。倡导欧洲合作者于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欧洲原子能机构，但它和煤钢共同体一样，是由法国最先

倡议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于这一机构范围狭小且便于技术管理。因此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前景仍抱怀疑态度,倒也情有可原。

再一次重新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得主要归功于比荷卢等国家,它们曾从跨疆界的统一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并没有淡化本国的个性特征。这就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如著名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寻求政治或军事统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人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军事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很显然,重点应当放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上,在这一领域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各国的合作而又不侵犯传统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兰同伴一起,于1955年6月在麦西拿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商对策。

303 参加麦西拿会议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还有一位英国(低级)“观察员”。斯帕克及其同伙们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关税联盟、贸易合作和其他跨国合作的提议,尽力避免伤及英、法两国的自尊。法国抱着警惕的热情,而英国则坚决地怀疑这一切。麦西拿会议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会议上继续谈起这项计划,旨在坚定地寻求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一个“共同的市场”。1955年11月,英国退出,表现出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的所谓欧洲共同体的警觉。

然而,法国却决定冒险一试。1956年3月斯帕克委员会再次强烈推荐成立“共同市场”时,法国表示赞成。英国观察家们还是犹疑不决。他们也深知不加入这一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正如在斯帕克推荐之前英国政府委员会私下观测后所指示的:“一旦麦西拿会议的权力机构在脱离英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那就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欧洲的霸权。”〔11〕要不是担心这一点,而且亲英的斯帕克又在极力主张,并且国际英镑体制在几个月前的苏伊士危机中又显得过于疲软的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会冒险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共命运。1957年3月25日,根据在罗马签订的和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掌控原子能的欧洲原子能机构),并于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欧共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共有6个7年前原属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

完全有必要重申《罗马条约》的重要性。对多数人而言,它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意愿。它的签约国都列出了一份时刻表,计划着要减免关税和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最终调整货币并实现自由商品、货币和劳力兑换的目标。《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框架并为以后制定和加强这些规则而设计出一套程序。根据《条约》第177条,各国可以提交诉讼至欧洲仲裁法庭以获得终审权。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

〔11〕 引自艾伦·米尔瓦德,《欧洲民族国家的自救》,(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429页。

视,倒是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强大,反倒可以说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报告中强调:“欧洲这一世界制造业的巨头,曾经从其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量重要资源,如今正面临着外在地位衰弱、影响力衰减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进步的能力。”正是因为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部分战略目标是为了抵抗正在日益强大的美国势力——从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间进入华盛顿政策圈内——这一目标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欧共体得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防护,离开了美国的保护,它的成员国根本没法投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防务了。 304

然而,也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对这一新的提议感到满意。在法国,许多保守党代表(包括戴高乐主义者)投票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汇率制,而有些社会党人和激进的左派(包括皮埃尔·孟德斯-法朗士)则反对成立因没有英国参加而显得令人不踏实的“欧洲小团体”。在德国,阿登纳自己的经济部长,热切主张自由贸易的路德维格·艾哈德,对新商业主义者的“关税联盟”提出批评,认为它会损害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限制了贸易往来并损害了价格体系。在艾哈德看来,欧共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宏大经济体”。一位学者曾敏锐地观察到,情况有可能变得完全两样:“要是艾哈德统治德国的话,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英德自由贸易组织,在农业上称霸世界,这样一种经济上排外的作用会最终迫使法国加盟进来。”〔12〕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实发生。而欧共体的最终成形也有它的逻辑可循。1950年代,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和西德进行贸易,欧洲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西德的市场和产品。此外,战后欧洲各国正忙于各自的经济事务中:通过计划、法规和制定成长目标并抵消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势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长、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中的资源转向、对农业和交通等行业发展的扶持,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跨国界的合作。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经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这样一种为实现共同体利益而合作的大趋势是受到了各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驱动,并不是舒曼炼钢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这一权力机构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制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1939年以前,这种保护和增强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欧洲国家以自我为阵,如今却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障碍的排除,成了推动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兰对欧共体可能对外的高额关税并不高兴,认为那会引起当地价格

〔12〕 安德鲁·穆拉维斯基:《欧洲的选择:从麦西拿到马斯特里奇的社会目标和国家权力》(伊萨尔,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98),第137页。

膨胀,和它的比利时邻国一样,它也因英国的未加入这一组织而感到担忧。但它们也不敢冒险断绝与它们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305 德国人的心思则比较复杂。作为欧洲主要出口大国的德国,在和西欧的自由贸易中获利日增——主要是因为德国制造商失去了在东欧的重要市场,也没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剥削利用。在艾哈德看来,为保护关税而限制了6个国家的欧洲关税联盟并不是德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和英国人一样,他和许多德国人期待着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欧洲贸易的到来。但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有多么不同,阿登纳将不会和法国断交。另外,还有农业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民大多产能低下,生产的食物还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结果导致了贫穷、移民和乡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那个饥荒年代里,所有的计划都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农夫们尽量多生产。为了减少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进口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依赖,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鼓励多产而非提高效率上。农民们不用担心会出现战前的价格紧缩:直到1951年,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政策保护和政府的价格支撑下,欧洲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说,40年代对农民来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到了1950年代,虽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已流向了城市新兴行业,但农产品产量还是在不断增加:欧洲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高产。而且他们也从公众的永久福利中不断得利。

在法国,这一怪异的状况表现得尤为突出。1950年,法国还完全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国的农产品出口就开始飙升。1949—1956年,法国的黄油产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奶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时期的大麦和玉米种植分别增长了348%和815%。法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跨度从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仍倾向于肉类、牛奶、奶酪、糖和小麦生产(在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盛产主要粮食的地区,影响法国农业生产的辛迪加势力最强)。同时,法国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在法国公众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村选票——努力维持着支撑价格并寻求着食品的出口市场。

306 这在法国决心加入欧共体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利益兴趣主要在于它可以优先进入海外尤其是德国(或英国)的肉类、奶类和谷物产品市场。这和它的欧洲同伴所允诺的持续的价格支撑以及同意全部购买法国剩余农产品的许诺一起,成为说服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的重要原因。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非农产品打开了国内市场。法国通过向欧共体成员国转嫁国内农产品而大大减轻了巴黎政府的负担,这一对农业的承诺长期以来已成了耗资巨大(并且快引起政策崩盘)的重负,法国早已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欧共体著名的共同农业政策诞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经过了近10年的商谈才于1970年正式产生。由于欧洲固定价格的上涨,所有的欧洲粮食产品都因价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由于都得受制于同样的价格机制,高效的荷兰奶业康释因集团并不见得比小型、低产的德国农场好多少。1960年代,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共体花费了大量精力设计实践方案和制定规则。他们为所有的农产品制定了目标价格。欧共体的对外关税将使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到这一水准——这完全是根据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最高价格和最低效生产者的水准而制定的。

因此,欧共体每年都得以低于“目标”价5%—7%的价格买空它所有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然后以低于欧洲价的价格贴补卖给共同市场外的国家,以清空多余的农产品。这种事实证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政治交易。为了维持生计,德国的小农场往往需要大量的补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场经营成本并不很高,但却没有人敢叫他们限制生产,更不会要求他们为他们的产品定个市价。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农民有求必应,把产品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城市消费者和所有纳税人头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前所未闻的。19世纪末欧洲的谷物关税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针对的是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在19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鼎盛时期,曾有过多次尝试通过购买剩余产品或出钱让农民少生产的方式来抬升农产品价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再也无法完成的一项协约中,德国曾许诺将从法国进口农产品,而法国则对德国开放国内化学、机械工程类产品的市场(战时在被占领后的巴黎曾举办过一次“欧洲的法国”展,强调了法国丰富的农产品,并认为法国加入希特勒的新欧洲后将进一步得益。)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保护。即使在美国,从1947年到1967年,它的对外关税降低了90%,却还是(并且仍在)小心地将农业排除在这些自由贸易之外。从一开始农产品就被故意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当然,欧共体也不例外。但共同农业政策带来的后果却也明显有悖常理。随着欧洲生产者效率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高收入保障使他们得以投资最好的装备,使用最好的化肥),供远大于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护的农产品领域:法国大农业主尤其偏好于谷物和牲畜,而对意大利南部生产的水果、橄榄和蔬菜却毫不关心。

随着1960年代末世界粮食价格的下跌,欧共体的粮价显得高得离谱。共同粮食政策宣布后的几年里,欧洲的玉米和牛肉价格是世界价格的200%,而欧洲黄油价格则高达400%。到1970年,共同粮食政策雇用了共同市场五分之四的行政人员,农业占据了预算的70%,这对一些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怪异的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受这样一种荒唐的政策,但是通过把重担整个地转嫁给共同体,并将它与共同市场的

更广泛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每个国家都至少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贫民(和非欧共同体农民)没有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但前者还是至少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一时期,当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加入欧共同体。共同市场宣布成立一年后,英国仍在试图阻止出现一个超国家范围的欧洲集团,提议将欧共同体扩展为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包括欧共同体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在内。可想而知,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回应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于1959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多是些繁荣、次要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爱尔兰、冰岛和芬兰。除葡萄牙外,它们的农业生产虽然规模很小却很高效,并且以世界市场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而且它们又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它们对欧共同体而言意义不大。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却成了(并仍然是)一个少数派的组织,成了对布鲁塞尔派缺陷的一大对抗而非一种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还是得自我定价。一些小的成员国,如奥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市场并吸引大批游客,得以繁荣本国经济。其他如丹麦等国则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出售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

但英国本身需要一个更大的工业出口市场,它的盟友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和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还太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虽然还在希望能够影响欧共同体的政策,但却认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正式决定于1961年7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时离伦敦鄙夷地拒绝参加麦西拿会谈已隔了6年。爱尔兰和丹麦在经济上和英国关系极为密切,也跟随英国申请加入了欧共同体。是否会批准英国的申请加入还不确定,大多数欧共同体成员国仍然希望英国能够加入进来,但是他们对英国能否接受《罗马条约》的核心目标却有理由心存怀疑。但事情仍属悬而未决,众所周知,戴高乐曾于1963年1月公开反对英国的加入。苏伊士危机发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来,直至此时仍受轻视的欧洲社会拒绝英国的加盟,这令麦克米伦非常绝望,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的内外政策都毁了。”

英国别无他法,只好再试一次。他们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同体,6个月后却再次遭到了心存报复、态度冷静的法国总统的投票否决。最后,在1970年,戴高乐退休并过世后,英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终于顺利加入了欧共同体(部分原因是随着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不断下跌,英国不再坚持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各国保证和非欧共同体国家之间的第三方贸易)。但是到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同体的时候,欧共同体早已定型,它们再也无法像英国的领导人以前一厢情愿地想对它施加影响

力了。

欧共体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宰,波恩掌管着财政大权,而巴黎主持政策。西德希望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由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阿登纳及其后继者们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毫无怨言,忠于法国这位盟友——这让英国大感意外。法国的农场则通过贴补和转型实现了“欧洲化”,而不用花丧失主权的代价。后者一直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首要考虑点——早在1955年麦西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南就明确宣布了法国的目标:跨国行政管理机构固然不错,但应当听命于各国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欧共体的最初10年里,戴高乐可以对其他成员国吹胡子瞪眼睛。根据最初的《罗马条约》,所有的主要决策(除吸纳新成员外)都应当在成员国内部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多数投票赞成的方式才可决定。但是,通过1956年6月撤离政府间的会谈,并迫使其他领导人同意根据法国的要求调整农业资金,法国总统一直束缚着欧共体的运行。经过长达6个月的僵持后,其他国家开始屈服;1966年1月,他们很不情愿地一致同意,今后部长级会议将不再通过多数投票的方式施压。这是第一次违背了原来的《罗马条约》,也是法国赤裸裸权力欲望的一次重要表现。

但欧共体早期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令人瞩目。1968年,欧共体就取消了内部关税,提前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期内6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倍。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约4%,而在1960年代,每个劳动者的农产品产量却年递增8.1%。到第一个10年快结束时,虽然还处在戴高乐的阴影之下,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却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排队申请加入。 309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那代价很高的自我服务式关税联盟、由集权当局和一位非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官直接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的做法,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按法国的命令形成的保护性条约和间接性补贴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组织体系的精神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共体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最终,法国人对早期欧共体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新“欧洲”,它被指责为在次大陆使各个民族国家再次产生了一切最坏的特征:似乎为西欧复兴而付出的代价总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危险。就总体的财富增长而言,欧共体所占份额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数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国或荷兰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还要小得多。但这在当时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还没什么选择余地。但一旦时机来临的话,它将导致产生一种狭隘的“欧洲”观,这对它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预示着在他那批神经紧张的继承者中间将引发一场权力之争。起初,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首先表现出一副唯一继承人的架势。正因如此,他的同事们密谋准备于同年7月将他暗杀,中间经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期执政2个月后,在斯大林内部圈子里名气并不大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确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多少带有点讽刺意味:贝利亚虽然患有精神错乱,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主张实行当时还不具备正式名称的“非斯大林化”。从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这段短时期内,他还一直在谴责所谓的“医生的阴谋”,并且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一些犯人,甚至还在那些卫星国推行改革,这令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是迷惑。

310 虽然新的领导层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却越来越以赫鲁晓夫为主,他们除了继续走贝利亚鼓吹的路线外,别无选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年里,苏联一直陷于压迫和贫穷交迫的境地,到处都是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坎格尔的劳改营里发生了暴乱,克里姆林宫出动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人数众多的军队,才平息了这些动乱。但一旦恢复“秩序”后,赫鲁晓夫又恢复贝利亚的策略。在1953—1956年间,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约500万名犯人。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1953年的柏林动乱中(参见第六章),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5月、6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冒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的危险,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第二年出台的赫鲁晓夫的策略分4个方面。首先,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西德重整军备,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他需要稳定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同时,莫斯科开始构建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桥梁——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经过长达7年的冷对局面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南斯拉夫(离签署《奥地利立国公约》仅隔了一个月),以便重修苏—南旧好。第三,莫斯科开始鼓励其卫星国的共产党改革,允许谨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卫者们所犯下的“错误”,重新安置一些当时的受害者,结束一系列的公审、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迈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步):划清同斯大林的界线。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走出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那现在为人熟知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总书记所犯下的罪行、错误和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这次报告带有一定的迷雾,但却

不可夸大它的划时代意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列宁主义者,并且至少和他的共产党领袖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阴险狡猾的目标,承认并细述斯大林的行为,但是把一切责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一切指责和责任推卸到已死的“乔大叔”身上,同时确保共产主义事业继续下去。

2月25日发表的报告在篇幅和言辞上都完全按传统的样式进行。它是对一批党内精英所作的发言,而且发言本身仅限于描述斯大林在“背离”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独裁者被指责为“忽视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独断专行。因而他的下级同事(自1930年初以来,赫鲁晓夫也归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责,不用为他的罪行及更严重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并加强列宁、列宁式的政府体制和斯大林的后继者的纯洁地位,赫鲁晓夫经过精心思考,冒着一定的风险,罗列了斯大林个人失误的细节(从而使听众中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干部们感到震惊和感情上的伤害)。

这次秘密报告达到了它的目标,至少在苏共内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时代坚决划清了界线,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继续表明这一切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对自由地腾出手来改革苏联经济,并可以放宽对恐怖机构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被边缘化了——在6月铁托回访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赫鲁晓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轻些的共产党员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些人和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一样,都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来否认斯大林的主张和败坏他的名誉。这场控制严格的“非斯大林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

然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无法保密,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在苏联,这份秘密报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许公开发表,但事发后几天之内,西方情报机构就风闻了这份报告。西方各国共产党也得知了这一报告,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动机还并不知情。结果,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贬损斯大林的传闻天下皆知,令人激动不已。对共产党人而言,贬损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担忧,但也是一种解脱。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人今后将不再需要寻找借口或否认他们批评斯大林的大胆指责了。西方各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同情斯大林的人开始退党和转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赫鲁晓夫公开弃绝斯大林主义的言行在东欧激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苏联领导人最近和铁托的重修旧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之言,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放弃了作

为共产党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现在,至少让人觉得,苏联将首次开诚布公地发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会上所解释的:“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大会上我们被告知,作家要讲真话。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讲真话……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魇终于被袪除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历史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过去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莫斯科那边又有传言说将发起新的政治行动。^[13]非斯大林化在邻国波兰则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6月间,波兰军队奉命开赴西部的波兹南市,镇压了一场因工资和劳动指标的争议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这和3年前柏林的那场动乱很相似)。然而,这在整个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个国家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并没有被彻底苏联化,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战后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受到的破坏并不严重。

1956年10月,由于害怕对公众情绪失去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苏联元帅康斯坦蒂·罗可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一职,并将其逐出政治局。同时选举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性变化:哥穆尔卡几年前还被关禁在狱,几乎难逃公审的厄运。在波兰公众眼里,他代表了一种波兰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他的当选被普遍理解成是共产党为了维持民族性而采取的一种对莫斯科更高权力的暗中对抗。

那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此事件的看法。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于10月19日突然飞抵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任,禁止驱逐罗可索夫斯基,并想重新控制波兰。为确保对方明白他们的意图,赫鲁晓夫同时命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但在机场柏油碎石路上,在与哥穆尔卡的激烈争辩中,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认为与其强加于人并引起激烈冲突,还不如接受波兰共产党的新状况,从而使苏联在波兰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而哥穆尔卡则向苏联人保证,他能够恢复控制局势,无意放弃权力,但不会使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也不会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

考虑到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的悬殊实力,波兰新的领导人却成功转移了一场国家灾难,实在令人惊奇。但赫鲁晓夫却认清了他的对话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对苏联政治局解释说,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完全错误估计了哥穆尔卡。”共产党控制波兰的代价只是一些人事变动,放松了波兰公众的生活,但哥穆尔卡是一位坚定的党员,

[13]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此仍然地位牢固,而且私下里的秘密审讯还是延续了两年多。1955年5月1日,一座巨大庄严的斯大林雕像矗立在一座山上,俯瞰着布拉格城。直到1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才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后果惊人。

他不愿意把权力拱手放到街头,或落到共产党的政敌手里。同时,他也是一位务实的人:如果他没法平息波兰动乱的话,那么就只能让位给苏联红军了。哥穆尔卡认识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消除苏联的地域影响力和政治垄断。 313

“波兰的十月”最终得以化险为夷,纯属偶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华沙差点再次被苏联占领。然而,匈牙利的情况却不一样,这在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纳吉和哥穆尔卡一样,早年曾遭受过清洗并被关入狱,因此对他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时期和暴政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作为党的领导人,他的首次行动就是在贝利亚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关闭拘留营和劳改营,允许农民自愿离开集体农庄。从总体上更多地鼓励农业生产,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工业目标: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决议很有特色地表述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揭示出一种自我吹嘘之象,充满了风险。只要强制发展重工业,就总是预见到有一部分资源和原材料无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来,纳吉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过马迪亚斯·拉科西的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并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员中仅有的两名反对处死拉兹罗·拉吉克的人之一。这件事以及他对农村集体化的批判,导致他被逐出党的领导层,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纳吉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态度”,未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选择他是符合逻辑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经济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躏过的国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拉科西统治下,从1948年到1953年间,约有480名公众人物被处死,这还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产党牺牲者在内;同一时期,(在总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竟有15万人被关进了监狱。

纳吉一直执政到1955年春。那时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批中坚分子正在暗中给这位同事制造麻烦,趁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北约组织扩张的威胁、邻国奥地利将要变成独立的中立国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莫斯科,说纳吉不值得信赖,他无法坚决控制局面。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纳吉的“右倾背离”,他被赶下了台(后来又被开除出党),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们则得以重掌布达佩斯的大权。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8个月前,这种从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预示了在诋毁斯大林名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是多么缺少计划,扰乱了共产党的平稳执政。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纳吉集团”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 314
对派,即“改革”派,这在战后共产主义中还属首次。与此同时,又轮到了拉科西来吸引莫斯科的嫌恶目光了。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续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铁托的那阵疯狂运动中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审中,尤其是对拉吉克的审判中,突出地指控拉吉克等人的“铁托主义”,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在这场运

动中,匈牙利共产党被指派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党的领导层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积极而热切。

因而,这时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尴尬境地,成了苏联计划中不合时宜的障碍物。1956年6月,随着苏联—南斯拉夫高层领导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似乎继续在布达佩斯保留这样一位与过去不光彩的日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又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况且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顽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众的公开抗议。尽管拉科西费尽心机,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报纸上起劲地批判贝利亚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随者尉加伯·佩特,紧跟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调,并庆贺得以“揭露”这种迫害无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56年7月17日,安纳斯塔斯·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把拉科西赶下了台。

苏联提拔了厄尔诺·格罗顶替拉科西的位置,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次苏联选错了人,格罗既无能力领导变革,又无法镇压变革。10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来说尤其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布达佩斯当局允许公众重新安葬拉兹罗·拉吉克及其在公审中牺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审中的幸存者贝拉·萨兹在墓前演讲道:

被以捏造的罪名处决的拉兹罗·拉吉克在一处不知名的墓地里躺了七年。然而他的死对匈牙利人民和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警示。从他棺木旁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仅仅是在向死者表示敬意;他们是在热切希望并决心埋葬掉一整个时代。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独裁专政、道德腐朽的不光彩的年代,应当被永远埋葬掉;匈牙利实践者们在执政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和个人崇拜,充满了危险,更应当被永远禁止。

拉吉克的命运在激起人们同情心的同时,又夹杂着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人自己也曾将许多无辜的(非共产党)受害者送上了绞架。但不管是否带有嘲讽意味,重葬拉吉克却引发了匈牙利的火星。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学生们组织了“匈牙利学生团”,它独立于官方的共产党学生组织。一周之内,学生组织遍及全国,到10月22日,以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学生系统阐述的“十六点”声明为高潮。学生们要求实行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改革、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论权,取消各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生活的禁令和规定。但是,他们还要求伊姆雷·纳吉当总理、审判拉科西及其同伙的罪行、苏联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土。这就预兆着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10月23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议会广场上示威,坚持他们的要求。政府一开始是禁止,后来又允许了这次示威。当天下午,示威还在继续,格罗通过当晚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发表讲话,指责这次集会及其组织者。一小时后,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攻击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员会连夜召开会议。第二天早上8点13分,宣布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

如果党的领导层指望通过纳吉的回归来平息这场事端的话,那他们是盘算错了。纳吉本人也急于恢复秩序:他上台后1小时内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苏斯洛夫与米高扬的谈话中(米高扬当天就从莫斯科直飞而来),纳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领导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和示威者对话。在10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雅努什·卡达尔^[14]向苏联人汇报时解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谁是忠诚的大众,他们因党在过去所犯的 error 而疏远了党;谁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纳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

卡达尔的明确表态可能说服了苏联领导人,但这不是匈牙利的真实情况。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自发地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工人团体和革命者“全国委员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反击和私刑泛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不顾一些党员的劝告,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场动乱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从而失去了拉拢对方的机会。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发仅一个星期后,纳吉才在广播中建议停止武装冲突,承认最近的抗议活动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许诺废除令人鄙视的秘密警察,并宣布苏军即将从布达佩斯撤离。 316

苏联领导人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认可了匈牙利领导层的新路线。苏斯洛夫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把这次让步看作是党为了控制群众运动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计。两天后,即10月30日,在共产党的布达佩斯总部遭袭并造成24名楼层保卫者遇难后,伊姆雷·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这一次,他宣称他的政府从此以后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党之间民主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纳吉正在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纳吉不是与反对派对立,而是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在民众运动的基础上。他的演讲结束语说,要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确地省略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公开要求莫斯科从布达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国各地“开始撤走苏军”。

纳吉的赌博——他深信可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能摆脱苏联的干涉所造成的难以

[14] 卡达尔是三年前由纳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10月25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顶替了格罗,因为当天早晨格罗手下的安全部人员向议会广场上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开枪。

启齿的威胁——得到了共产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但是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民众起义委员会、政治党派和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到处充满了反抗苏联的情绪，还不时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正在对纳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纳吉宣布他正在商谈匈牙利决定退出《华沙条约》之时，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兰一样，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失控的话，他们就会插手此事。只是一开始他们还并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宣称，关于苏军撤离匈牙利一事，他们愿意和匈牙利领导层“进行适当的谈判”。然而，即使他们已做出了这一让步，还是得到报告说（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的学生示威活动以及“含有敌对情绪的”保加利亚知识界都同情匈牙利动乱。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的传染效应的开始，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措施。

317 于是在赫鲁晓夫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原来定于第二天进行撤军谈判的议程。因为“帝国主义者”可能将这次撤军看作是苏联软弱的证据之一。因此相反，苏联现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部队被立即调派前往匈牙利边境。得知这一行动后，匈牙利总理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并通告他，为表示对苏联军队新动作的抗议，匈牙利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当晚，11月1日19点5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从此以后将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请求联合国承认其新地位。这一宣言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广泛赞同；曾在动乱之初就举行大罢工的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马上积极回应，号召工人复工。纳吉此举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曾对他产生过怀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

就在纳吉发表历史性讲话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达尔却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赫鲁晓夫说服了他，说苏联将支持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新政府。不管怎样，苏联红军将进入匈牙利维持秩序，唯一的问题是怎样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与之合作。赫鲁晓夫坚持说苏联现在意识到7月份让格罗重新上台是犯了个大错，这就打消了卡达尔心中残存的会背叛纳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顾虑。一旦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局势，他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赫鲁晓夫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会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领导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团曾在前一天会见过波兰领导人）。这时，纳吉还在继续抗议苏联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11月2日，他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出面调停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并寻求西方社会承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第二天，即11月3日，纳吉政府与苏军领导就撤军问题开始（或者说自认为是开始了）谈判。但当晚匈牙利谈判团一回到苏军驻匈牙利特克尔总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

没过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点,苏联坦克进攻布达佩斯,一小时后,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地区,并广播宣称已经推翻了纳吉政府并成立了新政府。纳吉立刻做出回应,亲自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号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击入侵者。然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们就逃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他们在那里被允许避难。

军事战绩不言而喻:尽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苏联军队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占领了布达佩斯,而后于11月7日,雅努什·卡达尔宣誓就职。由于卡达尔并不想直接攻击一些工人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得以多存在了一个月,一些零星的罢工运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根据1956年11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匈牙利的煤矿产量下降了10%。但一个月后,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执政。1月5日,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并开始了认真的镇压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2700名匈牙利人在斗争中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最后一次被处死刑是在1961年)。总计约有2.2万匈牙利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许多人被判长达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万人被关进了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处在严密监视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国大赦。 318

估计约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以上——在苏联占领后逃离了匈牙利,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许多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精英,他们来自布达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们定居在美国(约有8万匈牙利难民)、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纳吉和他的同伴们命运未定。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过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1月22日被骗离开了那里,立即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逮捕,并被送进了罗马尼亚的监狱。

卡达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为了避免引起国际舆论的抗议,针对那些参加巷战的年轻工人、士兵的报复行动尽量都在暗中进行;尽管如此,国际上还是要求对那些杰出人物如作家约瑟夫·加利和古拉·奥伯索夫斯基等从宽处理。纳吉本人的命运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达尔和他的同事决定把纳吉及其“同谋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但这一程序一直被他们自己耽搁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时候一切都还处在严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动反革命的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和阿帕德·冈茨(后来共产党下台之后当上了匈牙利总统)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位——约瑟夫·齐拉吉和格扎·罗宋齐在审判前就在狱中被杀了。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于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处死。

匈牙利暴乱,这场在苏联帝国一个小小边远地方发生的短暂而毫无希望的动乱,对国

际事务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首先,它从客观上给西方外交家们上了一课。直到那时,美国官方虽然知道无法使东欧卫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但是还在不断地鼓励它们的“反抗精神”。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第174号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创造条件以便在
319 未来适当时机下解放那些卫星国家”,美国采取了一些秘密活动和外交支持。但后来根据1956年的动乱而于7月份起草的一份机密文件却强调:“美国不打算依靠战争来消灭苏联在其卫星国的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

其实,自从1953年的柏林动乱被镇压后,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苏联在它的“地盘”上是不可动摇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对东欧的唯一战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国毫不妥协的公开论调的鼓励,“欧洲自由之声”移民广播节目也鼓励匈牙利人拿起武器,并许诺他们会立刻得到外援。一旦这种支持并不兑现,失败的造反者们自然就幻想破灭,感到痛苦。

即使西方各国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当时的情状也并非好时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举行密谈。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代表的一份高度机密备忘录中解释说:“在关于匈牙利问题上起草的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中,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影响到我国在阿尔及利亚行动的措施……我们尤其反对组织调查委员会。”4天后,为答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伦敦直接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国外交部长塞尔文·洛伊德写给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辙:“我本人认为传递这一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10月28日,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现在在埃及这件事情上焦头烂额了。”〔15〕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三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
320 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

〔15〕 苏联领导人在英法入侵前三天即10月28日就知道了此事,这说明苏联情报机构比当时西方联盟所担心的还要厉害。

问心无愧。

于是,苏联领导人看准并且抓住了时机。在共产党眼里,真正的威胁并不是纳吉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宽审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这在莫斯科看来也只不过是具有“挑衅性”,还不足以就此推翻纳吉的统治。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居然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十分小心、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这种背离苏联实践的做法,会小事变大,导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产党遭到失败。这也是其他各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立即听从赫鲁晓夫的决策,主张推翻纳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会议上,表示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发自肺腑,十分真实。〔16〕

连铁托也最终承认,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的垮台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瓦解,树立了一种危险的榜样。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一开始曾把匈牙利的变化看作是非斯大林化的进一步证明。但到了10月底,布达佩斯事态的进程改变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况,在他的国家里,在伏伊伏丁那地区住着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多,而且一旦受到传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使铁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辞辛劳地飞抵铁托在亚得里亚岛上的疗养地,简要地告知了他将出兵的情况,铁托表现出了忧虑,但表示理解。他最关心的是匈牙利即将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没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很高兴地让他放宽了心。

然而,仅仅两天后,铁托就为纳吉及其15名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避难场所,这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高潮时期所做的,并且假设了苏联人对制造烈士不感兴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接下来在卡达尔本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却绑架了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等人,这样一来,铁托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公开场合,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继续表示赞同卡达尔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却毫不掩饰他对整个事态发展的不满。

苏联任意干涉共产党兄弟国家内政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拉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领导 321
关系。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动提出要和西方国家、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修好。铁托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着复杂的态度。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对恢复了共产党的秩序表示释然,但认为,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引人非议。

〔16〕 甚至波兰的哥穆尔卡也马上认同了苏联的论调。在波兰,纳吉退出《华沙条约》曾引起过焦虑——波兰因恐惧德国的领土复仇主义而对苏联军队所保证的安全布局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在和赫鲁晓夫的一次会晤中,哥穆尔卡曾力劝苏联领导人不要审判纳吉,但没有奏效。

其他地方的反应总体来说要明朗得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一泄露开来,就标志着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与更新还可能继续存在,通过牺牲斯大林本人来保护人们对列宁的革命纯洁性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他的党员们及跟随他们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以执着坚守的神话。但布达佩斯发生的绝望的巷战却驱散了人们对这种苏联“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共产党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辩证法了。西方各国共产党开始大伤元气。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间约有40万党员退党。在匈牙利危机最高峰时期,陶里亚蒂曾向苏联领导人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趋势令我们党内的思想净化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要想得到领导层的共识也变得很难。”

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英国等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17]他们和左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样,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改革前景所吸引,并对匈牙利革命本身感兴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是在苏联集团的共产党的执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这些协会组织的崛起(而非纳吉恢复各政党的地位)意味着开始真正兴起了以民主反对独裁,以自由反对暴政,并且有可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自由的相互并存。用当时在巴黎从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轻共产党员约尔格·塞布伦后来的话说:“秘密报告让我们松了口气;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从理性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匈牙利被占领后,这种希望就破灭了。

322 一些西方观察者们还试图为苏联的干涉寻找正当的理由,或者至少想为它做解释,接受了共产党的官方声明,说纳吉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或者说他被清扫出局了。特别是萨特坚持认为匈牙利动乱明显具有“极右性质”。但不管布达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者有何动机——这在当时众说纷纭,难以辨明——引起国外观察者们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匈牙利的动乱,而是苏联的镇压。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是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在备忘录中写道:“在摧灭匈牙利革命中,苏联给那些为共产主义增添力量的‘同路人’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运动,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打击。”他的见解是

[17] 尤其在那些落后的组织里,比如法国共产党(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否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许多党员并不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而退党,而是因为当地领导层禁止谈论这一切。

很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达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平庸之才,使苏联共产主义在许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臭气”,前共产党人如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主张把“鼻子转向别处”。1956年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阴暗的工厂和荒废的集体农庄里,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秘密了,它们躲在了其他更怪异的领域里。一批未经改造过的列宁主义辩护者们还在死守着过去,人数却在逐渐消退;从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进步势力正在从欧洲之外那个还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负和发生的动乱中寻求慰藉和榜样。

在东欧,人们的幻想也破灭了。10月31日,一位驻布达佩斯的英国外交官报告第一轮战斗高峰时说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并击退那种残暴的猛烈进攻,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宽恕。”其实,不仅仅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记着苏联的坦克。罗马尼亚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表示支持他们的匈牙利邻居;东德知识分子因谴责苏联的行为而遭到逮捕和审判;在苏联,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让迄今忠诚的年轻共产党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达佩斯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如罗马尼亚的保尔·戈马和民主德国的沃尔夫冈·哈里希。

当然,在东欧,情况有所不同,声名扫地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们没法把目光转向遥远地区,那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信念。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却还必须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经历了1956年的事件后,东欧人久已累积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时候曾重新燃起过的信心,都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的救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还有对重新恢复公审受害者名誉的迟疑,这些都暗示着共产党内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复兴和解放的种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顺从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好处。正因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现在平静了,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常态,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适时地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紧随着对1956年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惩罚性的报复后,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后政治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共产党专政的政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享有虽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实的生产和消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信仰他们的领导人了,但却没有人表示对党有丝毫的反对。他们的沉默被看作是一种默认。

由此带来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保证了匈牙利的稳定;而对匈牙利的记忆至少在后来的10年间又确保了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付出代价后才换

来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曾是它在 50 年代早期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现在，它只是成了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这并不是说它将维持不了多久，1956 年以后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苏联统治制度将不久于世。事实上，在 1956 年事件以前，人们对苏联的统治都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1956 年 11 月以后，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本国一样，开始逐步走向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

在许多方面，苏联人也将为此而付出代价。1956 年的事件标志着列宁及其继承人曾经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话的失败和破灭。正如鲍里斯·叶利钦许多年后在 1992 年 11 月的匈牙利议会上演讲时所说的：“1956 年的悲剧……是苏联统治者永远无法抹灭的一块污点。”然而，比起苏联人施加给那些受害者的苦难，这又算得了什么。33 年后，即在 1989 年 6 月 16 日，在庆贺布达佩斯获得自由的纪念会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参加了另一场隆重的重葬仪式：这次是为了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事们。在纳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发言者维克多·奥尔班——未来的国家总理——对集会的群众说道：“这是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笔债带来的负担，从而走出我们被迫陷入的小亚细亚死胡同。老实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56 年已经剥夺了今天年轻人的未来。”

第 10 章

繁华年代

实话实说,我们的大多数民众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好日子。 324

——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年7月20日

整个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力不断上升、加上通货膨胀,加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高度逼人的广告和营销手段,加上大众传媒,加上文化的民主和创造大众的思想,而我的名字就是“容易受广告左右的大众。”

——J. B. 普利斯特莱

看看这些人!原始人!

他们从哪里来?

卢卡尼亚。

它在什么地方?

一直下到底!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卢齐诺·维斯康蒂导演,1960年

我们要去那儿,阳光灿烂,

我们要去那儿,海水湛蓝。

在电影中,我们早已见识,

现在亲自看看,是否属实。

——克立夫·理查德《夏日假期》,1959年

生活在美国人的时代,真是糟透了——当然,除非你是美国人。

——吉米·波特在《愤怒的回顾》中,1956年

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里法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报告,书名起得不错:《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西欧,自希特勒战败以后的30年里,确实算得上“辉煌”。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在经历了长达40年之久的战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西欧大陆的经济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础,但仅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开始仿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就摇摇晃晃地从废墟上站起来,蹒跚地进入了欧洲的繁荣时代,令人大吃一惊,并且多少有些令人诧异。

325 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史被认为是完全背离了先前几十年的模式。1930年代马尔萨斯派所强调的保护主义和紧缩政策均遭到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自由贸易。政府不但没有缩减开支与预算,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支出。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对基础设施和机械制造方面的长期投资,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厂和旧设备或者更新,或者替换,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国际贸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轻一代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来消耗各种各样的产品。

战后的经济“繁荣”在时间的到来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稍后是法国和意大利;而且各国在税收、公共支出和投资重点上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修筑或改善公路、铁路、房屋、工厂。有些国家还故意抑制居民消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岁月里都经历过(委婉地说来是)贫困时期。当然,这些国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们的起点:越是富有的国家,其改变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此外,欧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也都在稳步增长。GDP和GN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与福利的一种新的重要标准。在1950年代,西德的人均国民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为6.5%,意大利为5.3%,法国为3.5%。与过去几十年的表现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率令人赞叹:1913—1950年间,德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0.4%,意大利是0.6%,法国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后威廉敏娜帝国统治的几十年繁荣时期里,德国经济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长率。

到了196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西欧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同寻常地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总之,从1950年到1973年,德国的人均GDP确实翻了3倍多。法国人均GDP上升了1.5倍。意大利经济虽然底子更弱,但却发展得更快。那些历史上的穷

国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从1950年到1973年,奥地利人均GDP从3731美元上升到了11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换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则从2379美元上升到8739美元。从1950到1970年间,荷兰经济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长,与过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来的7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得归功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它的增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出口量。仅仅通过排除国际贸易障碍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战后西欧各国政府走出了以前几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1〕西德就是主要受益者,仅仅10年时间,它在世界出口制造品中占有的份额从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 326

1950年后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6倍。就连法国这样一个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中一直维持10%左右份额的国家,也从全球不断激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这些年来都获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条件明显有利于它们这一边,因为从那些非西方世界进口的原材料和食物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在和“第三世界”长达30年的不公平贸易特权中,这些西方国家简直就是获得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2〕

然而,西欧经济的繁荣最主要体现在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欧洲统一体。早在《罗马条约》之前,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那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往来就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1958年西德出口量(按价值估算)的29%都是销往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有30%销往欧洲其他国家。在签订《罗马条约》之前,比利时的出口中早已有44%销往欧共同体成员国。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后才正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它们也早就融入了这一贸易网络:1971年,即在奥地利正式加入欧共同体20年之前,它就从欧共同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中进口了约占它本国进口总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欧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并没有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正在实际形成中的体制。〔3〕

战后欧洲经济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950年

〔1〕 然而,对于旧规则,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强调其不合时宜而应该迅速废除。比如直到1960年代,意大利政府针对进口轿车,在配额政策上还是谨慎维持法西斯时代的关税和配额,以保护国内产品(主要是菲亚特汽车。)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同策略。

〔2〕 其中许多钱款被转化成了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导致这些国家至今债台高筑,经济严重受损。

〔3〕 英国老是与众不同。1956年,英国74%的出口销往欧洲以外地区,主要是它的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甚至到了1973年英国最终加入欧共同体之后,它也只有1/3的出口贸易是直接和这些在1992年组成欧盟的12个国家进行的。

到198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力比过去80年间提高了3倍:每小时生产的GDP增速甚至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考虑到就业人数的增加,这说明生产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劳动关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竞争的结果:过去327 30年来的政治动乱、大规模失业、投资不足以及人们身体上遭受的伤害等等,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自1945年以来处在一种历史的低起点。即使没有当代人那种对现代化的兴趣,也缺少技术上的革新,西欧的经济发展也还是会有进步。

但是在生产力稳步提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质的转变。194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爱尔兰和东欧还主要都是乡村,并且不管怎么说还处于落后状态。1950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成人就业者中五分之四是农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和波兰,每2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从事农业生产;意大利是每5个人中有2个务农。奥地利每3个就业者中有1个人在农场劳作,法国则是近3/10的就业者在从事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即使在西德,就业者中也有2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5%,还有相对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时(13%),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地推动它们进入了后农业社会。〔4〕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大量的欧洲人抛弃了土地,开始进入城镇工作,使196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77年,意大利的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6%;在东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农业生产人数从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奥地利全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则降到了12%,法国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农业生产人数也只占20%。在比利时(3.3%)和英国(2.7%),在统计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农民所占的已经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生产和乳制品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尤其是在像丹麦和荷兰这样的国家里,黄油、奶酪和肉制品现在成了出口盈利产品,成了国内经济的主要支柱。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意大利,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包括政府部门的雇员)获利最多,许多原先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这一优势。在某些地方,如意大利、爱尔兰、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还有法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直接从农业国跃变成了以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实质上跨过了工业阶段。而英国、比利时为了实现工业化,几乎耗费了百年时间。〔5〕到了1970年代末,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堪的那维亚半岛

〔4〕 从比较角度来看,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美国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2%。

〔5〕 瑞典部分地属于例外,战后瑞典的繁荣主要依赖其高价值产品的生产制造。一方面,它利用了大批廉价的、现成的(芬兰)技术移民工人,另一方面又通过水力发电缓解了高油价带来的危机。瑞典和瑞士的情况非常相似,纯属特例。

及阿尔卑斯山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据了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职于通讯、交通、银行、公共管理等行业。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也紧跟其后。 328

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欧国家,原先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转入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低的工矿业和制造业。在捷克斯洛伐克,1950年代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下滑。1950年代中期,随着比利时、法国、西德和英国煤、铁矿产量的逐步减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产量却正在逐步增加。共产党重点强调原材料开采和初级产品加工的策略最初确实促进了总产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短期内,共产党在经济上侧重工业生产的要求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不仅仅是对许多西方观察家而言),然而,这却对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

仅仅农业生产下降这一项就对欧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乡村到城镇、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伴随着英国再次步入百年前的崛起。实际情况是,英国并没有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来转向从事低收入的制造或服务行业,因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一下子从所谓的落后状态向高效率迅速转型而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英国的表现要相对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甚或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出于同样原因,这几十年来,荷兰也远比它的邻居、工业化的比利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这主要得益于“一次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尚未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很难估量政府和计划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们根本就显得多余。比如,意大利北部的“新兴”经济大多得益于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以以前那些季节性农业人员为主要的家庭雇工——管理费用低,投资也不大,几乎无需纳税。到1971年止,该国劳动力的80%受雇于人数不到100人、甚至远远不足100人的企业。除了对财政、区划、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不闻不问外,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维持这些企业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也并不明显。

但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在规划那些由个人力量或私人投资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长期以来,欧洲的非政府资本基金一直少之又少,而在1950年代末以前,来自美国的私人投资也还未开始取代原先的马歇尔计划或军事援助。在意大利,由世界银行大笔贷款的南部重建项目,一开始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生产——开垦土地、建设道路,铺设下水道、构建高架路,等等。后来,这项投资转而支持开建新工厂。它以贷款、资助和优惠税收的方式吸引那些愿意到南部去投资的私人企业。 329
这一方式有效地将60%的国有资产转为向地方的投资,直接促进了南部地区的新投资建设。1957年后的几十年里,在半岛的南部三分之一地方,建立了12个经济“发展区”和30个经济“发展中心”。

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国家项目一样,南部重建项目也毫无成效,而且发生了很多腐败现

象。这项计划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落入了沿海地区手中；它所引进的新兴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因而并未能提供什么就业机会。该地区在农业改革初期形成的许多小型、“独立”农场还是在依赖国家扶植，使得意大利的南部成了一块享受半永久福利待遇的地区。但不管怎么说，到1970年代中期，南部地区的人均消费却翻了一番，当地的收入以年均4%的比例在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电气化的进程也正在完成之中——这里可是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属于欧洲最孤立、最落后的地区。以北部工业起飞的速度来看，令人震惊的并不是重建计划未能在罗马以南地区创造出经济奇迹，而是这一地区居然也能跟上发展的脚步——这是由于南部的工人们努力所致。仅此看来，罗马政府还是有些值得称赞之处。

在其他地区，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却不容忽视。在法国，国家仅限于人们所说的“暗示性计划”，利用权力杠杆来调配资源到指定的地区、指定的行业甚至是指定的产品中，并且有意识地补偿那些战前几十年里由于马尔萨斯式的投资不足而造成的跛足状态。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货币法规和限制国际资本流动，阻碍了外来的竞争力量，这使得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对国内投资实施相当有效的控制。由于通过短期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自由权受到了限制，法国和其他地区的那些银行家和私人借贷者只好转而投资国内。〔6〕

在西德，人们脑海中还存留着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冲突和不稳定之感（政治上和金钱上都有），比起法国和意大利同行而言，波恩政府在对经济行为的规划和指导方面显得更为懈怠，但却更加紧密地关注于避免引起或尽量平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劳资双方。他们尤其鼓励并支持通过协商和制定“社会合约”来降低工人罢工或工资通胀的风险。因而，私人企业（以及它们协作的或拥有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未来做投资规划，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对员工工资的长期限定。在西德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那些相对顺从的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通过就业保障、低通货膨胀，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从高累进税率中征得的资金来支撑的综合性全面公共福利服务而得到了补偿。

在英国，政府更直接地干预经济。1945—1951年间工党政府从事的国有化项目完全由后继的保守党政府来接替掌控。但两党都坚决不制订长期的经济计划，也不过分干预劳资关系。它以“需求-管理”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操纵利率和尽量缩小税收面，来鼓励存款或消费。这些都还是短期策略。这些年来，英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战略目

〔6〕 同过去的做法作对比颇有启示意义。在法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巴黎一些大型投资银行因缺少资源而无法支持国内工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也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或鼓励。这些弱势状况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1945年法国的工厂、道路、铁路网和公共设施都处于破败之态。

标是防止重新出现1930年代那种令人可怕的失业率。

那时的整个西欧,政府、雇主、工人同心协力地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政府支出居高,税收累进,工资增长受到限制。众所周知,这些在战争中和战后形成的目标早就赢得了广泛的共识,以符合计划经济的需要并形成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因此,它们是政府政策和集体意愿的产物。然而,为创造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具备的便利条件,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掌控的范围。欧洲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了欧洲经济奇迹出现及其后来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

过去,欧洲曾有过多次数人口剧增的经历,最近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这些都未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一来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无法供养太多的人口,二来是因为战争和疾病,还有就是那些新增人口中,尤其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纷纷移居海外。到了20世纪,原本以为随着前几十年欧洲出生率上升而有可能增加的人口,却因战争和移民等因素而一直维持在低于原先估计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整一代男性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内战纷扰、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西欧部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低点。在英国,每1000个人中的新生儿比例仅为15.3,比利时是15.4,奥地利12.8。1939年法国每1000人中新生儿比例为14.6,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年、1929年,以及后来从1935年到1944年里的每一年,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出生率。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全国人口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欧洲的地中海其他地区到维也纳以东,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有时甚至高达西欧的两倍。然而,不断上升的婴儿死亡率及各个年龄层次的高人口死亡率,使得那里的人口总数并不显多。 33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造成的人口灾难中,战后出现的婴儿潮才显得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从1950到1970年,英国人口上升了13%,意大利上升了17%。这些年来,西德的人口出生率也上升了28%,瑞典上升了29%,荷兰更是高达35%。其中,有些国家当地人口的增长是因为大量移民所导致的(如大量原殖民地居民回归荷兰,东德人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难民拥向西德)。但对法国而言,外来的影响力并不大,从战后1946年的首次人口统计到60年代末,法国人口增长几乎达到30%,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1950年代及1960年代,欧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到处都是儿童和青年,这一景象在当时的街头比比皆是。经过40年的空档之后,欧洲再次焕发出了青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高峰出现在1947到1949年:1949年法国出生的新生儿人数达到86.9万,而在1939年仅有61.2万。到了1960年,荷兰、爱尔兰、芬兰人口中30%的人数年龄不到15岁。

1967年,法国1/3的人口年龄不足20岁。战后不仅出生了上百万的婴儿,而且他们的存活率之高也是史无前例的。

多亏了不断改善的营养摄入、不断提高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水平,这几十年来,西欧出生后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急剧下跌。在比利时,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53.4%下降到了1970年的21.1%,而且这一变化主要出现在1950—1960年的十年间。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从63.8%降到了29.6%,法国从52.0%降到了18.2%。老年人也越来越长寿,至少在西欧,同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也稳步下降。东欧的婴儿存活率也有所上升,与以前的高死亡率相比好了许多:在南斯拉夫,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11.86%降到了1970年的5.52%。^[7]在苏联本土,该比例从1950年的8.1%降到了1970年的2.5%,但它内部各共和国之间有差异。但是比起西方国家来,共产党国家的生育率却下跌得很快,而且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因死亡率(尤其是男性)的不断上升而变得更为糟糕。

332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生育率的复苏,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归结于乐观主义精神加免费牛奶的供应。在1913年到1945年长时间人口低谷时期,为弥补长期以来男性短缺的问题,各国政府曾通过鼓吹爱国主义、制定家庭“法规”和其他立法,提供住房、就业、社保等补偿途径来极力鼓励生育,但却不起作用。而现在,即使是在战后经济增长能够转化为就业保障和消费型经济之前,由于社会的和平、安宁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励,足以使整个社会很快就实现了1940年之前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传所无法达到的目标。

那些解甲归田的士兵们、重回故土的战俘和政治流放犯们,在供给和分配制度偏向有孩子的夫妻、给每一个孩子发放现金补贴这一政策鼓励下,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结婚成家。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些,在1950年代初,西欧各国政府还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还不只是希望和社会安全:他们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整个1930年代,西欧的平均失业率为7.5%(英国是11.5%)。到了1950年代,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3%。到1960年代中期,欧洲的平均失业率只有1.5%。自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全面就业状态,在许多部门还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

但除了组织劳动力的优势以外,(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工会不是本身弱小就是不愿意行使它们的权力。这也是两次大战期间留下的后遗症:那些战斗性的政治工会再也没能从大萧条的冲击和法西斯压迫的阴影下完全恢复。在充当全国性的谈判方而重新获得尊重之时,工会代表们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往往选择同雇主合作,而不是利用劳动力短缺

[7] 到了1950年,欧洲国家中只有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几个国家中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超过了1/10。葡萄牙1950年的新生儿死亡率是9.41%,在西欧排名最差。

之机来获得直接利益。1955年,当法国首份生产协议因汽车工人代表与国有化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发生冲突而搁浅时,就显示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工人对工资收入的要求,而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个带薪休假周。〔8〕

西欧过去的蓝领工会现在之所以不再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持续性力量,即男性技术工人正在逐渐减少。煤矿、钢铁、纺织和其他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行业的用工需求正在萎缩,虽然这一切直到60年代才日益明显。第三产业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中大多数职位需要的是女性雇员。有些行业,例如纺织生产和家政服务业,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女性的天下。但是,战后所有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女性劳动力不再只从事女仆或纺织女工的工作。相反,越来越多的年长女性(通常是已婚妇女)开始在商店、写字楼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业尤其是护士、教师行业就业。到了1961年,英国就业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而且就业女性中有三分之二从事神职或秘书工作。甚至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年长妇女按传统不会正式就业的国家,到了1960年代末,就业劳动力中妇女也占了27%。 333

在繁华的欧洲西北部地区,因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强,导致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拥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那些男人们(还有为数较少的妇女、儿童)放弃了乡村生活而迁往城市、迁往本国更发达的地区。在西班牙,1950年之后的20年间,100多万居民从安达鲁西亚迁往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到了1970年,有160万出生在安达鲁西亚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外地,其中仅巴塞罗那一地就有71.2万安达鲁西亚人居住。在葡萄牙,大量居民离开了贫穷的阿连特如地区,前往里斯本。在意大利,从1955年到1971年,估计有900万人从本国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地区。1950年到1961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百万青年涌向西德,也许是为了寻求政治自由,但是前往西方也是为了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就此看来,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之间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和1945年后的10年里由中部和北部乡村迁往城市的25万名瑞典人也差别不大。这种迁移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收入,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为了逃离艰苦、孤独和无聊的乡村生活,摆脱农村传统旧习的束缚。这种迁移给那些留在当地的人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可耕的土地增多了,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

第二种移民方式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当然,欧洲人移民并不是件

〔8〕 第二年,即1956年3月,法国扩展到所有工人都享受这项权利。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们于1962年获得了第4周的带薪休假,但全国其他行业的工人却为之奋斗7年才争取到了同样的权利。

新鲜事。然而,从1870年到1926年,就有1500万意大利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and 阿根廷。同一时期,另有几百万名希腊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人也开始了移民,甚至还有上一代斯堪的那维亚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小批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矿工、农民不断拥入法国;而193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难民为了躲避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逃往西方。但欧洲内部的移民,尤其是为寻找工作而移民他国的,却一直是个例外。

334 到1950年代末,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跨越边界的劳工输出活动。根据1946年6月的一份合约,成千上万的意大利青年工人被集体护送到瓦洛尼亚的矿区工作,以报答比利时对意大利的供煤支持。然而,到了1950年代,欧洲西北部地区的经济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婴儿潮”一代还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已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当德国经济步入加速发展后,波恩政府被迫从国外市场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1956年,阿登纳总理来到了罗马,同意为愿意前往德国工作的意大利劳工免费提供交通费,并向意大利官方寻求合作,借道阿尔卑斯山向德国输送意大利南部的失业工人。接下来的10年里,波恩当局不仅和意大利,而且还和希腊、西班牙(1960)、土耳其(1961)、摩洛哥(1963)、葡萄牙(1964)、突尼斯(1964)、南斯拉夫(1968)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鼓励外国(“客籍”)工人在德国就业,双方都懂得,严格说来这只是暂时性的:他们最终将回到原籍。就像在瑞典工作的芬兰季节性工人和在英国就业的爱尔兰人一样,这些绝大多数年龄还不足25岁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或山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技术经验(虽然有些人为了找工作而经过“技术扫盲”)。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所得收入,对支持他们所离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离开甚至缓解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和住房压力。1973年,这些劳务输出者的汇款额占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在希腊、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出口收入中都占到了50%。

这些移动人口对于人口统计的影响也十分重大。虽然在官方看来这些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即使重回故里,他们也要等到许多年后退休才会回去。1945年到1970年,有700万意大利人离开了家乡。1950年到1970年间,约有1/4的希腊劳动力前往国外寻找工作;在移民潮达到最高峰的60年代中期,每年有11.7万希腊人背井离乡。〔9〕据估算,从1961年到1974年,有150万葡萄牙工人在国外就业,这是葡萄牙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大迁移,让葡萄牙本国只剩下了310万的劳动力。对

〔9〕 随着1960年代末旅游业在希腊的发展,希腊本国也出现了大量普通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一个总人口数在1950年只有833万的国家来说,这些数据太富有戏剧性了。那些想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谋得家政服务工作的年轻女性移民,则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尤其显著的影响,还好来自葡萄牙殖民地佛得角群岛及非洲的移民略微缓冲了这些乡村地区年轻劳力的不足。在葡萄牙北部乡村地区的大城市沙布加尔,移民使得当地人口从1950年的43 513人在30年后的1980年下降到了19 174人。

而那些“输入”人口的国家在经济上都受益匪浅。到1964年,外国工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占到了瑞士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该国的旅游业主要依赖廉价的季节性工人:雇佣起来方便又可以随时解雇。在西德,1973年高峰时期有280万外国务工者,主要从事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他们占到了全国劳动力的八分之一。在法国,当年登记在册的外国工人有230万,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11%。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女性,其中又以葡萄牙籍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她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充当厨师、清洁工、宾馆接待员和婴儿保姆。 335

这些男男女女中绝大部分人都未获得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也不能享受工会和雇主为当地雇工所签订的协议中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及退休金。因此,对雇用他们的雇主及接纳他们的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认可,也构不成长期的成本支出。直到1980年代,这些身在德国的“客籍工人们”依然处在入境时的地位和工资水平。他们尽力维持生计,而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乡:不管他们所挣得的马克或法郎是多么少,但比起他们在老家农村可能挣得的钱却要远远超出很多倍。他们的处境很像弗朗科·布鲁萨提在1973年的影片《面包和巧克力》中那位孤身一人在卢塞恩当餐馆侍者而且略显滑稽的意大利人。

到了1973年,仅西德就有将近500万名意大利人,53.5万名南斯拉夫人和60.5万名土耳其人。^[10]德国人和瑞士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外国人。大多数欧洲人都不习惯生活在这么多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当中。他们还算比较理智地容忍了这一切,只是偶尔会对这些外国劳工所在的社区抱有一定的偏见并偶有针对外国工人群体的暴力冲突发生,好在这些外来人口都住得离当地人比较远,往往居住在大城市周边环境恶劣的郊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他们并没有构成任何什么经济上的威胁;而且至少这些来自葡萄牙、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基督徒们在身体上和文化上都属于“可同化的”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们肤色不黑,也不是穆斯林;还有一点,那就是大家都清楚,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去。

[10] 仅仅15年前,即1958年,根据官方登记的数据,当时只有2.5万名意大利人,4 000名南斯拉夫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土耳其人。

然而,上述体谅之情并不适用于引进的第三种劳动力,即那些来自欧洲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地移民。起初这种类型的移民人数并不多。那些从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前帝国辖区内重回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许多人都是白人专业人士或退休了的农民。即使到1969年,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有60万人,少于居住在当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336 即使在英国,政府也曾在1950年代积极鼓励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入境,从事火车、公共汽车行业和市政服务,移民人数也并不惊人。根据1951年的人口调查,英国居民中只有1.5万人来自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是巴巴多斯人),其中4000人居住在伦敦。到了1959年,每年移居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大约在1.6万人左右。来自英联邦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更少,1959年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仅有3000人。在后来几年里,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极不情愿地接纳了受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驱逐出境的东非亚裔居民,但到1976年为止,英国人口中“非白人”人数也仅有185万,只占总人口的3%,而且其中40%的人都是在英国当地出生的。

当然,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这些人是棕色、黑色人种——并且作为英联邦公民,他们在帝国宗主国内享有假定的永久居住权,并最终享有公民权。早在1958年,伦敦西部爆发的种族动乱就提醒英国政府,它早期允许“过多”移民入境的做法给历来的白人社会埋下了危险。因此,虽然对那些身无一技的移民来说,经济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但就总体来说却无足轻重,因而英国政府首先对非欧洲移民采取了许多控制手段。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首次采用了“工作签证”法,并严格控制非白人移民入境英国。接下来1968年的法律更是对上述这些情况严加限制,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英国人者方可获得英国公民权;1971年的法律更是公开针对非白人移民,严格限制那些早已移民英国者的亲属入境。^[11]

出台这些法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争取在今后20年内结束非欧洲移民进入英国的历史。因此,在英国人口中非白人比例的上升只能主要来自英国国内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和南亚人口的高出生率。另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黑人和亚洲人移民英国,反而可以相应地为那些早已获得移民资格入境英国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废除了在公共场合的歧视令,引入对工作歧视方面的弥补方案,并开始处罚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11年后接着出台的法律终于彻底废除了所有种族歧视,并成立了一个“种

[11] 对殖民地移民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反映了两大主要政党的主流思想。其实,仅仅早在不到一代人之前,在情况完全不同的时期,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在1948年7月写道:“无论是英联邦自治领还是殖民地的居民(且不论种族和肤色),按传统来说,均可自由进入英国。在我看来,不可轻易废弃这种传统,尤其是当前我们正需要大批引进国外的劳力。”

族平等委员会”。在某些方面,那些非欧洲的英国新移民(以及后来法国的新移民),比起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找到工作的欧洲二等公民要来得更为幸运。英国女房东们再也无法贴出“严禁黑人、爱尔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了;但瑞士公园里却还留着一些“严禁狗和意大利人人内”的告示,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在欧洲北部,那些外来务工者及外国居民一直被故意维持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337 荷兰政府鼓励那些西班牙、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后来又包括土耳其、摩洛哥和苏里南)工人从事纺织业、采矿业和造船业的工作。而一旦这些旧企业关门倒闭的话,失去工作的正是这些工人,但却通常没有任何的保险或社会安全机制来保障他们及其家人不受失业影响。1965年西德颁布的《外国人法》中包含了1938年纳粹首次公布的“对外国人员禁令”。外国工人都被描述并被当作临时居住人员,是由于当局的怜悯才留下的。然而,到了1974年,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不再需要很多移民工人,他们就变成了永久性居民。就在那一年,西德出生的儿童中有17.3%来自这些“外国人”家庭。

这些移民造成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总的来说,这些迁居人口的总数高达4 000万人,他们或者在国内迁居,或者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海外来到欧洲。如果缺少了这种脆弱而又大多无组织发起的廉价却又大量的移民,欧洲的繁荣也许就不会出现。战后欧洲各国和私营企业老板们因往往无须支付全额的社会成本,而从这些顺从的廉价劳动力身上稳稳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经济繁荣开始消退,需要解雇多余劳动力的时刻来临之时,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移民和流动劳动力。

和其他人一样,这些新来的工人们不仅制造产品,他们还购买产品。这可是件新事物。根据史料记载,欧洲大部分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曾拥有四种东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们通过以物易物或交换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几乎总是从认可的制造者那里必须用现金购买来的少量物品。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城镇,但欧洲的许多乡村却还保留着传统的经济模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最大的开支预算往往是衣服和食物,这两样和住房一起占据了一个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大多数人都不会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购物或“消费”,他们维持着基本生活。直到20世纪中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可支配性收入”只是一种用词自相矛盾的说法。到1950年,西欧的普通家庭一半的现金支出都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用以购买食物、饮料和烟草。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这一支出比例明显更高。一旦把衣服和房租都算在内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非必需品了。

对下一代人来说,一切都变了。在1953年以后的20年里,西德和比利时、荷兰、卢森 338

堡的实质性工资收入增长了近3倍。意大利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更高。这些年里,英国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也将近翻了一番。1965年,在英国的居民消费中,衣物和食品仅占31%;到了1980年,北欧和西欧的全部衣食消费平均只占总消费的不到四分之一。

人们手上有了余钱而且也乐意消费。1950年,西德的零售业仅售出了90万双女用尼龙长丝袜(这在战后几年里曾被看作是“奢侈品”的象征)。4年后,即1953年,年销售量达到5800万双。对更传统些的商品而言,这场消费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产品的包装方式与销售规模。尤其是在1960年代,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急剧增强,开始出现了超级市场。荷兰在1961年曾以拥有7家超级市场而自豪,10年后却拥有了520家大型超市。同样的10年里,邻国比利时的超级市场数从19家上升到456家,法国从49家上升到1833家。〔12〕

大型超市得以存在的理由是,购物者(大多数为家庭主妇)可以更便利地在一次购物时,在同一个地方购买到想买的、或者说是被诱惑而忍不住想买的所有商品,他们会消费得更多。但同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们回家后,得有东西来装置她们的食物,于是冰箱就应运而生,而且需求量不断上升。1957年,大多数西欧家庭还没有冰箱(各国家庭拥有的比例不同,西德是12%,意大利只有2%)。这倒并不是因为技术上还未跟上,而是供电问题(到1950年代中期,除挪威的部分乡村及意大利南部及高地外,西欧已经全部实现了供电服务):家庭主妇们外出一次就足够有钱购买那些易坏的食品,并且可以把它们带回家,但却还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冰箱这样的大额开销。〔13〕

因此,到了1974年,比起其他相关变化而言,在许多地方拥有冰箱反倒成了件不值得谈论的事情:在比利时和英国,82%的家庭拥有冰箱;法国是88%;荷兰和西德是93%。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94%的家庭都拥有冰箱,占有率排名欧洲第一。事实上,意大利成了欧洲最大的冰箱及其他“白色家电”生产商。1951年,意大利的工厂仅生产了1.85万台冰箱;20年后,它的产量一年内就达到了524.7万台,几乎和美国一样多,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

和家用冰箱一样,洗衣机在这些年里也开始面世。洗衣机的发明也是为了减轻那些新近变得富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并刺激她们扩大购物范围。然而,比起冰箱而言,洗衣机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才赢得了青睐:部分原因在于195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意大利、

〔12〕 意大利是个例外,1971年,该国538家超市的销售量在居民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还不足5%,几乎所有人都还偏好在当地的专卖店购物。20年后情况也没有发生改变。1991年,西德的食品外卖店已经减少到了3.7万家,法国只有2.15万家,而意大利却有182432家。按人均拥有量算,只有波兰最多。

〔13〕 而且“文化”层面上也有反对意见。1952年,法国共产党作家罗杰·范兰德断言:“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一年中除了有两个月比较热以外,而且也不是年年如此,全年的天气都那么冷,只要把食品盒放在窗台上就可以使烤过的食物保鲜一周。再说了,冰箱是一种‘象征’,一种(美国式的)‘神话’。”

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家庭还没有普及自来水供应;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用电管制,使得同一家庭无法同时满足两大件电器的用电需求。〔14〕甚至到了1972年,当时大多数西欧家庭都装备了室内马桶,安装了全部的管道设施,但却只有2/3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其每十年的拥有量在稳步上升但却很缓慢。对那些真正最需要它的穷困大家庭来说,许多年来,他们还是买不起洗衣机。部分地出于这样的原因,洗衣机就像1970年代中期出现的洗碗机一样,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向往装备的商品。

洗衣机和冰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就像玩具、衣服一样,它们都是比以往更大规模地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投资上升和持续高涨的需求,产品价格逐步下降: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往往有些落后的国家,在1948—1955年婴儿潮年代的初期,玩具的产量也增长了3.5倍。但这种新近就业的几百万人的消费者圈子,其最重要性的影响不在于家庭内部,而是在于外部世界。使欧洲繁荣的最大举措就是家庭用车带来的革命。

直到1950年代,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汽车还是件奢侈品,在许多地方很少见到。即使大城市,它也是近来才出现的新东西。许多人都不会为了游玩而长途跋涉,他们一般都乘坐火车、电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去上班或上学。1950年代初,西班牙(除出租车外)只有8.9万辆私车,每31.4万人才拥有一辆私车。1951年,法国平均12个家庭拥有一辆私车。只有在英国,拥有私家车才是大规模现象:1950年共有225.8万辆私车。但在地理分布上却极为不均:伦敦登记有四分之一的私车总量,而英国许多乡村地区和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并没有汽车。即便如此,许多伦敦市民也没有汽车,成千上万的市场商贩、街头小贩和其他人还得依靠马车来工作。

接下来的20年里,汽车拥有量开始剧增。英国在1930年代开始起步的汽车增长,因战争和战后的短缺而中止了,但从1950年到1980年,它的汽车拥有量却每隔十年增长一倍。英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1950年的225万辆上升到1964年的800万辆,到60年代末更是上升到了1150万辆。在战争爆发初期,意大利私人拥有的汽车量是27万辆,到1950年达到了34.2万辆(比大伦敦区一个地方所拥有的量还少),1960年上升到了200万辆,1965年是550万辆,1970年超过了1000万辆,1975年约有1500万辆,平均每7个居民就拥有2辆车。〔15〕在法国,1950年代,汽车拥有量从不足200万辆上升到了近600万辆,

〔14〕直到1963年,法国电力局才开始升级城市电力网,以容许使用多件电器,而乡村电力网的升级却要等到多年之后。

〔15〕费利尼导演的影片《8 1/2》(1963)的一开头场景里就出色地捕捉到了这种汽车快速增多的现象。即使按照费利尼自己的标准,几年前还不可能在城市里出现这么糟糕的交通堵塞现象。

到1960年代,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1950年代末,出现了停车计时收费器,最早是在英国,后来在60年代传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16〕

欧洲人之所以购买私家车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倒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更多的余钱,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之后,那种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恰逢有那么多的汽车可供购买。早在1939年前,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德国的波尔舍、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英国的莫里斯)就预见到经济大萧条后会出现私人汽车购买力上升的现象,开始考虑设计一种新型的家用车,该车在功能上和20年前亨利·福特的T型轿车相似:性能可靠,大批生产,价格适宜。战争的爆发推延了这些新款车型的上市,但到了1950年代初,他们开始用前所未有的数量大批安装新型生产线。

西欧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种当地产的占主导地位的车型,但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惊人地相似。大众甲壳虫、雷诺4CV型,菲亚特500和600型,奥斯汀A30型、迷你莫里斯都属于小型、双门型家庭用车:价廉、省油且维修简便。它们的外部框架轻薄质差;引擎小而动力不足(设计上以尽量少耗油为主);配置上又把附件装置等降到了最低限度。大众、雷诺和菲亚特都是后置引擎、后置发动型汽车,这样可以使驾驶座前面的空间用来放置少量行李和电池、备用轮胎、曲柄把手以及工具等物品。

引擎前置的莫里斯,和它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福特大众型车一样(该车产权归美国拥有,但却是由英国伦敦附近的达根翰地区的福特工厂生产制造,在英国国内市场销售),在设计上要显得档次略高一些,而且后来又衍生出了四门式车型,在款式上更加符合这些年来英国愈发繁荣的时代。法国的雪铁龙尤以其2CV型汽车最为显眼(最初市场定位在那些想用来取代牛车的农民身上),它有4扇门,车顶和座位都可以移动,引擎动力相当于一辆中型摩托车。除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外,1950年代的小型汽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尽量使西欧每个家庭都能够买得起、买得到汽车。

随着战后欧洲交通运输革命的发展,几年以后,汽车的市场供应再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这一情况在东欧一直延续到1989年)。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自行车、摩托车、翻斗摩托车充斥市场的现象。翻斗摩托车其实是那些买不起汽车、或暂时无法买到汽车的家庭用来替代汽车的代用品。小型摩托车也开始出场了。在法国,特别是在意大利,1949年11月13日在罗马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小型摩托车拉力赛,引起了后来销售市场的火爆,因为这种车既便捷又价格公道,象征着城里人的自由与活力,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几乎出现在了当时每一部意大利拍摄的或有关意大利场

〔16〕 当地群众对此项新创新反应有先例可循:英国的机动车驾驶者认为按时收费是一种未经政府许可的变相税收,因而拒不交费。法国人则通过摘掉巴黎的停车计时器的顶盖以示反对。

景的影片中。

60年代初期,汽车在西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从铁路到公路、从公共到私人的交通运行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铁路网曾在长度和使用量上达到高峰期,而现在却因亏损而缩减了运营,拆除了长达几千英里的铁轨。英国铁路1946年的营运量是9.1亿人次,接近历史最高点,但之后却开始逐年滑坡。在西欧其他国家,铁路运输状况要好很多,在那些铁路网络密集、人口众多而面积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铁路运营量还确实在增长,但增速却远远落后于公路运营量。

有史以来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的人数也开始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开车去上班。1948年到1962年间,在英国人口拥挤的首都,由于通勤者改开汽车而使得乘坐伦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以及地铁的总人数从每年39.55亿下降到了24.85亿。人们不顾欧洲的道路设施有多么明显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除德国以外,自从1920年代末以后,各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改造升级国家公路网的重要举措——许多个人,尤其是家庭,都在越来越多地开车自由出行,去那些新建的位于城市边缘的超级大型市场购物,尤其是去周末短途游,或在一年一度的节假日里外出游玩。*

外出游玩对欧洲人来说并不新鲜,显然至今为止,这种娱乐方式最早仅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又只限于那些家境较好的、在文化层面上更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享有。但是,和其他经济产业一样,“旅游业”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大萧条时期也遭受了挫折。1913年瑞士旅游业发达时期曾提供过2190万人次的食宿服务,但直到1950年代中期,它才又恢复到了这样的业绩。然而,当这一切到来之时,1950年代的旅游业的兴旺又有所不同了。342 它提供并鼓励私人驾车出游,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带薪休假:到1960年,大部分欧洲大陆的雇员都可以依法享有两周的带薪休假(挪威、瑞典、丹麦、法国为2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度假。

休闲旅行正在变成大众旅游。长途客运公司开始繁荣了起来,它们把工人、农民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海边度假扩展到了国内游、国际游这一商业服务范围。一些新兴的航空业企业家,如英国的弗雷迪·雷克就购买了一批战争剩余的达科他涡轮螺旋桨式飞机,为那些新开辟的暑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胜地旅游提供包机服务。战前就深受那些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的度假者和户外活动爱好者喜爱的野营,在50年代末也变成了一项主要的旅游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海滨、田园宿营地,兴起了大量出售野营装备的商场,大量的导

* 最初的欧洲超级大型市场的定义是:每一层楼面不少于2.5万平方英尺面积,位置至少离城镇中心2英里,它们最早出现于60年代末。到1973年,西欧有此类巨型超市750家左右,仅法国和德国就有620家。同年在意大利只有3家。20年后,法国有8000家超级大型市场,但在意大利仍然只有118家。

游指南手册和服装专卖店。原来那些位于欧洲北部和西部海滨、乡村的古老的度假胜地，现在又开始兴旺起来了。一些新发现（或重新被发现）的景点，通过那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和广泛流传的神秘描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过去只是那些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贵族绅士们冬天用来隐居的静谧的法国里利维拉地区，在一部新生代的影片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诱人形象，在阳光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乐趣：1956年，在罗杰·瓦蒂姆导演的影片《于是上帝又造了女人》中，他为新星碧姬·芭铎“创造”了一座新的场景：圣·特洛佩。

虽然对来自英国或德国的旅游者来说，按当时的汇率把英镑或德国马克兑换成低价的法郎或里拉的话，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的海滨、山区费用并不昂贵，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前往圣·特洛佩或瑞士度假。相比而言，在自己本国内的海滨度假，费用要便宜得多了，因而特别受到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的追捧。曾在1936年于斯凯涅斯创建了自己的首家游乐场的加拿大人比利·布特林，到了1950年代继续在工业发达的英格兰海边很策略地建立了许多可以容纳一大家子人共同度假的假日营地，打出了“既便宜又开心”的招牌，挣得了一大笔财富，被一位批评家在回忆中嘲笑地贬为“一夜食宿型的沃尔玛”。但布特林的度假营在当时却深受大众欢迎，成了后来法国梅德俱乐部的鼻祖，这种集体娱乐的方式深受后来更具大都市特色的一代人的青睐，甚至还吸引了一批“上流人士”（或按布特林的叫法是“有身份者”）。

在西班牙的中海沿岸新开了一些更具探险性的度假地，游客可以根据新兴的全包式的旅游公司团体预订，选择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供应膳宿的或条件适中的海边宾馆。这些地方都是驱车可以到达的。几百万家庭，人人身着夏日休闲装（这种衣服本身也是一种新产品，是一种炫耀财富的新象征），挤进他们的菲亚特、雷诺、大众和莫里斯车中，沿着早期为旅游设计的、明显运输能力不足的狭窄道路，前往遥远的海边。他们往往挤在同一天上路，因为官方规定的假期大都集中在8月份的几周之内。

结果就无法预料地造成了1950年代末期可怕的交通堵塞，而且一年比一年拥挤的状况愈演愈烈。他们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沿主干道而行：西南向的A303公路从伦敦通向康沃尔郡；6号、7号国道从巴黎通往地中海海滨；9号国道从巴黎通向西班牙边境（法国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1955年的几千人上升到了1962年的300万，两年后又增加到了700万人——法国法郎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一直流通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戴高乐重新估定法郎价值之后）〔17〕。德国游客沿着中世纪商路往南，拥向奥地利的提洛尔，然后再

〔17〕 从1959年到1973年，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300万人上升到了3400万。早在1966年，当年前往西班牙的观光者就达到了1730万，远远超过了前往法国或意大利游客的总数。在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有些地方的经济只花了半代人的时间就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进入了信用卡时代。但从美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它所产生的影响倒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的。

穿越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会继续向前,进入南斯拉夫这个和西班牙一样在这些年里才对外开放旅游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外国游客到1973年就达到了170万。10年后,这个欧洲唯一一个对外旅游开放的共产党国家一年的外来游客量接近了630万人(这得归功于亚得里亚湾长长的海岸线价廉景美)。

其实人们早就明白,大规模的旅游业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却明显可以帮助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因为大批富裕的北方游客拥入迄今还处在贫困之中的地中海地区后,就为当地的建筑工人、厨师、侍者、旅馆打扫房间的女工、出租车司机、妓女、门童、机场地勤等等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第一次得以在本国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季节性工作,不用再为此而漂泊异国。他们再也不用移居到经济发达的北部国家,就可以在自己国内从事这样的经济服务了。

国外游也许并不能开阔眼界:某个外国景点越是受大众欢迎,其引人之处就越快地受他人仿效——除了气候之外,其他各种实质性的东西都可以仿效一致。实际上,1960年代开始的旅游业的大规模发展,依靠的是使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游客们尽可能地感受到舒适,在一大群乡村人的包围下,他们觉得新奇、陌生而又意想不到。但是,这种一年一度仅为出门远行,并借助新型交通工具如私家车和班机的旅游,为那些至今仍处在闭塞环境中的几百万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

直到1960年代,对绝大部分欧洲人来说,他们获得信息、观点和娱乐的主要来源还是无线电广播。人们从广播中收听新闻,要是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话,那也多是基于人们的听闻而不是通过亲眼目睹或阅读所得。在这一时期,欧洲每个国家的广播电台都由政府管制(在法国,国家广播网在半夜就会结束广播)。广播电台、中转台和波段都需要许可证才能经营,并且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而为数少量的、通常安装在船上或岛上转播国外广播的电台,往往被俗称为“海盗”广播。 344

战前就广泛拥有的收音机到了1960年更是普及:1960年苏联每5人就拥有一台收音机,法国、奥地利和瑞士是每4人一台,斯堪的那维亚和东德是每3人一台。事实上,几乎家家都有收音机。^[18]大多数家用收音机还是那种体积庞大、笨拙难看的无线电设备,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式样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改进。通常是一家一台,安装在起居室或厨房间的显要位置,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必听无疑。甚至连汽车收音机在这方面也变化不大:一家人在一起旅行,一起听收音机,往往由父母来决定收听什么样的电台节目。那时候的无线电广播是一种很自然地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媒体,在内容和社会形式上都鼓励

[18] 只有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属于例外,1960年,那里的收音机拥有量同西欧35年前的情况大致一样,人们还是挤在咖啡馆里收听新闻和音乐。

并维持着传统标准。

晶体管改变了这一切。1958年,晶体管收音机还很少见,比如,在整个法国也只有26万台。但3年后,即1961年,法国人拥有了225万台晶体管收音机。到了1968年,法国十分之九的人都拥有了收音机,其中三分之二是便携式收音机。十几岁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和父母们坐在一起收听那些按成人口味播放的新闻或戏剧了,这些节目往往都是在晚餐后“家庭节目时间”播出。他们现在可以收听自己的节目,例如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向伙伴致敬”、英国BBC的“流行采编”等节目。收音机的个人化促生了特定目标的节目制作;当国家广播系统落后于这一改编的步伐时,那些“外围的”电台一下子抓住了这一机遇,例如卢森堡广播电台、蒙特卡罗广播电台、安道尔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国界并在商业广告的经济支持下,开始合法广播节目。

靠干电池供电的晶体管收音机既轻巧又便于携带,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正在变得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因而经常出现在旅游者光顾的沙滩或公园里。但收音机还只是一种听觉媒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视觉需求。对年长些的人来说,收音机还是一种提供信息、启智和娱乐的首要渠道。在共产党国家里,无论收音机数量多么不足,但它同样是接触“自由欧洲之声”、“美国之音”,尤其是“BBC全球广播”播出的未经审查的新闻和观点的唯一途径。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主要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而其余一切节目他们都从电视中来收看。

345 在欧洲,电视服务出现得比较缓慢,有些地方甚至非常晚。英国最早在1940年代开始了定期播放电视,许多人都收看到了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电视现场直播。到1958年,经授权许可的电视台比广播台还多;早在1960年以前,全国的家用电视机达到了1000万台。相比之下,法国在1953年6月还曾以拥有6万台电视机而沾沾自喜(当时西德已拥有20万台,而美国则有1500万台);甚至到了1960年,法国也只有1/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英国按同等人口比例是五分之一。在意大利,这一数字还要小一些。

但是在60年代里,几乎到处都是电视机: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适中,即使是最普通家庭也日渐将它当作一种必备的家庭用具。到了1970年,西欧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电视机,英国的拥有量更高,而爱尔兰则较少。这段时期,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欧洲最大的电视机、冰箱生产国),一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比拥有一部电话机还普遍,但根据后来的标准来看的话,当时他们的使用率并不高:意大利75%的成年人每周收看电视的时间不足13小时。东德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电冰箱);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该国人民早在1954年就可以收看到芬兰的电视了)的家庭拥有率略低于东德。

电视的影响作用比较复杂。它起初的一些节目题材并不是为了创新：国有化的电视频道要求所播节目的内容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应当同时适合成年人和儿童，从而对节目内容有严格的规定。1955年，英国最早出现商业电视，但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直到1970年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才允许开播私营电视频道。早期几十年的电视节目大都传统而无新意、沉闷乏味，充满监护的意味：它被用来肯定而不是去破坏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在意大利，1954—1956年担任“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总裁的费利伯托·加拉教导员工说，他们的节目“不应当破坏家庭制度”，不应当“在观念、姿态或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上可能诱发人们的基本本能。”〔19〕

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可选性，大多数地方只有1个或至多2个频道，而且播出时间仅限于下午和晚上那几个小时。然而，电视还是对社会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边远社群的孤立和闭塞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同样的经验和共同的视觉文化。人们不再通过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众庆典来区分何为“法国式的”，何为“德国式的”或“荷兰式的”，而是通过电视所投射到每个家庭时，人们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对国家形象作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意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为共同热爱观看“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播出的体育运动和各种“秀”节目的一群，而不是一个已有长达百年之久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346

最重要的是，电视把国家政治直接摆到了家庭层面。在电视出现以前，在巴黎、波恩、罗马或伦敦，政治是精英人士的事情，是由那些在电台广播中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在报纸上毫无生气的照片、在短暂而又公式化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中一闪而过的、相距遥远的领导人所从事的行业。而现在，时间跨度还不到20年，那些政治领导人就不得不在电视上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出现：要能够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权威而自信、高雅而自如、还要热情而有亲和力——这种表演功夫对许多欧洲政治家来说都还未准备好，表现得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美国同行们。许多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些年轻又善于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家们却尝到了甜头，得益巨大。正如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爱德华·希思在回忆录中对其对手、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利用媒体获胜后所作的恰如其分的评论：电视“可以被那些善于合理操纵它的骗子公开滥用。今后10年将会证实这一点。”

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电视对电影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不仅提供可供选择的娱乐节目，而且可以供人们在家里直接收看除新片以外的各种故事影片，免除了人们必须外出之烦。从1946年到1958年，英国电影院损失了56%的观众。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数字减少得

〔19〕 鲍尔·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1943—1988年的社会与政治》（1990），第240页。

比较缓慢,但迟早会到处下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还是经常光顾电影院,尤其是在意大利,那里的观众人数一直维持着相当的数量,直到1970年代中期。但即使到那时候,意大利人仍然不仅定期(通常每周)光顾电影院,而且还拍摄影片:1950年代中期,罗马的电影业雇用的人数在所有的行业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建筑业,不仅制作了由许多明星拍摄的经典影片,还出产了(赢利更多的)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的电影,由那些美女皇后们和昙花一现的童星扮演,走的是“肉体优势”路线。

最终,意大利制片业和电影观众一起衰退了。欧洲的制片人因缺乏好莱坞那样的资源而毫无希望同美国影片在规模及“产品价值”上竞争,只得局限于不断拍摄一些有关“普通生活”的片子,无论是“新浪潮”影片还是厨房水槽片和家庭喜剧片,都是如此。欧洲电影业从社会活动降格到了一种艺术形式。与1940年代和1950年代相比,当时的人们自动地拥向当地电影院,饥不择片,而他们现在只去观看某部令他们感兴趣的影片。如果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管“放”什么片子,那他们就会转而从电视里面去看。

电视虽然是一种“年轻的”媒体,却对老年观众有特别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它最初由政府控制、在文化上显得特别谨慎的那些年里。以前收听广播或外出上电影院的成年男女转而呆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那些商业性体育比赛,尤其是传统观赏型运动如足球和赛狗等,受到了很大影响:一来是因为它们的观众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娱乐选择,更加方便而且又更加舒服;二来是因为不久电视也开始播放体育比赛了,通常时间往往选在周末。只有年轻人才会大批外出,但他们的娱乐兴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到了1950年代末,欧洲经济开始感受到了婴儿潮带来的全面的商业影响力。首先涌现出了大量为初生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和儿童设计的产品:婴儿车、婴儿床、纸尿裤、婴儿食品、童装、体育用品、书籍、游戏机和玩具。然后又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校服、课桌、教材、教学设备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种教育产品。但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却是成人:父母、亲戚、学校管理者和中央政府。在1957年前后,欧洲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年轻人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的现象。

在此之前,年轻人还并不是一组明显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年轻人”。在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除非他们离开学校并工作了,才能算是年轻的成人。处于两者中间的“十几岁的人”新群体是根据年龄而非社会地位来归类的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十几岁的人有可能会代表一个明显的消费群体,这种想法在几年前还匪夷所思。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永远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任何一个年轻人独立挣得的钱都应当属于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应当被用来支付家庭集体的开销。

但随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大多数家庭都能够仅靠主要收入者的工资就能维持生计并过得更好了,要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话,那生活就更加富足了。如果子女14岁离开学校(这是近些年来西欧年轻人离校的普遍年龄),但还住在家里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仅仅是打半工的话,父母也不会再指望他们每到星期五就自动上交薪水。到了1965年,在法国,62%的16—24岁的年轻人都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却自己保管自己的收入,自己随心所欲地花销。

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费能力最明显、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业上。早在婴儿潮这代人自己发现迷你裙和长头发之前,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在战争年代而非战后出生的人——就在50年代末出现的街头团伙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他们身着皮革或仿麂皮的黑色紧身衣,裁剪得线条分明又隐隐带着挑衅意味,例如黑夹克(法国)、阿飞装(德国、奥地利)或怪样皮衣(瑞典),就像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那帮穿着花哨、热衷于摇滚乐的男阿飞一样,装出一幅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像马龙·白兰度(《野性骑手》),也有点像詹姆斯·迪恩(《无因的反抗》)。然而,这些人除了偶尔会挑起暴力争端外——最严重的是在英国,那帮身着皮夹克的街头小混混会攻击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主要的威胁是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服装挑战了上一代人的“得体”意识。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 348

身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表示独立甚至反抗的方式。而且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变化,以前的那些年轻人根本就别无选择,只好穿和父母辈一样的衣服。然而,从经济角度而言,这还不是构成十几岁青少年消费习惯最重要的变化所在:年轻人确实在衣服上花销巨大,然而,他们更大的花销是在音乐上,远远超过了服装花费。1960年代早期,在一定的商业和文化基础上,“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流行音乐”自动地互相交融。和美洲一样,现在欧洲人的家庭预算中已经可以把青少年的开销也包括在内了,这些获得自由权的少年们有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一张唱片。

1948年发明了密纹唱片。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向市场上推出了每分钟45转的“单张”唱片,每面刻一首歌。在美国,唱片销量从1955年的2.77亿美元上升到了1959年的6亿美元,一开始,欧洲大陆的销售量比美国差远了,但也还是在上升。英国年轻人最初都迷上了美国流行音乐,而对欧洲大陆同时代的音乐并不感兴趣。1956年的影片《昼夜摇滚》,掀起了一场流行音乐的盛行之风,涌现出了比尔·哈利、彗星组合和浅碟合唱团这样的摇滚明星。即使借用了摇滚乐这样的载体,这部电影本身其实还是乏善可陈,倒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哈利主唱)震撼了英国的青少年一代。

那些原本对爵士乐毫无兴趣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们,一下子迷上了具有革命性的美国(接下来是英国)流行音乐:激情洋溢、曲调优美、平易近人、性感迷人,而且

最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20〕这些音乐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愤怒之情,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即使是有些性感之音,也都被唱片制造商、销售经理和广播电台的执行总监们捂得严严实实,藏而不露。这是因为最初的流行音乐革命只是 50 年代的一种现象:它虽然没有伴随着 60 年代的文化转型,但却是它的先驱。结果,这往往成了官方评论家的批评对象。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当地监察委员会禁映《昼夜摇滚》,一如他们早期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主演的更优秀的摇滚乐作品《狱中猫王》的态度。

349 威尔士天鹅海市的市政厅父老们认为英国的噪音爵士乐演奏者罗尼·东尼根很“不合时宜”。50 年代末英国摇滚歌手、温和又充满活力的汤米·斯梯尔,在普次茅斯就被勒令禁止在安息日演唱。一心模仿美国摇滚歌星吉恩·文森特或埃迪·科奇兰,并获得一定成功的法国摇滚歌星约翰尼·哈雷蒂在 1960 年发行的首张唱片,激怒了法国知识界的一代保守主义分子。回想起来,当时西欧那些家长、教师、牧师、专家、政客等人对摇滚乐的过激反应,显得多么奇特而又不合理。因为在不到 10 年时间里,哈利、东尼根、斯梯尔和哈雷蒂等人就会无可救药地过时,并沦为无辜的历史遗迹。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欧洲青少年并不想改变世界。他们成长在一个安定而又适度富裕的环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显得与众不同而已,他们不断旅行,玩流行乐,购买各式用品,完全反映出他们喜爱的歌手和他们收听的节目里流行音乐唱片节目播音员的举止和趣味。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离革命还差得远呢,只是处于边缘状态而已。比起他们的父母辈,他们这代人更是广告业的目标人群,他们追求着、伴随着、刺激了商业消费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出来,品种繁多,前所未有。市场上充斥着形形色色、不同尺寸、不同色彩的汽车、衣服、童车、包装食品和洗衣粉。

广告业在欧洲由来已久。报纸(尤其是 1890 年以后畅销的报纸)通常都刊登广告。早在 1950 年代以前,意大利人就对路边的广告牌和灯箱广告并不陌生;20 世纪中期去法国的旅行者也早就熟谙那些乡村农舍旁和城区里高高竖起的广告牌,邀人品饮圣拉斐尔和杜博尼酒。在整个欧洲的电影院里,商业广告的短歌和照片一直就伴随着新闻短片的播放,成了影院的第二大特征。然而,这种传统的商业广告并没有对产品市场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划分,在年龄层次和品位特色上也没有做出市场细分。相比之下,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消费者的偏好成了市场调研的重要内容;广告在战前的欧洲相对来说商机很少,如今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20〕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爵士乐的边缘化。它就像美国 1960 年代民间音乐一样,在西欧,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或波希米亚派人,他们从不欣赏和购买爵士乐,他们也不像一般摇滚乐爱好者。而东欧的情况则略有不同。他们把爵士乐看作是来自美国(黑人)的一种音乐,既有异国情调,又具颠覆性,是一种西欧的激进的东西,但又并不是完全西方化的。

此外,早期英国商业电视台的广告如清洁产品和早餐麦片等,针对的都是家庭主妇和儿童,而蒙特卡罗等地方的电台插播广告则瞄准了“青年一代”的市场。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构成了一块巨大的、回报丰厚的、尚未触及的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广告商蜂拥而至,抢占先机,例如烟草、烈酒、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价格适中的时装、鞋子、化妆品、护发品、珠宝、杂志、唱片、录放机、收音机,等等。英国的商业零售广告开支从1951年度的1.02亿英镑上升到了1978年的25亿英镑。

在法国,在关键的1959年到1962年,杂志上刊登的针对青少年的广告上升了4倍。对许多人来说,广告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还是离他们很遥远:1957年法国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青少年都抱怨无法按自己的需求得到向往的娱乐消费、梦想中的假期和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但这项民意调查却也显示出,这些年轻人都早已认为他们有权享有这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把这些东西仅仅当作遥不可及的幻想。同年,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一群中产阶级活动家,因受困于自发商业广告和众多商业产品销售的烦扰,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消费者购物指南。有意义的是,他们为其取名为《哪一样?》而非《什么》。 350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就像英国小说家J. B. 普里斯特莱1955年所描述的,是“易受广告影响的社会大众”。而对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观察家而言,非常简单,这就是“美国化”:全欧洲都全盘接受现代美国的实践和抱负。虽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彻底同过去脱离了,但事实上却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欧洲一直在经历着“美国化”——而他们在思想上却很担忧。^[21]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式的生产线、“泰勒式的”工作效率和精彩的美国电影、美国时尚就开始流行一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知识界早就哀叹,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美国现代化世界是“灵魂空洞”的;在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到处泛滥的、以毫无根基的纽约大都市为代表的“大杂烩”面前,纳粹和共产党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并保护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

然而,欧洲人的想象基础还只是遍布西欧各处的美国大兵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美国人讲的是英语,在那些年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都都不熟悉这种语言。欧洲的学校并不教授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也不熟悉美国的作家;除了少数特权人物外,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大众来说更是一个谜。几乎没有人会耗费巨资、长途跋涉前往美国旅行。去过美国的只有那些(为数并不多的)有钱人、那些由马歇尔计划资金援助的、精心挑选出来

^[21] 1902年,美国作家威廉·斯泰德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一书,预见到了这一现象,但也许并不全面。

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员、几千名交流学生——其中有些 1900 年后移居美国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晚年又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岛和希腊群岛。由于许多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会有一些朋友或亲戚已经去了美国,所以有可能的话,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愿意前往那里,因此东欧人比起西欧人来,同美国的关系要相对地更密切一些。

当然,美国政府和各式私人机构——例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向来在努力缩小美国 351 和欧洲之间的差距: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是美国议会和富布赖特基金会学者向海外文化投资的伟大时代。这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 1948 年到 1955 年,共有 12 000 名德国人被送往美国进行为期超过 1 个月的访问交流。整整一代西德人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路德维格·艾哈德就曾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制造品”。

然而,重要的是指出,这种受美国影响并仿效美国的做法并没有直接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干预。1950 年,美国占有西方资本总市场五分之三的总量和产量,却几乎没有越过大西洋直接流入欧洲。1945 年后的投资首先来自美国政府。1956 年,美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资额只有 41.5 亿美元左右。后来,从 1960 年开始(尤其是在英国),这一数字开始大幅度上升,到 1970 年达到了 245.2 亿美元。到了这一时期,许多有忧患意识的出版物开始引起轰动,提醒大家注意美国经济权力的上升,最著名的是 1967 年 J-J. 塞尔文·施瑞伯的文章《美国的挑战》。

在欧洲,人们感受更深的并不是美国经济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和杠杆作用,而是它对美国和欧洲同样产生的消费革命的影响。欧洲人现在也开始能够得到那些早已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各式新奇商品:电话机、大型家用电器、电视机、照相机、清洁用品、包装食品、廉价的花哨衣服、汽车及其配件,等等。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象征着富裕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美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积极进取。它虽然抽象,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代表:它巨大而开放,繁荣又充满着青春活力。

前文早已提到过,“美国化”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流行音乐上,虽然这本身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 1903 年,维也纳就上演过“散拍乐”(ragtime,一种早期爵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舞蹈乐队、爵士乐团就一直在到处巡回演出。而且它也不只是一种单方面的音乐输出:大多数现代流行音乐都吸收了海外音乐和当地音乐的一些类型,是一种混合型音乐。在英国上演的“美国”音乐就和在法国、德国的“美国”音乐有着细微的差别。尤其是法国人的鉴赏趣味受到了那些为躲避国内歧视而前往巴黎的黑人表演艺术家的影响,这也造成了法国文化观念中认为“美国”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形象的理由。

到1950年代,通过电影这一媒体,美国的榜样对欧洲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观众可以几乎毫无限制地看到所有好莱坞输出的片子,到了1950年代下半期,美国每年向市场投入大约500部影片,其中投向欧洲市场的总计约有450部影片。当然,美国影片也受到了语言不通的影响(虽然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意大利,当地人也会为这些影片重新配音)。部分地出于上述原因,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宁愿选择观看国产片。但他们的子女的想法却不一样。年轻观众越来越喜欢美国故事片,这些影片通常都由那些逃离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欧洲导演所执导。 352

当代批评家们担心美国流行文化中那种墨守成规的自鸣得意和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播的那种或明或暗的政治信息,会对欧洲青年一代的意识产生腐蚀或潜移默化。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欧洲青年过滤掉了美国主流电影所宣传的内容,并没有像20年前他们父辈所做的那样妒忌荧屏上所描述的“美好生活”,而是对美国式浪漫故事与日常生活的矫揉造作与天真烂漫发出大笑。然而,他们却极度关注演员们往往是颠覆性的表演风格。

收音机、咖啡馆、酒吧和舞厅里经常播放美国影片中的音乐。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美国叛逆青年的肢体语言,成了欧洲同龄人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欧洲的年轻人开始在穿着打扮上也趋于“美国化”,1963年5月,“正宗莱维牌”牛仔裤首次在巴黎跳蚤市场出售时,一下子就脱销了。美国青年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没有阶级标志(至少在得到高端服装设计师们青睐之前一直如此,而且即使到了这一步,当时的差别也只体现在面料上,而并不代表社会等级)。实际上,这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喜爱的牛仔裤,属于传统服装风格的“降级”发展,却完全是真正的工作服在服装领域“升级”的结果。而且,它们显得如此青春洋溢,和那些从1950年代末的影片中仿制而来的服装样式一样,年长的人们是不会喜欢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牛仔裤和摩托车、可口可乐、大波浪发型(男女都一样)及流行明星们一起,风靡了整个西欧地区(但他们所炫耀的影片和各种产品却一直无法向东蔓延)这也是整个美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美国电影的固定主题——科幻故事片、侦探片和西部片——和风格都被欧洲人吸收了。千百万西德人从当地那些并未去过美国的作家所写的平装本小说中了解到了牛仔的生活;仅在西德,1960年德语版的“西部”小说一年就能卖出9100万册。在欧洲,继比利时儿童侦探“丁丁”之后,最受欢迎的又一卡通人物“幸运儿路克”也同样来自比利时,这位运气不好却有魅力的牛仔每周都会出现在法语和荷兰语喜剧片中。真也罢,假也罢,美国正在成为各类轻松娱乐节目的自然背景。

美国对欧洲青年产生的影响更直接地加深了人们早已哀叹的“代沟”。长辈们一边看着,一边却在遗憾:欧洲各地的年轻人都乐于在谈话中渲染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美国色

彩。有一项研究估计说,在 60 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报纸上,这种“崇美主义”出现的次数增加了 14 倍。1964 年,法国批评家雷内·埃蒂昂布勒在他出版的《你会讲法式英语吗?》(Parlez-vous Franglais?)一书中调侃地(现在看来是预言性地)指出了讲英语对法语所造成的污染性破坏。

反对崇美主义——即对“美国文明及其所有现象”表现出原则性的怀疑与厌恶——在文化精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影响使这种反对崇美主义的思想传播得更为广泛。文化保守主义者、法国作家安德烈·齐格飞 1954 年的作品《美国场景》重新引发了所有人的怨恨和一些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辩论。他同意文化激进分子让-保尔·萨特(或几十年后英国的哈罗德·品特)的观点:美国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偏执于科技和标准化,墨守成规,富于创造性思维。其实,引起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身的变化太快,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欧洲青少年将他们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看作自己的未来,而他们的父辈却在责怪美国给欧洲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曾经认为欧洲这块大陆拥有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权威、自己价值观,不受现代性与大众社会诱惑的影响,但这一切其实原本就不存在。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 1964 年 3 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 13 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舒适和安逸。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某集体农庄。“赫先生”自诩为农业专家,其实他的实验往往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但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尤以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最为著名)却无可估量,虽然其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料。



1956年11月1日,伊姆雷·纳吉(中)上诉联合国。在注定失败的匈牙利动乱中,纳吉为自己所起的作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苏联付出了更高代价,令它的追随者们幻想破灭。

1961年8月19日,构筑柏林墙。虽然西方政府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苏联决策下,通过在被其占领的柏林砌上一堵壁垒来把城市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不断复发的柏林危机,西方也无甚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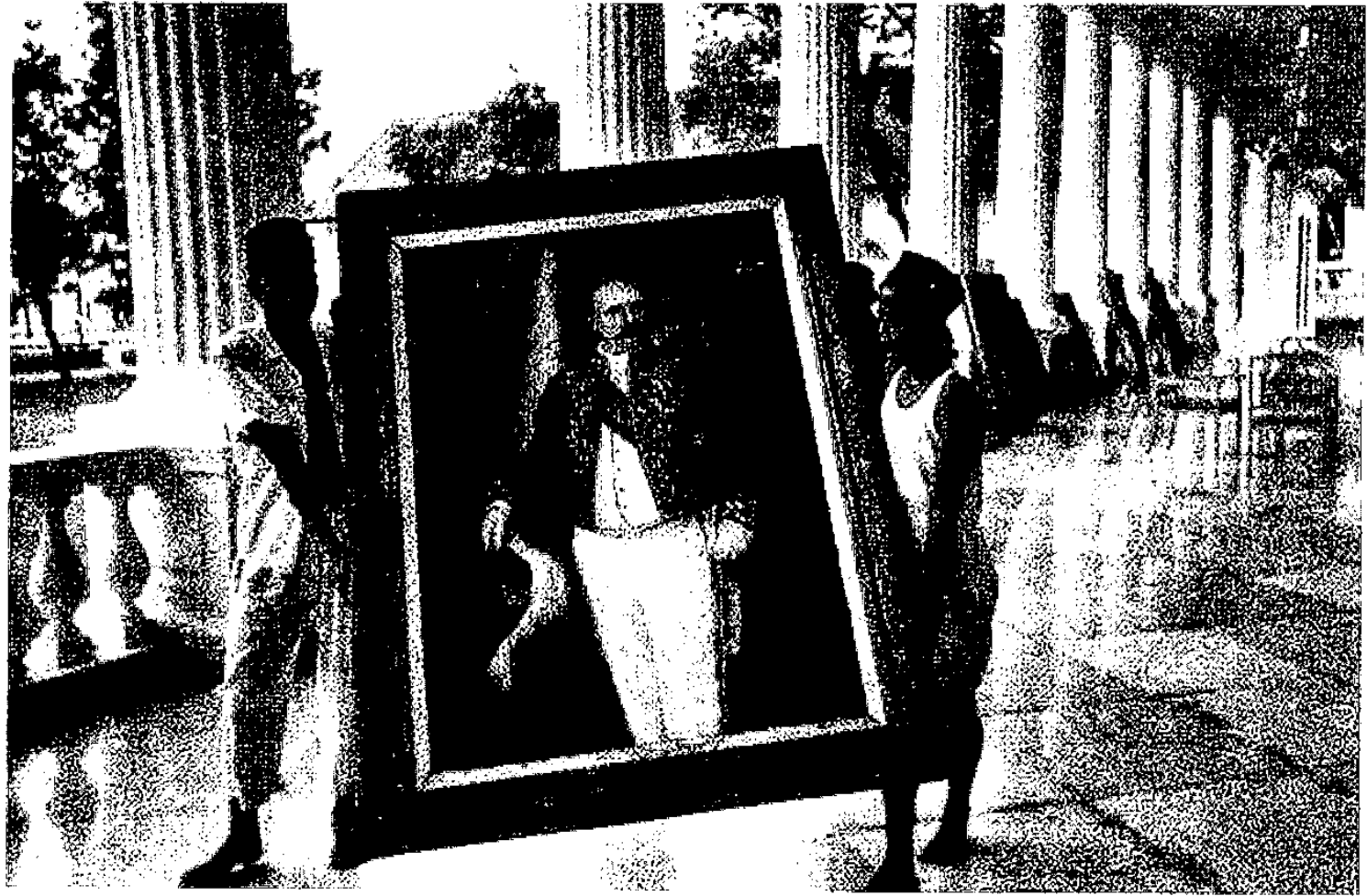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DIE EHE
 DER MARIA BRAUN**

...sie wahrte nur einen halben Tag - und eine ganze Nacht

《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78), 电影导演雷纳·法斯宾德尖锐地剖析了战后联邦德国存在的弊病。对年轻一代评论家来说, 西德沉湎于繁荣、政治上解散军备及集体遗忘过去历史的做法是一种假面具, 实质上还是犯了过去的弊病。

“所有的德国人都和首相一起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都。”实际上, (来自天主教莱茵地区的) 康拉德·阿登纳从心底里讨厌普鲁士式的柏林。但他还是利用柏林的分裂作为杠杆以求得西方盟友的让步。





1949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的前一天,荷兰派来的历任总督的画像被搬出雅加达宫。失去“印尼群岛”给荷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它只好退缩回欧洲,地位大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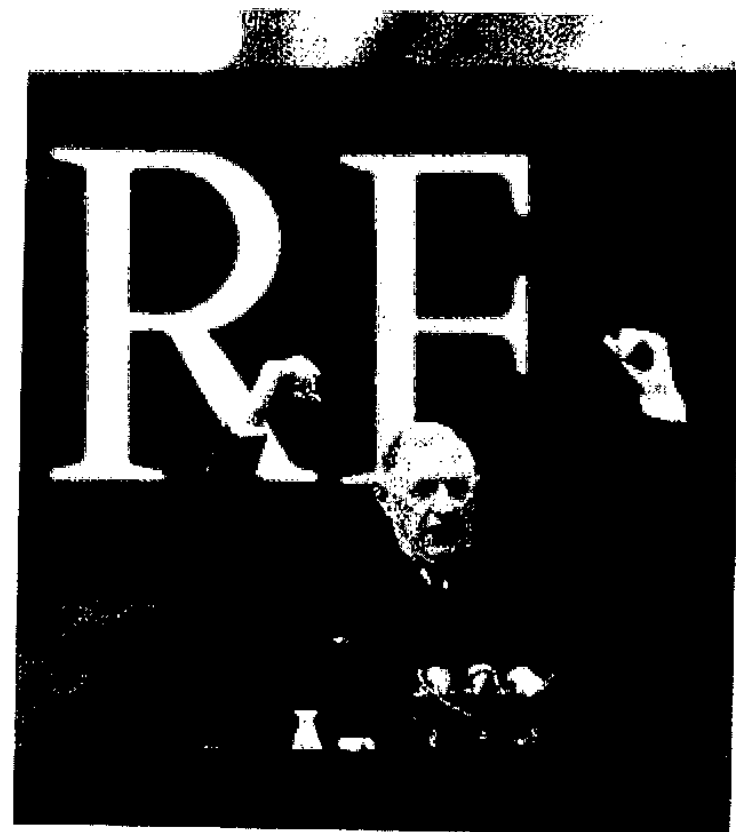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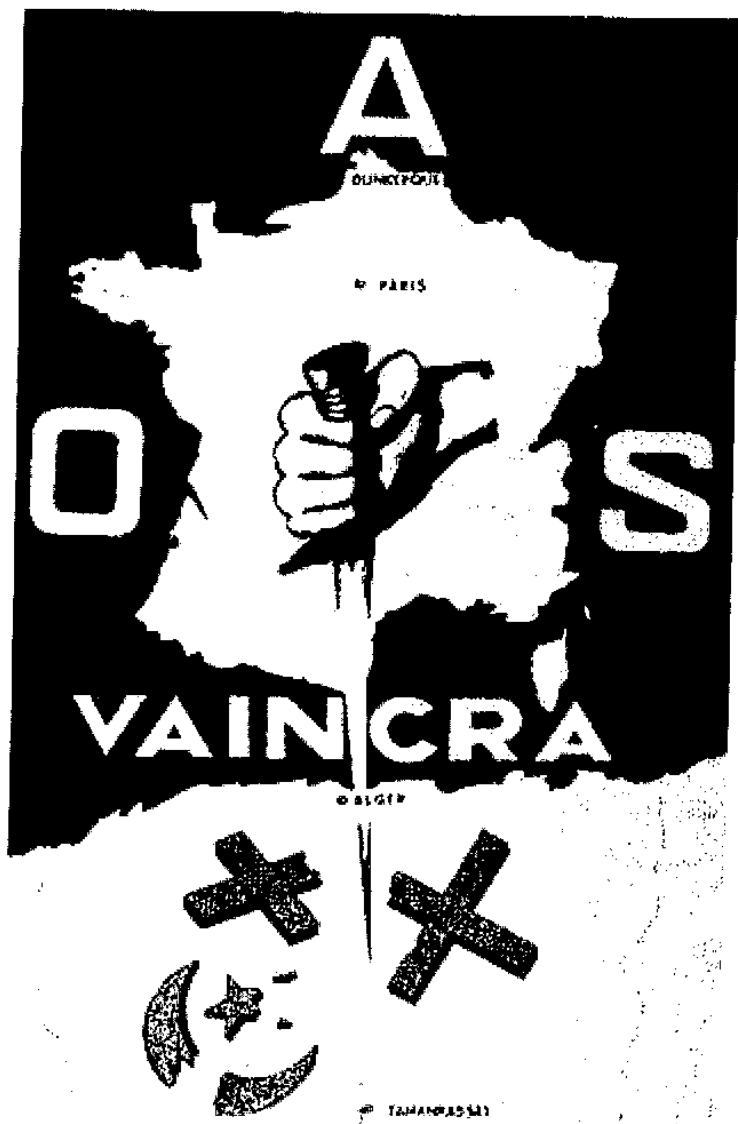


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后,越盟军队押送法国士兵进入关押地。法国羞辱地在越南被逐出境,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尤其是法国军队不得不从北非剩下的占领区撤退。



1956年12月,埃及人民要求英法撤军。苏伊士危机成了战后欧洲的转折点,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撤离,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了英法两国的政治轨道。

“终我一生,我都对法国抱有一种理想。”1958年5月的一场实际政变中,夏尔·戴高乐夺得了权力。他使法国重新出现在世界事务中,并使他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比以往更稳定。



OAS(秘密军队组织)掀起了一场血腥报复的恐怖行动,针对那些它认为是要对失去阿尔及利亚担责的人们。它尤其憎恨戴高乐,认为他背叛了事业(注意图中那断裂的洛林十字架,那是戴高乐主义者的标志)。



1960年7月，刚果的欧洲人逃往坦桑尼亚。比利时从殖民帝国领地的撤离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可耻的失败：经过几十年的剥削后，比利时于1960年放弃了刚果，他们仅留下了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填塞那4000个高级行政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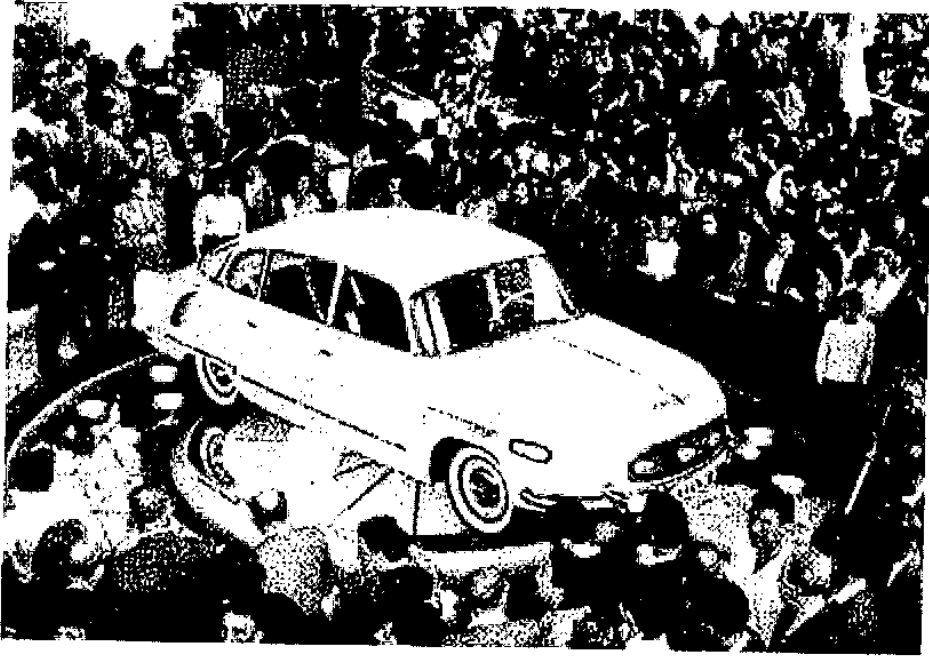


"ER, COULD I BE THE HIND LEGS. PLEASE?"

图片上标：“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未找到自己的角色。”——迪恩·艾奇逊先生，肯尼迪总统的顾问

图片下标：“呃，请问，我可以扮演两条后腿吗？”

文字解释：1962年，迪恩·艾奇逊就英国失去帝国地位后所处尴尬境地而讲的著名俏皮话，激发了卡通画家维奇，他描述出了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卑躬屈膝地和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的耻辱形象，时隔40年后，这一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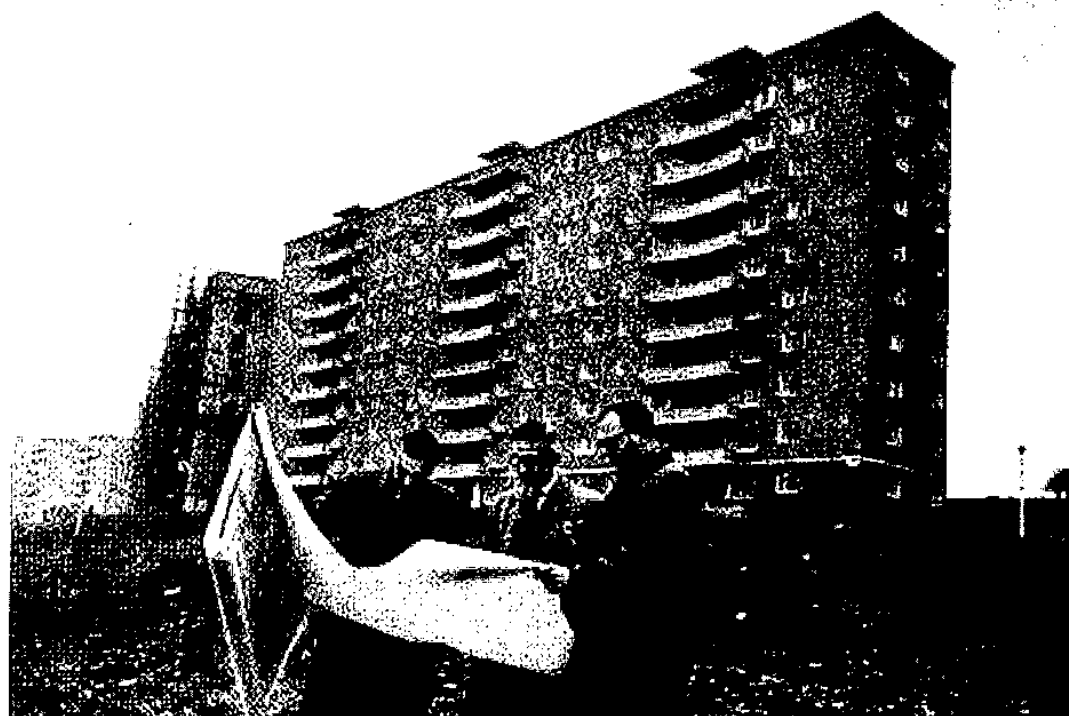
现代性的象征(1):1959年9月在布尔诺交易会上展出的捷克生产的塔特拉603型轿车。苏联集团生产的汽车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共产党国家内部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它们设计得很差劲,并且仅供为数极少的特权人物使用。然而它们却很经久耐用。

现代化的象征(2):1960年,伦敦3位女士在窥视一辆豪华轿车的内部。虽然对许多西欧家庭来说,现在已经可以买得起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冰箱、洗衣机,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财富、阶级和特权的差异。豪华轿车一般都配有专职私人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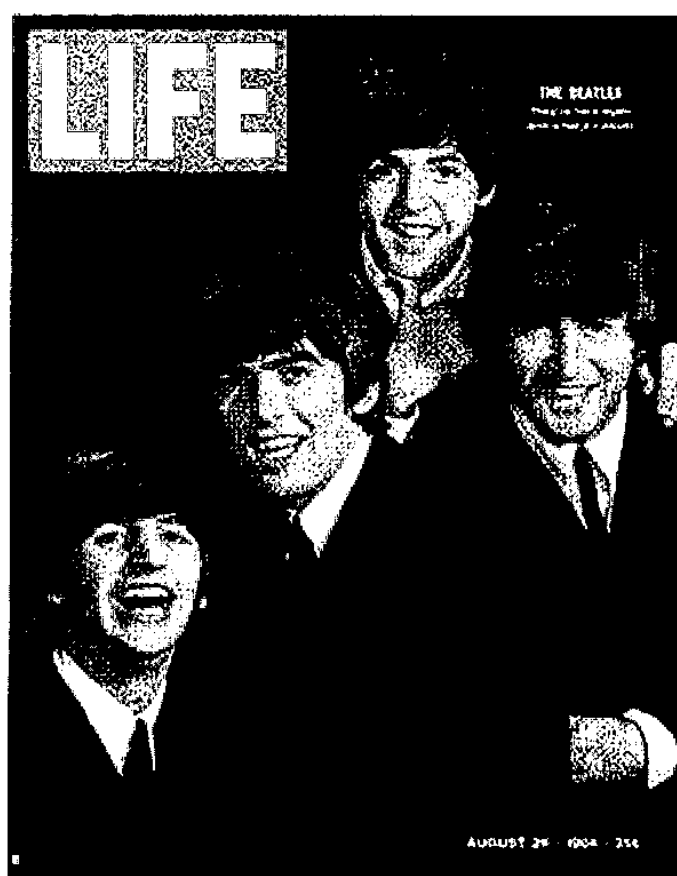


《于是上帝又造了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度假者喜欢上了阳光下的欢乐享受。芭铎还留在因她而成名的法国科特达祖尔,而她的许多朋友们却因忍受不了蜂拥而至的旅游大众而纷纷逃离该地。

战后欧洲各地“清除贫民窟”行动和城市规划,引领了兴建一大批高层公寓大楼,但并不受居民的欢迎,尤其是这些大楼容易短命和提早破败。格拉斯哥在建中的“莫斯高楼”很富有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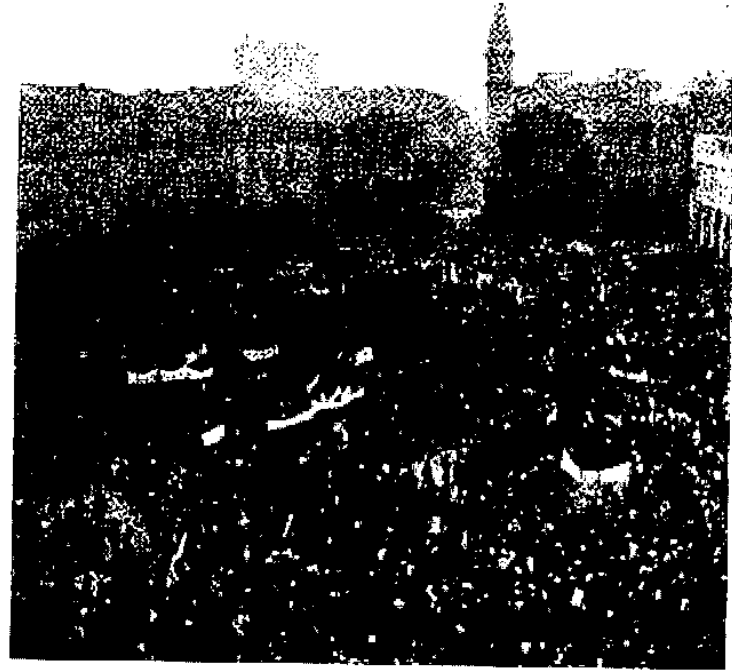
1955年7月,伦敦大象城堡电影院旁的男阿飞。1950年代,介于大萧条时代出生的父母辈和即将出现的战后婴儿潮之间出生的所谓“迷失的一代”缺乏娱乐休闲设施。许多人参加了街头暴力帮派,例如法国的“黑夹克帮”,而德国和瑞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披头士确实很有成就。40年后,他们仍然是、也许是唯一让全世界的人们常常提起的六十年代人的标志。而且他们创作的音乐也确实不错,虽然队长丕帕还算不上是“欧洲文明史上的关键人物”(肯尼斯·泰南语)。



1968年，巴黎学生占领了巴黎大学。除了高举象征马克思主义的镰刀斧头旗并在旗的顶端贴上毛泽东、斯大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画像外，1968年的造反者们并不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大多数学生也并不十分严肃。正如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时所说的，我们只是“喜欢革命”（丹尼·科恩-班迪特）。



1969年9月25日，汽车厂和轮胎厂的工人们在圣卡罗的都灵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在意大利和法国，群众大罢工和工人抗议比起转瞬即逝的大学激进主义运动来，对政府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威胁。



1968年8月的布拉格。“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自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如果它仍还是共产党的话，却不可自由偏离这些原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苏联的占领扑灭了“布拉格之春”。

附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德国到处都是孩子。想来真是后怕，要是时间再长一些的活，德国人 354
可能最终打赢这场战争。
——扫罗·帕多瓦，1945

当然，要是我们连续输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话，债务就会一笔勾销——而不是
背负近 3000 万英镑的债务——就会被免除一切海外义务，也不用驻军海外，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和德国人一样富裕了。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3 年和 1954 年英国财政大臣 R. A. 巴特勒几次讲话中庆贺的英国经济的
繁荣和富强，只是随着德国经济奔腾前进中带动欧洲经济之船队前行时，在
英国岸边撞击出的最后浪花而已。回想起来，1954 年成了英国的幻想中最后
一个辉煌之夏。
——艾伦·密尔瓦德

战后西欧历史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西德和英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德国的一代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战败国命运：城市被毁、货币失效、男劳力不是战死就是被关押在战俘营中，交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都被彻底摧毁了。而英国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明显得胜的欧洲国家。除却遭受的轰炸和人员损伤外，英国整个国

家的结构如公路、铁路、船坞、工矿企业都在战争中完整地幸存了下来。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联邦德国就开始欣欣向荣,成了欧洲经济的动力,而英国却发展滞后,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1〕到1958年,西德经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在许多观察家眼中,英国正在成为欧洲的病人。

355 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带有嘲讽意义的命运,究其原因,具有教育意义。5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产生的背景在于其“30年代”的复兴计划。纳粹在通讯、军备、车辆制造、光学、化学和轻型发动机产业及有色金属方面的投资,原本是一种战争经济,但却在20年后见效了。路德维格·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就根植于阿尔伯特·斯皮尔的政策之中,实际上,战后爬上高位的西德商界年轻经理和政界规划者原先都是在希特勒手下起步的;他们为联邦德国各委员会、规划局和公司所提供的政策和实践都是些受到过纳粹官僚首肯的项目。

德国商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并未受损。1950年代初期,制造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批发商又都恢复了运营,为贪得无厌的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连德国马克的不断升值也未能阻碍德国经济的发展,它降低了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却没有限制国外对德国产品的需求量,这些德国产品都是价值很高、技术先进的物品,它们靠的是品质而非价格取胜。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要是瑞典人、法国人或荷兰人的公司想要购买某种发动机产品或工具时,他们除了从德国购买外,别无他选,所以只好以卖方价格买进。

通过对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的持续投资,以及依靠员工的顺从,德国的企业得以维持较低的成本。联邦德国确实得益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从东德逃离过来的年轻而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半熟练的机械维修师和装配流水线生产工人,还有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普通劳动力。所有这些都因工作稳定、每周可以得到硬通货工资而心怀感激,就像那些继承了1930年代优良传统而不会反抗的老一辈德国工人一样,他们也不会惹是生非。

通过介绍一个行业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大概情况。到了1960年代,德国汽车制造业就因其引擎质量和生产的可靠性而赢得了声望。斯图加特的梅塞迪斯-奔驰和慕尼黑的宝马几乎垄断了高档车的市场,先是在国内,之后又不断销往海外。波恩政府毫不羞涩地公开支持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一如当年纳粹的做法,向它们提供早期优惠贷款进行扶植,并鼓励银行业同企业联姻,向德国公司提供现金投资。

大众汽车公司早在1945年就完成了基本建设。和战后西德许多其他产业一样,大

〔1〕1960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9.0%,英国为2.6%,成了发达国家中除爱尔兰以外发展最慢的国家,因为当时的爱尔兰还远称不上“发达”。

众公司从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对其产品的不断需求——的一切好处中获益，根本没有遭遇过竞争的损失，也没有消耗什么研发成本、改进工具成本。该公司在 1939 年前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它曾为纳粹、战争及军事占领出了大力，盟军政府之所以器重它，也是因为早在大战前它的生产能力就已确立，因而无需进一步投资就可以投入生产了。因此，一旦市场开始大量需求小型家庭用车，大众甲壳虫型汽车就不会碰到国内竞争对手，即使售价固定且低廉，它还是能够盈利，这可得感谢纳粹政府使它没有旧债一身轻。 356

英国也有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由莫里斯、奥斯汀之类的独立的汽车生产商合并而成的英国汽车公司(BMC)，但英国汽车公司后来又并入了雷兰汽车公司，专门生产英国雷兰车(BL)。到了 1980 年，雷兰汽车公司就专营英国特色的汽车产品，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挥动旗帜——买辆奥斯汀·莫里斯吧！”和德国制造商一样，英国汽车生产商也越来越关注海外市场。然而结局却完全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敦促英国汽车公司尽量向海外销售汽车（但却无法对在英国的美国福特汽车及通用汽车等分公司施加任何影响）——竭力争取外汇收入，以抵消国家欠下的巨额战争债务。（政府制定的官方出口目标是到 1940 年代末，英国生产的汽车出口量要占到其总产量的 75%。）公司为了快速提高产量，相应地、甚至故意忽视了质量管理。起初，英国汽车的劣质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英国公司垄断了市场：英国国内和欧洲市场的订单远远超过了汽车的可供应量。而欧洲大陆的生产厂商在产量上根本不是英国的竞争对手：1949 年英国生产的客车量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然而，一旦形成了质量差、服务差的坏名声，也就覆水难收了。随着各国汽车的大量上市，可供选择的种类多了，欧洲人就不再购买英国汽车。

当英国人决定将汽车产业升级、并使生产线改进现代化设备时，英国的汽车公司却无法像德国方式那样从银行获得资金投资和贷款。它们无法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来补缺（不像意大利的菲亚特和法国的雷诺）。然而，在伦敦的政治压力下，为了服从当地政府的决策并安抚当地的政客和工会组织，它们又不得不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地区建立工厂和分销中心。即使后来放弃了这种非理性经济策略，加强了措施，英国的汽车产业仍然遭到了彻底分化，毫无希望：1968 年，英国的雷兰汽车公司所辖的是 60 家不同的工厂。

英国各届政府的政策造成生产厂商消极怠工。战后，政府按照各个生产厂家在战前的市场份额，来给它们配给极少量的钢铁，导致按过去的经济模式发展的主要生产部门受到冻结，而新的部门也受到致命伤害，哪怕它们是具有潜在高效率的企业。供应保障不到位，虚假性的过高需求，以及政治上的压力，等等，这种种经济发展上的低效无能，一并导

357 致了英国汽车产业走向破产。到了1970年,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厂商开始占领了英国人的市场,并在质量和价格上击败了英国。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英国最后一些受保护的市场因英国撤消了原有自治领和殖民地而消失,这些都最终摧毁了英国的独立汽车工业。1975年,英国唯一独立产权的雷兰大众型汽车生产厂商倒闭,从而不得不通过国有化的途径来摆脱困境。几年后,它原先利润丰厚的那几块沦为宝马(BMW)的收购对象。

英国自主汽车业的衰败与最终消亡,大体上可以代表英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历程。英国的经济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糟糕:1951年英国还是欧洲的主要生产制造中心,总产量是德国和法国之和的两倍。英国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经济发展虽然比其他国家缓慢,但还是在增长阶段。然而,它主要遭遇了两大致命性的打击:一个是历史的不幸所造成的,另一个是它自己造成的。

英国无处不在的支付危机,主要源于6年来对德、对日作战所累积欠下的巨额债务,此外还有为支撑战后有效的防御系统而增加的巨额开支(1955年占到了国民收入的8.2%,而德国这方面的支出还不到此数字的一半)。1950年代仍是世界主要贸易支付单位的英镑价值被高估,这使得英国很难向海外卖出足够的产品,以弥补它对美元的长期赤字。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食物和大量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在历史上英国完全依靠英帝国和英联邦统辖下的特权市场保护来弥补这一结构性劣势。

而这种对遥远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在战后早期欧洲其他国家努力挣扎着复兴之初所表现出的优势,到了欧洲,尤其是欧共体地区一旦起飞,就变成了英国的一大劣势。在不受保护的海外市场上,英国根本无法和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竞争,而英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出口产品也越来越比不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了。1950年,英国出口产品总值占世界总量的25%,20年后,它只占到10.8%。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它的份额,而它原先的那些传统供应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非洲殖民地——也开始纷纷转向其他市场。

就某种程度而言,英国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英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低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制造业就以低效而著称,只是借着过去的成功而行。这倒并不是说英国定的物价太高。恰恰相反。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讥讽过英国战后的经济前景:“该国的每小时工资是(大约)2镑,美国每小时为5镑……英国制造业出名的低效率根本无法如愿地抵消蔓延于全行业的全部最初成本差,虽然应当承认在某些重要情况下,他们能够做到有效控制……根据可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除非我们以前没有生产过这类产品,然而我们的整个行业都消耗在成本上了。”〔2〕

358

〔2〕 引自彼得·汉尼斯的《风光不再:1945—1951年的英国》(1993),第117页。

还有,劳动力也是一个问题。英国工厂里就业的男人(和一些女人),他们都按传统加入了成百上千种由来已久的行会:英国的雷兰汽车公司在1968年就一共有246个不同的工会组织,管理层事无巨细都得分别和各工会协商解决工作效率和工资问题。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事实上在这些年里,保证充分就业成了每届英国政府的头等社会目标。为避免重新陷入30年代人员闲置和机器折旧的灾难,充分就业的决心就比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高效率来得更重要。工会——尤其是那些当地的工会代表和工厂车间的管事——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以后都显得更加有权有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罢工——这既是劳方的战斗、又是资方无能的标志——在英国工业生活中普遍存在。

即使英国工会领导仿效德国的做法,温和地处理工厂的各种关系,并限制工资用以促进投资、保障安全和刺激经济增长,大多数工人也不会愿意上钩。早在1930年代,后来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就准确地指出,英国的经济忧患在于投资不足,缺少革新,劳工懈怠而资方又过于平庸。然而,一旦当政后,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制止这样的衰败。德国工业从纳粹手里和战争中继承了一切变革所带来的优点,而英国那些缺乏竞争的老工业却因袭了呆滞,深深地害怕任何变革。

战后几十年里,纺织厂、矿业公司、造船厂、钢铁厂和轻型发动机厂都面临着重建,需要重添设备,然而,英国工厂的资方选择容忍工会、而不是指责劳动效率差的实际状况,他们宁可陷入投资减少、研发受限制、低工资、客户萎缩的恶性循环,而不愿冒险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结果尚不明显。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出于可悲的地理判断失误,美国空军(现已为时太晚,不可能指望从敌人手里得到太多了)沿着东北海岸和兰开夏郡(正好当时只有工厂主们坐在那里,而没有别人)空袭每一座工厂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看起来,还有什么比此举得逞所必备的过度经验不足更让我无法猜测到的呢?”

法国资方也继承了这样的管理无能和惰性,但公共投资和进取性的指示计划弥补了这些不足。但是英国政府却仅限于集体讨价还价、要求管理和劝告。对于一个在1945年 359后经济迅速走向国有化轨道、1970年47%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来自国有化部门的国家来说,这种警告看起来显得奇怪地似非而是。英国政府虽然将大部分的交通、医疗、教育和通讯部门都国有化了,但却从不自夸全国总体战略的雄心;经济发展只是按自己的方式达到实际目的。直到后来那一代崇尚自由市场的改革者和激烈地反对国有化的保守党首相手里,才开始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解决英国经济发展的迟滞问题。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那种针对英国政府对“旧”经济调节不当的指责也落到了摇摇欲坠的德国经济身上。

第 11 章

社会民主时期

360

政府的重要任务不是做个人早已在做的事,将它们做得好一点
或者差一点;而是要做目前根本还未做过的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年

挑战不会来自美国,……来自西德或法国;挑战来自那些好不容易
才最终能够收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物质成果的国家,无论他们可能错到什么
地步——而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错误的。
——安奈林·贝文,1959年

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适当的疏导。
——约翰·贝杰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户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向外看,而人们可以向里面看。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电影就是每秒 24 帧照片的真相。
——让-吕克·戈达尔

20 世纪 60 年代是欧洲国家达到顶峰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
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在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妥协游走:公民刚刚获得的现代权利

被保家卫国的旧义务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以社会公益和经济策略相互交织为特征,而政府的角色也转变为服务于国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能兑现他们的诺言:失业、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使得政府兑现不了当初承诺的一半。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国内公共部门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僵化和无能,而在国外,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灵和政治镇压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361

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将来。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巅峰年代,行政机关仍然保有广泛的权威性,其可信度也没有受到质疑,因而可以获得显著的共识。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总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场要做得好:它不仅仅能够行使公正、保卫国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务,而且还设计和实行能产生社会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强文化活力的策略。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开明的、自利的和商品及观念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主张当时被欧洲主流政界和学术界认为是前凯恩斯时代有趣的残留:最多是没有吸取大萧条的教训,最坏也就是导致冲突和遮遮掩掩地诉诸最根本的人类本能。

如此看来,国家是一件好东西,有诸多的好处。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政府经费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7.6%上升到38.8%,西德从30.4%上升到42%,英国从34.2%上升到41.5%,荷兰从26.8%上升到45.5%——这一时期国内生产要比以往和后来的任何时候增长得快。巨额增长的政府经费中绝大多数花在了保险、退休金、医疗、教育和住房上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和瑞典仅用于社会保障一项,1973年占国民收入比例就比1950年上涨了250%;而挪威甚至翻了三倍。只有瑞士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占战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低一些(直到1980年才达到30%);但即使这样,与1938年仅6.8%的占有率相比,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历史上,无处不强化公共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国家介入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避开直接拥有实业(除公共交通和通讯领域),而喜欢间接控制;他们常常通过名义上的自治机构,比如意大利业务涉及各个领域的工业再造局(IRI),是该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公司(见第八章)。

像工业再造局(IRI)那样的大集团不仅服务于他们的员工和消费者,还有各种政治党派、工会、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教堂。对于上述团体和机构,大集团不仅施予恩惠,也同时扩大它们的影响。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囊括”了从村庄到首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占据了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控制或资助的一系列产品领域:运输、电子媒体、银行、能源、工程和化学产业、建筑业、食品生产等。除该党派之外,其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在官僚机构里 362

找到稳定工作的无土地农民成千上万的子孙。意大利战争孤儿收留机构为每 70 个孤儿雇佣 12 名员工,每年 80% 的预算都花费在员工的工资和管理上。

同样地,比利时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允许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缓和本地的民怨,对那些为不同地区和语种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人群提供服务和工作岗位,大笔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安抚他们。法国战后的国有化奠定了一张产生长期影响和庇护的网络。法国电力公司(EDF)是该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同时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根据最初的战后法规所签订的协议,法国电力公司(EDF)每年 1% 的营业额将汇入由当时法国总工会(CGTT)控制的一个社会基金中。由该基金支付的假期和其他福利(还不包括基金会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代表着法国总工会(CGTT)对其大恩主——法国共产党的回报,这种杠杆式的回报在经济上合算,政治上也意义重大。

这么一来,国家通过无数种方式推动了商业、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对数以百万计男女的就业和报酬负责,使他们因此以专业人士或官僚的身份从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从英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们,与毕业于法国大学院同龄人一样,不去私营部门找工作,也几乎不做工商业,而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法律、国家垄断行业或政府服务部门寻找就业机会。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比利时 60% 的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公共服务或政府资助的社会部门的职位。欧洲国家由此打造了一个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独一无二市场。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就业的良性循环,其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国家在公开目标方面存在的原则差异可能会引起左派和右派、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等的争吵和对立,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从国家提供的机遇中获得收入和影响力。对国家作为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分野。〔1〕福利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远不是。这一点上,正如西欧各国所展现的那样,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后意识形态的东西。

363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 20 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 19 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 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

〔1〕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党派和自由思想家,就像英国保守党内一小部分自由市场派别一样,并不加入这种共识。但在那时,部分地出于这种原因,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即使刻意与马克思及其忠实追随者保持距离,也总是保有这样一种信念——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而社会主义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都更优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终结,也不认为他们有智慧以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加速资本主义的终结。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萧条、分裂和独裁,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其任务是运用国家资源来清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无制约的市场经济运作,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乌托邦。

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并不总像后来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诱惑性急的年轻人,但是它对于1914年以来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生活的男男女女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某些西欧国家的人民眼里,社会民主已经不再是政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再明确不过的了。1945年至1964年间,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选票从33%上升到42%;而同一时期挪威工党赢得43%到48%的选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战后在大选中的选票从未低于45%;在1968年甚至超过了50%。

上述投票数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数据本身——奥地利社会党有时几乎也做得一样好,而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艾德礼的工党也获得了48.8%的选票(虽然保守党得票总数略低,但获得了较多的国会席位)。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同一性。年复一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确保了本国五分之二以上的选票,其结果是连续几十年掌控政府,虽然其间也偶尔联合较小的、顺从的合作伙伴,但通常单独掌权。从1945年至1968年,十届丹麦政府中有八届由社会民主党主宰;同一时期五届挪威政府中也有三届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更是四届政府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政府人事也有一贯性:挪威的埃纳尔·基哈德森领导了两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总共执政14年;而瑞典的泰奇·厄兰德首相同时领导他的政党和国家长达23年,从1946年直至1969年。〔2〕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继承了某些优势。这些国家都很小,同根同源,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帝国主义野心,多年以前它们曾是立宪君主国家。1849年的丹麦宪法纳入了有限议会、广度新闻和宗教自由的内容。瑞典(同时也是挪威)1809年宪法确立了近代政治体

〔2〕与意大利相比,同一时期意大利有13届不同的政府和11任不同的总理;法国在1945—1968年间,有23届政府和17个总理。瑞典任命长期的政党领袖做首脑,它是个特例:埃兰德的前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佩尔·阿尔宾·汉松任总理职位从1926年直至1946年。

制,包括代表比例制和具有示范作用的监察专员制度——后者后来被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用——而且为政党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75年这一体制还在起作用。

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来贫穷——这个地区拥有森林、农场、渔场和少数第一产业,其中大部分位于瑞典。瑞典和挪威的劳工关系长期以来矛盾不断——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两国的罢工频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了很长时间。1932—1933年间,三分之一的瑞典劳动力失业;而挪威和丹麦40%的成年劳动力没有工作——这一数字与英国、魏玛德国或美国各工业州失业率最高的几年不相上下。瑞典的这一危机导致了暴力冲突,最著名的是1931年军队镇压瑞典阿达伦纸厂罢工工人(这一事件被瑞典导演波·维德伯格记录于电影《阿达伦1931年》中)。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走欧洲其他经济萧条国家的老路,那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他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
365 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3〕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选票,或者甚至联合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里的改革派,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还是永远占少数,他们的政治前景依靠该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此,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并没有像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那样,因为马克思关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评论和列宁对“富农”的嫌恶,本能地对农村反感而受到创伤,而这恰恰是许多欧洲左派人士的特征。

两次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轻易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

〔3〕《盐湖浴场协定》与1937年瑞士达成的《劳工和平协定》在某些方面相似。在后者中,雇主和工人双方同意建立一种无冲突的集体交涉制度,这种制度后来成为瑞士未来稳定和繁荣的一种长期基础。然而,尽管瑞士的《劳工和平协定》试图把政府排除在经济交涉之外,瑞典的《盐湖浴场协定》却委托政府和平调解劳资双方共同的利益。

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耕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联合阵营(最初是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后来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却成了一种模式。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形式。

1945年后发展起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项社会协定:订立双方分别是雇主和雇员、劳工和农耕方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颇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反映了上述起源,强调了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的统一费率福利金,等等。如此一来,上述福利国家就明显地与典型的欧洲大陆版本形成显著对比:在后者,国家把收入转化给或者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的方式支付所谓的政府补贴的因私服务(特别是保险和医疗)。但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制度除了教育于1914年之前已经得到了普及和统包,从未被突然间同时构想和实施过——这种制度是逐步出现的。医疗保障尤其拖在最后:丹麦的全民医疗保障到1971年才完成,比北海对岸的英国人艾纳林·贝文创立的国家医疗服务整整晚了23年。

366

而且,局外人看来单一的北欧福利制度,其实根据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丹麦最没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不仅由于它主要依靠海外市场销售其农产品(尤其是奶制品和猪肉)而使该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发展更敏感,还因为该国的技术劳动力大多是按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组织来划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丹麦更接近英国而非挪威;事实上,60年代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往往不得不仿效英国政府,以便通过物价和工资来控制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英国的标准衡量,这一政策成功了;但以更高要求的斯堪的纳维亚尺度衡量,丹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表现总显得有点问题。

除冰岛外,挪威是北欧社会中最小、也是种族最纯的国家,它也备受战争创伤。而且,即使在海岸线外石油资源发现之前,挪威的形势也与众不同。作为冷战的前沿国家,挪威承担了比面积少得可怜的丹麦和中立国瑞士更多的军费开支;挪威也是北欧最狭长的国家,低于400万的微弱人口却要分布在欧洲最长的1752公里的海岸线上。许多偏远的城镇和村庄祖祖辈辈到现在都依靠打鱼为生。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其他党派领导,奥斯陆政府一定要把国家的资源运用于社会和社区事业中:补贴从中央拨到地方,用于运输、通讯、教育、提供专家和服务,尤其是用于居住在北极圈北部的平民,而这种补贴是挪

威民族国家的生命源泉。

瑞典也很特别,虽然它的特点在以后一直被认可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瑞典人口相当于挪威和丹麦两国的总和(仅大斯德哥尔摩一处就相当于挪威45%的人口),至今仍是半岛上最富有、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到1973年,其铁矿产量相当于法国、英国和西德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在造纸业方面,木浆和木浆运输领先世界。当挪威社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辛苦地为贫穷的本国组织、定量和分配有限的资源时,瑞典却早已于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儿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人民共同的利益,将对财富和服务进行平均分配。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治的西德规模还要小。但上述两个国家,加上丹麦和芬兰,政府确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逐步地、无情地对私人收益课以重税、并为了大众的福利而重新分配。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结局最有说服力。到1970年时,以人均购买力为标准,瑞典(同芬兰一样)是全球四个经济强国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和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人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也许这一点会让三代以前的、贫穷闭塞的北欧农民感到非常惊讶)。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为北欧公民带来了令人满意生活,政府提供的教育、福利、医疗、保险、退休和休闲服务以及相关设施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连美国和瑞士也比不上)。到60年代中期,“冰冻的北欧”发展如同神话: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或许不会被其他国家那么容易效仿,但它确实受到广泛的钦佩和羡慕。

无论是谁,只要是从易卜生、蒙克到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中来熟悉北欧文化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自我拷问的、过早的忧郁本质,这些年来,这种特质被理解为沮丧、酗酒和高自杀率的倾向。自60年代开始,这类问题印证了保守派人士批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的观点,他们认为太多的经济保障和集中化使得人民道德瘫痪,并产生诸多问题。于是外界不断有传言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倾向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及在电影中)脱光衣服或者与完全陌生的人做爱,而且这种说法流传非常之广。一些

观察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由于向人民提供一切,而没有任何禁令,因此导致了精神问题。〔4〕 368

如果这就是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最坏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原谅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可以一路笑着走向银行(这本身也是一种抱怨)。然而批评家认为: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20世纪初对于国家有能力把社会治理得更好的信心现在已经转变成诸多形式: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政治就像是英国福利社会的费边主义改革主张,天生对各式社会工程抱着无边的迷恋。只要国家稍微超常一点调整工资、政府花销、就业和信息,就使人们感到要修理他们个人了。

优生学作为一门种族优化的“科学”,超越了例如素食主义和散漫思想那样的爱德华时代的时尚(尽管优生学也往往迎合了同样这些人)。各种不同政见的思想家都喜欢优生学,它尤其与善意的社会改革者的雄心壮志相吻合。如果某人的社会目的是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的状况,那为什么拒绝现代科学提供的种种机会,而一直去做小修小补的改善呢?为什么我们不把防止或消除有缺陷的人类状况扩展到防止或消除有缺点的人类呢?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要求用科学手段来操控社会或人种的计划广为流传,而且深受尊重;只不过由于纳粹的“卫生”雄心始于合成人体测量室而终结于毒气室,才使优生学在战后欧洲到处名声极坏。不然的话,它将会是一种受到广泛赞许的假设。

但是,当它在多年以后出现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国政府至少没有舍弃对优生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兴趣,即“人种卫生”。1934年至1976年间,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这些国家都相继实施了绝育计划。在这些年里,大约有6000名丹麦人、4万名挪威人和6万名瑞典人(90%为妇女)为“卫生”目的,即“提高人口质量”,做了绝育手术。作为这些计划背后的知识界推动力——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人种生物学的研究所,创立于1921年优生学最流行之时,直到55年后这个研究所才被撤消。

这段伤心历史所叙述的社会民主政治状况,如果有,也是模糊的,因为非社会主义和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差。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合法性和大多数胸无疑虑的公民所赋予国家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使得政府可以对貌似共同利益的事务采取自由行动,而缺少明显的监管。看来监察员们也从未想到过要调查一下那些纳税公民之外的有权群体滥用职权的情况。把累进税率和父亲假与强制干预“不健全”公民的生殖能力划开界限的做法,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某些社会民主党政府里也不完全明 369

〔4〕 到1973年为止,西欧最发达和富足的国家里自杀率最高,如丹麦、奥地利、芬兰和西德。欧洲贫穷的边缘国家最低,丹麦的人均自杀率是意大利的6倍、爱尔兰的14倍。这一意志消沉的现象到底是何种因素导致的,是经济繁荣、气候、地理纬度、饮食、宗教、家庭结构,还是福利国家制度,这在当时和现在都还不清楚。

朗。这至少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所上的道德课没有像当初想像的那样清晰,特别(或许还不是出于偶然)是在瑞典这类过去被普遍认为有集体良知的国家里。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最接近理想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国家是位于西欧边缘的另一个中立小国奥地利。确实,奥地利所具有的表面相似性被许多观察家指为“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像瑞典和挪威一样,占奥地利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土的贫穷农村,已经转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繁荣、稳定、政治安定的一块绿洲,一个由国家提供福利的国度。奥地利为了避免重新回到两次大战之间几十年公开冲突的状态,也签署了一份事实协定,协定双方是社会党和保守的人民党。但是相似性却不复存在。

奥地利确实是“社会的”(曾经是除芬兰之外西欧民主国家中最大的国有化区域),但它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政体。直到1970年,该国才有了一个战后社会党政府首脑,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任奥地利总理。奥地利虽然多年来制定了许多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同的社会服务措施和公共政策,例如儿童保育、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和退休金、家庭救济、全民医疗和教育、示范性的国家资助的交通事业,但是把奥地利与瑞典区别开来的,是其根据政治倾向而在就业、影响力、优惠政策和基金等领域进行近乎全民式的分配。奥地利这种为根据政治选择来稳定市场而使用资源的做法与社会理想无关,却和对以往创伤的记忆有关。一想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经历,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就更加对稳定本国脆弱的民主政治感兴趣,而不是使其社会政策革命化。〔5〕

同其他政党一样,事实证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擅长忘记过去,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激进的改革中消除怀旧情绪要花相对更长一些时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等到1959年,国会才在巴特哥德斯堡重新设立其长远目标和具体目的。新通过的《党纲》中坦率地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欧洲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打算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党纲》还声明,国家应当“约束自己,仅限于参与间接影响经济的办法”。商品和就业的自由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极权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摧毁的是自由”。〔6〕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识在两个国家的态度中产生了明显对比:比利时工党在随后的1960年决定重新确认该党在1894年成立时的党章,要求生产资料集体化;而1960年英国

〔5〕 有趣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20世纪早期维也纳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的兴趣更甚于奥地利本国人。相比之下,这两位理论家的奥地利继承者们却更乐意把上述理论抛置脑后,除了偶尔有所呼应,比如奥地利社会党1958年的纲领里含糊地宣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地位处于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

〔6〕 关于这一部分的解释,详见1992年出版的巴克和格莱斯两人撰写的《西德史》第一卷第十六章“从影子到实质”。

工党拒绝了其改革派领袖休·盖茨凯尔的建议,没有删除 1918 年工党纲领第四条中公有制公平分配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与比利时、英国上述行为的对比可以通过其晚近的经历来解释:对刚刚过去的破坏性抗争的痛苦记忆,和国界线对面近在咫尺的极权威胁,促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妥协的种种好处上,就像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

英国的工党没有这类可怕的梦魇要驱赶。在这一点上,它也和比利时、荷兰的工党一样,从一开始起,就是被工会成员的利益(和钞票)所驱动的,其根源是劳工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它不太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也更加盲目。如果被问到,工党的发言人会乐意赞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总体目标;但工党自身的利益更实际、更加狭隘。恰恰是因为英国(或至少是英语)政治文化的内在稳定性,也由于长期奠定(虽然正在缩小)的工人阶级基础,工党才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福利国家采取的改革措施兴趣不大。

相反,英国式的妥协以控制需求的财政政策和成本很高的普通社会供应为特征,它得到大幅度累进税率和大型国有化部门的支持,是在动荡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对抗的产业关系背景下产生的。除工党所强调的国有化的固有好处,上述特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主流派的大力支持。如果英国人能够意识到——哪怕是一点点——英国的政治也是被过去经济上一次次震撼塑造出来的,那么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广泛的、跨党派共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大规模失业。

即使在工党做了 13 年反对党之后,其新党魁哈罗德·威尔逊于 1964 年率领工党重新登上了权力宝座、并热切地谈论“技术革命白热化”时代时,还是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威尔逊在 1964 年大选中的险胜(以多四票当选)使他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且即使两年以后的选举中工党赢得选票更多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工党在经济或社会政策上有任何激进的转向。威尔逊本人继承了费边的理论和凯恩斯的实践相结合的艾德礼—贝弗里奇传统,对经济(或政治)的革新毫无兴趣。像大多数形形色色的英国政治家那样,他从本质上是传统的、务实的,但在公共事务方面带着傲慢的短视目光,他曾说过,“对于政治来说,一周是段很长的时间”。

然而,英国的社会民主政体确实有某种独特之处,所以各方都无法狭隘地否定如下描述。英国左派(和当时许多政治上的中间派和中右派)首先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目标。战前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生活是贝弗里奇改革和 1945 年工党以压倒多数当选的原因。工党当时承诺它能够解放经济、维护报酬和服务的公平分配,但这一承诺却导致了 1951 年保守党上台并长期执政。英国人接受了累进税率,欢迎全民医疗,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而是因为直觉地感到它们更公正。

同样地,英国福利和服务机制的统一费率(富裕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从中受惠特多)

也得到广泛接受,因为它看起来很平等,即便只是表面的平等。60年代工党政府一项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学教育不按智力分班和废除重点学校的人学考试制度这两件事,这一项被1945年以后艾德礼政府长期审慎地忽略的工党承诺推出后受到了大家欢迎,与其说这是因为这项变革内在的好处,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看起来“反精英”,因此“公平”。这就说明了1970年威尔逊卸任后为什么保守党仍然推行教育改革,而不顾各方面警告说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后果可能违背初衷。〔7〕

372 工党依靠工会的支持,延迟了各类工业改革,许多人(包括工党的一些领导人)都知道改革来得太晚了。当英国的产业关系彼时仍处于工厂里对抗与冲突的困境,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奥地利或荷兰按熟练程度计件和计工资一类的争端几乎闻所未闻。工党的大臣们半心半意地企图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但都劳而无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从来没有效仿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成果。

而且,英国福利制度的普遍性特点虽然比法国或意大利早二三十年采用,但是英国即使在物质平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也非常有限:直到1967年,80%的英国个人财富还掌握在10%的人口手中。战后最初30年重新分配政策的唯一效果就是从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手中把收入和资产转移到了在其之下的40%人口手中,而垫底的50%人口在保障和福利方面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没有提高。

如果对西欧福利国家的时代作一番全面审视,我们必然发现其中预示着以后几十年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诸如1957年《西德社会安全改革法案》一类的立法提案将会成为人口增长、经济环境变化后财政预算上不可承受之重;该《法案》保证工人的养老金依他们退休时的工资而定,也同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挂钩。我们事后总结瑞典的社会民主政治,可以清楚地看到。急剧拉平收入会减少私人储蓄,遏制未来的投资。政府换届和统一费率的社会费用征缴使得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人获益,即使当时这一点也很明显: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会牢牢把握机会去争取一系列新的特权。

无论这种国家制度是由谁引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家长式的天主教徒,抑或是谨小慎微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欧洲的“保姆国家”也都真的取得了成果。以保护社会、经济的核心纲领为起点,福利国家向着权利、福利、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制度迈进,而且

〔7〕 英格兰的国立重点学校取消入学考试,只能把更多的中产阶级人士推入私有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重点“公立学校”收费的期望和利润,而这是当初工党激进分子所蔑视的。与此同时,选择还在继续,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有能力的父母在“好”学校周围买房子,而穷人的孩子只能在最弱的学校和最差的师资环境下学习,将来升学的希望也相应降低。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是战后英国实施的最倒退的社会立法。

在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中几乎不产生任何政治成本。即使是实际受益的官僚和白领所组成的自私自利阶层,他们的创造活动也不是没有优点的:常受中伤的“中下层阶级”农场主在民主政体的制度下得到好处,也像农民一样成了既得利益者;当然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样也有好处,因为这类政党必定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对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却不好,他们遇到的麻烦更多一些。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早已引起注意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个人保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注重教育以及社会的高度灵活性。当西欧人开始倾向于不固守他们的出生地、职业、收入级别和社会阶级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动地囿于认同父辈的政治派别和社会从属关系。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满足于获得经济保障,不想卷入政治运动及其产生的危机;他们的孩子——60年代人口更多的那一代,只知道有和平、政治稳定和福利国家,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373

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点进行坚决的、强制性的控制。同性恋做爱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非法的,并会受到长期监禁的惩罚。在许多国家的艺术作品里也不准出现同性恋题材。堕胎在大部分国家里是非法的,甚至从理论上来说避孕在某些天主教国家也是犯法的,虽然在实际上可以得到谅解。离婚在任何地方都很困难,在一些地方甚至决不可能。西欧的许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又要部分地排除在外),政府机构仍然负责审查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电台和电视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政府垄断的,对节目内容有严格规定,不大允许出现异议和“不敬”。即使在1955年就有了商业电视台的英国,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电台、电视台有责任遵照国家指令,在播放娱乐、广告节目的同时节目还要包含“启迪意义和丰富信息”。

审查制度与税收一样都是由战争推动的。英国和法国一系列最严厉地限制行为和言论的政策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入的,而且从未废止过。在其他地方,例如意大利、西德和被它们占领的一些国家,战后的法规沿用了遗留的法西斯法律,当地的民主立法者

还想适当地加以保留。到1960年还在起作用的、最带压制性的“道德”强权已经不多,这些强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明显的时代错误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办公室负责预审戏剧,而戏剧审查官和副审查官两个职位早在1738年就创设了)。当然这条审查规则的除外特例便是天主教教会。

374 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会议在公开反动的教皇庇护九世支持下举行,从此天主教教会便以囊括一切、坚定不变的教条主义观点看待其自身的职责,认为自己是所有信徒的道德守护人。恰恰由于天主教逐渐被挤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梵蒂冈就在其他方面对其信徒提出了不容更改的要求。事实上,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尤金尼奥·帕切利有争议的长期在位不仅维护了天主教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正式地把教会带回了政治领域。

从当时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密切联系、对纳粹模棱两可的回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独裁者的热情,可以看到帕切利教权的反动政治立场。他在位期间,对其国内民主政治也采取了不妥协的方针。特别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就是灵魂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比利时或荷兰,当地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体系也按照严格的指令,要求教徒只能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直到1967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9年,一位荷兰主教才敢对公众建议,荷兰的天主教徒可以为非天主教党派投票,而没有被逐出教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持不妥协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问题包括家庭、道德行为或不合适的书籍与电影。但年轻一点的教徒和新一代的教士们于50年代末已经不安地感到,梵蒂冈对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独断和顽固不化是个时代错误,也是欠考量的。在1900年时,大多数的意大利婚姻大约维持20年,通常以一方的去世而告终。但到70年代中期,婚姻往往超过35年,要求离婚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从人口统计学上也削弱了反对避孕的态度,孤立了那些持不妥协态度的教会首脑。西欧每个地方的弥撒出席率都很低。不管是什么原因——原来顺从的村民在地域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妇女的政治解放,福利国家里天主教慈善组织和教区学校的重要性日益减弱——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就像洞察力非凡的天主教首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问题不能诉诸传统和权威来解决,也不能像40年代晚期那样挑起反共浪潮来实行压制。

帕切利死后,他的继任约翰二十三世召集了一次新的梵蒂冈大会,倾听这些困难,提出目前教会应当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这次会议史称第二届梵蒂冈大会,时间为1962年10月1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语言(实际上,在日常教会活动中不再使用拉丁语,对此,少数死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感到难以理解,并且十

375

分愤怒),更重要的是教会对现代生活的两难做出了反应。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声明中,清楚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不再与自由民主政治、混合经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甚至是世俗政治为敌。教会审慎地迈出的第一步尝试是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和解,并且通过重新解释长期以来所说的犹太人造成了耶稣之死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大程度)认可教会有义务不鼓励反对犹太人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再被视作独裁统治的支持力量;相反地,在亚洲、非洲、尤其是拉丁美洲,他们至少看起来像是与对手的立场一致。

在天主教自己的改革派中间也不完全赞同这些转变,一位参加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的克拉科夫年轻教士后来成为教皇,他以恢复天主教不可妥协的道德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己任。第二届大会也没有扭转欧洲天主教徒教会活动衰落现状:即便在意大利,弥撒的出席率也从1956年全体天主教徒的69%下滑到12年后的48%。但是,既然欧洲宗教的衰退并非只限于天主教信仰,那么这种现状恐怕也不是天主教会能控制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真正获得的成果至少是推动和批准了欧洲大陆政治和教会的最终分离。

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没有哪一个教皇、而且几乎没有哪一个主教会有胆量威胁教徒说,如果他们不正确投票将会后果严重;并且,曾经出现在荷兰、比利时、西德、奥地利、意大利的教士阶层与天主教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又被撬开了。〔8〕即使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当地的教士阶层也享有非同寻常的待遇和特权,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也造成了急剧的变化。虽然直至60年代中期,西班牙领导人才禁止非天主教信仰及活动的一切公开声明和表现,但他还是于1966年被迫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其他基督教派别的存在,而天主教仍然享有特权;随后的4年里又批准了基督教信仰的绝对自由。通过在西班牙成功地游说天主教晚到的“政教分离”政策,而为佛朗哥有生之年的统治和教会带来一线曙光,梵蒂冈的教廷至少部分避免了西班牙天主教会因为长期地、劳神地与“古老政权”相联系而产生的后果。

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所熟知的这一“文化分裂”,发生于政治和宗教之间、天主教同它的晚近历史之间,对“60年代”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梵蒂冈的改革思维肯定有其局限性,因为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第二届大会背后的策略动力不是接受激进的变革,而是阻止它。几年以后,当大家为堕胎和离婚的权利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天主教徒为主的 376 国家里,如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神职人员激烈地投反对票,即便结果不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一类敏感问题上,教会也并没有碰壁,而它的反对也不再会冒瓦解天主教团体的风险。

〔8〕 随着神权政治的死亡,政治上的反教权主义也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从而结束了充斥着争吵和困扰、时间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循环。

在一个稳步走向“后宗教的”社会里,教会接受了它的降格地位,并且尽可能做得好一点。〔9〕

在非天主教的社会里,即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荷兰的一部分和少数德语区的西欧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公民从传统的道德权威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进行得必然更加分散,而事实上运动一旦来临便非常剧烈,这种转型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直到50年代末,英国仍然禁止公民赌博,禁止阅读和观看前人认为“淫秽”和政治上敏感的事物,不支持(更不用说参与)同性恋行为,禁止本人或给他人堕胎,离婚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受到公众鄙视。如果公民犯了谋杀等一些大罪,就会被绞死。

然而从1959年起,这类枷锁被解除了。随着那一年《淫秽出版物法案》的颁布,开始执行成人文学作品免审制度,一本成人书刊如果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科学、文学、艺术或学习”,就可以免于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自此以后,出版商和作者可以借助作品的整体价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同时还可以在法庭辩护时借助“专家”的意见。1960年10月,著名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一案中,检察官起诉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这本D. H. 劳伦斯创作的淫秽小说,认为除了应该删节的内容,小说并不出色。“查特莱”一案引起了英国人特别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原本违禁的章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诸于众,还因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来源于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情爱。当案件的检察官问一个证人是否会让他的“妻子或女仆”读这本小说时,证人回答说,“妻子或女仆”读这本书不会给他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决不会让这本书落到猎场看守人手里。

由于召集了35名专家到场作证辩护,企鹅出版社被宣告无罪;英国正统体制的道德权威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同一年,赌博在英国也合法化了。4年后,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废除了死刑;在出色的改革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领导下,工党于1967年引入了政府出资的家庭计划诊所、修改了同性恋法律、并使堕胎合法化,第二年又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1969年,工党又颁布了《离婚法案》,这项法案对婚姻制度实施彻底改革的程度实际上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58对夫妻中只有1对离婚,而40年以后,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

60年代英国的自由化改革被整个欧洲西北部所仿效,虽然在时间上先后都迟了些。西德联合政府在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于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进行了相似的改革。这次改革与其说受到法律和先例的限制,不如说被其联合的党派所挟制——主要是经济上开放但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自由民主党人。法国要废除死刑,不得不等到1981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执政,但那儿的堕胎和离婚法律

〔9〕然而在爱尔兰,教会当局参与日常政治活动的做法一直保持到了90年代,为时相当长。

也像意大利一样,早在70年代初期就重新修订过了。总而言之,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60年代”的解放运动直到70年代才在欧洲真正来临。但是,一旦法律上的变革到位,其社会后果也就接踵而至: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离婚率1970年至1985年间翻了可怕的3倍!

公共权威在道德和私人关系方面名声日渐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民族文化事务中角色的式微。实情正好相反。西欧广泛的时代共识是:只有国家才有足够资源服务于民众的文化需求,如果让公民个人或者社区来做则缺乏方法和决心。只有运作良好的公共权威才有责任给予大众食物、住房、就业乃至文化滋养。在这一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想法相似,两者都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思想;而现在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比以前多得多。60年代的审美反叛几乎没有改变——新的(“反”)文化运动与旧文化所要求和获得的资助是一样的。

50年代和60年代是政府文化资助的美好时代。自1947年起,英国工党政府就在地方税上增加了6便士,以支付地方上的艺术创新,如剧院、爱乐乐团、地方歌剧等等项目,拉开了60年代艺术委员会的序幕,这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补贴各类地方的和中央的艺术节、艺术机构和艺术教育。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没有这么乐善好施,它的补贴主要针对传统的、有声望的高雅文化场所,如博物馆、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等等,还有政府垄断的电台和电视台。但戴高乐重新掌权,任用安德烈·马尔罗做文化部长后,法国的文化现状变了。

法国政府在文化活动中长期扮演文化艺术保护人的角色,但马尔罗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他的角色。按照传统习惯,法国宫廷及其共和国接替者把他们的权力和荷包总是使用在巴黎(或凡尔赛),以吸引艺术家和艺术,使得国家的其他地方艺术干涸。现在中央 378 政府愿意将钱补贴给外省的表演者和演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节和剧院开始在法国的外省生根发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让·维拉尔执导的阿维侬夏季戏剧节,始于1947年;但当维拉尔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戏剧的改革和更新中起主要作用时,这个戏剧节却落荒而逃。许多法国一流的演员,如让娜·莫罗、玛丽亚·卡萨雷斯、杰拉尔·菲利普,都在阿维侬工作过。就是在阿维侬和其他一些看来不太可能的地方,例如圣艾蒂安、图卢兹、雷恩和科尔马,法国艺术复兴开始了。

马尔罗对外省文化生活的鼓励当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动机。即使是维拉尔自己的作品,在反对偶像崇拜方面也是典型巴黎式的:关键不在于把文化带到各个地区去,而在于打破主流剧院的陈规——“把生活带回剧院、带进群体艺术……,让它再次自由呼吸、从阁楼和画室里面解放出来、使建筑 and 剧诗结合在一起”——这些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好像

更加容易做到,但必须拥有中央政府的资金和文化部的支持。在一个真正的非中央集权的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则刚好相反——文化和艺术是地方政策和地区利益的直接结果。

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战后几十年里德国在艺术上的公共花费急剧增长。由于西德的文化和教育事务控制在联邦的州政府的手里,而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却重复得惊人。每个州和大多数最重要的市镇都有一个歌剧公司、一个乐团和诸多的音乐厅、一个舞蹈公司、享受补贴的剧院和各种艺术团体。有一项统计表明,两德统一时,西德地方上有225家剧院,它们预算的50%—70%都由州政府或市政府资助。这种制度在法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而对德国来说,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小侯国、大公国和教会的封地,其中许多地方都保留了专职的宫廷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定期委托创作的新作品。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大。经历了纳粹统治后的西德虽然在文化上缺乏信心,政府慷慨资助的文化机构却成了各类艺术家的圣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柏林交响乐团、科隆歌剧院以及几十个较小的机构(曼海姆国家大剧院、威斯巴登国家剧院,等等)为成千上万名舞蹈家、音乐家、演员、舞蹈指导、剧场技师和办公室职员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失业福利、医疗保障及养老金)。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来自国外,包括美国。这些外国艺术家极大地受惠于欧洲繁荣的文化场景,其受惠程度不比当地为那些得到不同的补贴来观看或聆听他们演出的观众差。

379 就像“60年代”的景况直到70年代初才在许多地方真正来临一样,50年代的文化也显得一成不变——沉静、乏味、荒芜、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很神秘。在《愤怒的回顾》一剧中,剧作家奥斯本通过剧中人吉米·波特之口,斥责战后繁荣和自满中蕴含的虚假成分;毫无疑问,优雅背后的虚伪直到50年代末,在许多观察家、尤其是青年感到极端丧气后才被赶走。^[10]然而50年代还是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戏剧、文学和电影中,许多作品拥有比后来的作品更长久的影响。在权力和政治声望中失去的东西,西欧各国政府现在从艺术中补了回来。事实上,50年代晚期是欧洲“高雅艺术”的小阳春时光,形势是那么异乎寻常地有利:“欧洲质量”(这儿的着重引号还没有以后几十年里所产生的贬义)第一次由大规模的公共资金支持,这时的大众尚未对之提出“易懂”、“明白”和“有意义”的要求。

随着1953年3月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次上演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欧洲的剧院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海峡对面,伦敦王家宫廷剧院的英格兰舞台剧团采

[10] 奥斯本把英国皇室描述为“满口烂牙中镶的一颗金牙”,以表达其典型的“愤怒青年”式的愤怒。

用了贝克特和东德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并上演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阿诺德·威斯克的表演作品,所有这些戏剧都把极简主义风格和鄙视现实的审美态度融合在戏剧技巧中,这样的艺术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是很难出现的。甚至连英国主流剧院也开始更加冒险的尝试。50年代晚期,英国一代出色的戏剧界翘楚(奥利维尔、吉尔古德、理查森、雷德格雷夫、金纳斯)与大学里(大部分从剑桥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表演家们及著名的创新派导演和制片人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彼得·布鲁克、彼得·霍尔和乔纳森·米勒。

英国于1946年最初提出建立国家大剧院,它正式建成于1962年,当时任命劳伦斯·奥利维尔为建院总监、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作为他的顾问和助理,剧院在伦敦南岸正式落成于1976年。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起,国家大剧院是英国新兴戏剧的主要赞助人和演出场所,同时又是慷慨的英国艺术委员会的主要受惠者。应当注意的是,这不表示戏剧成了当时较受欢迎的娱乐形式。相反,当音乐厅一走下坡路,剧院也落到了二流地步,虽然表面上看来戏剧题材挺无产阶级的。剧作家们可能会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然而看戏的却是中产阶级。

就像贝克特和他的作品很容易进入英国一样,英国的戏剧和戏剧界的主要人物也在国外过得非常舒适:彼得·布鲁克在伦敦以他的莎士比亚作品(最出名的是《仲夏夜之梦》)成名后,在法国永久定居了下来,轻松地跨越了审美和语言的障碍。到60年代初,已经可以谈论“欧洲”戏剧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其素材是有争议的、描述当代欧洲主题的戏剧。罗尔夫·霍赫胡特的《代表》1963年第一次在德国上演后不久即在英国演出,这部作品攻击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他接下来的那部作品《士兵》(1967)又把矛头指向了丘吉尔,指责他战争期间轰炸德国城市,所以英国最初是禁止这部戏上演的。

也是在50年代,欧洲的艺术又被“新浪潮”的作家和电影导演横扫,他们结束了传统戏剧的叙事,而把注意力转向了性、青年、政治和异化,预示了许多应该由60年代人考虑的问题,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就。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西欧小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随波逐流的人》(1951)、阿尔贝·加缪的《堕落》(1956)、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比后来的作品要新颖和勇敢得多。即使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作品《你好,忧愁》(1953)或者科林·威尔逊的《外人》(1956)中的那种刚过青春期的青年人专心致志、自恋式的描述(威尔逊的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暗示对威权主义蔑视人类的厌恶),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原创性的。上述小说创作时作者分别为18岁和24岁,其题材及其成功预示了60年代的“青年革命”,却比后者整整提早了10年。

在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初期,尽管影院的上座率明显下降,欧洲电影却赢得了艺

术性和创新性的长久美誉。西欧的电影从大众娱乐中升华(或摒弃出来)为高雅文化,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当然欧洲电影业的振兴不是由观众需求推动的;如果让观众作决定,法国影院会仍然被牢牢限制在50年代初“高质量”的古装戏剧上,德国影院只能继续放映黑森林背景下的浪漫“故乡”电影,而英国的观众会津津有味地欣赏战争电影和越来越具挑逗意味的轻喜剧。在任何欧洲国家,大部分观众还是会非常喜欢美国的通俗电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欧洲观众对美国电影的热衷,尤其对40年代晚期那种朴实无华的“黑色电影”风格的喜爱,才引起了一群新生代法国电影编导者的电影革命。出于对前辈的陈腐主题和洛可可装饰风格的绝望,1958年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借用了法国影评人皮埃尔·比亚尔的文章《新浪潮》的名字,拉开了法国重新制作电影的序幕:首先从理论上,尔后从实践上。这一理论在新刊物《电影手册》上已有预示,其核心概念是“导演即作者”:比如说,对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影评人所赞赏的是作品体现的“主体性”,即一种在制片厂的工作中设法让他们拍摄的电影具有他们自己的“符号”。出于同样原因,新生代法国电影人也先是挑战,然后抛弃诸如让·维果和让·雷诺阿等上一代法国导演的作品。

上述一切都揭示了一种直觉的良好品味,但是其所处的理论氛围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事实上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圈子之外,人们通常理解不了。但是路易斯·马勒、让-吕克·戈达尔、克洛德·夏布罗尔、雅克·里维特、埃里克·侯麦、阿涅斯·瓦尔达,尤其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人的实践改变了电影的面貌。在1958年至1965年间,法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制作能力惊人。马勒于1958年执导了《通向断头台的升降机》和《移情记》,1960年《地铁里的莎姬》,1961年《私生活》和1963年的《鬼火》。戈达尔也分别执导了《筋疲力尽》(1960)、《女人就是女人》(1961)、《随心所欲》(1962)、《法外之徒》(1964)和《阿尔伐法》(1965)。同一时期夏布罗尔的作品包括《俊男塞吉》(1958)、《两次旅行》(1959)、《女仆》(1960)和《恶眼》(1962)。

里维特的作品更有趣,创作时间也晚一点。像瓦尔达(这些年里以作品《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和《幸福》最出名)一样,里维特也堕入了自我放纵;而这一辈新浪潮电影人中年纪最大的埃里克·侯麦就不同,他后来以悲伤的“道德故事”而举世闻名,其中的第一、第二部电影《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职业》都是1963年拍摄的。到最后却是无与伦比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铸成了“新浪潮”艺术的风格和影响。特吕弗首先是因为在一系列电影中起用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安托万·德瓦奈(一个特吕弗自传式的“主角”)而享有声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四百次打击》(1959)、《二十岁的爱情》(1962)和《被偷的吻》(1968);特吕弗不仅是法国电影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也是其中最稳定、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的许多独立题材影片,如《朱尔与吉姆》(1962)、《柔肤》(1964)、《华氏451度》

(1966)和《最后一班地铁》(1980),是电影史上的艺术经典。

新浪潮运动优秀导演的力量之一是,虽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宣言,而不是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娱乐(《电影手册》的投稿人频繁地提及他们得益于“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电影一样地娱乐大众(没人会说看特吕弗或马勒制作的电影就像看油漆慢慢干掉那样无聊,就像人们对戈达尔和里维特的作品私下里议论的那样)。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和视觉上的易懂性相结合,对外国的仿效者才有重要意义。对于阿伦·雷奈的作品《广岛之恋》的回应,也暗示了法国电影已经成为国际上道德辩论的首选载体。

所以,当26个年轻德国电影导演1962年在奥伯豪森集会,宣布“传统德国电影的崩溃”和他们要“创造新的德国特征的电影……以从这个产业的成规中、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其实公开承认了法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1957年,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手册》里的著名论文《论伯格曼的电影》中赞扬伯格曼这位瑞典“作者”是“欧洲电影界最有原创能力的制片人”;同样地,爱德嘉·莱兹和他的德国同事就像西欧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从戈达尔及其朋友身上得到启发。^[11] 382

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年轻时喜欢黑白片,是因为这些影片没有“虚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评论家艳羡法国导演自己对美国现实主义的重演演绎是出于他们的精妙和知识分子的世故:他们能够独特地使小人物赋予令人敬畏的文化意义。在埃里克·侯麦的《我在慕德家的一夜》(1969)中,由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扮演的外省哲学教授让-路易斯在慕德(法国费边社成员)家的沙发上度过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慕德是让-路易斯一个熟人的女朋友,聪明而又有魅力。天主教徒让-路易斯在当时那种情景所暗示的道德规范中挣扎,为是不是应该与女主人发生一夜情而烦恼,他不时地与一位共产党同事交换一些感想。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让-路易斯回了家。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或英国的导演会去拍这样一部电影,更不可能使它发行。但对于新一代的欧裔美国知识分子来说,侯麦的电影抓住了所有要素——世故、厌世、巧智、影射、成熟和欧洲人对法国电影的看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电影虽然在国外发行范围很广,却达不到相同的影响。一些比较成功的影片自我意识太强,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塑造成为富有而性感的新形象,通过索菲娅·罗兰的肉感特征和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浪子回头的喜剧角色来传达:比如《意大利式离婚》(1961)和《意大利式结婚》(1964)。

马斯特洛亚尼第一次扮演回头浪子的角色是在一部由弗德里科·费利尼执导的、比

[11] 戈达尔尤其具有极其明确的折衷主义品位。有报道称他“痴迷”于尼古拉斯·雷执导、琼·克劳馥主演的《约翰尼的吉他》(1954)。

较严肃的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中,但是总体上调子比较灰暗。费利尼本人在与特吕弗、戈达尔相同的许多圈子里忠实地仿效他们,尤其是《8 $\frac{1}{2}$ 》(1963)和《鬼迷朱丽叶》(1965)。当时老一代的天才导演还没有退出舞台: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了《万劫余生情海恨》(1962),和费利尼共同执导了改编自萨特剧本的《三艳嬉春》(1962),并且在60年代末还导演了《费尼兹花园》,但是他们的作品再也不能像4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那样拥有政治和美学的影 响,尽管德·西卡与新现实主义一直联系紧密。更有影响的人是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的作品《奇遇》(1960)、《蚀》(1962)和《红色沙漠》(1964)都起用了莫妮卡·维提,安东尼奥尼敏锐的电影艺术风格和无法吸引人的、愤世嫉俗的回头浪子角色要早于60年代晚期电影艺术中出现的疏远而淡漠的世界,安东尼奥尼自己也自觉地沉迷于其作品《春光乍泄》。

意大利电影缺少法国(或瑞典)电影那样有魅力的知识性,但是它们富于自己的风格。恰恰是这种欧式风格,以“多样化”平衡了艺术家的自信、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和有教养的才智,使得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的欧洲大陆电影独具特色。到50年代末,西欧不仅从经济萧条和战争创伤中恢复了过来,还再次成了吸引雄心勃勃的世故之人的好地方。虽然纽约有钱,也许还有现代艺术,但美国仍然被认为有点嫩,即便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约翰·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他的魅力部分地在于他在华盛顿办公场所显示出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概,俨然一个“肯尼迪王朝”。这个“肯尼迪王朝”要归功于他妻子那欧洲背景的、大陆式的自我展示。

杰奎琳·肯尼迪把欧洲风格引入了白宫,这不足为奇。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欧洲化“设计”空前繁荣,并且被认可为地位和质量的标志。如果商品、创意或者某个人被贴上了欧洲的标签,就意味着与众不同,当然价格也更高昂。这个发展过程其实刚过去不久。我们坚信,“巴黎产品”至少从18世纪晚期开始,长期列入奢侈品交易的行列;而瑞士手表已经享有几十年的声誉。德国汽车工艺事实上要比其他国家的好,意大利设计的服装、比利时的巧克力、法国的厨具和丹麦的家具毫无疑问是各自领域中最好的——但这种观念在上一代人看来几乎是可笑的。

如果说欧洲什么东西是好的话,应该是英国制造的货物,直到不久前还是如此。这是英国19世纪工业至高无上地位的遗产。英国国内的货物、汽车、工具或武器长期以来被外国市场看重。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制造商几乎在每一个商品领域里都成功地破坏了自己的地位,只有男士服装成为英国零售商唯一的机遇;到60年代末,英国给人的鲜明形象就是低质量的“时髦”货,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一市场被无情地开发了。

欧洲商业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国家一样,是各自不同的。

意大利的轿车,如菲亚特、阿尔法罗米欧和蓝旗亚,因为以次充好、性能不可靠而臭名远扬,但这并不影响意大利在国外市场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比如皮具、高级女装,甚至低一档的白色家电。〔12〕对于德国服装和食品,国际市场从来没有任何需求,也应该如此。但到 1965 年,任何一件用德国机床做出来的或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在英国或美国的橱窗里想开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在许多产品领域里赢得了高质量的美誉,但即使在那里,市场的情况也明显地变化多端。外国的富人们在家里高档风格的瑞士家具或丹麦家具,即便它们的结构有点脆弱,因为它们非常“现代”。但是这些消费者同时会对瑞典的沃尔沃汽车感兴趣,虽然看上去外观不美,但却给人坚固的感觉。“风格”和“价值”这两种特性被称为识别“欧洲”产品的标签,而在美国通常相反。 384

巴黎仍然是高档女式时装之都。但是意大利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不受原料定额供应的限制(不像法国和英国),早就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早在 1952 年,就在圣雷默市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男士时装节。然而无论法国多么时尚、创新,其高级女装(从克里斯汀·迪奥到伊芙·圣罗兰)风格还是非常传统的:直到 1960 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杂志编辑和专栏作家还把出席年度时装发布会所戴的帽子和手套穿到工作场所。只要中产阶级妇女在着装方面还跟着一小部分巴黎的设计师和时装屋的风向标走,那么后者的地位(和利润)还是牢靠的。但到 60 年代初,欧洲的妇女像男士一样,不再把戴正式的帽子、穿剪裁得体的外套或者晚装作为日常生活。大众服装市场既追随上层、也跟从下层的时尚。欧洲作为时尚和优雅之都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欧洲的未来存在于更加多姿多彩的时尚风格中,其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甚至是亚洲借鉴而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上意大利人尤为擅长。对于服装及其理念,巴黎主宰着欧洲市场,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将来的服装之都却在别处。

1955 年 3 月在米兰举行了文化自由大会,雷蒙·阿隆提出大会的议题是“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当时,他的一些听众认为这个提法有点为时过早,毕竟在铁幕对面和其他一些地方,意识形态都看上去很活跃、而且很得势。但是阿隆有自己的观点。在那些年里,西欧国家越来越与任何一种主义的事业相分离;并且我们也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缓和了旧的政治仇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人来直接关心国家的政策和开支,但是他们也不会淡忘应当由谁来控制国家。看来西欧人抵达这块繁荣而和平的“阳光普照下

〔12〕 意大利当然能够设计轿车,这一点任何赛车迷都会认同:是意大利客车制造商去除了小型家用汽车上的一些多余的东西,如挡泥板、脚踏板等等,就像在同一年里米兰的裁缝去掉了裤脚的褶边,并创造了现代意大利西装简练清晰的线条和裁剪风格一样。意大利轿车制造商所不能做到的是让他们准确无误地按照图纸制造轿车。

的辽阔高地”(丘吉尔语)比预计早了点:在欧洲这个地方,政治向政府让步,而政府又越来越限于行政事务。

385 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保姆国家(即使是后意识形态的保姆国家)制度的后果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知道还有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公民而言,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它的错误。通过一群仁爱的执政者来使公共事务明显地惯例化,也不能保障那些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的民众会关心政府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至少阿隆的预测没有说中。因此,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里长大,才会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感到最生气和憎恶。这一悖论所孕育的征兆在公共规划和公共建筑领域内可以明确地看到:因为这个领域内,冷战双方国家都极其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时出现的人口增长和迅速城市化,对城市规划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东欧,即使许多城市的中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摧毁或半废弃,还有2000万人口在战后20年里从农村移居城镇和城市。到1970年,立陶宛半数的人口住在镇上;而20年之前只有28%。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在解放至1970年的一段时间里下降了50%,大批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1948—1970年间,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人口长了一倍,居民从28万人增长到56.6万人;同样地,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内从36.8万人上升到了74.6万人。

布加勒斯特从1950年至1970年间,从88.6万人增长到了147.5万人;索非亚从43.5万人上升至87.7万人;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的人口从1959年的50.9万人上升到了两年后的90.7万人。造成这些城市(从柏林到斯大林格勒)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苏联时代的住房政策:苏联建造了成千上万幢样式相同的灰色或棕色的水泥公寓楼,它们价格低廉、结构简陋、没有显著的建筑风格特征,也一点没有美学思想(或公共设施的样子)。

在一些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内地城市(如布拉格),或者根据以前的计划重建的城市(如华沙和列宁格勒),大部分新建筑位于城市边缘,形成了一长串延伸到农村的郊区宿舍。其他地方,比如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新的贫民窟却位于城市中心。这是由于小镇和村庄没有能力吸纳成千上万无家可归之人,这些人以前是农民,后来做了矿工和钢铁工人,而城市的中心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的聚居地,不复有老镇残存的优雅。集体农庄的工人不得不进入农业城镇生活,这一措施在50年代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发明,后来又由齐奥塞斯库来完善之。一些新型的公共建筑,如技术学校、文化站和党组织办公室,都一板一眼地模仿了苏联的建筑:有时呈现出社会主义风格,但总是空间过大、很少吸引人。

强制性的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和对私人需求的批评和蔑视,是导致共产主义城镇规划 386 变成灾难的原因。但西欧的“城市之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大量农村人口的拥入造成城市资源相对紧张。大雅典地区的人口从1951年138.9万人上升到1971年的254万人;而同一时期的米兰则从126万人上升到了172.4万人;巴塞罗那从128万人上升至178.5万人。在所有这些地方,就像是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和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大城市的快速扩张的郊区,城市规划者忙都忙不过来。与在共产主义城市中办公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设计建造出大片面目相同的住宅,位置不是在被战争夷为平地或重新改造过的城市中心地带,就是在城市边缘的绿色田野上。特别是米兰和巴塞罗那,当第一代南方移民于60年代从破烂的小镇搬往高层公寓大楼时,其结果让人联想起苏维埃时代的灰房子,而且他们还遇到了进一步的困难:好多人因为租不起离他们上班地点很近的房子,所以不得不每天忍受公交不足而带来的长途奔波之苦;也有人开着新买的车上班,结果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然而,这些年西欧城市建筑形式的丑陋不应当只归因于人口压力。这种“新野兽主义”(建筑评论家雷纳·班汉起的绰号)的出现不是由于偶然或疏忽。在西德,重建的许多大城市极其缺乏想象力和眼光;在伦敦,伦敦市政议会的建设部门竟然把大批的住宅项目承包给了阿尔顿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位于罗埃汉普顿,专门营造咄咄逼人的、直线风格的、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勒·科比西埃式的建筑。这些建筑的丑陋外表似乎是精心设计、故意造成的。米兰那座可怕的维拉斯科摩天大楼由一家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的私人集团于1957年至1960年间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具有当时那种典型的、咄咄逼人的超现代主义风格,意欲表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1959年3月,法国建筑委员会同意了蒙巴纳斯大厦的设计,他们在报告里总结说:“巴黎再也不能迷失于过去了。在将来的日子里,巴黎必须经历巨大的转变。”

其结果不仅仅是蒙巴纳斯大厦(或是像它生下来的孩子、丑陋的拉德芳斯建筑区),而且有一系列的新镇迅速出现:超高密度的住宅街区(它们被特指为“大集中”)位于大巴黎区的边缘,人们被剥夺了就业和享受当地服务的机会。这些小镇中最早、也是最出名的是位于巴黎北面的萨尔塞尔,它的居住人口从1954年的8000人一直扩展到7年后的3.5万人。从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这个小镇没有根基,与同一时期间其他国家专门用于工人住宅的郊区相似(尤其与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边上的拉兹迪奈相似),远远背离了法国 387 当地建筑设计或城市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种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其他生活领域里被万分赞赏的欧洲“风格”在这儿没有任何迹象。确实,欧洲的传统在这儿被刻意地避开了。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的建筑,是有意识地反历史的;它们从建筑规模和建筑材料上(最喜欢用钢铁、

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来背离过去的建筑设计。〔13〕这样一来,建筑作品就不再有必要比以前的更富有想象力:相反,这种几十年来改变了诸多欧洲城镇面目的“城市再开发”计划被视作一个巨大机遇而让人念念不忘。

在英国等地方,城市“规划”最多作为一种修修补补的策略:政府没有哪项长期战略会纳入住房、服务、就业或者休闲等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兴小镇或住宅区都没有电影院,更遑论运动设施或足够的公共交通)。〔14〕政府的目的是消灭贫民窟,并快速、低成本地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1964年至1974年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84幢公寓大楼拔地而起,其中许多大楼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废弃。伦敦东头最抢眼的建筑“罗纳角”公寓大楼在1968年发生了自行坍塌事件。

公共建筑也不见得怎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60年代设计,直到1977年1月才对外开放)像它西面的巴黎地下购物中心(Les Halles)一样,本该为巴黎市中心展示各色流行文化资源,但在较长时间内它跟周围的街区 and 传统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伦敦大学新建的教育学院上,这座建筑位于旧布卢姆斯伯里区中心的伍伯恩广场,它招摇过市,用伦敦历史学家罗伊·波特的话来说,简直“丑陋至极”。还有,伦敦南岸建筑群素以提供各类无价的表演艺术和艺术服务而闻名,但是其可怕的、低矮的标高,乱七八糟的小巷和满是裂纹的混凝土立面,老是令人沮丧,印证了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杂乱无趣的市容”一说。

即使我们承认两次大战和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后,确实存在着一种渴求崭新的、脱离过去的事物的愿望,我们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战后欧洲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这好像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周围的新环境很难看:居住在大型住宅区、高楼公寓和新兴小镇上的人们从来就不喜欢这些房子,并且他们对每一个来询问的人明确表明否定态度。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许不会理解,他们设计的住宅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会成为社会上流浪汉和暴徒的滋生地,但居民们十分清楚。即使是欧洲电影,几年前还在拍摄关于老城和老城生活的爱情、怀旧题材,现在也转向关心现代大都市冷淡、困苦的非人性化题材。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一类导演在拍摄俗丽的新兴市区和工业化环境题材的电影时感受到了感官上的愉悦,如《阿尔法城》(1965)和《红沙漠》(1964)。

〔13〕一位巴黎评论家有一次赞赏道,巴黎大居住区规划中挤得紧紧地“大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成千上万间公寓是“纳入垂直结构的真正的小房子,就像是排列在酒架上不同的酒瓶子那样”。参见皮埃尔·阿加德在《精神》杂志上的文章《同一模样的居所》,1953年10月-11月号。感谢尼科尔·鲁道夫博士为此提供的引文信息。

〔14〕但是荷兰的鹿特丹与此不同:在被德国炮弹摧毁之后的几十年里,经过一步一步的重建,港口鹿特丹成为一座真正有意识地被“设计”的城市。

深受战后建筑打破旧传统之害的是火车站；火车站被历来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细的艺术成就的体现，同时它本身往往也是一座重要的建筑丰碑。美国的火车站也一样遭受灾难（许多人仍然记得1966年拆除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事，它见证了官方流氓主义时代的开始）；但至少美国城市规划者至少还有理由——在轿车和飞机的夹击下，铁路旅行的前景实在比较黯淡。但是在人口拥挤、面积相对较小的欧洲大陆，铁路交通的未来从来就不是大问题。欧洲拆除的火车站被缺乏风格的、毫无吸引力的大厦所取代，而它们行使的不过是同一种功能。如果要去拆除伦敦的尤斯顿车站、巴黎的蒙帕那斯火车站和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这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在美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规模拆除城市建筑、全欧洲要求与过去割裂，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废墟一步跃入极端现代化，被自己证明得到了报应（感谢70年代发生了经济不景气，为此公、私预算都被削减，从而使翻新旧建筑得以暂停一段时间）。早在1958年，大批城市改革巅峰到来之前，就有一批保护主义者在英国发起成立了“维多利亚协会”。作为典型的英国志愿者组织，“维多利亚协会”致力于寻找和保护英国受威胁的建筑文化遗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整个西欧受其影响，出现了一张类似组织的网络，推动居民、学术机构和政治家们与之呼应、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损失。虽说他们对于保护某一块区域或某一幢建筑而言已经太晚了，但是他们至少设法保护了尚未被破坏的一些建筑，比如位于米兰科尔索马金塔大街上的展览中心，除了70年代早期已经被拆掉的部分，所有能够反映17世纪城市孤儿院面貌的建筑元素，如正立面和内部回廊，都被保存了下来。

在欧洲城市的有形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20年。那些年里对城市建筑的伤害是出于无知，但在“辉煌的30年”的经济发展光环下，这一点没有完全被认识到，为此付出的代价就像在上一个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过程中一样。虽然在以后几十年里也作了一些弥补（例如法国对现代化的规划和对道路等交通运输网络的大力投资，显著地提高了边缘郊区的生活质量），但是被破坏的建筑再也无法挽回。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对于为扩张城市的野蛮行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追悔莫及。

60年代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之一是，被无情地“更新”和重建的城市景观被居住其间的这一代年轻人深深地嫌恶。他们的房屋、街道、咖啡馆、工厂、办公室、学院和大学可能非常现代、无比“簇新”。但除了极特别的建筑，大部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丑陋的、没有灵魂的、沉闷的、野蛮的，而且用流行的话来说是“异化”的。如此一来，出现下列情况就很正常：当欧洲实行仁慈服务的那些福利国家那些吃得好、住得好、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们长大后反对这个“制度”时，第一幢正式宣告爆破的建筑是位于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分部校区”中的预制混凝土宿舍，原因是它正好位于人口过多的巴黎郊区，那里充斥着高楼街区，而且交通堵塞。

第 12 章

革命的幽灵

390

性交开始于 1963 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出第一张激光唱盘之间。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们如此热爱它。

——丹尼尔·科恩-班迪特

后悔了的资产阶级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象之一。

——以赛亚·伯林爵士

现在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拍你们的马屁,但我不会,亲爱的各位。你们一副被宠坏的小杂种的嘴脸,我恨你们,就像恨你们的父亲一样……昨天你们在朱利亚峡谷殴打警察时,我对警察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是穷苦人的儿子。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 年 6 月

我们追随的不是杜布切克。我们追随的是毛。

——意大利学生口号,1968 年

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时刻,一般是在作历史回顾时才为人所认识。而60年代却不同:那一代人对于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谁人”乐队的歌词,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一代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见这也造成了一些视角上的扭曲。对于现代欧洲而言,20世纪60年代确实确实是现代欧洲有着非凡结果的10年,但并不是当时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样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对偶像崇拜的冲动,不管是在服装样式还是思潮方面,都犹如昙花一现;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务领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尽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后才看到效果。同样,60年代的政治版图也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总在最出名的地方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16至24岁之间的学生年纪人群超过了800万, 391 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样的人口爆炸早已对国家的食品供应造成了严重压力;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会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繁荣的时期,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饭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多数孩子在小学教育完成后便离开学校,年龄通常在12至14岁之间。在很多地方,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并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共产党掌权前的东欧国家里的在家孩子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来的学生人数,同时也作为较大范围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开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多数孩子事实上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是区区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数的20%。

这些教育变革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一直以来在多数欧洲社群划在两类人中间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背出民族历史大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是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少数特权阶层。那些语法学校,

如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级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拒之门外的经典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并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392 这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代沟本身也成了事实上的社会革命,尽管它的后果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当成千上万的孩童拥入匆忙建成的中学,给为完全不同的时期建造的教育体系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已开始发愁:这些变化对于大学——曾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 1960 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得以一窥中学校园,那么更少有人怀有上大学的梦想。在 19 世纪,一些传统的大学曾有过些许扩展,高等学校的数量——主要是技术学校——也有所增加,但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 18 岁以前自己挣钱,并且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第三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更不用说可用以补偿收入上的损失。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 年瑞典共有 1.5 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 2 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 5 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 4 900 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 13 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学的数量。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容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的话)都很难再容纳额外的数千名年轻人。

393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里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幅员狭小且远离都市(几个世纪以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选择了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学是个例外,但只是个特例。欧洲的大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明显地属于例外),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于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物质资源。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城市或国家。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逐渐经过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举措必须来自中心地区。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来临时,这些新的大学,尽管其建筑乏善可陈,至少已经建好,足以解决日益增加的人学需求,同时也为数量日增的大学毕业毕业生提供了教师职位。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的大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在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参加并通过了全国性的中学毕业考试,你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这一制度都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总人数少,大学不必担心学生人数过多无法负担。不管怎样,欧洲大陆大多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仍沿袭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丝毫没有必须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经历一次社交成人仪式。〔1〕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规划者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设置新的预选障碍或制度。相反,也是出于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尽力去去除那些残余的预选制度——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及既定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能容纳约5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仅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2〕

〔1〕 显然一些规模较小、精英型的学院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法国的理工大学和高等师范学院,它们的学生人数不多,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精心挑选出来的,教育质量也非常高。但这些是特例。

〔2〕 60年代中期,在意大利只有44%的大学生最终毕业,而这个数字在70年代继续下降。

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每7个年轻人中有1个在上大学(10年前为每20人中有1个)。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每6个人中有1个。在西德,1950年时总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开始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在法国,到196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956年公立中学学生的人数。欧洲各地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建学校尤其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尽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由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是学生(这一细节容易被这一时期的记载所忽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人、没有技术或是从偏远省份或是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学内外发生的。这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395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是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典范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人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套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从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尽管每个国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习俗,以及本土独有的特点(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广场举行的兄弟节是法国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时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样式却以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越了一条又一条国界线。大众文化必定会成为国际性的。某种潮流(音乐、或是时装)在英语国家——往往就在英国——开始,然后再向南、向东,借助着日益视觉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国界)的文化流行开来,只是偶尔会因为当地的一些不同趋势、或更经常的是

由于政治干预而受到阻碍。〔3〕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头阔绰的年轻人,即欧洲白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买得起唱片、音乐会门票、鞋子、衣服,还可以消费时髦的化妆和发型。但这些新潮事物的表现却又完全跨越了寻常的界限。当时最为成功的音乐人——披头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国布鲁斯吉他音乐(多为黑人所演奏)的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直接拼合在一起。〔4〕这种极具独创性的组合不久便成为了欧洲年轻一代本土的、跨国界的文化。

流行音乐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们对风格尤为关注。有人会说这毫不稀奇。但是由风格直接替代了内容,这可能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特之处。60年代的流行音乐对曲调、对表演的方式无比关注,而歌词却往往平淡乏味,外国人听起来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奥地利,演奏或是听英美流行乐曲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的父母们大惊失色,就像脸上挨了一巴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邻国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些音乐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反叛心理。

396

如果说60年代的主流音乐文化似乎都与性有关——至少在它短期内转向毒品和政治之前——这其实也是风格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离开父母的时间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药也比以前更为安全、易用、合法。〔5〕电影和文学中的裸体、滥交等表现也更为常见,至少在西北欧是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年长的一代相信有关性的种种禁锢已经全然崩溃,而他们的孩子也乐于让他们面对这种梦魇。

事实上,60年代的“性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觉而已。据我们所知,多数年轻的欧洲人的性兴趣和性行为并没有像当时的人喜欢宣称的那样发生了迅速、激进的变化。当时的调查证据表明,甚至当时学生的性生活与他们前面几代人的也并无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态度一般与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经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风尚、情感收敛的年代。但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是19世纪末颓废的欧洲、或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风流社

〔3〕在共产主义阵营中,“60年代”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自然是二手经历的。但不能因此夸大其中的区别。用当时的典型参照物来判断:每一个东欧人都知道“披头士”乐队,很多人都听过他们的音乐。而且不仅仅是“披头士”,法国摇滚歌星强尼·哈里代到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科希策演出时,听众多达2.4万人。

〔4〕“披头士”乐队出身于利物浦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其中只有保罗·麦克尼出身高了一两个阶层。另外一支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滚石”的歌曲题材更体现了波西米亚传统风格,与其主唱人员的伦敦中产阶级背景相符。这一缺陷因为其故意硬朗的风格以及其成员广为人知的非常混乱的私生活得到了弥补。

〔5〕但是应该注意到在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在西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仍是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英国是个例外,它在1961年就批准可以使用避孕药。而在海峡对岸,在1966年歌手安托瓦纳销量达100万张的唱片里,他在悲哀中梦想着法国也会有一天让避孕药可以“在廉价连锁商店里出售”。

会”相比,“时髦的 60 年代”实在是相当平淡的了。

为了强调风格,60 年代的人异常执著地追求外表上的独特。服装、发式、化妆,还有当时所谓的“时尚配件”都成为一代人的关键的政治性标签。伦敦是这类潮流的发源地:欧洲在服装、音乐、摄影、模特、广告、甚至流行杂志方面的品位,无不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考虑到英国早已有了设计单调、建筑破烂的名声,成为欧洲时尚风潮的发源地似乎绝无可能,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思潮对于传统秩序的逆反。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但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的伦敦”——《时代周刊》在 1966 年 4 月给它的称号——为这一时代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光亮。

到 1967 年为止,英国的首都有超过两千家商店自称为“时装商店”。多数都厚着脸皮模仿了卡尔纳比街沿街服装店的风格。卡尔纳比街长期以来是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现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新潮”时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时装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装裁剪革命的法国时装店,1965 年 4 月 13 日在古戏街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一连串模仿其风格的时装店开业,全部被冠以时髦的英国风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温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卡尔纳比街风格在整个西欧被克隆(只有在意大利的影响不甚明显)。它的特点是颜色鲜艳、剪裁贴身,不分性别,不适合 30 岁以上人士穿着。“新男士”出售的红色紧身灯心绒裤和黑色紧身衬衣成为之后 3 年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者的正规服装,而且被四处抄袭。与 60 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些服装出自于男人之手、为男人所设计;但年轻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穿了。这甚至影响到了巴黎主流的时装设计公司;从 1965 年起,巴黎的女式时装店制作的宽松式样的服装多过了裙子。

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帽子的产量。可以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帽子市场的青少年市场,发式代替了帽子成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传统的帽子只限于在为“年长者”举行的正式场合上戴。〔6〕但帽子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服装裁剪变革的第二阶段,式样活泼、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装”(从 50 年代后期继承而来)被更“严肃”的外套所代替,这与音乐上的变化类似。年轻人的服装裁剪和营销都更强调其灵感源自于“无产阶级”和“激进分子”:不仅仅是蓝色牛仔裤和“工作衬衣”,还有靴子、深色夹克以及皮制“列宁”帽(或是毡帽的变种,令人想起 19 世纪匈牙利起义者所戴的“科苏特”式的帽子)。这种更带有政治自觉意识的时装在英国并没有真正流行,但在 60 年代末,这种服装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极端分

〔6〕但在较为边远的地区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那里黑色贝雷帽、布帽,甚至妇女的有带子的帽子,都还每天由人们戴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帽子仍然是区分出身地和社会阶层的可靠的传统标志。

子和他们的学生追随者们的半正式制服。〔7〕

与这两种流行时装风格都叠合的是嬉皮士们类似吉普赛人穿的带有很多垂饰的服装。与源于欧洲的“卡尔纳比街”和“街头斗士”风格不同,嬉皮风格——其明显的原始风格中体现的非西方、“反文化”、无性别的主张里依稀有些“乌托邦情调”——是美国舶来品。它的商业效用显而易见,因此很多顺应60年代中期的紧身服装潮流出现的商店很快就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商品。他们甚至有段时间尝试贩卖“毛式服装”。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领角,配以随处可见的“无产阶级”帽子,“毛式服装”将三种风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如果配以毛泽东的革命红宝书就更是如此。但是尽管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人》中有一群法国学生努力研究毛泽东并以他为榜样的情节,“毛式服装”一直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欣赏对象,甚至在“毛泽东主义者”当中也是如此。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征在1967年后风头渐劲,因为与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击队活动有关联。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欧洲也从未真正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后被西方青少年奉为烈士、犹如耶稣的传奇误导:60年代的欧洲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运动”,也并未真正越过大西洋,至多不过是冲刷了英国和荷兰的海岸,以比别处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残迹,以及一张非常独特、经久不衰的唱片。 398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是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惟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

〔7〕 之后很自然地演变成70年代的光头打扮。

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卡尔·雅斯贝斯、马丁·海德格尔、贝尼迪托·克罗齐、莫里斯·梅洛-庞蒂、让-保尔·萨特——当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已经改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如杨·帕托什卡和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现代“盎格鲁-萨克逊”学术的核心人物。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一个当代艺术新术语）学术领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在理论革命的前沿是历史学科和其他更“软”的社会科学学科。欧洲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从上一代就开始复苏：《经济史评论》和《经济、社会、文明年鉴》都创刊于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小组”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刊物《历史与现实》，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著作影响而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还有稍后的在西德的贝勒菲尔德大学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学派。

以上这些组织和机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实上，尽管一般来说质量上乘，这些研究采取的往往是常规方法论。但这些研究显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通常是采取非教条的、但明确是左倾的立场。他们的历史研究从社会理论出发，强调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目的不仅仅是叙述、甚至不只是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涵义。这类历史学著作似乎是使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学术性的思考和介入当代现实相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时候是去误读）这些研究。

尽管有这些政治意义在里面，但历史学是一门特别不适合于做高度理论思考的学科：理论越深入，历史越后退。尽管60年代有一两个领先的历史学家也在年老时成为了学术偶像，但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具有颠覆性——成为文化巨人。其他学科的情况稍好、或者说稍差，则按名人的观点而不同。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作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再现性的理论:它所描述的社会代码,或“符号”,并不与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联系,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相联系,因此它就不必受经验的检验,或被证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证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它的断言带有打破传统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产生矛盾的特点,为它赢得了广大的追随者。无论什么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种“结构”的组合来解释:就像皮埃尔·布列兹将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为“结构”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应用性结构主义: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当然还有文学上的结构主义。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销能力的人,他们有幸进入学术界的聚光灯下,继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就像电视成为大众媒体一样。如果换作早些时候,米歇尔·福柯可能会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样,成为沙龙的宠儿、巴黎讲座圈的明星。但《词与物》在1966年发行头4个月便销售2万册,福柯可谓一夜成名。

福柯本人坚决摒弃“结构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像阿尔贝·加缪一直坚称他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物。〔8〕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过去或现在貌似颠覆性的叙述的简称,传统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和范畴都已动摇,它们的种种假设也备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者”缩小、甚至于否认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和个人主动性的作用。〔9〕

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歇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至少使变化和转变显得没那么明显了。特别

〔8〕 到1960年,“存在主义”(就像几年后的“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可随意套用的流行词汇,其意义大体与之前几十年的“波西米亚风格”一词相近:那些到汉堡的利泊邦区听披头士音乐会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学生、无不自称“存在族”。

〔9〕 在此情况下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是,风头正健的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康也被大家归于此类。不过拉康当属特例。即使按60年代巴黎的宽松标准,拉康对当时的医学、生物学和神经学发展都相当无知,但这些对他的工作和名声并未造成明显可见的影响。

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60年代的活力并不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称的(此文系他年仅26岁时所写,近年来被人引用颇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如何改变世界,只有一种伟大理论是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大师的叙事既可以解释一切、又可以让人类采取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业。

欧洲在60年代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兴趣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让-保尔·萨特1960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坚定信念并不被普遍认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领域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希望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非常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政治遗产。萨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同时也是萨特曾经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对手,便是一个终身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世俗宗教(尽管对此他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在1956年和1968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活动中止”的状态存活并繁荣着: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而名声扫地;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西德和低地国家),势头渐弱,就是像意大利,在竭力使自己与莫斯科划清界限。由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体现在历史和政治主张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大多失去信誉,特别是在其仍维持统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国家将选票投向共产党的人对它也表现得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脱离了后者的道德沉船,对它们普遍给予了思想上、学术上的关注。自从其创始人去世以来,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党中间就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分离出来的各种派别,纷纷自称是“真正的”继承人。这其中有少数派别,例如英国社会党,仍然存在、仍在夸耀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声称只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10〕而19世纪

〔10〕 英国社会党在本书写作时仍然存在。始终不变,人数太少,因此其脱离现实的事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它想必会一直存在下去。

后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运动、圈子、俱乐部、社团等组织,多数都在1900—1910年间被 402
总体目标相同的社会党或工党所吸收而联合起来。现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其后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分裂。

苏联早期的派系斗争,导致产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学说。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件事)25年后,他的政党在每一个没遭明令禁止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些党通常规模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个颇具领袖魅力的集权领导人带领、决定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的策略以“打入内部”为特色:从较大的左翼团体内部(党派,工会或学术团体)内部夺权,或是将这些团体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联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论的方向。

外人很难将托洛茨基党以及与他们所属的短命的第四国际(“工人国际”)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效忠于列宁主义,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血腥的权力斗争而分道扬镳。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区别,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不断革命”,指责正统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局限在一个国家,而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流产。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显著区别就是斯大林主义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败北。

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托洛茨基后来的追随者才对它趋之若鹜。过去或许不堪回首,但他们认为,苏联革命被官僚们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热月政变”被雅各宾派所利用;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分析可以帮他们在以后夺取胜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暂地拥有过权力——他毕竟在苏联政权成立的早期起过关键作用,对后来苏联路线的偏离也负一定责任。对于那些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败者是欧洲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领袖、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们。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这个在1919年1月注定失败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国自由军团士兵暗杀的波兰犹太人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别于正统派共产主义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不久便被迫公开表示放弃这些观点;另外更有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发表的有关政治革命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就。他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46岁。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三个人的著作以各种语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多少共同点,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们都不曾执掌过权力(除了卢卡契,他曾 403
于1919年3月至8月在布达佩斯的贝拉·孔所领导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文化部

部长)；他们都曾一度反对列宁的做法(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就反对)；而且他们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正统派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

卢森堡、卢卡契、葛兰西等等被遗忘的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1]，他们伴随着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发掘而再现于世。事实上，一个全新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近年来为人们所重新关注的关键因素。“旧的”马克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新实证主义著作预见并授权实施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个马克思不应为他后期著作的应用直接负责，他无疑是与那些应用有关联的。不管是为共产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所用，它们代表的是“旧的”左派。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论文中、1840年代初期的笔记里(当时马克思刚过19岁，还只是一个倾向于黑格尔派历史观点、带着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哲学家)找到了它们。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确实，1848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使他坚决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政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关注这两个领域。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30年后。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次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看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级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

[11] 比如与葛兰西年纪相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科尔施，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

主义。〔12〕

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预见到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变成顺应当代的趣味和时尚。马克思这样一个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工业社会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适应反对后工业时代西欧“强压下的忍耐”的现代抗议。自由、繁荣的西方明显地具有的无限灵活性、其如同海绵般地化解激情和差异的能力,都激怒了对它的批判者们。他们坚称,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这种压迫如果没有在大街上表现出来,那么必定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实上它进入了人们的灵魂,而首先是他们的身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落脚在南加州。在那里,他巧妙地把旧的认识论和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将这些思潮合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这样解释: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实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即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这样对年轻马克思愈加牵强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是那些读马尔库塞著作的少数人,而且随着它的广泛流行,还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论证的大致过程。

老一辈的左派人物对强调性满足是一种极端目的的说法是相当反感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性爱一说并不是什么新思想,19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曾鼓吹过,而且在苏联成立之初,对道德方面明显地也相当宽松,但欧洲激进主义的主流传统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主流或冒险持有开放的性观念,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波西米亚人、美学家、艺术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带有个人主义、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倾向。 405

但是,不管它们是如何的令人发窘,性与政治的组合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不止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努力指出,这种强调把个人私欲放在集体斗争之上的新倾向,在客观上是反动的。〔13〕新左派对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颠覆性含义不在这里。共产党

〔12〕 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作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13〕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比利时环境因素论者哈伍尔·范内哲姆在1967年这样写道:“这个世界让人去抓住种种令人喜不自禁的享乐,我们能失去的只有无聊。”从现在来看,很难确定当时的这些口号究竟是巧智、无知、抑或仅是愤世嫉俗。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当时的现状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和其他人都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论,甚至对年轻一代的反权威美学观、他们对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权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这些,他们可能都大意地认为不过是自然秩序短暂地受到扰乱罢了。真正对他们造成严重困扰的,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外国的一些革命实践的倾向,而那些革命实践是无法由任何既定的范畴和权威来解释的。

欧洲历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张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即蓝领产业工人阶级。事实上,对共产党而言,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城市工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这是意识形态左派的明显特征,由此他们与其他愿望良好的自由主义或者天主教派的社会改革者们相分离。工人阶级的选票,特别是男性工人的选票,是英国工党、荷兰和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和中欧那些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除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的劳动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但是传统的左翼党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阶层的选票,因此与他们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逐渐消失。在西欧的发达国家,矿工、钢铁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各类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随后到来的服务业时代,他们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劳动者所代替。

对于传统的左派而言,令人焦虑的是:工会成员和党员以及会费都主要来自于这一群体。但是尽管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人数开始下降这一事实在当时的社会调查中已有广泛报道,老左派们仍在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基础”。尤其是共产党,更是毫不妥协: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党能够代表、提升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正确的结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国在50年前实行的革命。

但对所有并不接受这一欧洲史版本的人而言,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在当今越来越多人所称为的“第三”世界,有着各种另类因素:北非和中东的反对殖民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黑人激进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与之非常相像),以及从中美洲到南中国海各国的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在1956年以后,年轻的西欧激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洲东部的令人沮丧的共产主义实录移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求灵感。

这种对外国的新兴趣,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励,一部分是因为欧洲自己的幻想破灭,转而将其投射到其他国家。这种关注很少以对当地的

了解为基础,尽管当时产生了专注于“农民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的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优点而且成就非凡的,而这些在欧洲都无处可觅、令人失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抒情诗般地比较了当代欧洲的悲惨形势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后的乌托邦,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期:“在中国,人们身上没有任何在商品社会里个人所发生的异化和神经错乱迹象。中国人的世界是紧密的、健全的、绝对完整的。”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农民革命,对于当时的西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种迷人的特点:暴力性。当然,在向东飞行几个小时的苏联和其卫星国并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国家的、正统派共产主义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义的暴力是寻求解放的暴力。萨特在他给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穷苦人》一书法文版所写序言中对此作了有名的解释: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暴力是“人类为了重新创造自己……杀死一个欧洲人等于是一石两鸟: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死了,另一个得到了自由;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脚下所踩着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这种自我否定的、对外国模式的推崇在欧洲并不新鲜——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对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而且当年苏联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纪60年代,远东、或是远南地区的榜样被高举着,让欧洲来学习。米兰和柏林的激进学生受到鼓舞,要学习东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一次“穿越体制的长征”。 407

在保守的长者看来,这种对于外国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旧欧洲所拥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则已经被胡乱堆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巴比塔,全无章法。意大利学生们提出,在新的服务型经济下,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因此学生是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滥用到了极点。但至少他们还遵循着辩证法,还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以内。几年后,当一家名为《裸体的国王》的米兰学生报纸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青年们,吉米·亨德里克斯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时,辩证法就蜕变成了滑稽剧。正如批评他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轻人们根本就是闹着玩儿的。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为时不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

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 10 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 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要求结束越战，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则半心半意地支持着这一行动。

当时如此众多的争端和要求都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有关，这也说明了 60 年代的奇特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家们的社会背景。和 1848 年的革命类似，60 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但是尽管当时很多参加者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人们对时局的不满中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的。尽管战后几十年的繁荣还没有到头，西欧的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点，但西欧新一轮的劳工争端在 60 年代初已经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麻烦问题。

在这些罢工事件以及 1968—1969 年的罢工事件背后，是人们对于随着战后增长减慢后日益缩水的实际工资的不满，但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工作状况、特别是雇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奥地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不同之外，欧洲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资关系相当糟糕。在米兰、伯明翰或巴黎工业区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车间里，充满仇恨的、好斗的工人们受到强硬、专横的雇主们的严密监视，双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在西欧很多地方“工业关系”一词的意义根本就无法成立。

在服务行业和专业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从记者到工程师，技术人员们个个都咬牙切齿。传统的权威、纪律和称呼（甚至还有穿着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相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管理都是从上至下，根本不听下面的意见。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开除员工。员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见也没有人听。于是，要让工人拥有更多主动权、更多专业上的自主权、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声四起。

从 1936 年发生人民阵线占领工厂事件以来，有些事在欧洲的产业冲突中没有受到很多注意。它们之所以不太受到工会和政党的关注，是因为焦点只集中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更传统、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这些要求与学生激进分子的言论大致叠合（后者与工厂里的那些好斗分子在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学生激进分子对于过度拥挤、管理混乱的大学也是牢骚满腹。

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力之外的感觉，反映了 60 年代的另一维度，而其涵义在当时并没被充分觉察到。正因为有由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组成的两轮全民公决的选举制度，法国的政治生活才在 60 年代中期合成一个围绕两大政治阵营的选区和议会而相互组合的稳定体系，一个政治阵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另一个是由中间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协议，较小的政党和边缘组织不是被迫和四大组织

之一融合,就是被从主流政治圈中排挤出局。

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从1963年开始,意大利一个广阔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占据了国家政治的大多数空间,而将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6年起就被一个由基督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所统治,它和自由民主党一起主宰了国会。这种结构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这西欧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激进的反对派不止被边缘化,而是被彻底排除出了议会。如新左派在一段时间里所坚称的:“体制”似乎完全被“别人”掌控了。出于一种必然性,激进的学生们自称为“议会外”反对派,从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头。

409

人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短命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春的法国。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其震撼力,以及发生在巴黎街头的暴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任何持久的效应。“五月事件”开始于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农泰尔,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学一个匆忙建起的新校区。农泰尔校区的学生宿舍长期以来已成为合法学生、“地下”激进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流动家园,租金没人支付,男女宿舍间还有很多晚间的活动往来,尽管官方对此严令禁止。〔14〕

农泰尔校方一直不愿严格执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们将一个违法居住的人驱逐出校区,并威胁要处分一个合法学生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因为他侮辱了一位来访的政府部长。〔15〕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游行。到了3月22日,随着袭击巴黎市中心的美捷运公司大厦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捕,一场运动随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领袖之一。两周以后,更多的学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农泰尔校区被关闭,运动和行动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区的巴黎大学本部古老的楼群中。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触发了五月事件的都是些狭隘的、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以免在此之后数周里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言语和野心勃勃的计划会误导我们。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学生们占领了巴黎大学,并且在学校附近的街道设置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团代表、还有历史悠久的学生和讲师联合会职员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论,尽管耳

〔14〕 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端之后,一个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当时称得上是激进的做法:21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异性,而21岁以下者只要有父母书面同意也可以如此。这种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

〔15〕 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农泰尔,为一座新落成的体育设施剪彩。一个名叫科恩-本第特的当地学生狂怒地质问,为什么教育部对宿舍争端(他的说法是“性问题”)不闻不问。部长回击了这一挑衅,建议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问题,他应当跳进这个崭新的游泳池冷静一下。这位有德国血统的学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说:“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团都是像你这么说话的”。

熟,却掩盖了一种实质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清除和羞辱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对此充满蔑视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次闹
410 剧,而不是革命。它具有传统法国革命的所有象征物——武装游行,街垒,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和街口的占领,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事实上,很多人本身就属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轻蔑地称他们为“爸爸的儿子们”。当他们在街头列阵与法国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作对时,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姑妈、奶奶从舒适的资产阶级公寓楼的窗口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目光。

戴高乐主义者、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很快地采取了解决麻烦问题的措施。在最初的对抗之后,他不顾来自政党内部和政府的批评,撤走了警察,让学生事实上控制了学校和周围的街区。蓬皮杜和戴高乐总统都对名声大振的学生运动深感棘手。但是,尽管最一开始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大吃了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时机一到,就会有警察到来——特别是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都是贫穷的外省农民的儿子,让他们去砸破养尊处优的巴黎特权阶级年轻人的脑袋,他们决不会手软,可以依靠他们恢复秩序。但是让蓬皮杜担心的事远比这件事情严重。

学生的骚乱和占领学校引发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事件。到5月底,法国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议活动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对报道学生运动、特别是报道防暴警察的过度暴力行径的禁令。但是当大罢工蔓延开来,从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到电力和石化工业,甚至到了巴黎市区边缘巨型的雷诺工厂时,很明显,制造危险的就不仅仅是几千名躁动的学生了。

这些罢工、静坐、占领办公室和伴随着发生的游行示威,是现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运动,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议运动范围更广。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很难确定地说那些抗议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开始时不知所措:当工会组织者试图接手雷诺罢工时,他们被大声喝止;政府、工会和雇主们达成的协议被雷诺的工人们断然拒绝,尽管协议答应要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并给予更多的协商机会。

成千上万名罢工者与学生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抱怨的理由,他们首先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他们并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些在他们的小册子和宣言、演讲里都有明确的表述。
411 这对于当局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就降低了罢工的情绪,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目标上移开,但它也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面对的社会病症。

法国社会繁荣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认定抗议的浪潮并不是出于不满,而不过是

出于无聊。但是那些不满确实确实存在着,而且不仅仅是在那些工作条件一贯不尽如人意的像雷诺地区的工厂,实际上到处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国已经按长期习惯将法国权力集中到一处、集中在几个机构手中。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优越的、傲慢的、等级分明的、难以接近的人所掌管着,事实上也是如此。甚至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种情况令人窒息。

年迈的戴高乐本人自1958年后第一次没能理解事件的发展态势。他最初的反应是发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电视演说,然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16〕当他在第二年全民公决时,试图利用他所认为的反对集权的民族情绪、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权力的措施时,遭到了绝对的、大失脸面的挫败。他就此辞职退出政坛,回到了乡下的家,几个月后在那儿去世。

与此同时,蓬皮杜等待学生示威运动过去的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学生静坐和不断升温的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本该有更好判断的学生领袖和少数资深政治领袖(包括前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和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当局毫无用处,因此权力应由其他人来掌握。这种言辞是危险而愚蠢的。正如当时雷蒙·阿隆所说,“驱逐一个民选总统与驱逐一个国王是两回事。”戴高乐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国家正受到共产主义政变的威胁。〔17〕在5月底,戴高乐突然宣布实行选举,号召法国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开始选举活动,右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比两周前的学生示威规模远为浩大。5月30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香榭丽舍大道,驳斥左翼声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说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了大学的大楼、工厂和办公室。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当权的戴高乐政党大获全胜,选票比之前增加了五分之一强,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学生们开始休假。

412

法国的五月事件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这显然是一次实时在全球电视观众眼前展开的一次革命,其领袖们是一群风度迷人、口齿伶俐的翩翩少年,带领着法国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18〕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学术环境、结束道德监察、或者仅仅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

〔16〕 他去访问了驻扎在德国的法军部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希望确认这支部队的忠诚程度,在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但这些情况在当时无人知晓。

〔17〕 这明显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对学生激进分子冷嘲热讽,以及试图对工人运动保持影响力之外,并没有一贯的战略。要夺取政权显然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

〔18〕 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女性。在当时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们醒目地骑在她们的男朋友的肩头,但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学生大军中的“步兵辅助部队”。1968年的青年动乱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对性别歧视却并不关心。

的。而且他们尽管拳头紧握、满口革命言辞,但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性。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尽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给学生们的行动增添了一重光环:他们意外地触动了社会怨恨的爆发,但后人认为是他们预见、甚至表达了这种爆发。

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的和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动荡相比,法国五月事件和平得出奇。当时发生了大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过后,有一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住院,但双方都相当克制。没有一个学生于1968年5月遇害;共和国的政治代表也没有遭到袭击,它的体制也从未受到任何认真的责难,只有革命的发源之地——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遭受到持久的内部破坏,信誉大受影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革。

1968年的激进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风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画般夸张的地步——毕竟他们是在同一座舞台上表演。但他们放弃重复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国1968年的“心理剧”(雷蒙·阿隆语)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神话,几乎立即成为怀旧的对象,一种时髦的斗争,它让生命、能量、自由等种种力量与同时代人的麻木、无聊作斗争。一些在五月事件中突出的、受到大众推崇的人物从此走上了常规的政治生涯:阿兰·克礼文,当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学生领袖,在40年后的今天年纪已经60有余,是法国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五月事件中遭驱逐出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则成了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委员,后来更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绿党代表。

但正由于1968年5月社会情绪的基调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过去之后,法国有关五月事件的畅销书都不是什么分析历史的严肃作品,更不是庄重的时代宣言,而不过是当代涂鸦和口号的汇集。脱胎于墙头涂鸦、布告栏和城市街道,这些充满巧智慧的“一句话文学”鼓励年轻人去做爱、寻找乐趣、嘲弄权威,总的说来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顺便改变世界。就像口号里说的:Sou le pavé, le plage(铺路石底下是沙滩)。1968年5月的口号发明者们从来没有请读者们去干任何严重伤害别人的事,甚至对戴高乐的攻击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老朽、障碍,而不是一个政敌。他们表达了一种烦躁和失望,但也明显地有一点愤怒。这场革命没有牺牲者,因此也就最终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意大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在学生运动的言辞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点。首先,意大利的冲突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迁移在米兰、都灵和其他的北方工业城镇产生了交通、服务、教育、特别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问题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比其他地方来得都晚,跳出农业社会的过渡要远为突然。

因此,第一代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加上对现代性的不满情绪,两者重叠,产生了冲

突。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妇女——从未被吸纳到工业化的北方那些历史悠久、由男性熟练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历时已久的劳资紧张关系之上,现在又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多重争端。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和倍耐力橡胶公司里的熟练工人有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们在工作时间、工资差别、纪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决策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那些非熟练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标,但反对另一些目标。他们主要反对的一点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计件工作指标、超强度的大规模机械化流水线,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意大利的战后经济变化是由几百个小型工程、纺织和化工公司,而在这些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对老板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体制上的反对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国家仍然相当粗糙,一直要到下一个10年才逐渐成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60年代的社会动乱),很多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场所的权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建立综合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政党和左派工会能解决的。相反,他们当时主要的担心是老的劳工组织被这种新的、不受约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释。当女性半熟练工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寻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强度时,工会作出的反应是劝说她们去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社会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组织,而是几个非正式的“议会外”左派组织。他们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自治的学术界理论家,以及学生组织的发言人——很快认识到工厂里新的不满情绪的源泉,迅速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再者,大学本身的情况也完全相仿。那里同样存在着一股新增的、未经组织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学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也有一帮长期以来拥有掌握决策权的旧式精英人物压在学生头上,在学生的工作量、考试、成绩和惩罚措施等方面恣意妄为。 414

从这一角度看,大中学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和工厂车间一样,都是现实中的既得“客观”利益的受益者。意大利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样的推理——作为知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他们自视代表着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对权力和权威更大的威胁。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个组织的社会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制度和权威结构的能力。讲堂和机械车间一样是开始活动的好地方。

在那些年里,意大利激进的政治形态变化多端,米兰的一所中学里流传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称,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直至最终消灭分数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学校对学生的选拔制度;每个人都有权力受教育,并保证能得到奖学金;有集会自由;应该有晨间集会;老师应对学生负责;驱逐所有反动、专制的教师;自下而上

地决定课程安排”。〔19〕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一轮抗议活动和破坏行动在1968年的都灵展开,当时学生反对将学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区,这恰巧与当时正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遥相呼应。与之同时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罗马大学学生暴动,抗议议会有关大学改革的议案,后罗马大学被关闭。但与法国学生运动不同,意大利学生运动组织者对于学术制度改革兴趣并不强,他们更把自己看作与工人运动一体,就如他们组织的名称(例如“工人先锋队”、“工人权力”)所表明的。

415 劳工争端最早开始于倍耐力公司在米兰的几家工厂,从1968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11月(政府强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为止。对于学生抗议者来说,这是来自于业界的类似行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1969年的罢工运动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年轻的意大利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前一年在法国的短短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那一年“火热的秋天”,小规模工人组织进行了多次自发罢工和占领行为,要求有权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促使意大利一代学生理论家及其追随者认定,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正确的策略。工人自治作为策略和目标,是通向未来之路。学校和工厂的改革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协就意味着失败。

为什么“非官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有如此转变仍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通常采取传统的低调、随和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被指责在他们的“系统”内做手脚,寻求稳定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评家指责为“客观上的反革命”。而意大利政治制度本身既腐败,而且似乎使变革难以渗透: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党则处境很糟。但是尽管这一情况也许可以解释议会外左派的不满,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人何转而动用暴力。

“毛泽东主义”——或者说无论如何,那种对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恋——在意大利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普遍。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各种政党、团体和杂志——从它们坚持使用“马列主义”这一形容词(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受鄙视的官方共产党)即可以分辨出来——在这些年里相继出现。它们受到中国“红卫兵”的启发,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罗马和波洛尼亚的学生理论家们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条主义者的论调,把学科划分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希腊语和拉丁语)、“纯粹意识形态”(例如历史学)和“间接意识形态”(物理、化学、数学)。

〔19〕 引自罗伯特·朗姆利《紧急状态:1968—1978年意大利的反叛文化》(1990年伦敦出版),第96页。

这种靠推断来产生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工人主义教条的结合,表现在《不断斗争》杂志和它的派别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刊名就是对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断斗争》创刊于1969年秋,当时早已有充分迹象表明它的行动即将转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灵学生示威中有这样的口号:“反对工厂里的社会和平!”“暴力统治的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学、工厂的示威游行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暴力既是语言上的(“国家不要改,要砸!”),也是事实上的。当时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贴切至极。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赫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贸易市场和铁路中央车站埋下了炸弹。8个月以后,在倍耐力公司的冲突得到解决、罢工结束之后,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被炸飞。70年代初的那几年“紧张策略”开始了。

人们可以指责6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分子遗忘了国家的晚近历史。但是在西德,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来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一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西德知识分子都非常热衷于这种观点。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艾森伯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尔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赖兹等,都出生于1927年至1932年间,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纳粹主义及人们对它的回避态度上。但是一群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几年出生的一代,对此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验,他们透过失败的棱镜看德国的过错,认为这与其说是纳粹主义的过错,不如说

是波恩共和国的过错。因此,对鲁迪·杜契克(生于1940年)、皮特·施奈德(1940年生)、古德龙·恩斯林(1940年生)或是更年轻一些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1943年生)和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1945年生)而言,西德战后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才是个问题。不带政治色彩、消费主义的、在美国保护壳下的联邦共和国不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与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气,试图否认德国的历史,将历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传中。甚至连它的宪法内容都不够真实,正如法斯宾德所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给西部占领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

德国60年代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指责波恩共和国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的德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关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知识(对魏玛时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空白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真空中:即使在家里——事实上,也正是在家里——没人会去提“它”。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西德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了自大和虚伪。首先可以证明的例子是《明镜周刊》事件。在1962年,这一德国主要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西德国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纳手下的巴伐利亚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些不当行为。在阿登纳的授意和施特劳斯的命令下,政府袭击了报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办公室。这种滥用警力以压制不利报道的无耻行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称“这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耻辱,因为有了出版自由,没有了不可分离的出版自由,民主就无法存活。”

4年以后,在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择了前纳粹分子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来继任路德维格·艾哈德的总理职位。这位新总理是交纳过12年党费的纳粹党人,因此他被选为总理的事实,被很多人认为无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国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态度的表现。如果政府首脑对自己曾经支持希特勒长达12年之久的事实不感到

羞耻,那么当新纳粹主义组织再次在边缘政治中抬头时,谁还能把西德的忏悔和对于自由价值的承诺当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纳粹主义抬头时给基辛格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

418

从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担任政府首脑为时三年。在那几年里,德国的议会外左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向大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令社会党学生会振臂而起的一些问题,如今在西欧大陆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遥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学。但是那些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西德所特有的。最活跃的校园莫过于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于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产党占领区的历史悠久的洪堡大学),很多学生都去了那里,以躲避征兵。〔20〕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学生抗议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表现了对联邦共和国的谴责,同时也表现了对其前身——纳粹的谴责。随着反越战情绪的升温,这种将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谴责的对象扩展到西德的军事教父——美国。在少数激进分子口中,美国一直被称为“法西斯”,现在则成了更多人的敌人。确实,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罪行几乎代替了对德国自身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剧作《越南话语》中,明确地将美国与纳粹相提并论。

如果美国比希特勒政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US = SS(美国 = 党卫军),那么把德国等同于越南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两个国家都被外国占领者分割,都孤立无援地陷于其他民族之间造成的冲突。这样的提法使西德激进分子同样地蔑视波恩共和国目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及其以往与法西斯的勾结。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进分子得以重提当年的说法:德国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种论调一向与极右势力的观点一致。〔21〕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奥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同屠杀犹太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确实,他们同父母一样,一提到“犹太人问题”就感到心理极不舒服。他们宁可把这个问题放在“法西斯理论”课上去讨论,把纳粹的种族主义倾向模糊化,转而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进一步讨

419

〔20〕 西柏林在那些年也带上了些许反文化的调子。它奇特地独处在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而无法动弹,依靠波恩和华盛顿的命令行事,它的未来不可预料,城市处在一个在时间、空间之中僵滞的状态,这使它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激进分子和其他寻求政治、文化的边缘状态的一些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当时情势的反讽意味在于,西柏林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前哨,完全是拜美国士兵的存在所赐。但它的年轻居民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21〕 这种颠倒的说法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得到响应。当时德国的反战派坚决声称美国是20世纪的第一号战犯,而德国则是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论华盛顿和波恩。真正的“国家的镇压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国主义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对美国越战的人士。在这样的奇怪逻辑下,流行畅销的《图片报》(其前身是《先锋报》)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学生描绘成新“犹太人”,而纳粹集中营则成了对帝国主义罪恶的贴切比喻。在1966年,达豪的墙头被激进分子们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威辛。”

德国的议会外的左派因此与它的根基——反纳粹的主流——失去了联系。因为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与基辛格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前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边缘。他们的组织比欧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运动更明确地反对西方,特意选择了第三世界的名字,当然会包括“毛主义者”,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罗人”一类的名字。这种对反西方的强调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异国特点的、相当怪异的反文化,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60年代的文化混乱中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的德国变种,它把性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激进分子组织(也包括奥地利,至少是维也纳)追随马尔库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赖希等等20世纪德国研究性和政治压迫关系的理论家,为裸体、自由性爱和反权威主义的生育大唱赞歌。他们随意地将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传,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团体中还出现了一种怪异而且恐怖的类比,将希特勒造成的犹太人受害者与60年代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父母在性压抑的政府压迫下的牺牲品。

“一号公社”是一个毛主义小团体,它积极推动以性乱作为解放的途径。他们在1966年流传这样一张自画像式的照片:7个裸体男女手脚张开贴在墙上,注解是“光墙上的光身毛主义者”。照片后来于1967年6月在《镜报》上刊登。突出裸体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集中营里无助的裸体囚徒。看,照片说: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现在有叛逆的毛主义赤身露体的革命者。如果德国人能够正视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真理,那他们也就能够正视其他的真理了。

这一“启示”——认为年轻人的乱性将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对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样态度——使社会党学生会领袖鲁迪·杜契克(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传统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来,将“公社分子”斥之为“神经病”。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本着好斗的、无政府的自恋,为了逗弄和震动资产阶级,而随意地将大屠杀和性暴露癖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没有结果。“一号公社”的一名成员曾骄傲地声称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义,后来他于70年代在中东的游击队训练营里再次露面。从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内佐格的学生。杜契克宣称奥内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谋杀”，号召民众群起讨伐。几天之内，西德各地共有10万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几天后，一向批评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评家哈贝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会党学生会说，“法西斯左派”与右派一样致命。那些动辄提到“潜在的暴动”与和平的波恩政权的“抑制着的宽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来挑动政府进行镇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第二年的3月，随着激进的学生领袖们反复号召对抗波恩“政权”，而政府又威胁要对西柏林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挑衅行为进行报复，哈贝马斯（还有格拉斯、瓦尔泽、艾森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随后加入）再次劝说学生和政府双方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呼吁采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为他所鼓吹的暴力冲突付出了代价，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纳粹分子枪击身亡。接着便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愤怒日子，仅柏林一地就死了两人，伤了四百多人。基辛格政府通过了紧急法令（以384票对100票通过，其中得到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授权波恩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令实行统治，因此引发普遍恐惧心理，认为波恩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像35年前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德国学生政治中日渐趋于暴力的边缘组织，像社会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别“K小组”和“自治会”，很明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通常都是“马列主义派”（即毛主义一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东德或莫斯科的财力支援，尽管这一点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德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左派与正统派共产主义保持着区别，后者在西德反正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是像西德的许多左派（其实不仅仅是左派）一样，激进分子们与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当时的东德，或是他们的德国祖先被赶往的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像东普鲁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们父辈对于失去的在德国往昔的种种的怀念，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留下了影子，向往着东面一个更好的德国。东德，尽管（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东德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再者，将西德同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绑在一起、并将反共产主义当作其政治内容的核心，这本身也成为新左派的打击目标，特别是在越战的年月里更是如此，这就说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态度。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

不到哪里去。

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西德 60 年代的脸,就像整个西欧一样,坚决地转向自己内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视线投向外国,那也是因为外国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种令人愤怒的限制。60 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 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作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制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

第 13 章

尘埃落定

革命是指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统治的行为。它常伴随着政治权力危机和高压统治手段的衰弱。这也是革命并不一定非要动用武力的原因所在。
——雅契克·库伦、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给党的一封公开信》，1965年3月 422

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要想保持党性，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

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
——兹丹纳克·姆利纳尔

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
——保罗·麦卡尼

60年代，苏联集团内部的经验必然和西方所经历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后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变革的呼声，和西方在苏伊士危机后要求非殖民化的呼声一样，越来越大。然而，对匈牙利动乱的摧毁，表明这种改革只有从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进展。这反过来也提醒了人们，共产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莫斯科当局，一切都得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心情和政策来做定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决定着欧洲东半

球的历史命运。

赫鲁晓夫那一代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国际阶级斗争还存在。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把对过去苏联革命历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动荡上,令他采取了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了1962年古巴危机,并且害得自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苏联和中国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出现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评家们看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毛泽东主义”,这不仅仅是争夺地缘政治的先机;本质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思想之争。在这表面现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后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反而令苏联处于一种矛盾地位。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发源地,他们不断地在苏联内部及其卫星国煽动性地宣扬他们的理想抱负,坚称绝不能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又不断地讨好西方势力以求得共存,还不断地讨好本国公民。

在赫鲁晓夫统治的年代,苏联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59年开始,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再是苏联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版本。^[1] 实行恐怖统治的年代结束了,但是产生恐怖的机构和做法还存在:古拉格劳改局还在,几万名政治犯还在劳改营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乌克兰人。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废除了斯大林颁布的禁止劳工流动法,缩短了法定工作时间,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推出了生育产假,并在全国推行了养老金计划(1965年后这一计划扩大到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总之,苏联以及那些比它更先进的卫星国,至少在形式上变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国家。

然而,赫鲁晓夫许诺生产更多剩余粮食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也是他的同伴们在1964年10月抛弃他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垦“荒”作业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冲走50万吨的表层土壤,而那些原来丰收的农田现在却又因为种植牧草而遭到彻底破坏。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地的腐败双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粮食上交份额,竟然逼迫集体农庄的农民买断了当地商店的所有粮食供应。有些外省城市爆发了粮食骚乱(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尔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于1963年农业歉收,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

而同时,那些受赫鲁晓夫鼓励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农场取得的成功却使人尴尬:在60年代初,这些私人耕种的农场以占地3%的比例,生产出了苏联1/3的粮食总产量。到了1965年,苏联人的粮食消费中三分之二的土豆和四分之三的鸡蛋都来自这些私

[1] 虽然后来又出现一种新版本,但对斯大林问题仍然遮遮掩掩。

营农场。和波兰、匈牙利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生存依靠的却是内部这些非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此它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

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只是兴之所至地想弥补不健全的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一半是出于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经济决策的做法,或者允许那些实际上存在的私有化生产的合法化,但是他们冒犯了那些拥护旧制度的强硬路线者。其实,赫鲁晓夫及其后任勃列日涅夫实施的自由化并没有对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权力网和官员任命权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的确,正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的经济改善总是得服从于政治优先原则,才使得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424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种状况。列宁往往更担心的是人们针对他个人的批评而不是针对他的原则;他的后继者也一样。知识界的反对意见,无论是否会在党内外引起更大的回应,这对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之后,在苏联及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人们广泛的乐观态度,认为以后苏联会放松审查制度,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网开一面,接受那些谨慎的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就在同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将小说手稿《日瓦戈医生》投往文学期刊《新世界》,却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开始担忧文化领域产生的放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三年里,赫鲁晓夫多次发表咄咄逼人的公开讲话,捍卫艺术领域里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威胁那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人,如果他们继续地、哪怕只是以回顾形式来诋毁它,也会遭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在1959年,苏联当局压制东正教牧师和浸礼会教徒,而自从斯大林去世后,当局曾经允许给予这种形式的文化差异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们的话,赫鲁晓夫本身就是个令人难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中国和苏联的分裂程度(11月,苏联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阿尔巴尼亚是北京在欧洲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苏联开始以新面孔出现在那些国外追随者面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犹豫。196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省乡村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准许出版了他那部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并且以暗示手法批评顺从态度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投稿。

〔2〕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体制的可靠性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农业生产的成就。在它存在的80年里,农业一直以不同方式处于性命攸关的基础地位。这对那些18世纪的欧洲观察家甚或20世纪的非洲观察者来说,也许并不稀奇,但苏联却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视。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晚期虽然态度相对地比较宽容,但并没有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即使到了最“解冻”的时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后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60年代初期还算是一个文学自由、可以谨慎地从事文化实验的时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后,一切都变了。这些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策划者们迁怒于他政策上的失败和专制独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复无常令他们坐立不安。第一书记本人也许十分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旁人却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宽容所误导。这样就可能会出错。

425 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层控制政局几个月后,就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年9月,两位年轻作家安德雷·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遭到了逮捕。他们两人分别以艾勃拉姆·德尔兹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将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许多小说。德尔兹——即西尼亚夫斯基——还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批评苏联当代文学的短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6年2月举行了对这两人的审判。由于苏联尚无律法明文规定禁止在国外出版作品,当局只得宣称作品内容本身即是他们反苏活动的罪证。这两人被判有罪并被送往劳改营:西尼亚夫斯基被判7年监禁(虽然6年后就获释了),达尼尔被判了5年。

虽然媒体上关于诬蔑这两人的竞相报道引起了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但是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审判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只有几位被允许进入审讯室的人把审讯过程记录了下来,并且整理成文,一年后,这些审讯记录以俄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人。〔3〕这次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有人仅仅因为其所(虚构的)作品内容而被逮捕入狱。即使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物证,过去的知识分子们也往往是因其行为而非言辞而受到指控。

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相对宽松的政策相比,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处置在苏联本国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议,由此引发了几十年来对苏联政府表示不满的各种运动:在这两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现了许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地下出版物,涌现出了许多70年代和80年代反苏联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初就是以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案件抗议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时年仅25岁的学生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就因为在普希金广场组织示威游行,捍卫公民权并要求言论自由,而于1967年遭到了逮捕。早在1963年,他就曾被克格勃逮捕过,罪名是私藏反苏的文学作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如今,他因“反苏活动”罪被判刑3年,送进了劳改营。

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很明显地显示出了苏联的情势:有些事

〔3〕西尼亚夫斯基获释一年后就移居法国,并在巴黎大学谋得一个教授俄罗斯文学的职位;达尼尔一直呆在俄罗斯,直到1988年去世。

情已发生了变化,哪些还没有。若非按历史自身的标准来看,苏联的政权是不可动摇的、压制性的和僵化的。1956年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已经消失了。那些可以针对历史讲实话、可以在未来进行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已消逝了。对赫鲁晓夫年代抱有的幻想也已破灭。不管苏联政权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它在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发展停滞、道德腐败,星光暗淡,前途未明。

然而,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卫星国中,改革的前景却显得比较明朗。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一种悖论。毕竟,如果连苏联公民在面对后斯大林时代的专政时也都束手无策的话,那么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居民就显得更加无助了:他们不仅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本国的领导层也完全服从于苏联帝国首都的权威。1956年11月的布达佩斯事件已经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做了最恰当的诠释。此外,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遭受公审的那些受害者们,时隔十多年后,却还在狱中受罪。 426

但是,东欧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到了1960年代,对绝大部分的苏联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成了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统治方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影响下,共产主义甚至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对苏联西面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对苏联占领和武力接管的事还记忆犹新。那些卫星国的共产党人纯粹成了莫斯科的傀儡,在当地缺少威信,这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对当地民众的感情和利益需求尤为敏感。

尤其在1956年到1968年之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内部,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决非出于反共产党,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针对萨特在1956年提出的匈牙利革命具有“右翼精神”这一论断,匈牙利流亡学者弗朗索瓦·费吉托回复说,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站在右翼一边。他们是“凡尔赛分子”。“我们仍然是左翼分子,忠实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传统。”费伊托坚称,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分子的这种诚意代表了后来12年里东欧知识分子的反对意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谴责共产主义,更不在于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切会错得如此离谱,而且还应当在共产主义本身范围内提出另一种选择。

这就是“修正主义”: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波兰领导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首先根据当时情景提出了这一说法,用来形容那些知识分子中持批评意见的人。在1956年前,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许多场合下都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最有名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勒塞克·科拉科夫斯基。他们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过去的忠诚,而是在接下来的12年间,按斯洛伐克作家米兰·西迈斯卡的说法是:“一直企图在蓝图中挑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著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线。

对东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拙劣模仿,而

苏联是对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一种永久性挑战。但和西欧新左派不同的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还继续和共产党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共产党内部活动。当然,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出于需要;但更主要的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从更长远来看,这种联系将会孤立这些年来的共产党改革,甚至败坏改革的名声,尤其是在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越来越倾向于向西欧同龄人看齐的年轻一代眼里,他们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在而非斯大林式的过去。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东欧这段修正主义时期,为作家、电影制片人、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打开了一小扇得以看见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机会之窗。

在波兰,天主教会提供了最重要的批评空间,为那些批评者们提供了庇护,尤其著名的是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一些杂志。这在哥穆尔卡统治的年代,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为了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而找到了共同基础,这成了两者后来在70年代结盟的雏形。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只有在共产党内部论坛上才能安全发表这些批评性言论。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这一领域成了发表最“有益”的批评的合适地带。

其原因之一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据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过世后,获得解放了的经济政策就成了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舞台。另一原因是当时东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十分器重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看成是实行认真改革的重要理论起点。但到了60年代初,主要的解释却很简单:欧洲各个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严重失修的迹象。

东欧共产党国家经济的失败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在苏联,甚至连这一点都往往做不到)。他们不断地、重复地、大规模地生产最基本的工业产品,而并不生产那些需求量在不断增长的商品——主要消费品不是供应量不足,就是质量太差。此外,由于执行的分销制度和销售渠道的原因,这些商品的供应渠道并不通畅,经常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短缺,例如销售环节上的瓶颈问题、瞒报赢利、腐败,还有大量的浪费——尤其是在食品和其他一些易耗品方面。

在战后10年里,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共产主义效率低下问题部分地被掩盖着。但到了60年代初期,随着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将“战胜”西方,并正式宣布现在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后,这种靠激励来修复战争创伤或增加生产的做法,却再也无法弥补共产党的说法与日常生活拮据之间的鸿沟了。而对那些阴谋破坏者——例如富农、资本家、犹太人、间谍或对西方“感兴趣者”——的指控,是因为他们蓄意破坏共产主义前进道路,这类事件在某些地方还时有耳闻,他们迎来的却是恐怖的时代:这是一个继赫鲁晓夫之后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急于把它抛在身后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必定出在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本身。

在匈牙利,自称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他们不采用“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因为它带有贬义)根基很深。1961年,雅努什·卡达尔宣布说,共产党国家认为,今后一切不积极反对的人都将被看作是赞成者,所以在卡达尔执政期间,人们才敢第一次感到对共产党的经济实践发表批评是安全的。〔4〕改革派经济学家们认为,40年代和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是一种错误。他们还非常谨慎地意识到,苏联过分强调大规模开采和生产初级工业产品的做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他们虽然话不多,却认为东欧照搬苏联强制工业化、废除私有财产的做法已构成了一场灾难。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开始寻求途径,使共产主义经济能融合价格指数和其他刺激市场的因素,一起形成一套促进财产和生产集体化的机制。

6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有关经济改革的争论,不得不注意走好每一步。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承认过去发生的技术性错误方面表现得非常实际(或焦虑),甚至连新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也在灾难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到半途,即1961年就放弃了强调重工业的做法。然而,要去承认中央计划制或财产集体化的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例如奥塔·西克或匈牙利的雅诺斯·科尔内,都在寻求给“第三条道路”作出定义:通过一种无可争辩的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来让不断增加的地方自主权同重视某些价格指数、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的相融合。毕竟这些经济学论点是无可辩驳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将陷于停滞和贫困状态——正如科尔纳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会“再度产生短缺”。

在匈牙利,卡达尔确实对那些批评家们说的话做出了回应,采取了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在1968年正式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赋予集体农庄相当大的自主权,不仅允许、还积极鼓励并支持私有土地,打破了一些垄断行业;一些商品根据国际市场来定价,并允许其价格根据多种汇率变化而上下浮动。批准建立私人零售店。进行这项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倒并不是为了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经济制度之间建立一种可行的中间路线,而是为了在政策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毫不减弱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促进市场活动(藉此希望在引导消费者满意的情况下促进繁荣)。

回想起来,很明显当时这些改革家们是在自欺欺人地认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会真实地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但这也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经济分析存在着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天真地误解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制度。对共产党领导层来说,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些经济改革家的理论将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

〔4〕 虽然6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是捷克人奥塔·希克,但是影响最广、最具有实际冲击力的还是匈牙利学派。

话,那么共产党国家的中央集权将会受到削弱。但面对那样的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往往会趋于选择经济的非正常化运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政权首先都对稳定更感兴趣。因而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卡达尔主义”,它并不适宜于其他国家照搬,因为这是匈牙利领导人自己想出来应付克里姆林宫的策略,为的是让苏联当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匈牙利的“模式”,这只是为了解决当地困难而采取的有限而且实际的解决办法而已。确实,匈牙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卡达尔老是玩世不恭地在渴望着的匈牙利同胞们面前答应他们去繁华的西方世界旅游,作为对他们行为良好的一种奖赏,这真是对共产党统治失败的默认。现在,整个匈牙利都由一个“新阶级”在统治,在为这个“新阶级”服务,正如南斯拉夫反对派人士米洛万·德吉拉斯在1957年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中所称呼的那样:这些由官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们,首先关心的最实际问题就是中饱私囊,并确保自己的生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也决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压迫状态。

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这座“防御营地中最好的兵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妒忌,但只引起了短暂的仿效跟风。第二种模式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明显地更为独特。这倒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设法避开了它的邻国们所碰到的问题。苏联的卫星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许多障碍,对南斯拉夫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而它那悬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历史偶然性造成的结果,而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铁托在决策上采取了一些非中央集权制的做法,而且允许工厂和工人们从事“自治”实验。

这些革新既是因为天生的种族和地缘上的分野,也是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在这样一个联邦国家里,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除了对过去的幸有着共同的对抗性记忆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统一发号施令更会显得让人回到了战前的状况。该国艰难的地势也更需要各地方的创造性;并且多亏了与斯大林之间的决裂,430 铁托可以根据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行事,而不用再被迫按苏联本国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重复其每一个错误。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像这些年来西方仰慕者们所相信的是铁托那富有创新意义的另一种社会主义蓝图——构建了南斯拉夫的模式。

但南斯拉夫还是与众不同:它对批评者们毫不留情,例如德吉拉斯等人就是因为不赞成铁托的正统观点而付出了代价。〔5〕但它却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在总体上处理得非常灵活(这还得感谢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散文作家杜勃拉芙卡·乌格雷西茨(Dubravka

〔5〕《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德吉拉斯被关入狱长达4年之久,获释后不久又被关押了4年。

Ugresic)在描写逝去的青春年代南斯拉夫时,不无怀旧地写道,映入她脑海中的是一些“真正的‘去皱霜’、塑料计算器、第一条尼龙内裤……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这些廉价消费品的清单,也许根本不大可能会出现在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例如,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南斯拉夫人并不富有,也不自由,但他们也并没有被禁闭在封闭的制度中。“铁托主义”压迫人,但却并不压抑人。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

第三条走向稳定的道路是“民族斯大林主义”。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择,这个封闭、贫穷的国家完全受当地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专制独裁、偏执多疑而又大权独揽。但这也是愈演愈烈的罗马尼亚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讨厌罗马尼亚(这种情绪在他那一代俄罗斯人中非常普遍),只让它在国际共产党的劳动分工中担任独特的农业角色。然而,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沦落到只能为更繁荣、更先进的共产党国家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地步。

在匈牙利事件中,罗马尼亚扮演了监狱的角色;在1958年,它又保障了苏联军队安全撤离罗马尼亚地区,后来又逐步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起)的领导下,罗马尼亚逐渐退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甚至拒绝《华沙条约》国在当地的军事演习。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动向铁托示好(铁托和《华沙条约》之间纯属官方之间而非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1963年,德治甚至向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大献殷勤,他们利用西欧供给的金钱和机器来保障罗马尼亚的新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建设。罗马尼亚一直在不断加强同西方打交道;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却在下跌;罗马尼亚的外贸总额从1960年代初期的70%降到了10年后的40%。

这种鼓吹“罗马尼亚第一”的战略在国内广受欢迎。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其执政中明显的非罗马尼亚根源的缺陷,因而裹以民族主义面目示人。从德治开始,齐奥塞斯库更是进一步采取了这样的手段。但是,这一策略在国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它只能引起那些怀旧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完全沉迷于毛泽东思想者的注意。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国际上却令人惊奇地树立了积极的形象。仅仅通过疏远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人就赢得了西方崇拜者的仰慕,真是不可思议。1966年8月号的《经济学家》称齐奥塞斯库为“东欧的戴高乐”。

而戴高乐本人在1968年5月出访布加勒斯特后注意到,虽然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但却很适应罗马尼亚的情况:“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政权很有用,它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把事情办成功。”毫无疑问,戴高乐说对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尤其厉害:自从1958年它疏远苏联后,德治和齐奥塞斯库更加自由行事,再也不必去附和赫鲁晓夫时代的非斯大林化和改革政策。和其他

卫星国不同的是,罗马尼亚决不容忍内部的反对意见。60年代布加勒斯特那些受自己的社会排挤的知识分子们,无权参与国内事务的争论(也没有什么争论),只好满足于阅读那些来自巴黎的最新出版的新小说派作品,并通过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法国文化中而间接获得乐趣,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尼亚人老是标榜自己和法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

西方各国政府并没有抨击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反而给予他们各种鼓励。在罗马尼亚投了否决苏联的票、并与之决裂后,它于1967年1月正式承认了西德,它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热络了:1969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出访布加勒斯特,成了第一位到访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民族共产主义得到了回报——“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但他是我们的共产党人。”罗马尼亚成了华沙条约成员国中首个加入关贸总协定(1971年)、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1972年)的国家,接受了欧共体的贸易优惠政策(1973年),并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6〕

西方外交官们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罗马尼亚反对苏联独裁统治当作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铁托:稳定、顺从、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权力,而不是国际争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就像卡达尔和民主德国的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成功地绕过了60年代的暗礁。他们至少在和莫斯科保持妥协时,用自己的方式保障了自己在本国内的权威,而华沙和布拉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432 1956年,波兰为达到和平处理动乱的目的而付出了代价。基督教机构和基督教作家们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获准存在,但是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却受到了严格限制。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根深蒂固地坚持保守主义态度,尽管他们成功地逃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暴力大清洗。由于一直担心1956年的动乱会再次出现,党的领导人把任何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都看作是对党的政治垄断的直接威胁。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愤怒,他们不仅对党的统治深感不满,还对失去转向革新的机会、对未完成的波兰十月革命感到十分沮丧。

1964年夏,华沙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雅契克·库伦和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学术性批评论文。他们的论文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无可指摘,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还是未能幸免被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开除,并在官

〔6〕 理查德·尼克松可绝不是最后一个受罗马尼亚独裁者吸引的美国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1978年出访罗马尼亚时,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印象很深,称赞他是“世界上主张用武力执政的主要倡议者之一”。直到1983年9月,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事实早已广为人知时,副总统乔治·布什的话让人不会忘记,他称齐奥塞斯库为“欧洲的好共产党人之一。”

方圈子内被指责为是在宣扬反党言论。对此,他们做出了回应,于1965年3月向华沙大学党支部递交了一封《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现在的官僚、专制政府只关注那些统治精英们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对其他大众的利益不闻不顾,在对贫穷的工人大众的服务和统治上却完全无能,但是审查一切评论和批评。库伦和莫泽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波兰的唯一希望在于一场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要实现新闻自由,并取缔政治警察。

递交《公开信》后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指控犯了鼓动推翻国家的罪行。1965年7月19日,他们分别被判入狱3年和3年半。当局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里所使用的毫无瑕疵的马克思主义言词、它所引用来指出政府经济表现无能的有效社会数据,以及它所号召的要工人阶级用革命来取代现行官僚专政的提法,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新托洛茨基派的支援行动也根本无助于解救这两位作者。〔7〕)也许最重要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库伦-莫泽列夫斯基信中呼吁的那种将知识分子的调查分析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相联合的可能性。

库伦-莫泽列夫斯基案件在大学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场对两个学生的秘密审判使不少人感到震惊,许多人不仅要求释放这两名学生,还要求公布他们的《公开信》和先前的研究论文。年长的学者们也参与了进来。华沙大学哲学教授勒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在第二年亦即1956年10月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体会议十周年的庆典上,对历史研究所的学生们作了演讲。他说,波兰的十月错失了良机。10年后的波兰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低效无能和审查制度的国家。党已经脱离了民族,对库伦、莫泽列夫斯基的压迫证明了这一点,而他们所提出的批评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党和国家都在衰退。

433

虽然华沙大学的同事们都勇敢地站出来,坚称科拉科夫斯基是一位国际认可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必然被开除出党。22位知名的波兰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给中央委员会,为“科拉科夫斯基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到了1967年春,愚笨的波兰领导者被来自左翼的批评激怒,由此造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华沙大学成了学生动乱的中心,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保护受迫害的教授们。

华沙大学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在1968年1月又发生了新的转折。自1967年11月末以来,华沙大学剧院一直在上演一出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写的剧本《先人

〔7〕 第二年在巴黎公开发表的法文版《公开信》是由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青年共产主义革命”发行的。

祭》。该剧虽然创作于1832年,但它所描绘的19世纪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具有当代危险性,显然该剧生动地吸引了卷入事件的参与者。1月底,共产党当局宣布取消该剧的演出。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几百名学生游行前往位于波兰首都的密茨凯维奇纪念碑,谴责审查制度,要求“自由演出权”。其中两名学生,亨利克·兹拉耶弗和亚当·米奇尼克向法国《世界报》驻华沙的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之后这篇报道在“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广播了出来,结果米奇尼克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学校开除了。

由此引发了学生组织向波兰议会的请愿潮,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做出了同情学生的决议,科拉科夫斯基等著名教授、作家们都发表了为学生辩护的言论。有一位作家公开抨击党执行的文化政策是“聋子专政”。3月8日,华沙大学的学生们集会,抗议开除米奇尼克和兹拉耶弗一事,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散。3天后,这件事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活动,华沙大学学生罢课。党内那些新斯大林主义者开始预言党已失去了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莫斯科,要注意波兰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修正主义”的危险。

哥穆尔卡政府坚决反击,采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罢课和紧接着的抗议示威活动,激起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内阁两名高级部长辞职,以示抗议。华沙大学又开除了34名学生和6位教授(包括科拉科夫斯基在内)。接着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参见下文),政府当局逮捕了一些为抗议苏联入侵而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从1968年9月到1969年5月,通过长时间的系列审判,华沙、弗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罗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被判处了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秘密组织”、“散发反对国家的出版物”等等。像亚当·米奇尼克、扬·利廷斯基、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这些早就积极参与学生先前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被处以重刑。

在1967年到1969年间,波兰那些被逮捕、开除和监禁的学生、教授中,犹太人极不相称地占了很大比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早在1956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后,波兰党里的保守派势力(新斯大林主义者)就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他所推行的、即便是有限的自由化政策。在内务部长米奇斯拉夫·莫查尔的带领下,党内的反对派们联手制造了这起反犹事件。

自斯大林去世后到1967年,虽然在东欧和苏联本国内部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共产党的官方言论绝口不提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去了西方或以色列。那些留在原地的许多犹太人也都尽可能地在斯大林对犹太人进行大迫害运动的后期逃离了。然而,在波兰、(尤其是)匈牙利,还存在着重要的犹太人社区;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按犹太方式生活,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对那些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而言,他们通常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出于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为好。〔8〕

尤其在波兰,在人数相当多的党员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员,还有些人是教授和专业人士,许多人都对他们的犹太出身非常漠然,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波兰人也和他们一样并不重视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想在党内夺权或在民众中蛊惑民心的话,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必然会成为诱人的靶子。〔9〕所缺少的只是机会。然而1967年6月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六天战争及时地提供了这一时机。苏联对阿拉伯人的支持,更是为公开批评以色列、批判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正当理由。

因而,哥穆尔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谴责了那些在最近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混为一谈:“我想宣布,只要波兰犹太裔公民愿意,我们就不应当阻止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我们的立场就是,每个波兰公民都应当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人民的波兰……让那些自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人、那些不顾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当的结论吧。我们不想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第五纵队。”将犹太人看作是波兰的第五纵队的说法,通过广播、电视传到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耳朵里。它传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435

不管哥穆尔卡表达的是否其本人的意愿,或是否只是在为过去10年来的政策失败寻找替罪羔羊,或者仅仅是预见到了莫查尔正在蓄意推翻他,而他本人已下定了决心要战胜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这些已经永远无人知晓了。但他所下的决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波兰当局在整个波兰尤其是在党内和学术机构内,掀起了一场蔑视犹太人的浪潮。党内官员开始散播言论,暗示经济短缺等问题都是那些犹太裔党员们造成的。在那些一心为波兰国家利益着想的“好”党员和那些心思在别处的其他(犹太)党员之间,公开地划上了一条分界线。

1968年,那些被逮捕或被开除的犹太裔学生家长、亲戚们本人也都被逐出了官场,解除学术职务。检察官们尤其关注出庭的学生和教授们的名字和出身,这和50年代斯兰斯基案和其他公审案很是相似,但在共产主义的波兰却还是头一遭。在反犹主义狂热的高潮时期,各家报纸都直接按照《纽伦堡法》所制定的标准来为犹太人定论,也许,执政党里的斯大林主义派系的这种做法毫不令人惊奇。

犹太人现在被请出了波兰国门。许多人由此而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付出了巨大的

〔8〕 在波兰,1960年代中期约3万名犹太人中,只有不到7500人属于正式的犹太人组织。

〔9〕 出于反犹目的而编造的伪书《犹太长老议定书》于1966年以波兰文出版,曾在党组织、大学和军队里私下发行。

个人代价。留在波兰的3万名犹太人,约有2万人于1968—1969年间离开了波兰,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轻人,包括正在狱中服刑的米奇尼克和他的同学们。这场动乱的受益者是莫查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他们接管了党内和政府部门里犹太人留下的空缺。而受损害的除了波兰的犹太人外,还有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它们失去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包括科拉科夫斯基,他不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还娶了位犹太妻子)。哥穆尔卡意识到自己所激发的这一切变化时,已为时过晚矣,两年后他自己也被赶下了台。而波兰本国的国际声誉又一次地、并且在以后多年里也就一直不可避免地虐待犹太少数民族连在了一起。

波兰的统治者之所以可以相对轻松地孤立并破坏学生的示威抗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及其不满同其他国民分离了开来,由于运用了这种策略,反犹主义自然起到了作用。对此,学生们自己或许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尤其在华沙大学,波兰共产党
436 高官们那些享有特权的子女们,在抗议和示威活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正如他们的对手、新斯大林主义者很快就指出的:华沙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们根本不关心工人大众的面包和黄油问题。反过来,那些波兰民众有意对起诉犹太人和学生的事件无动于衷,尤其是对那些犹太学生更是毫不关心。

两年后,即1970年,波兰政府提高了30%的食品价格,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用罢工来表示抗议,结果得到的回应是竟然无人愿意支持罢工。然而这些年来的教训是,倘若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想要向党挑战的话,他们就必须抛弃相互之间的冷漠,结成一种政治联盟。尤其对亚当·米奇尼克和雅契克·库伦自己他们来说,更是会好好吸取这一教训,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在这一方面1968年的波兰事件至少有一种积极的后果,尽管是推迟了的。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60年代初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处于一种混杂状态,正痛苦地经历着从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向改革的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1950年代的公审和清洗运动在布拉格到来得比较晚,而产生的影响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远、更长久。这里既没有老派的斯大林主义精英,也没有捷克的哥穆尔卡或卡达尔。旧政权的捍卫者们仍然当道在位。为调查斯兰斯基案及其他公审案件,专门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第一个是在1955年到1957年,第二个则从1962年到1963年。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的背后目的,多少承认了政府最近所犯下的罪行,但它却并不会由此而放松现在的统治权。

这个目标在短期内达到了。斯大林式公审的那些受害者都获释并恢复了原职,其中许多案件还是在那些起诉他们的同一批政治家、同一批法官、检察官和审讯者的要求下获

得了重申。原先的犯人们又重新恢复了党籍,获得了一些金钱赔偿,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例如一辆轿车),而且有些人还归还了原来的公寓。他们的妻子重新找到了工作,孩子们也得以重返校园。除了遭受了过去这些实际上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外,共产党和它在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还在继续执政,丝毫未受什么影响。

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一样,在决定跟随赫鲁晓夫的榜样来批判苏联的独裁专制之前,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一直等待了好多年,以观察政治风向的变化。捷克所经历过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时期是如此的极端,历历在目,以致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情愿承认他们所犯下的任何“错误”,以免贬损1956年波兰动乱或匈牙利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就尽可能地故意拖延时日,连矗立在高处俯瞰布拉格的斯大林塑像和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法那座仿制的小雕像也都在1962年10月前一直未被触动过。〔10〕

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导致了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更重大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比起其他听命于苏联统治的国家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恐怖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通常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社会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他阶级人人每况愈下的社会运动,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地区成了1950年代的显著特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职业性高等教育机构里,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了1956年的31%,到了1963年更是接近了40%。在苏联统治的欧洲国家中,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一个国家。

因此,共产党领导人确实想按1960年宪法所宣布的,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却付出了发展停滞的代价,即使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一代价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在1962年12月的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当局决定“调整国民经济”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接受并允许少量不可避免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以激活处于停滞不前的经济现状。然而,由奥塔·西克和共产党内另外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工人享有一部分工厂利润以刺激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只要求他们完成国家制定的计划或规定——却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反对,最终在4年后的第13届党代表大会上才得以通过。

〔10〕 并不是只有诺沃提尼一个人害怕反攻倒算。1963年4月5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私下写了封密信,要求诺瓦提尼及其同事们在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结束前,不要公开已恢复斯兰斯基名誉并释放其他公审受害者的消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深知,10年前捷克领导人在公审中参与大规模司法迫害的行为,完全有理由引起人们对共产党人的不满。

此时此刻,正如领导层一向担忧的:公开恢复名誉、小心翼翼地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期待哪怕是最温和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合并在一起,都已经引起人们对共产党束缚公众生活的强烈质疑。1963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可能并没有得到基层劳动者的普遍欢迎;但对那些作家、教师、制片人和哲学家而言,放松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意味着能够迎来一种新的前景,可以让人大肆批评,可以有许多希望和期待。

1963年在利贝雷茨,作家们举行了纪念弗朗茨·卡夫卡的大会。在此之前,卡夫卡一直是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卡夫卡作为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因此会勾起人们对波希米亚失去的历史的记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中都深刻地预见到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令人尴尬。因此,允许讨论卡夫卡就预示着今后的公众讨论将变得更加自由:从讨论被禁的作家到议论那些被害的领导人,这仅仅是跨出了一小步。1963年4月,重新恢复了名誉的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诺伏梅斯基在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充满敬意地提到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克莱蒙蒂斯——斯兰斯基公审案中一名受害作家。现在,虽然人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以“修正了的”的语言来谈及这一切,但那种想要谈论过去历史的欲望却开始变成了中心话题:1963年,青年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文学期刊《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谨慎地批评了捷克文学中斯大林主义导致的“背离”现象,提出文学有必要说出真相。

在那些年里,捷克斯洛伐克人相对的自由化思想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一种迟来的回应。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政变后,莫斯科方面改变了调子,但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复兴却在继续展开,只是偶尔受到审查或压力。在外国人眼里,最显著的迹象就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影片,而这些片子所小心涉及的主题在几年前肯定会被禁止,例如伊利·门泽尔导演的《被严密监视的火车》(1966年),就很温柔地揭露了战争时期共产党抵抗纳粹的核心神话。这部影片原作者之一是约瑟夫·史考沃雷茨基(他写的小说《懦夫们》主题也很相似,极为谨慎地勾勒出了大致轮廓,在几年前就为他赢得了声誉)。但是那些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昆德拉在内,这些年里还兼写电影剧本。

1966年,路德维克·瓦楚利克出版了小说《斧子》,以虚构手法叙述了他父亲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儿子的幻灭收场。1967年,另一位作拉迪斯拉斯·穆纳斯科则借着小说的形式,尖锐地抨击诺沃提尼和共产党的术语,书名却一目了然:《权力的滋味》。同年,昆德拉也出版了《玩笑》一书,以新的存在主义的手法和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揭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里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现在成了知识分子们的批评靶子,在1967年夏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瓦楚里克、诗人兼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青年剧作家瓦克拉夫·哈维尔攻击当时

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追求物质享受、道德败坏。他们呼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要求国家再次恢复到从前处于自由欧洲的中心“正常”地位。

对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人的影射攻击,显然是针对了所有的人。如今看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早就在略带担忧地关注着布拉格的时局了:勃列日涅夫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华沙条约》国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不值得信赖的分子了。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布拉格城堡中那些年老的斯大林主义者早就对坚持党的路线力不从心。如果他们不坚决镇压1967年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派的话,那倒不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尝试,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两种束缚:其一是若要继续推行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按照匈牙利的路线,适度开放并允许一些反对意见的存在;其二是现在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些难题。 439

“捷克和斯洛伐克”(它的原先国名)一向是一个艰难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要比西北部的捷克人穷困且更乡村化。1918年脱离匈牙利统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多民族之间爆发的内战中,斯洛伐克人一直矛盾不断,民族关系很差,而且又没有得到过布拉格的善待。因此,斯洛伐克许多政治领袖都对1939年的国家分裂表示欢迎,在纳粹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以布拉迪斯拉发为首都的“独立的”傀儡国家。反而是那些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城镇居民中占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捷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那些天主教斯洛伐克人不是保持漠然就是反对共产党。

同样,在共产党执政下,斯洛伐克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了共产党清洗的对象,被指控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阴谋反对共产党(或者两罪兼具)。那一小批幸存下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也和捷克犹太人一样遭到了迫害。然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一直孤立于社会之外。大多数斯洛伐克人都很贫穷,而且都在乡村劳动。对他们来说,战后最初10年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利益和好处。与捷克人相比,他们决不会对命运感到不满。

然而,1960年以后该国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社会主义”宪法比以前的宪法更不关注当地人的主动权或意见,并且还收回了战后斯洛伐克重建国家时的自治权。对大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更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停滞(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是苏联集团的国家中最慢的一个),导致斯洛伐克中部的重工业发展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打击。

1967年1月,在党内专家的建议下,诺沃提尼开始推行预定的经济改革。在布拉迪斯拉发,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决策非集中化”和增加地方自主权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与利润相挂钩的工资激励制度——并没有经过仔

细考虑,因此对斯洛伐克效率低下的工厂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们毫无吸引力。但诺沃提尼完全出于本能地抵制了一切使党放松控制权的改革,所以他鼓励对提出的建议作修改,目标是加强中央计划体制。这不仅暗中破坏了西克等党内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更是远离了斯洛伐克人的观点。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自己开始在内部讨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以及同布拉格那些年老的共产党政府官员们合作的困难。这些想法得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的斯洛伐克清洁工、建筑工人、教师和店员们的响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而且一直被捷克的主流社会忽视。也有人开始谈论被遗忘已久的战前屈辱和斯大林式的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大清洗。

440 与此同时,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发生动乱的迹象。1967年10月31日,布拉格科技大学的一群学生们在斯特拉霍夫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切断他们寝室里的电源。然而,他们要求“多一点光!”的呼声正可以解释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后来被称为“斯特拉霍夫事件”的这次示威遭到了警察局高效、残暴的镇压;但这更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暗示着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学生运动。

诺沃提尼和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面对如此挑战也束手无策。由于缺少反犹的机会,他只得求助于勃列日涅夫来对付当地对他的批评。然而在1967年12月,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抵达布拉格时,却只是含糊其辞地称赞说,他所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所做的一切都很恰当:“那是你的事情。”诺沃提尼的同事们立刻抓住了时机: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一位新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这位新人还很年轻(只有47岁,比诺沃提尼小16岁),来自共产党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过去3年里,他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将会既支持改革、又安抚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台1个月后,党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经济改革计划。杜布切克纯朴而毫不做作的作风更是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而他那毋庸争议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在当时更是让正在焦急地关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安心。

要说杜布切克的动机在观察者眼里并不明朗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起初,这种含糊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各种不同的派别都在竞争想要获得他的支持,为他提供强手的力量。在他当选几个星期后,布拉格举行了公众集会,要求取消审查制,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真正深入地调查50年代的大清洗案,并要求追究诺沃提尼身边的那些老近卫军的责任(诺沃提尼虽被取消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地位,但他还在担任国家总统一职)。杜布切克积极顺应这波民众潮流,批准放松审查制度,并开始在党内和军队

内清洗诺沃提尼派。

3月22日,诺沃提尼极不情愿地辞去了总统一职,一周后由路德维奇·斯沃博达将军接替总统职位。又过了5天,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行动纲领》,宣布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权;恢复过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誉,并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此时,共产党正式批准纲领中所宣称的要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人性化社会主义”。经过一段时期后(文件中称需要10年过渡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允许成立其他党派,和它一起参加真正的竞选。这些想法并非原创,但经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官方机构公开宣布,却引发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开始了。 441

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要以当时的三种幻想来定局。第一种是在杜布切克上台后,尤其是颁布了《行动纲领》之后,全国都在传闻和议论说,“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计划中也可以包容自由和改革。现在看来,当时所认为的1968年的学生、作家及共产党改革家们正在“真正”地寻求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追求“人性化社会主义”的热情仅仅是一种妥协论调或习惯性的表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当时存在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制度媲美,它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集体目标,这种思想对捷克学生们的吸引力,一点都不亚于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们的吸引力。

诺沃提尼那一代人的并不可信赖的斯大林主义和杜布切克时代新的理想主义之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后者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得到了共产党员们的欢迎。^[11]正如伊利·佩利康在关于捷克政治审判的第三份调查报告(1968年受杜布切克委托调查,但在他下台后即被废止)的“前言”中所声称的:“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极大的声誉,人民群众自发地宣称他们拥护社会主义。”^[12]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并没有太脱离当时的实际舆论情况。因此,这就导致了第二种幻想。

既然人们相信共产党可以从历史中拯救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就假设他们可以进行改革而不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4月18日,组建了以奥德里奇·泽尔尼克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戴和支持,并举行了庆祝游行(尤其是在传统的五一节庆祝会上),它确实在公众表达意愿方面放松了一切形式上的管制。6月26日正式废除了对新闻和媒体的审查制度。同一天,还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国

[11] 1967年12月,共产党员人数占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16.9%,这在共产党国家里是占比例最高的一个。

[12] 伊利·佩利康主编《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判。1968年杜布切克政府调查委员会被压制的报告》,(斯坦福,1971),第17页。

家,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同组成(这是后来经过镇压后,杜布切克所有改革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成果,于1968年10月28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442 然而,在放松对一切意见的控制后,接着,共产党领导层却在行动的逻辑方面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什么还要等上10年再实现自由、公开的选举呢?既然取消了审查制度,又为何保留对媒体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呢?6月27日,捷克的一些刊物刊登了路德维克·瓦库利克一份“两千词”的宣言书,向“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呼吁重建政党,成立公民委员会,来保卫并促进改革事业,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抓住时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以推动更多变革的建议。这场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瓦库利克警告说:共产党内的反动分子将会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斗争,甚至称可能会“利用外国势力来干涉我们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让人民来加强党内改革者的力量,迫使他们加快改革步伐。

杜布切克驳回了瓦库利克的宣言书,不同意宣言书中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它的独断统治权的说法。作为一名毕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会同意这种重大的、本质上的转变(“资产阶级多元化”),而且并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这样做。在杜布切克看来,如果要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本质的话,那么共产党本身就是可以促进这种激进变革的唯一恰当的载体。共产党得到群众的拥护越多,就越可以更安全地推行更多的变革。然而,正如瓦库利克宣言书中所明确而残酷地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受拥护及可信赖度将越来越取决于它所推行的改革意愿,而这终将导致它失去权力。如今,在共产党国家和开放社会之间所存在的错误路线已完全显露无遗了。

而这些事情反过来又在1968年夏天将全国的关注引向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幻想:杜布切克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他可以说服苏联同志们放心,不用担心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可以从新近赢得民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那里、从重新恢复信心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杜布切克之所以会做出这样致命的判断,实在是因为捷克的改革家们完全错误地解读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认为,伊姆雷·纳吉错在脱离了《华沙条约》并宣布了匈牙利的中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坚持留在《华沙条约》内,毫不含糊地与莫斯科结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就会让他们自行其是。

然而到了1968年,苏联更担忧的是共产党会失去控制权,而不是军事安全。早在3月21日苏联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佩特罗·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坏榜样的传染性,他报告说,来自布拉格的谣言对乌克兰青年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在3月,波兰和东德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议上也向他们的苏联同伴们发出了类似的告诫(内乱缠身的哥穆尔卡对布拉格公众舆论批评波兰反犹主义一事尤为

光火)。让布拉格蒙在鼓里的是,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说起过必要的话将采取“具体军事措施”;4月份,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秘密授权起草了一份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计划——“多瑙河行动”的第一份草案。 443

随着布拉格自由化的每前进一步,莫斯科方面就变得越来越不安。杜布切克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5月4日到5月5日,他和其他捷克共产党人访问莫斯科,东欧集团的领导人们亮出了一张抱怨和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抗议书。然而,杜布切克还在继续坚持认为,共产党仍然在掌控一切,不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有多么自由,整个国家还是毫无疑问地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但是现在,捷克军队是否还效忠于党却是个问题,而且不受审查的捷克新闻界正在发表反对苏联的文章。那些访问布拉格的苏联学生可以读到、听到一些在自己国家一直被禁止发表的言论。布拉格成了向西方敞开的一扇窗户。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们决定以兄弟之情联名写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警告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危险,并列举了一些应采取的对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重要利益。”两星期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苏一捷边界上的蒂萨河畔切尔诺会晤,杜布切克再次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并使他相信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推行改革而损害党的地位,而是正在扩大它的公众支持率。

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信服,反而更加怀疑杜布切克的计划。《华沙条约》组织宣布将在靠近捷克边境处举行军事演习。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一次华沙条约国成员会议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勃列日涅夫提出,今后所有的指令全都得以他的名义签发:“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但若还是共产党,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削弱任何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它们不会对此漠然视之。”

这一宣言虽略带掩饰,但却断言克里姆林宫有权采取防卫措施,消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杜布切克应该歇手了。然而,他却对此束手无策,只好继续坚称他的国内改革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任何威胁。8月13日,在和多疑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会谈中,杜布切克费尽心机解释说,他正在努力压制公众对苏联的舆论批评,但“这种事件并不是只通过上面的直接指令就能解决的。”要是他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他的5名同事早在8月3日就私下里递交给苏联一封密信,声称捷克斯洛伐 444

克的共产主义秩序已经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请求苏联出兵实施军事干涉的话,也许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13〕

8月18日,苏联才最终正式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愿意——从直觉上感到,无论多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胜,但后面的余震却可能导致许多麻烦——但此时此刻已势在必行了。苏联领导人预计到,即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明显得胜,而他们现在正切实地害怕捷克的例子会在周边邻国中产生影响力。正如格列奇科在决定入侵前召集苏联军事领导人会议时所告知他们的:“即使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实施。”其实,苏联领导人心中十分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倒并不是因为当时华盛顿方面正全力以赴地在打越南战争。仅仅五个星期前,华盛顿和莫斯科刚刚联合签订了《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美国还不想为了这几百万迷失了方向的捷克人的利益而破坏这样的成果。因此,1968年8月21日,来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苏联的50万名华沙条约国士兵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14〕

这次入侵遭遇了一些消极抵抗,尤其是在布拉格引发了许多次群众的上街抗议,但在捷克政府的紧急请求下,他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遭到镇压。苏联领导人对这些不友好的接待略感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们的坦克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他们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那些位居领导层的同伴们,之后又用飞机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并迫使他们签下一份协议,要他们放弃原来的部分计划并同意苏联占领捷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方面就可以装出一种姿态,承认这些改革家们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并至少暂时同意他们继续执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切都会显得很轻率。

此外,对布拉格改革的镇压——号称为“使之正常化”——的进程几乎正在同时进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被取消了,重新实行了审查制度,并禁止谈论有关执行《行动纲领》的一切话题。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军事强占布拉格这种专制统治大为支持。这不仅仅是安德罗波夫和谢列斯特的愿望,而且很明显也是民主德国的沃尔特·乌布里希、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等人的心愿。然而,勃列日涅夫却选择让杜布

〔13〕 这一请求并非是自发的。两周前,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畔由亚诺什·卡达尔主持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谢列斯特向瓦西尔·比拉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中杜布切克的政敌之一)提出,莫斯科需要一封“邀请函”。因此在邀请莫斯科“介入并全面支持”之前,该信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失控”、可能引起的“反革命政变”及“对社会主义的危险”。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恳请贵方对我们的陈述严格保密,也正因为有鉴于此,我们才会私下里给远在俄罗斯的你们写信。”

〔14〕 由于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入侵行动,也不允许华沙条约国军队穿越罗马尼亚国土,保加利亚军队不得不空降到乌克兰。他们的出场并不能摆平这次麻烦,但这种为了进攻而跨越如此多的兄弟国家,让它们也担负责任的做法,其重要意义压倒战胜了其他一切想法。

切克继续执政了几个月,继续在该国实行联邦制(目的是要将主要要求已获满足的斯洛伐克人从激进的捷克人中分裂出来)以静观事态的发展,同时继续维持《华沙条约》的现状。

学生们偶尔还会为了捍卫改革而举行一些示威活动,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工业城镇,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模仿1956年匈牙利模式的工人委员会(在顶峰时期,即1969年1月,这些委员会宣称代表了全国六分之一的劳动力,但在斯洛伐克,它的力量却很薄弱)。然而,查理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扬·帕拉赫,却为了抗议苏联的侵占及其之后的行为,而在布拉格的温切斯拉夫广场上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自焚以示抗议。3天后,即1969年1月19日,帕拉赫因烧伤抢救无效而身亡。1月25日,为他而举行的葬礼成了举国哀悼的一种方式:为了帕拉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民主。

人们又一次上街举行了民主大游行(这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冰上曲棍球赛中击败苏联后),克里姆林宫就利用这次机会剥夺了杜布切克的权力,并于1969年4月17日挑选他以前的同事古斯塔夫·胡萨克替代了他。胡萨克是斯洛伐克人,而且以前曾是公审案的受害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曾因“民族主义”罪而被判入狱),他成了可以肃清改革异端、而又不会被指责为回到斯大林时期统治的理想人选。捷克斯洛伐克接下来所遭受的压制,比过去显得温和了些,但却更加高效。政府未使用公开审判的方式,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内部一切“不可靠”的人物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其中被驱逐的人中9/10都是捷克人)。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活跃或突出的男男女女都被接受“面试”,要求他们签订声明,弃绝过去的言行,并且不再参与杜布切克的改革。大多数人签了字。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被剥夺了工作,并连带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遭到了社会的遗弃。然而,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些年来在党内外占据了显眼位置的那些人物:记者、电视台播音员、杂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学生领袖。〔15〕

对这些知识分子实行的“屏蔽”和肃清运动都是由那些下层官僚、警察和党的干部来执行的,他们多半不是那些受害者本人的同事。他们的目标只是要求他们认一点罪,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控告他们,而是为了羞辱他们,从而在这个动乱的社会中通过顺从以求自保。1968年,全国都在经历一场心理恐慌,伪先知们利用了接踵而来的“歇斯底里”的状态,预测整个国家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到正道:接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统治,即一方面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又必须接受无处不在的监督统治。

446

〔15〕 1989年后,资料显示,在正常化年代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组建了一种特殊组织,来监视和对付犹太人:这既是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历史的回响,也是同时代波兰的写照。当局注意到,在杜布切克的领导圈内,仅有一人拒绝按莫斯科的要求签字承认自己会放弃行动。这人名叫弗朗梯斯科·克里格尔,是领导层中唯一的一名犹太人。

暴力的威胁似乎总是挥之不去,但实际上却很少发生,这更增加了一种集体的羞辱感。和1938年、1948年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败在了自己手里,而且沦为同谋犯。直到1972年,那些诗人和剧作家们还在被迫清洗锅炉、擦洗窗户;大学讲师们还在砌砖墙,那些更会惹事的学生们都被开除出校门;警察局里堆满了有用的“认罪”卷宗;那些共产党改革家们不是屈服认错就是被流放在外——正如正常化运动的一位受害者在一篇出色而又充满痛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又“恢复了秩序”。〔16〕

整个共产党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抗议性的涟漪。1968年8月25日,在红场上举行的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活动中,参加者里面有巴威尔·李维诺夫(斯大林时期的外交部长之孙)和拉丽莎·达尼尔(被关押的苏联小说家之妻)。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欧各国军队都被误导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以免受到西德和美国的人侵,但他们后来都悄悄地撤离了,他们的可靠性——尤其是占领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军队——非常令人值得怀疑。在波兰,对布拉格的镇压一方面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统治当局对此进行彻底镇压的力度。1969年4月,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位犹太女学生伊利娅·利普斯引火自焚,以唤起人们对苏联处置杜布切克行为的警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本身,还有苏联集团中原来最亲苏的一些国家,现在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一种抑郁的默然状态。

但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自主权,任何背离共产党专政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与此相比,在国内外不受欢迎只是为求得稳定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1968年后,在莫斯科再次表示若有必要将不惜以武力相待的“态度”下,苏联统治区那些国家获得了稳定局势。然而,共产主义再也不会——1968年的真实教训,首先对捷克人而言,但是对其他一切人来说也必然如此——再也不可能继续成为大众的共识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的历史教训也都如此。

在布拉格,对改革运动的破坏令其元气大伤,只留下痛苦的回味。许多最热心的整肃者仅在几个月前还都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最积极拥护者。共产党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道:“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这种从杜布切克开始,然后是共产党内部,最后又弥漫到整个社会,在苏联君主和各地的仆从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顺从,不仅仅是一种蒙羞(简直可以和12年前的匈牙利相媲美),它给改革年代本身的理想和希望投上了一种起反作用的令人怀疑之光。

许多年后,姆利纳尔回忆起1968年8月21日红军士兵闯入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会议,

〔16〕 米兰·西梅斯卡,《恢复旧序》(布拉迪斯拉发,1984,地下出版物)。在苏联入侵后,8万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逃亡国外。

每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守着一名士兵时的情景时,他说:“此情此景下,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都一下子退到了底。但同时,你又会直接联系到好像正有一支自动枪支指着你的后背。”正是这种联系,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更明显地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历史出现了转折点。

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碎,再也无法复原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定的“行动纲领”不是一种开始,而是一种结束。那些改革家或激进分子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执政党会实现他们的抱负或采纳他们的计划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开始蹒跚而行,依靠着不太可能的外来借贷的支撑和苏联人的刺刀来维持:直到1989年整个体系才最终崩散。其实,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驱散了新左派的论调和计划——对后工业时代的异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缺少精神质量的强调说法将迅速地被淘汰,而代之为一种新的对工作和薪水的关注。〔17〕在东欧,60年代的情况是你再也无法在“体制”内工作了;而在西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铁幕的双方都抛开了幻想。只有那些铁了心要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真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暗中活动的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暴力和犯罪活动。

从短期来看,60年代所取得的实际成就非常单薄。18岁的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处。大学尝试将设施升级、改进课程、更多地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这些都取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到处都能获得更为便捷的离婚、流产、避孕途径,在言论和行动上,大部分人们不再限制性行为。1970年5月,通过《劳工法》,意大利工人们赢得了不受任意解雇的保护权。总之,这些变化构成了欧洲社会的文化转型;但在1968年生活在标语和行动中的那代人眼中,它们根本就不算什么“革命”。〔18〕 448

事实上,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

〔17〕 婴儿潮一代人本身从来不用急于就业。反而是他们的后来人,1953年以后出生的那代人一踏上社会就经历了工作难找的阶段。毫不稀奇,这些后来人的政治观明显不同。

〔18〕 只有西班牙,社会抗议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才融入并回归到议会民主制上,这时,60年代的动乱才显示出它预示了一场真正的政治转型。详见本书第16章。

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

然而，如果说60年代的逝去最终并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悼念的东西或几乎没什么永恒的纪念丰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从70年代初期看来，它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包罗万象，而又如此地自然正常。在70年代的初始，欧洲一直由那些年长者控制着，并且看上去也是在为这些年长者服务。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和 workplaces，还是在媒体或政治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0年里，这些年长者（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相继过世。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这种社会转变非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如英国，这种转变经历了好多年才得以实现，而且它的方向只有后来在回顾中才能完全得到肯定。〔19〕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对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449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19〕 1963年英国的普罗富摩事件——这是一桩精心策划、包含性、阶级、毒品、种族、政治及间谍案于一身的事件——几个月来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这件事要是放在几年前，简直会令人不可思议。一位精英人物因小过失而堕落垮台可能会继续引起人们一定的好奇心，但过了60年代以后，这些事情就不再令人震惊了。

POST WAR

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而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却是用一种自怡自乐的甚至抒情的方式来尝试叙述1945年之后欧洲复苏、像凤凰一般再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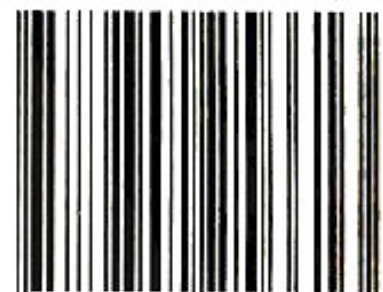
托尼·朱特坦率地提供了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上述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在这段风诡云谲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现在，作者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很难有人能超过托尼·朱特的成就。

——诺曼·戴维斯，《卫报》



ISBN 978-7-80225-661-3



9 787802 256613 >

定价：88.00元

(上、下册)